图文名人丛书

毛泽东研究专家、一个铁骨铮铮的老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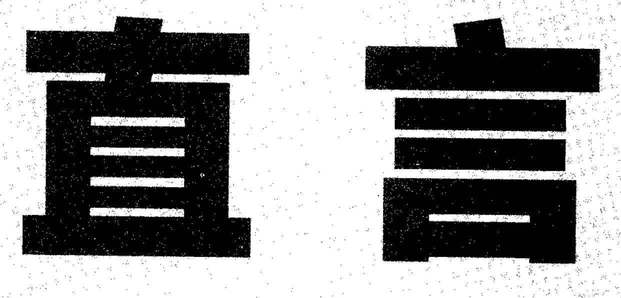


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著　薛晓源／编

今日中国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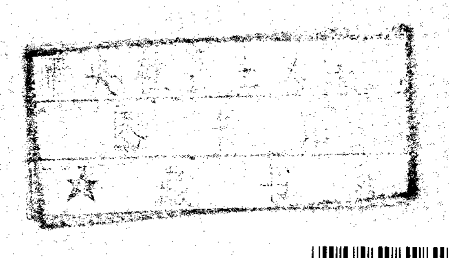
毛泽东研究专家、一个铁骨铮铮的老革命



直言

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著 薛晓源/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李锐著.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10
(图文名人丛书)
ISBN 7-5072-0944-X

Ⅰ.直… Ⅱ.李… Ⅲ.①政治-概况-中国-当代
②李锐-回忆录 Ⅳ.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5378 号

出版发行:今日中国出版社
社　　址: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68993927(发行部)
　　　　　68326644—4114(编辑部)
电脑制作:外文出版社电脑照排室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5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0 册
书　　号:ISBN 7-5072-0944-X/C·44
定　　价:29.50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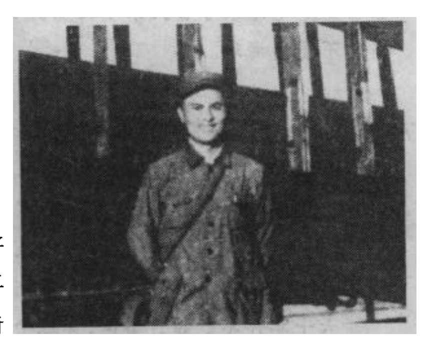
家事琐忆

父亲李积芳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加入同盟会，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同为第一批会员。

母亲能到启明女校读书，当然是由于父亲的极力支持。母亲很聪明，文言作文在班上总是第一名，还跟着父亲学会做诗，互相吟和。

父亲回国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国会解散期间，曾专营商矿，不问政事。他病逝时，李锐不满五岁。父亲虽做过不小的京官，但为人清正，因而“身后萧条”。

投笔从戎·延安六年



李锐性格耿直，无论利害关系如何，他看不惯的就要讲。在延安与人创办《轻骑

队》墙报，因文风尖利而轰动延安。经胡乔木推荐，毛泽东期期必看。

受康生迫害，在"抢救运动"中李锐被关进延安的监狱——保安处，受到严重的刑讯逼供。历经一年零三个月，经周恩来过问后出狱。

痛说"大跃进"



毛泽东听到李锐说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

毛泽东说：李锐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人算是好人，有点头脑，就是胆小。他大声地问：李锐来了吗。坐在会场最后一排的李锐只好站了起来。毛说，你坐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头来嘛！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胡乔木提醒说，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毛泽东鼓动"大跃进"说："这是一种责任，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

除你的球籍！”

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舞台，因而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经由历史来证明是办了蠢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错误的主观意志论和不负责的政治随意性加以彻底清算，那么我们还会不会再干类似的蠢事，我们这个民族还会不会再次陷入类似的“狂热”，这个问题似很难作肯定或否定的答案。

亲历庐山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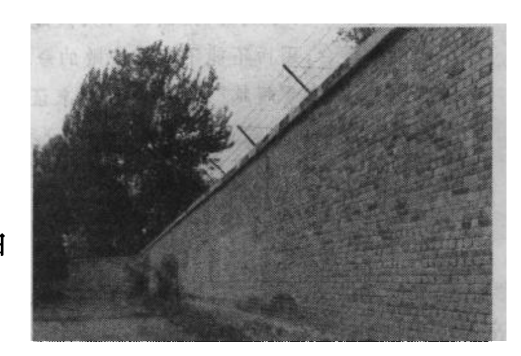


1959年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去谈话。毛说，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他说：“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

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

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不仅直接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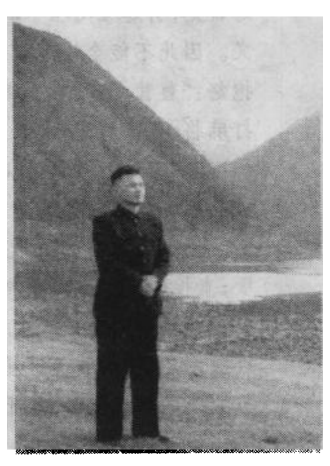
秦城铁窗八年



1967年11月关入秦城不久,就听到楼下有锤凿墙板的施工声响,随后又从高窗窗外见到高架起重机的长臂,这就更证实了我的猜想:定是"粥少僧多"。

牢房门的上端有个钱眼大小"观察孔",巡逻哨兵每隔一分钟要窥看一下。擦身,气功,这些活动哨兵不干涉,但一跑步、旱游起来,就会惹起一些哨兵的训斥。由于门是上锁的,他们进不来,我仍我行我素,有时也解释两句。有一次,一个哨兵打开小方门,命令我过去,待我面对面时,竟吐了我一脸唾沫。

治水情结与三峡工程大争论



毛泽东多年来听了林一山的话,想上三峡(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词)。会上他听说李锐是反对派,于是把林、李二人都找去。大家为李锐捏了把汗。可是,听完二人当场的说明,又命各写一篇长文(李锐的"长文"即本文)之后,便采纳了李的意

见。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有理，个别问题他还是听得进意见的。毛泽东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要李锐做他的兼职秘书。

171／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记

周恩来查勘三峡时说："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

在三月召开的中央成都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关于三峡的决定，李锐在第四项防洪措施的起草中，在最后加了一句话："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许多决定和文件如过眼烟云，而关于三峡的这个决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自然同周恩来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直到周恩来、毛泽东去世之前，不论有关方面怎样催促三峡上马，他们再没有就三峡何时开工有过首肯之事。

194／陪周总理视察新安江

201／访苏杂忆、忆外友

203／如何保证优先发展水电

211／三峡工程定案后答记者问

为解决长江的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问题，总应当有几个不同方案来比较论证吧。皇帝选妃，总不能就让一个美女做对象吧，总得有若干个美女让选择吧。现在的论证是"孤证"，只是就三峡大坝的高程证来证去而已。造成几十年来三峡"孤证"的原因，根本在有关部门的防洪指导思想不对头。

三峡工程只能控制川水，根本不能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长江每年有6.7亿吨泥沙，(防洪)库容200亿立方米，约40至50年必然淤死。

治标先治本。长江防洪应先治理上游，从上到下着手。

中央组织部工作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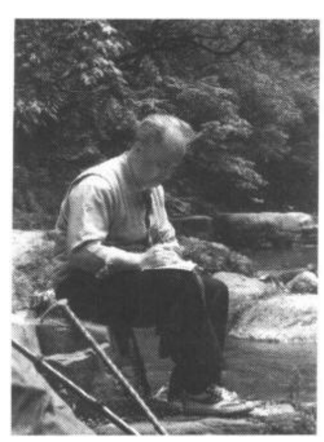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就把“野无遗贤”当作治世的一个标志。封建政权，中央六部，以吏部为首呵。

那种随意定人“成分”，随意把人列为专政对象，随意剥夺他人公民权利的现象，相信今后可不再出现。但是，要消除埋没人才、摧残人才、压制人才的现象，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全面地、彻底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确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

分清敌我友，掌握真正的敌情，这仍然是今后的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抗战初期，康生在党内大搞所谓肃托，华北各地不知错杀了多少共产党员。后来又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幸亏有毛泽东的九条方针，才没有再开杀戒。建国后，“镇反”和“三反、五反”中的冤假错案，情犹可说。随后的“潘汉年事件”、“胡风事件”，到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遍地敌情，如山冤案，直到国家主席、三军元帅、第一书记，都难幸免。敌情观念如此登峰造极，除开新的国际环境、内部情况等复杂原因和错误认识外，确有其“左”的历史渊源。

研究毛泽东

268／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胜利。看来，从劳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

他是一个我行我素不受束缚的人，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很被学校当局欣赏，他还是从那呆板的课堂生活中退出来，跑到图书馆狼吞虎咽了半年，读自己爱读之书。读书是他一生最大嗜好。一个好教师、好报人（主笔兼编辑兼记者），这两者是他的生平志愿。他来自下层，熟悉下层，不是书香子弟，而是农民的儿子，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对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

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鉴戒毛泽东，是当代也是后代中国人的任务。

286／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极广，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无不在其视野之内；在当代领导人中，罕有其匹。但其基本办法，仍是“六经注我”，即利用或改造前人的思想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我们这个根本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也难得摆脱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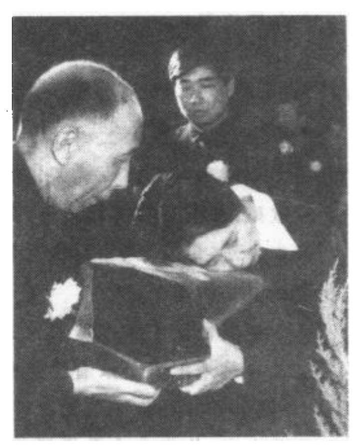
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最后促成毛泽东可以随意实行个人专断。

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完成不顾实际情况，不顾条件的变化，到处照搬照用，必然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此路不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带有这种浓厚的狭隘经验主义色彩。

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夺取战争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驾驭矛盾，指挥若定，是何等游刃有余；可是领导现代经济活动却相形见绌，这些陌生规律过于复杂，非其所长。如果他有足够的民主作风，党内和国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自己不怕认输，不怕下"罪己诏"，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气慨，应当说，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是不难纠正失误的。

他晚年来源于"左"的教条和主观盲动的错误，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无法为之掩饰，正好引为鉴戒。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心中的人物



黎澍说：历史要站得住，必须讲的是真正的事实，写出来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推翻不了的。跟着现实政治的风向团团转，那就不可能写出一部大家都承认的可信的历史。

我们议论过“兴无灭资”的口号，因为80年代中还有主管宣传的人坚持这个口号。黎澍以为这是一个彻底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提这个口号的人连《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读过，很可能还是从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脱胎而来。

393／项南，真不忍言别啊！

项南说：“我党全部历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历史，但也犯过极其严重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为害最烈的是‘左’，而不是右……共产党员要光明磊落，有不同意见，可以说，可以写，也可以保留，但不能搞小圈子，背着大家写一些同党的路线唱反调而又不敢具名的文章。……以‘革命’的极左面目，放肆地反对改革开放。”又说：“新闻媒体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在宣传鼓舞我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敢于揭露我们消极不健康的现象，是一个政党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多么中肯啊！这是我们尊敬的朋友项南留在这个多灾多难而又充满希望的世界的最后声音，也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啊！

活在人心便永生——悼念耀邦

398／序《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当代历史要揭开新的一页，仍有两大难题待解决，即“两个凡是”和如山冤案。要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左”的路线，是一场旋乾转坤的搏战，是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众所周知，为这场搏战、这场革命打先锋的是胡耀邦。当时，他先后在宣传和组织领导岗位上，以“我不下油

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办好了这两件大事。



李锐1982年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同耀邦同志开始直接往来。感到他很是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多年来，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使李锐有如此感觉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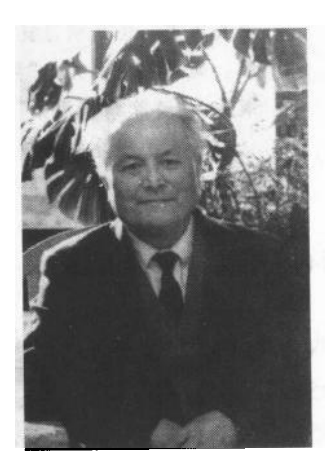
耀邦是一个富于感情的真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失天真的人，他胸无城府，总是以善心待人。

1988年9月间，他让人送来三首诗，要李锐修改。第一首强改为五言排律，除首两句外，都不如原作。第二首作者借巫山神女之口，一气呵成，修改的反添了个要查出典的啰唆句。作旧诗需要一些旧学基础，这方面耀邦虽非行家，但从这两首诗来看，从意境、物象、情源到遣词、用韵，确是古风，读起来琅琅上口。有些老同志也喜欢作旧诗，但语多概念，缺乏诗意，不合格律倒是次要的，被人称为“老干部体”。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左”祸——无尽的忧与思



李锐的《旧事新谈》在光明日报刚刊出三篇，就有一位从来威风凛凛的老将军，拄着拐杖，来到中南海，没有见到要见的人，由秘书接待。老将军拿出光明日报5月7、8、9日载的三篇文章，指给秘书看，并很生气地说：“看了这三篇文章，我火气很大！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把现在比作大跃进时期。”“现在有的地方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把生产停下来，这样做不好。我准备给总理写个报告。”并嘱咐：“你把我的话报告耀邦同志、启立同志，你就说我火气很大。”总书记和总理对此“火气”的批示，报社的同志也给了李锐一份。李锐“早岁曾知世事艰”，深深知道，这种“火气”而且“很大”，是惹不起的。

《旧事新谈》就此夭折。

中顾委撤销后，很少讲话的场合。趁这次列席十五大的机会，本着知无不言之旨（却难言尽），就回顾历史谈一点感想和意见。李锐已逾80，自感来日无多，以后这样的机会恐也难得了。

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左”的阴魂从未散去。

1978年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是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左”王、“左”爷们时有表演。如借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整得周扬抑郁而死；后来还演化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搞了28天，才被制止。

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近20年来，与之相对的种种“左”的干扰始终没有停止过。

八十行吟气浩然



编者的话

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同李锐老熟悉起来。一次去他家约稿，偶然看到他的书柜中堆着许多老相册，十几大本，我随手翻开几本，质地不同的照片大致按历史时期与工作活动，错落有致地排放着，这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主人从投笔从戎到致力水电建设、三峡争论、出国访问、启用一代新人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交往和各种活动，包括近年名山胜水旅游来往。其中一些活动同重大历史事件凝结在一起，弥足珍贵。这些老照片真是令我心驰神往，沉浸于历史的思考之中。

谈起这些老照片，李老感慨不已，说还有几本珍贵的老相册在“文革”被毁，其中一册是到1963年下放安徽大别山前的个人历史总录，从1917年在北京出生三个月时的照片，童年、家庭、学生时代，以及解放战争、50年代水电建设等等，大都是绝版，甚是可惜。不然对他回顾自己一生历史，将是一本很好的图片注脚。李老这席话给了我灵感，遂建议编辑出版一本“李锐老照片”之类的书，同文字相结合。这种书现在坊间开始流行。李老思忖片刻，莞尔一笑说：“考虑考虑再说吧！”今年5月，和老人一起去深圳参加“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研讨会”，朝夕相处十余日，每遇机会总是这样游说：这些照片与他的一些相关重要文字一起编排成书，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虽非全貌，但总能从许多方面向世人展示他一生的奋斗与坎坷，尤其进入中年后，20年流放坐牢，也从这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艰难曲折。这样的书定会吸引不同层次的读者，启发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反思“左”的经验教训。我的这种游说，起了作用，李老表示回京后再定。经过慎重考虑，

当他消除了“吹捧个人”这种顾虑之后，终于同意编编看。于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和我这个30出头的年轻人，在盛夏时节开始奋战，从几千幅照片中精选出一百余幅。

在照片初步选定之后，还要讨论结合照片的有关文字包括文章与诗词的编选。7月17日，当我应约到他的办公室时，只见到留下的便条：

晓源同志：

《龙胆紫集》和《不要忘记钱宗仁》送给你，其余两本书用后请还我。

编入的文章，先给个目录，再推敲一下。

因发烧，到医院吊瓶，不能来办公室了。

李锐

1998.7.17

我感到歉疚不已，懊悔太着急催促一个老人这样做份外之事。直到听说李老病愈，已准备去怀柔山沟中躲夏喘，并专事写作，才放下心来。

在编选照片集过程中，使我感念不已的是李老丰富而奇特的人生经历，他个性刚直，自感“堪慰平生未左偏”。屈子《离骚》的名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是他心路历程最好的写照。

李老一生经历三个主要工作岗位：新闻宣传、水电建设和组织人事，他说自己是个工作干部，不是学者也非作家，却结合工作留下16本著作近500万字，而且中外公认是毛泽东研究专家。这个集子的文字大部分是根据照片编选的，是否妥当，能否展现集子主人丰富、曲折而实实在在的一生，这个责任由编者承担。

薛晓源

1998年7月29日于北京

家事琐忆



李锐的父母亲在民国五年(1916年)左右在北京时的合影。

我的父亲

多年以来，湖南尤其平江编志书的人，总催我为先父作传。可是我一直拖着，其原因是很难找到文字资料。父亲是1922年去世的，我还不满五岁，对父亲的印象都是从母亲口中知道的。如果早有这个打算，50年代时，父亲的许多朋友还活着，必定可以搜集到一些有关资料的。

关于父亲生平的文字资料，现在只有两处：一是《民国之精华》一书中，约300字的李积芳小传；二是《凌容众日记》中的一鳞半爪。前者1916年由日本北京写真通信社出版，日人佐藤三郎编，内收民国初年参众两院443位国会议员的小传，中日英三种文字，有照片，并日文中华民国议会史。后者先在《黄兴年谱》（毛注青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见到。

小传前面，例行的人品赞誉中，有这样的话："君秉性诚原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数，喜闻尽言。"后半是简历："前清时，以湖北仕学馆学员，由张文襄选送日本留学，毕业于经纬学校及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归国应学部试，授法政科举人。辛亥武昌起义，回湘光法制局参事，筹办地方自治，旋组织湖湘法政学校，兼充公立法政各校教员。二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国会解散后，专力经营商矿，不问政事。及国会重开，始入京仍为众议院议员。"

《黄兴年谱》载，1905年8月13日"发起组织并主持东京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这一条中，记有凌容众日记云："未初，偕小溪

(父亲号筱溪)赴富士见楼,因开会欢迎孙逸仙也,不期而会者千余人。警察原限准300人,继许900人。楼中只能容千人,踵门而退者殆又数百人。日本之白浪滔天演说云:吾倾家以谋中国之革命,不成,无以为生,为优人以求食。所以不忍饿死者,欲留一命以见支那之革命也。"

凌容众是父亲的同乡好友,他们一起去日本的。《凌容众日记》(载《湖南文史资料》第十辑)中有他们去日本的具体时间:1905年1月间,平江四人同长沙一批人,"于武汉会齐,93人去日本。16日乘轮离汉口,21日抵上海,30日上日本邮船,31日开船,2月2日抵长崎,3日在船上度过阴历除夕,4日抵神户,5日抵东京"。1905年2月11日记有除辫事:"早起改装剪辫,小溪继之。此次鄂中同寅来东者60人,均结发于顶,独角前峙,若獬貌然。固谓不忘本也。"这也就是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描写的形象:"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我的老家在平江长寿街,这是湘鄂赣交界处的一个大镇,商业往来直通汉口,略得风气之先。祖父是地主兼茶商。据母亲说,父亲考秀才不第,就到武昌读书去了。戊戌变法期间,湖南开始有人去日本留学。1902年以后,湖南官费和自费赴日留学者逐年增加,成为全国最多的省份之一。据1904年统计,全国留日学生2852人中,湖南401人;到1905年全国留日学生增至八千人左右,湖南增长更多。这是由于当年的青年读书人,已不热心于科举,有志之士痛清廷之腐败,多好西书,议论时政,以谋救国。黄兴、宋教仁都在湖北读过书。1902年,黄兴由张之洞派去日本留学,1904年回国,和宋教仁、陈天华等组织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都来到日本。1905年,他们创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民族革命。8月间同盟会成立后,这个杂志改名《民报》,成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陈天华是1903年由湖南到日本留学的,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等鼓吹反清革命的白话文小册子,影响极大。据统计,头两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863人中,湖南籍最多,有157




父亲李积芳(1882－1922年),1905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期间加入同盟会,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同为第一批会员。父亲回国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国会解散期间,曾专营商矿,不问政事。他在英年病逝,其时李锐未满五岁。父亲虽然做过不小的京官,但为人清正,因而“身后萧条”。

母亲李张淑(1890－1980年),1905年与李积芳结婚。在父亲极力坚持下,母亲冲破封建大家庭的牢笼到启明女校读书。母亲很聪明,文言作文在班上总是第一名,还跟着父亲学会做诗,互相吟和。父亲病逝时,母亲只有32岁。母亲用从国会索取的抚恤金,将父亲的灵柩运回长寿街,大办丧事而花光,这也许是她的责任心、自尊心和带有示威性的傲慢心理所致。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李锐姐弟三人,常常是“典衣卖旧物,举债以维生”。母亲“身兼父职”,管教子女极严,在母亲严责下,不满五岁的李锐已认识1000个汉字。此照片是1913－1917年期间在北京拍摄的。

人(广东 112 人,湖北 106 人)。

当年除辫是一件大事,在留日学生中也只有少数人做到,这表示革命精神,同清廷的决绝。凌容众和先父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到日本,还没有上学,就先除辫明志,这说明他们在国内早已接受了黄兴、陈天华等的反清革命思想。因此,同盟会成立后就加入了,成为第一批会员。他们的生年都差不太多:黄兴、凌容众(31 岁),陈天华(30 岁),宋教仁、李积芳(23 岁)。关于凌容众当年的情况,平江县志和有关史料记载颇多,他大概比我父亲行动更激烈一些。1905 年冬,日本政府循清廷之请,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禁止中国留学生的各种革命活动。留日学生群起反对,陈天华蹈海自杀,以绝命唤醒国人,一批留学生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其中湖南来的有秋瑾、凌容众等十多人。1906 年凌回到平江后,特制一铁丝灯笼,上书"凌容众奉旨驱逐回国",遨游县城大街小巷,痛斥清廷腐败,轰动全城;同时向友好宣传革命主张,传播陈天华的著作及《民报》等书刊。1907 年,凌与日本留学归来的夫人李樵松毁家兴学,办启明女校,学校正式开学时,第一班只有八个女生,其中有我的母亲李张淑和李六如的元配夫人钟桓英。关于凌容众的这些事迹,李六如著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中,都有所反映。凌容众于 1929 年去世,谭延闿为凌撰墓表,开首即说:"清光绪乙巳,考送日本留学。居二年,以同盟会会员,触清廷忌,驱逐回国。"新修《平江县志》为凌立传,不忘他启迪新风、早年办学的贡献。

父亲一生重视教育,在日本安心读书七八年。当年留日学生万余人中,因多入速成科的学校,进大学而毕业的为数很少。宋教仁在早稻田与父亲同班同科,他主要从事革命活动,大概是没有毕业的。父亲不仅自己兢兢学业,还提携兄弟到日本求学。他们亲兄弟共四个,大伯在家经商。据母亲说,二伯抽鸦片,父亲强行让他去日本,学的造纸,后发现他仍进日本的鸦片烟馆,愤而驱之回国。二伯还带回一架小型造纸机,一直搁着,生锈报废。四叔名李

积芬(号葵林),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阎锡山同班,且是好友。(阎锡山是同盟会员,四叔想必也参加了的。)回国后,任北京陆军测量学校校长,为陆军少将,1917 年在上海去世。对四叔的英年早逝,父亲非常伤心,在日记中记述他亲自料理丧事的情况(我在大学读书时,保存过这个小日记本)。父亲在北京当国会议员的那几年,还将两个堂弟(六叔、七叔)带到北京读书,1918 年送七叔到法国求学。我母亲能到启明女校读书,当然是由于父亲的极力坚持,才能冲破封建大家庭的牢笼。婆婆每学期只给媳妇一吊钱零用,丈夫从自己官费中节省出钱,支助妻子。儿时母亲同我们谈起这些旧事,还常掉泪。母亲很聪明,文言作文在班上总是第一名,还跟着父亲学会做诗,互相吟和。父亲在日本读书时,寒假回过家。我现在保存的父亲手迹,唯有一张破损的诗笺,上面写的四首旧诗,下端一小截由母亲贴补,将脱落的三句填上。

《宿望仙桥》三首,前两首正是写这种春节回家省亲,短短欢聚又言离别的依依情景:

才是离家又说归,一肩行李总相随。
夜长不寐围炉坐,且数鸡鸣到几回。

世事如棋我不知,望仙桥下水依依。
此行犹忆离家日,道我归来腊尽时。

同这页诗笺一起保存的,还有我母亲的半页手迹,这是旧时的一种九宫格毛边纸,其中有一首《春夜》,大概是回赠父亲的:

幽房独坐意绵绵,剔尽寒灯尚未眠。
纱窗月黯花无影,惟有钟声到耳边。

这两页手迹,是十年浩劫后的幸存物,1979 年春节,我平反复

职后,回长沙看望母亲,没有问清楚母亲是怎样保存下来的。父亲的遗物中有一部李义山诗全刻,广东三色木刻版。看来父亲很喜欢玉溪生的诗,也受其清词丽句诗风的影响。

《宿望仙桥》第三首,涉及时局,大概是学成回国后(1912 年三十岁),到长沙参加法制局,并同宋教仁、谭延闿等组织国民党等活动时,匆匆回乡又急返长沙时作。

三十韶华容易过,一官奔走为谁忙。
若非时局艰难甚,那得偷闲返故乡。

这页诗笺上另一首五律,题为《送江浴民之蒙古》:

边塞烽火急,男儿渡玉关。
短衣三尺剑,匹马万重山。
□□□□□[①] 传书有雁还。
楼兰犹未斩,莫唱大刀环。

这首诗的风格,同《宿望仙桥》的儿女之情完全不同了。江浴民是平江人,可能也是留日归来的朋友,其人其事现在已无从打听。录下这一首诗,只是想说明父亲当年的政治思想气质。

从仇鳌(字亦山)写的《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载《回忆辛亥革命》)中,可大略知道一点这时湖南的情况:"1912 年 8 月 10 日,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众议院选举法公布后,国民党为了争取选举的胜利,随即开始布置各省的选举工作。宋教仁要我回湖南去作司法司司长,以便掌握选举,支援国民党的竞选,同时改组湖南同盟会为国民党湖南支部。""等我回到长沙以后,才知道办理选举属于行政范围,是民政司的事,与司法司无关。那时湖南民政司司长是

① 原文缺一句。

刘人熙,不是国民党员。湘督谭延闿便设法将刘调开,让出民政司司长给我。我即着手筹备选举事务,自兼选举总监督,并按湖南五道,派出监督五人。结果,湖南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胜利。宋教仁为了竞选,这时也回到湖南,到处演说,博得各界人士的称赞和同情。他以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为参议员。"国民党当时是由宋教仁在北京组成的,以同盟会为主干,拉拢了统一共和党和其他几个小党派,合并改组而成,成分极其复杂,远非同盟会可比。属于清末立宪派的谭延闿,这时也已参加了国民党。参议院议员主要代表地区,每省选十名;众议院议员代表人口,80万人选一名,湖南应选27名(平江当时的人口过60万)。当年选民有年龄、教育、财产等限制,不过占人口5%左右,选民选出代表,再由代表选出议员。父亲由平江县选出,为众议员。湖南国民党组成时,谭延闿、仇鳌任正副支部长。儿时听母亲说过,仇亦山是父亲的朋友。1952年我从湖南调北京任水电总局局长时,曾接到仇老的一封信(向我介绍一位老技术人员),可惜我当时未能前往拜会。

宋教仁遭暗杀之后不久,1913年4月,国会于北京召开。母亲已经考入了稻田女中第一班,只能放弃入学,随父亲北上。母亲谈过生平坐"花车"(当年称火车"专列")进京的荣耀。我们姊弟三人都是在北京出生的(1914—1917年)。母亲常谈到父亲这时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湘阴的众议员陈嘉会(号凤光),岳阳的众议员李锜(号莼荪),同属岳阳道的同乡。《民国之精华》中有两人小传。李锜在时务学堂读过书,同焦达峰、谭人凤友善,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后的活动。"赋性豪爽,有侠士风,不屑事举子业。"反袁二次革命时,"潜与陈嘉会返湘,劝都督谭延闿独立,再谋改革。事败,走日本,居数月,更名返国,企图再举。迨滇黔起义,往返沪湘,与各旧同志联合响应。"陈嘉会"前清毕业两湖书院及日本法政大学。归国创立湖南法政学堂。辛亥武昌起义,参与南北议和,与黄兴共筹进行。民国元年,南京新政府成立,任陆军部军法局长,旋任南京留守府秘书长。是年,袁世凯任为国务院秘书长,辞之。"

黄兴到北京同袁世凯谈判时,陈随行。黄一欧的《回忆先君克强先生》文中谈到此事:"据随先君入京的秘书长陈凤光告我:先君至京时,袁世凯表面上殷勤接待,礼遇甚优,并请中山先生和先君提出组阁人选,而暗地则密派心腹随时侦察先君的行动。"(见《回忆辛亥革命》)母亲同我谈过袁世凯对陈伯伯的关注。袁大总统接见全体国会议员时,礼仪隆重,大多着大礼服,袁一一握手。见到陈时,手握得很紧,而且连说"仰仗、仰仗"。陈伯伯当时同父亲议论过这一情节:决非好兆头。陈嘉会在北京的几年,即住在我们家中,这是我从小传前面"住址"条目中见到的:"北京都城隍庙街(现名成方街)李宅"。母亲谈过当年国会开会时发生争吵的情景,议员间互相摔墨盒,以致后来墨盒就固定在桌子上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国会议员常受到恫吓和人身威胁。有次威逼着通过一个议案,让军警把住议会的大门,逼到深夜,议案通过,才放议员回家。因此,这三位曾经是同盟会员的岳州同乡,就各自寻求自己的业余爱好吧。母亲说:莼荪好京戏,成了戏迷;凤光跑琉璃厂,专好收藏字画;你父亲好打麻将,劝不听,有次回来太晚,气得将房中可打碎的器物全部摔到地上。父亲在朋友中是有名的"惧内",母亲则一直以此自豪。我在长沙读中学时,莼荪伯到过家中一次。听母亲说,这位京戏迷后来在南京当寓公时,正式成了票友。父亲去世时,陈伯伯为首操办丧事。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南下到长沙时,陈刚去世,得知程潜当省主席时,他曾任省参议会议长。陈的长子去看望过我的母亲,谈到土改时,他父亲所藏书画全部被毁。此事使我长久耿耿于怀。土改时注意保护了曾国藩故家,而忽略了陈嘉会等这些人物。陈送我父亲的他自己画的一幅山水,由我大姐保存下来,现在由我藏着。

1917年我出生后不久,张勋复辟,举家南迁到平江,那时国会已被黎元洪解散,孙中山在广东举起护法的旗帜,欢迎国会议员南下广州集会,后来到广州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于是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父亲去广东参加了非常国会。母亲

提到过的父亲朋友，如谭延闿、孙洪伊、周震鳞、覃振、彭元彝等，这时大体都在广东或同孙中山的军政府有密切关系。这些人是否当时都属于国民党的右翼，因而我父亲的政治倾向同他们相似，我难以断定，也没有必要就此作什么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我的父亲一直盼望广东的军队能够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父亲从广东带回的纪念物，儿时印象最深的是磨墨用的注水器，伴随我读完小学和中学。那是一个没上釉的本色陶器，水牛趴在地上，牧童爬在牛背上，牧童的背上有个斗笠，将斗笠取下，水由小孔中注入，从牛嘴中吐出。这一类的佛山陶器和其他广东小特产，父亲带回很多，分给我们姊弟和老家的孩子们。谭延闿在广东送我父亲的四幅字条，上书苏轼《张先词跋》"张子野诗笔老妙"这一大段话，一直挂在家中，儿时是能背诵的。

父亲从广州(或上海)，母亲从平江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长沙定居，大概是 1920 年。我幼年的记忆中，有湘军援鄂战争失败，黄一欧从前线狼狈回到长沙，到过我家中的情景。这次战争是 1921 年夏季发生的。战争的结局是赵恒惕与吴佩孚握手言和，吴佩孚的势力直接伸到岳阳。这次战争揭穿了赵恒惕标榜的"联省自治"的戏法，也暴露了南北军阀间权力地盘之争的丑态。赵恒惕原为谭延闿湘军的旧部，这时湘军内讧，分成几派。1920 年 6 月张尧败走，谭延闿入驻湖南后，11 月间，即被赵逼走。谭到上海后，赵每年馈以生活费二万元。这就是我父亲短促一生最后两年定居长沙时的政治环境。这时家庭并无可靠的经济来源。前引小传中有"国会解散后，专力经营商矿"一语，据母亲说，父亲曾有意于此，但未实现。对兴办实业，父亲是极力赞成的，例如范旭东(湘阴人，留日回来的)是父亲的朋友，初创久大精盐公司时，父亲买过 400 元股票。父亲最反对老家的子弟靠地租生活，分到自己名下的田地和店铺，全归祖母掌管。在旧社会，虽然赋闲，还得维持官僚场面，家中这时还有轿班和"听差"。当家的母亲，已开始变卖首饰等积蓄来维持生活。父亲对赵恒惕完全采取不合作态度，赵曾拟委父

亲为省榷运局局长(食盐专卖的“肥缺”),他坚决不就,连过年节送来的几百元“节费”,也当来人退回。父亲曾同母亲有过不接受任何人礼物的约定。有次一个找父亲谋差事的带来礼品,母亲碍于情面收下了,父亲回来后大发脾气,对母亲说:你去给他找差事。父亲脾气急躁,谁都怕他,只有母亲能制服他。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母亲是完全尊重父亲的。

父亲是1922年阴历正月11日(阳历2月7日)凌晨去世的,还不满40岁。头天晚上在一个朋友家打牌,父亲赢了,输家硬要违约加四圈,父亲身体已很感不适,额头擦了些薄荷酊,勉强奉陪,最后倒输了才结束牌局。回家已是午夜12点。由于是过年,这次母亲没有生气。临睡前,还同母亲谈到时局,表示对孙中山北伐的希望。父亲实际患有心脏病,又严重贫血,可是多年大意,当胃病治。章太炎来长沙时,朋友们陪着游岳麓山,父亲拄着手杖,只能到爱晚亭,上不了山。后来的判断,大概死于心肌梗塞,发病一个多小时,就去世了。父亲的好朋友,田秋明,是日本留学的医学博士(开有秋明医院),匆匆赶到时,父亲还说了最后一句话:“田博士,要救驾呀!”我同父母亲睡一张床,这个情景一直留在记忆中:早晨我悄悄站在床头,从铁床栏干的空隙中,摸着父亲冰冷的脚板。还记得开吊“点主”时(灵牌“主”字上头那一点,要从孝子手指上扎出血点上),我没有哭。出殡时,执绋的人群很长,我披麻带孝,骑在别人的肩上;经过内务厅时,穿过围墙门,接受厅长吴景鸿(父亲的朋友)的路祭,我下地跪着。

母亲这时只有32岁。我还有个不满周岁的妹妹。不久后,因照顾不周而死去,更增加了母亲的悲伤。父亲去世后的头件大事,是这个家怎么办?母亲常说的话是,“你父亲去世时,身后萧条,没有任何积蓄。”她还对我们讲过,老家的大伯寄来100元钱,信上要弟媳携子女扶柩返乡。母亲非常生气,马上将这笔钱退了回去,立下决心:继承夫志,将三个子女教育成有用的人,为丈夫争口气,决不能回老家吃租谷,让儿女成为游手好闲的子弟。在长沙的丧事

料理完后，就搬住到租金少的房子，除留下一个老女工外，辞退一切佣人。大姐、二姐继续读书，母亲教我认方块字，我是认识了一千字之后才进小学的。为了将灵柩运回家乡安葬，第二年的冬天，母亲带我上北京，向国会索取了好几千元的抚恤金。归途经过上海，由我的五叔（他到过广州，见过世面）领我去见了谭延闿，此事也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进到那所大洋房的客厅后，向谭行三鞠躬礼，谭抚摸我的头，同五叔交谈后，送了 200 元奠仪。母亲平生的蠢事之一，是用这一大笔恤金，将父亲的灵柩运回长寿街，大办丧事而花光。这也许是她的责任心、自尊心和带示威性的傲慢心理所致：我要凭自己的本领，为死去的丈夫在家乡最后风光一下，以符合他在世时的身份。丧事完毕，母亲理直气壮，"舌战群儒"，同祖母分家。这在当年是一场了不起的斗争。分家结果，田地母亲分 1/3，店铺各分一个。田租和铺租，每年约 300 元左右。土地革命时期，平江红白斗争厉害，田租收入常不可靠。因此，在长沙读书的十来年中，维持一家生活尤其是姊弟三人的学费，主要靠借债和变卖衣物，母亲为此而经历的辛酸苦涩，真是一言难尽。债户是父亲的同乡老朋友，也有多年要好的邻居和房东，还有雇佣过的年老女工。母亲对儿女管束得极其严厉，我们常挨打。她打人时总念叨，要尽严父之职。

在广东的两年多，父亲给母亲写过许多信，这些信都贴在一个皮纸钉的厚本上，这是母亲的宝物。我曾经翻看过，称呼是"存真吾爱"，内容多有关教育子女的方法。两个女儿，母亲因一个顶嘴、一个乖巧，而有不同对待。母亲常向我们诉说父亲的为人和种种细事。如老家后园的金橘树，是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树种。多次郑重说过：日本是一定要灭亡中国的。日本从小学教育即作此种熏陶，如说橘子好吃，笋子好吃，这些东西都长在哪里？都在中国，中国物产丰富，日本地方太小。父亲留下的书籍不多，记得有《饮冰室文集》等，秋瑾、黄兴、宋教仁等《荣衰录》有好多本，还有他们的照片。在黄兴的照片上，有父亲写的一句话："壮志未酬身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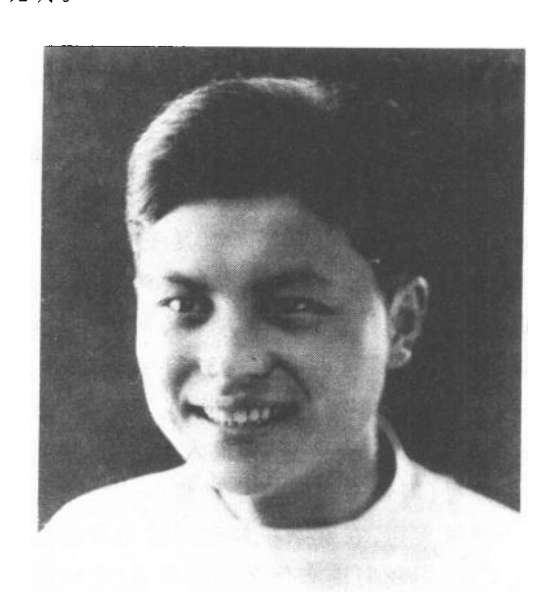
死”。这些人物以及父亲同他们的关系，在少年的心中自然留下深刻印象。我继承了父亲用的一张大书桌，《民国之精华》这本厚书，就是放在书桌小框中的，后来由我大姐保存着。

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就有误传，说我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当时父亲的朋友李六如在延安，问题很容易查清楚。可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康生又放出这一指责，说我这个人家庭有“血债”，坐定是“阶级异已分子”。当年在部里挨批斗时，刘澜波为了解我的父亲和家庭情况，又去找李六如详谈过。

父亲、母亲和老家人事，1960年我被开除党籍时，都成为交代的问题。1967年11月关入秦城，12月写《历史自传》，1968年7月又再写对自己历史的“反省认识”时，对此都要求有最正确的认识。1979年1月6日平反复职后，这些《历史自传》等都交还给我了。现将其中有关段落抄下，以结束这篇小文。

> 同家庭有关应予说明的有三件事：一是父亲确于1922年病故。延安审干时，不知怎么传说，我父亲是被红军杀死的；庐山犯错误时又有人提过此事。在延安时，向李六如作过调查，证实是1922年死去（李六如同我父亲有朋友关系）。关于我的家庭情况，水电部党组后来大概又向李作过调查。
>
> 二是老家“移民”死人事。1931年红军攻入平江长寿街时，老家中留下的妇孺约十人，被“移民”送去江西。途中两个祖母和一个堂嫂因体弱死去，其他人后来辗转来到长沙我家中，有一个婶母（即四叔母）、两个堂嫂、一个堂姊、两或三个小孩，这些人都害重病，在我家中短时间内先后死去。由于这些人一直在老家，同我们没有什么感情联系，当时我并没有因此发生过思想上的什么震动。从延安写《自传》起，此事从来没有向党隐瞒过。但1959—1960年审查时，乃至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上，都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
>
> 三是家庭（主要是母亲）对我的影响问题。我母亲是一个

封建意识、权威思想很浓厚的人，但有些文化，懂得教育子女成人。十年内战时期，平江地区红白斗争极其尖锐，按常情我们在家庭中应当受到一些反共思想影响的。不过事实上，母亲并没有给我们这种影响，相反地，向我们说过父亲的朋友方竹雅(即方维夏，1936年在湘赣边区牺牲)、李六如都是好人。我们童年时最亲近的一个表哥方国华，大革命时是地方上党的一个负责人，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倒很深。我父亲大概有些民主思想。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母亲曾对我说过：你父亲在世，也会赞成共产党的。在许多封建意识方面，我受母亲的影响很多，但在政治影响上，必须作上面一点说明。



李锐在高中读书时(17岁以前)，就有些模糊的革命思想，喜看左翼小说，还写过他平生唯一一篇左倾小说，应当说，这都同他父亲留下民主、开明的思想有关。这是李锐1934年5月拍摄的高中毕业照。

我在高中读书时(17 岁以前),就有些模糊的革命思想,喜看左翼小说,还写过平生唯一一篇左倾小说,应当说,都同父亲其人留下的影响有关。在秦城哼旧诗时,关于方维夏、李六如有过两首绝句,《方维夏》、《父执》:

反戈一击赴南方,北伐从军出豫章。
夜半罗霄山月照,头颅掷地发苍苍。

常闻竹雅六如名,父执当然毋美称;
竹雅抚棺而恸哭,六如两弟已牺牲。

母亲常同我们谈起父亲这两位同乡至交。方维夏是长寿街人,乡下称"方圣人",日本留学学农业的,当过赵恒惕时期的省议员,第一师范的学监。父亲的灵柩从湘江起运时,方伯伯到河边,扑在棺材上放声痛哭。1924 年到广东,由李六如介绍入党,北伐时是谭延闿第二军一个师的党代表(李六如是另一个师的党代表)。母亲也常同我们谈李六如的往事,这同夫人钟桓英是她的同学又是朋友有关,一直到解放前,母亲回平江老家时,总要到距长寿街 30 里的献钟,去看望她的这位老朋友,并从经济上予以接济。母亲过去还同我们谈过这样的事,钟桓英跟母亲谈过,当年住在文运街时,毛泽东常到他们家中来,她不知多少次为毛洗过长褂子。当年敢于谈毛泽东其人其事,这也反映出一种对共产党的认识吧。社会与个人总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过去简单化搞惯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太紧了,以致走过那么长而曲折的道路。也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不辞啰唆,写出上面这些有关我父亲的一些材料和回忆。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样,这当然不是他的传。

童年琐忆·哭灵

这五篇《童年琐忆》，是1962年在北京闲居，等待分配工作无望时写的。当时心情低沉，为了打发日子，除了读书之外，想随手写点童年琐事。拟了二三十个题目，写成了稿子的，只有这五篇。①

大概觉得太没意思了，便停下笔来。《随笔》编者多次约稿，无以为应，只得找出这几篇东西寄上。附上这几句，说明这是25年前的旧稿，当时并无发表之意。

1922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不满五岁，大姐八岁，二姐七岁，妹妹还不到一岁。父亲虽然做过不小的"京官"(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但"为人清正"，因而"身后萧条"。由朋友们的帮助，好不容易父亲的丧事完了，跟着来的问题是：我的母亲——30出头的寡妇，带着四个儿女如何生活下去？

我们家住在长沙。平江老家的祖母和父亲一辈好多房人，都是靠收地租吃饭的。我的大伯父，老家中的长辈，这时给我母亲汇来200元钱，信中写道："望弟媳携子女扶柩返乡。"

父亲同我母亲结婚之后，1905年便到日本留学去了。母亲比父亲小七八岁，很不愿意呆在封建大家庭中做媳妇，便由父亲安排，到平江县城他的朋友新创办的一所女子师范读书。为此，她曾受到许多歧视和虐待，同威风凛凛的婆婆作过不少抗争。每年开

① 本书选录其中之《哭灵》及《一张照片》。

学进城时，婆婆只给媳妇一吊钱的零花钱，连买纸笔墨都不够。还是父亲节省读书的官费，补贴妻子，母亲才在这个学校毕了业。父亲是同盟会员，有民主思想，常给母亲写信，反对老家的子侄靠收租过日子，主张人要“自食其力”。对于那个乌烟瘴气的老家，对那些游手好闲、抽大烟、嫖赌逍遥的子弟，母亲是深恶痛绝的。因此，接到大伯父这封信后，她立即打定了主意：决不回老家去，不管来日怎样困难，要带着四个孩子在省城念书。她写了一封剀切陈辞的信给大伯父，并且将那笔钱退了回去。

由于一时筹不到钱，父亲的灵柩没有运回老家去安葬，寄存在南门外专门停放灵柩的处所，这种地方叫“厝屋”，里面很是简陋。走进大门，是一块空无所有的泥土地门厅，左右伸出很长的廊道，廊道还有拐弯抹角的分道。廊道两边整齐地排列着停放棺材的小间，用木板隔开，没有顶棚，每间恰好放下一口棺材。一走进厝屋的大门，就有一股泥土夹着漆醋的特殊气味扑鼻而来。除开偶尔能碰到守屋的老头以外（这个老头也是从不开口讲句什么话的），里面从来见不到一件活的东西，连猫狗也没有一条。射进来的阳光少，夏天也是凉气逼人；走进长廊，更是阴森森的。一间间的小间都没有关严，里面的黑色棺材和香烛供物，好像故意要跟人打招呼似的。有两口用麻绳捆缠得很严密的棺材，就搁在门厅后面进廊道的入口处，好像守卫着长廊。母亲告诉过我，这是被赵恒惕杀害的两个人，领导罢工的——黄爱与庞人铨的灵柩。小孩子喜欢听鬼怪的故事，又总是怕鬼和怕黑暗。我每次随母亲到这里来，心绷得很紧，贴着母亲身边，半步也不敢挪开，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母亲就要带我来一次。父亲去世不久，由于照顾不好，小妹妹随着也死了，这更增加了母亲的痛苦。母亲所有的委屈和苦难，都到这里来向父亲的灵柩倾诉，还没有走到那间小房子，便放声号啕大哭起来。打开那扇小木门，母亲紧抱着我跪在灵柩前，哭得更伤心了。母亲是并不迷信的，家中从不敬天地祖宗，也不用迷信物品。只是过年过节和父亲的生日忌辰，摆几样菜在父亲的照片前，我们向着

照片磕头。到厝屋来，她也从不带香烛之类的东西。长期摆在灵柩前小桌子上的，是父亲的灵牌和随灵送去的一对“金童玉女”小纸人。母亲哭得太厉害的时候，我也跟着哭起来。我还记得，当年母亲头磕得太多了，前额正中曾长期留下一小块红印记。那个厝屋的老头，对我们母子俩似乎也习惯了；我的记忆中，几乎没有遇见过来哭灵的人。

没有了父亲，我们的家突然变得狭小而黯淡无光，生活中种种不幸几乎都由此而来，这在幼小的孩子心灵中，是渐渐感受到了。每回母亲带我到南门外去，去“看看爷爷”，我很害怕去，但又愿意去。走进那阴森森的长廊时，心里特别害怕，但和母亲一起跪坐在那所小房的门槛上，对着面前那口大黑棺材时，又好像亲近了“爷爷”似的。父亲留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严肃而又和善的人。他带我上街买过小洋号；我先起床时，曾经把他的鞋子藏到厕所里去过；他死去的那天早晨，我在床头摸过他那双冰冷的脚……母亲在灵柩前哭诉完了，也累了，总是坐在门槛上，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用湿脸挨着我的脸。再安静地坐一阵，我们才回家去。

这样哭灵的生活，持续了近两年，直到父亲的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那时留在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父亲灵前小桌上那一对“金童玉女”，对它们有着特别亲切的感情，似乎觉得它们真好，日日夜夜陪伴着如此寂寞的“爷爷”。

童年琐忆·一张照片

我们小时候，只有过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上照相馆照相得花钱，这类事提不到日程上来。那次是我的十周岁生日，母亲带我们姊弟三人去照相馆。按理，这是件多么愉快的事。可是照片上留下的形象，三个孩子好像刚同谁生过气，姐姐的嘴都是翘着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说来话长，得从我们的挨打说起。

提起挨打，心都是紧的。从小学到中学，特别是小学时，我们三个孩子常挨母亲的打。我自己的关于挨打的回忆，最早是还没有上学之前的认方块字。那时商务印书馆出有一种方块字，一盒1000张，字的背面印有图画。为了认清“觀”、“歡”、“勸”、“勤”这几个字，真不知挨了多少个“栗壳”和耳光。这几个字的背面没有图画，字形又容易混淆，我真恨死这几个字了。母亲是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的，很懂得教育的重要。父亲去世时，我还不满五岁，认识了这1000个字，才进小学。母亲打耳光出手极快，一听见我又认错了，就飞手一下，我还不及准备就挨上了。“敲栗壳”是老家土话，勾起食指和中指，对前额或头部任一处，用力一敲，其疼痛是另一种味道。按现在的说法，当时我还是学龄前儿童，要认熟1000个字，负担实在很重。每天认字两次，一看见母亲将方盒子搬出来，心就打战。

进学校之后，挨打的机会就更多了。衣服弄脏了，没按时回家，同邻居孩子吵了嘴，打碎了东西，挨骂时回了嘴，等等，都可以挨几下。因此，在学校犯了事，如跟同学打了架，弄坏了人家的什



李锐少年时很爱玩，玩友又多，玩的名堂也多，除打球之外，还喜欢跳房子、踢毽子，乃至打群架。春天时还喜欢养蚕，到处搜寻桑叶。有一次，同几个同学到城外，爬大桑树，不仅回家晚了，还弄脏了衣服。回家挨了母亲的打，又在父亲像前罚跪。这张照片是中学时代的李锐与表弟方南君等人在嬉戏时的合影，这是李锐现存的最早一张珍贵照片。

么东西，回来一般是不敢讲的。有时瞒不住，那一顿打就会挨得特别重。当年有一种“拐子手”，专门拐骗小孩去贩卖。晚上，特别是夏天的晚上，街上常传来边敲锣、边拉着长声的叫唤，谁家丢了孩子，几岁，多高，穿的什么衣服，有仁人君子送回或者报信，谢光洋多少……这种凄凉的叫唤声，和震人心弦的锣声，增加了人们生活中的不安和恐怖。学校离家有好几条街，散学之后，如果回来稍稍晚了一点，母亲就会顿时恐慌起来。她常常对我们说，她是“提着胆子活着”；“你们回来晚了，圞心都跳到口里了”。因为没有按时回家，挨的打最多。孩子们散了学，谁个不贪玩呢，我的玩友又多，玩的名堂也多，除开打球之外，还喜欢跳房子、踢毽子，乃至打群

架。春天还喜欢养蚕，那就要到处寻找桑叶。有一次，同几个同学到城外，爬大桑树，不仅回家晚了，还弄脏了衣服。这一回又挨打，又在父亲像片前罚跪。

挨耳光，敲栗壳，那是家常便饭，正式请客是要动用刑具的：鸡毛掸子（使用竹鞭这一头）或藤拍子（一种用藤做的拍打衣被尘土的用具）；还有术语，名曰"笋子炒肉"。"身上又发痒了吧，又要吃笋子炒肉吧？"一听到这种警报，我们就吓得不敢吱声。用起这种刑具时，一边教训，一边逼问："下回还敢不敢？还犯不犯？"一定要等到满意的回答，才放下手来。如果还敢顶一句嘴，那就火上加油，打得更凶。大姐脾气最犟，她挨的打最重，她总是窖口不开，有时还顶一两句。

由于经济困难，又常挨打，家庭生活中的快乐是不多的。有时候，难得的欢乐会突然变得扫兴。这就要说到这张照片了。为了上照相馆，女孩子当然要忙着梳妆打扮，穿上最喜欢的衣服，梳成最称心的发式。不知是衣服还是发式或是两者都不合母亲的心意，硬叫她们改装换样。二姐乖巧一些，照着换了；大姐不肯换，于是出门前，挨了几下。弄得我也没趣极了。

像吃饭睡觉一样，挨打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肉体上还是能习惯的，最难堪的是怕邻居们知道。我们家从来只租得起前后房两间房子，楼上楼下，前前后后，总有很多家邻居。我们挨打时，一般是不吭声也不哭出声的，咬着牙受住，就是怕别人听见。可是母亲是以善于教育子女自豪的人，并且确实以此闻名于亲友之间，"打人"，自然属于"家教"之一种。每逢动用刑具时，就惟恐别人不知道又在施行这种"家法"了。偶尔也碰到还不大明了母亲习性的人，走过来劝解几句。这就糟了，必定打得更凶，打得更得意，定要孩子当着外人认了错，才罢手。比挨打更不堪的，是前面提到过的罚跪。在母亲看来，也许是孩子犯的过错太重，需要施以更严厉的"反省"法。有时一跪一二十分钟，膝盖疼是小事，被别人看见，真恨不得钻到地下去。

以体罚教训子女，"棍子出孝子"，"不打不成钢"，这是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礼法家规。父母打自己的儿女，不仅理所当然，甚至因此获得好评：你看，人家是怎样教育子女的。母亲常对我们讲，"身兼父职"，应有"严父之威"。然而，我们从所有的亲友和邻居中，没有发现过这样一个"严父"，更不要说是"兼职"的。我们常常暗自羡慕别家的孩子。不过，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也没有因此生长过对母亲的怨恨，有怨恨也只是在挨打的那一阵子。因为在家庭生活中，比挨打更严重的问题是经济上的困难：母亲长年累月、日日夜夜为一家的生活，尤其是一年的两大难关——缴学费的大笔款子，以及过年过节等装饰门面的应酬，而费尽心机，四处奔走，忍受各种委屈和苦楚。虽然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分析母亲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但似乎也能体会她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这是同我们的生活交融在一起的。有时，母亲打了我们哪一个之后，又抱着孩子哭起来，我们心里的那点怨恨，就被这种特殊形式的抚爱驱散了。

投笔从戎·延安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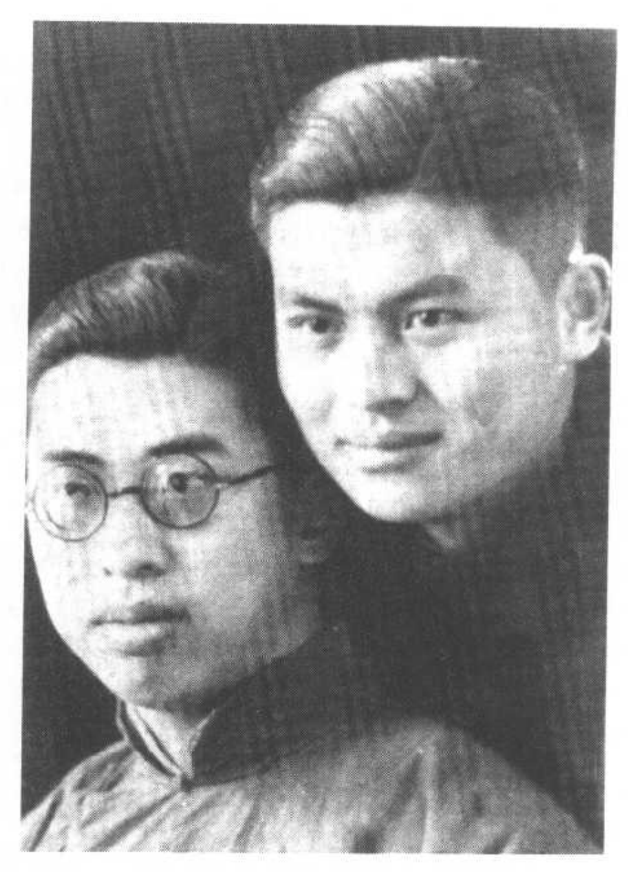


1945年李锐到热河后，《冀热辽日报》的担子压到他肩上，从文章版面、印刷、发行，到柴米油盐都得过问。他在给《解放日报》总社的信中写道："这一年来碰了不少钉子，吃了一些苦头，才算知道一点当家的困难。过去在延安的生活真是'饭来嘴张'，不知天高地厚。去年8月底至10月底，撤退五六次，奔波一二千里，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算是一扫而光了。"这是1947年5月，李锐在热河乃林车站的留影，他身后是被炸毁的车厢。

投笔从戎的三天

1938年1月到5月，除开3月间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外，我在徐州做青年工作。当时徐州是第五战区首府，司令长官李宗仁政治上比较开明，成立有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会中吸收了一批进步人士和地方开明士绅。中共的苏鲁特委负责人郭子化几乎是半公开的，被聘为委员，特委成员郭影秋就在动委会内工作。因此，徐州及附近各县的抗日救亡群众工作相当活跃。同我发生工作联系的王文彬，即在他的家乡丰县准备打游击。我作为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负责人，参加过李宗仁主持的动委会的会议。这个团体是公开合法存在的（动委会给经费补助），在徐州周围地区得到迅速的发展。当时党组织的工作重心是准备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记得范长江、陆诒两位《大公报》、《新华日报》记者到徐州时，还向我作过采访，报道过当时徐州的群众抗日活动和鲁南正在起步的游击战争情况。我自己正是少年气盛，满腔热血，决心投笔从戎。卢沟桥事变之后，大批离开了学校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平津流亡同学，多是决心留在敌后参加游击战争的。

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徐州很快变成前线，敌机轮番轰炸，白天在城里不能呆；大概在撤退前的几天，一次最大的轰炸，我留在城里，几乎被炸死。组织上这时已经得悉国民党军队的大撤退计划，同时知道东北军于学忠的52军，准备留在山东敌后。于部有党的组织，同我在工作上有横的联系（主要联系人是解沛然即解放同志）。青救团奉特委之命，组织一批决心留在敌后的进步青年，



李锐 1934 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1938 年少年气盛、满腔热血的李锐决心投笔从戎，这是投笔从戎(1936 年 1 月)之前的李锐(右)与其世交黄乃在长沙的合影。

黄乃是黄兴的遗腹子，原名黄一寰，战争年代改名黄鼐，为了便于书写，成为黄乃。黄乃与李锐至今有 75 年的友谊。由于先天不足和隔代遗传，小学时，黄乃就是 500 度近视，在延安时右眼已失去视力，还总在油灯下伏案熬夜。黄乃博学多才，是日本问题的真正专家。1949 年黄乃失明，1953 年任中国盲人福利会副主任……80 年代黄乃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致力于新盲文的创造工作，几十年孜孜以求，成果斐然。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锐心集》即将出版。

以战地工作团形式，进入于部作政治工作，此事由我负责。我原来是准备随特委到山东去的，但王文彬要求于部派一位懂军事的干部同我作“交换”，帮助他们开展游击战争，于是原在于部工作的张如就派到丰县去了。

可是，临撤退的头一天，于部接到命令，不进入山东，同国民党各部一起向西突围。准备撤退的这天，我率领青救团成员三十多人，来到于部的一个旅，旅长（李杜将军的弟弟）和副旅长贾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换军服，会餐。三十多人，分成两个队，我负责带一个队，匆匆组织了党的支部，原在东北军工作的王学明、王西萍、徐锐林等同志参加领导。这天晚上就突围，摸黑行军，但行军的路线、宿营地等等，都没有交代清楚。一个通夜也没有走多少路，各种番号的部队，乱糟糟地在一条公路上拥挤着，谁也不让谁。晚上在一个村子停歇时，我这个队的人还没有全走散，但同王、徐等已联系不上了，同我在一起的支部成员只有张震寰。周围也没有于学忠的部队，杂七杂八的国民党军队中，我们发现有向老百姓换衣服开小差的士兵。为了应付意外，我们每人向这些想开小差的士兵弄到一支步枪，背上一串子弹带，我们这些学生兵自找麻烦的行为，引起那些士兵的奇怪。这样，我们这伙人心里却踏实多了。半夜弄到一些红薯，胡乱煮了充饥。

第二天一早，我们正准备出发，西面不远的村庄后面，突然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炮轰鸣声，似乎朝东发射过来。这时，通过平原田野向东走去的各种番号的散行纵队，像山崩、潮涌一样，成千上万的士兵一齐掉头向东飞跑，没有人阻拦，也没有一个什么军官下个命令。我于是带头领着我们这十几个人，大声呼喊，不要往回跑，向前面冲过去！无奈这如同螳臂挡车，最后，我们也被这股潮水冲向东走了。中午在一个村子休息时，我们这十来个人展开讨论，是随大军继续向西突围，还是离开部队朝东去山东敌后。两种意见争论剧烈，大多数人主张去敌后。我虽然也很想去山东，但负有带队的责任，主张仍随部队突围，去找于学忠部。我们这支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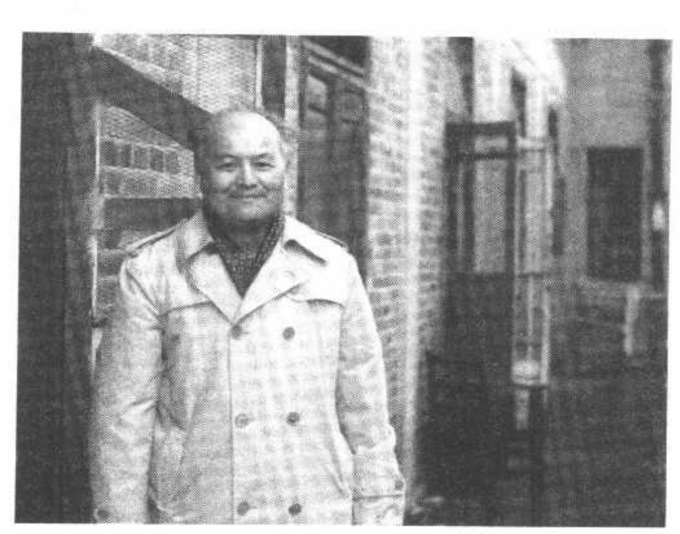
是在徐州紧急时临时组织起来的，成员比较复杂。尤其几位东北籍的同志态度非常坚决，认为怕去敌后是胆小，贪生怕死。我没能说服大家，只好和大家一起离开突围的部队，朝东向敌后走去。又走了一个通夜，第二天大早，来到徐州东南江苏与安徽交界的双沟地方，由于过分疲劳，又怕遇见敌人，大家分散在原野的苇塘中休息。地上泥湿，无法躺下，只能坐着抱枪打瞌睡。时间没有隔多久，大概附近农村的农民，早就把我们这群人当作国民党军开小差的散兵游勇，他们走进苇塘，用自有军阀战争以来就传下的方法，向我们分头包围、说服、缴械。来到我身边的几个农民，说附近有日本军，硬脱下我的军服，换上他们带来的农装，说往东到皂河镇一带，那里没有敌人。我在徐州时知道，苏北两淮地区还驻有东北军常恩多师，国民党的省政府在淮阴，那里有我新结识的朋友，常师中有横的联系的党员关系。走出苇塘时，同张震寰又失去联系，又见到几个本地青年和东北同志，我们只好先到苏北再说。

以上这段经历，就是抗战初期我投笔从戎三天的故事。以后，直到日本投降从延安出来，过封锁线，我就再也没有到过前线。

（原载《群言》1987年第9期）

珞珈山

二九年华一首诗，此时岂是读书时！
南窗剪烛忧天下，北土扬尘走虏骑。
万籁无声何可忍，匹夫有责不宜迟。
路从无路走而出，鲁迅文章是我师。



1934－1937 年李锐在武汉大学读书，住日字斋 678 号。1992 年李锐回到阔别 50 余年的母校，在 678 号门前留影。



李锐从小酷爱运动，尤其热爱游泳，现今虽 80 有余，夏天每日还要游 800 米左右。毛泽东少年时所提倡的“野蛮其体魄”在李锐身上充分地展示出来。这是李锐 1935 年暑假在武汉大学东湖游泳至小岛时拍摄的。李锐一生虽两次入狱、历经苦难，身体仍能坚持下去，继续革命，这与他常年游泳是分不开的。

五味俱全的延安六年[①]

宣传科长

李锐和范元甄到达延安的具体时间是1939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年，李锐22岁，范元甄18岁。

中共中央1935年从江西长征到这里，这时不仅早已恢复了元气，而且由于全国向往真理、追求光明的人士源源到来，力量在迅速壮大。此时，聚集在延安的革命者约5万人，使这里成为全国培养、储存革命干部的后方基地。

我们从《龙胆紫集》中《延安杂忆》《青春歌》等几首诗里，可以看出李锐初到延安时的愉快心情。

延安色彩最单纯，
黄土蓝天间白云；
莫道都穿粗布服，
称呼同志一家人。
（《延安杂记》之一）

马扎随身即会场，
油灯一盏半窑光。

① 该文选自宋晓梦著《李锐传》。

惜怜破布草鞋料，
小米金黄土豆香。
（《延安杂记》之二）

回忆延安昨日情，
偷闲寻乐正妙龄。
下河洗衣风已软，
围炉煮枣雪初晴。
草鞋斗艳堪圆舞，
木屐如飞好滑冰。
远足开荒野餐会，
每逢周末涉水迎。
（《青春歌》）

其实，延安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一年到头吃的就是小米、土豆；衣服是三年一身棉，一年一身单。但是，凡是到这里的青年，都是作了为民族的解放吃苦、牺牲的思想准备才来的。再说，在青年们炽热的情感中，延安是革命的灯塔，抗日的中坚，李锐来到这里，自然会有一种找到了归宿的幸福感。这是许多当年投奔延安的人，都曾有过的最纯洁的情感。这情感使他们热情奔放，苦中作乐！

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是直属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机构，与它平行的单位还有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等。中央青委的作用相当于后来的“团中央”。

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兼任中央青委书记，在他离任以后，又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兼任这个职务。副书记是冯文彬。李昌、胡乔木、黄华、刘光、宋一平、蒋南翔都是中央青委委员。

中央青委下设组织部，部长李昌；干部部，部长黄华；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宣传部下面有宣传科和编辑科。编辑科实际上就是

《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许立群、韦君宜、萧平都是这个杂志的编辑。

李锐一到延安就被留在宣传科任科长。范元甄则进了马列学院。今天著名的经济学家童大林、“文革”前上海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前新华社副社长陈适五都是李锐当年的科员。

当时，从大后方来延安的青年主要是两个去处：大部分进延安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像于光远、李锐、武衡、韦君宜等这样直接留在中央青委工作的是少数。

李锐在中央青委宣传科工作了一年零九个月。

轰动延安的《轻骑队》

到中央青委一年多以后，李锐和中央青委的一些同志创办了在延安轰动一时的墙报《轻骑队》。凡是 40 年代初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不论是高级领导还是普通干部都不会忘记《轻骑队》。一个墙报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它的内容不但反映了延安的“光明面”，也涉及到延安的“阴暗面”。

说到创办《轻骑队》的起因，童大林讲得最有意思：

“说实在的，要光是像我这样一些初中学生就闹腾不起这个事儿来。因为我们都比较老实、听话，领导让怎么就怎么。这些大后方的大学生一来，中央青委机关立刻成了当时延安青年中文化层次最高、最活跃的一个单位。这些人原先都是各省抗日青年团体的头头，能说、能写、又会组织活动。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对延安好些事情看不惯，每天晚饭后，青年们聚在窑洞前聊天儿，谈的尽是这类话题。于是有人提议：办个墙报，将这些意见写上去。大家赞成，事情就是这么定的。”

如果说，这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青年对于生活的艰苦以及来自敌人和战争的危险是做了比较充分的估计，那么他们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种种问题，却是太缺乏思想准备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延安既是革命圣地，就应是处处平等、自由、民主的典范。一旦



李锐性格耿直，无论利害关系如何，他看不惯的就要讲。在延安与人创办《轻骑队》墙报，因文风尖利而轰动延安。经胡乔木推荐，毛泽东期期必看，并称赞其文风。受康生迫害，在“抢救运动”中李锐被关进延安的监狱——保安处，受到严刑逼供。历经一年零三个月，经周恩来过问后方出狱。这是1944年从保安处释放出来后在王家坪与黄乃的合影，这是李锐现存延安时期唯一的一张照片。

发现现实生活并不像原来理想中那般纯洁，便感到不能容忍，便要拿起笔来，向他们看不惯的一切进行批判。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争论，这个墙报就被定名为《轻骑队》。

“轻骑队”是前苏联共青团在工厂里开展类似“青年监督岗”活动时的一个组织名称。另外，30年代中央苏区有一个名为《青年实话》的杂志，其中一个专门登批评文章的栏目也叫《轻骑队》。

没有负担，无所顾忌，敢打敢冲，勇往直前是轻骑队的战斗风格。难怪具有批评特色的青年组织或刊物栏目都愿以它命名。

中央青委的几位领导相当慎重，担心出这样的墙报，万一批评得不对，会惹出事来。但青年们的热情定要保护，于是决定先出一

期看看。不敢让他们贴出去，就贴在窑洞里，把中宣部部长凯丰等几位领导都请来“审查”。大概是因为第一期内容比较温和，“审查”顺利通过。皆大欢喜之际，众人决定：贴出去！

这些思想敏锐，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青年人真是敢想敢干，什么人都敢碰、什么看不惯的都敢批。李锐当然是积极分子之一。当年他发表在《轻骑队》上的文章，今天还想得起来的有两篇：一篇题目叫作《想当年》，讽刺某些老干部，没有新建树，只一味摆老资格。文中虽然没有点名，但所举的例子：“想当年我在苏联如何如何”，“想当年我与高尔基如何如何”……人们一看便知是指萧三。萧三是毛泽东一辈的革命家，著名诗人，曾任“左联”驻苏联代表。李锐等一些青年却瞧不起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几首白话诗，觉得太缺少“诗味儿”，萧三似乎一时还拿不出更如人意的诗作，言谈中只好常常“想当年”。

一天傍晚，大家在延河边散步，李富春在路上遇见李锐，笑指他说：“李锐，你好尖锐，挖苦萧三嘛！”

五年以后，李锐当了中央冀辽分局机关报社社长。他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想起当年在《轻骑队》写讽刺萧三杂文，多么幼稚、偏激！”

另一篇是李锐调到《解放日报》以后给《轻骑队》的投稿。文中批评一种对上谄媚、对下骄横的领导作风，矛头所指，是他的上司，《解放日报》三版主编。在李锐的性格中，耿直一直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无论利害关系如何，他看不惯的就要讲。从青年到老年，尽管受了那么多挫折，这一性格始终不变。

《轻骑队》批评萧军的稿子不少，带头的是许立群。青年们不喜欢他“老子天下第一”的作派，更不喜欢他动不动就以“鲁迅弟子”自居。

韦君宜到“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以后给《轻骑队》投稿的题目是《论师道》。文中说，老师就要比学生高明，而当时“泽东青年干校”某些教师的水平却不能令人满意。

陈企霞的长诗《丘比特之箭》，讽刺了当时延安女青年的择偶标准："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此不嫁。40年代初去延安的青年男女比例为16∶1，女青年们找对象眼睛都盯着大官儿、"大知识分子"；工农干部和"小知识分子"就被冷落了。

《轻骑队》上登载的，也不都是批评文章，比如胡乔木的《纪念白求恩》，就发表在《轻骑队》的第一期上。许立群的《反对党八股》，后来备受毛泽东赞赏。童大林在他的大作中要大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节约每一张纸，每一个信封……这使李富春大为高兴，因为他是延安的"总管"，这类事归他负责。

《轻骑队》每两周一期，每期七八篇，稿源极为丰富。稿件都由童大林用笔抄成大字报，然后精心安排，配上各种字体的标题，再加上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的漫画，可谓图文并茂。

《轻骑队》轰动了延安，每到周末，那块矗立在延安交通要道"大砭沟"处的三四公尺见方的大木牌前便热闹非凡。其时，胡乔木已调到毛主席那里去当了秘书，但是，每期《轻骑队》一贴出，他必定专程过延河来看。鲁艺的学员和其他单位大大小小的干部们，更是从七八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纷纷赶来，就为看看《轻骑队》！

《轻骑队》的影响使胡乔木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看看。当然主席工作繁忙很难有时间过延河来看墙报，胡乔木便让童大林将每期《轻骑队》油印。主席不仅自己期期都看，还叫他的警卫员也看。他对《轻骑队》的文风尤其满意。后来他在作为整风文件之一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写道：

"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发展。"

"早已存在"四个字，指的就是《轻骑队》。毛泽东把《轻骑队》的文风誉为"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其评价之高，实属罕见。

主席的称赞使《轻骑队》的队员备受鼓舞。过了一阵子，胡乔木又想把它搞成铅印。管纸张的李富春一口答应，印刷这一关却被《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卡住。

博古并不反对出《轻骑队》。他对童大林说，不仅在大砭沟口，还可以在"新市场"和延安的其它几个热闹的地方多出几块。但形式只能限于墙报，搞成铅印，就容易传出去。不久前《轻骑队》上的一篇《龙生龙，凤生凤》就被国民党的一个叫做《良心话》的杂志转载，他们利用这些材料把延安说得一团糟。博古还批评《轻骑队》有"平均主义"的倾向。

既然博古不同意，铅印只能作罢。但对博古的批评在这里是需要作些注释的：

《龙生龙，凤生凤》一文的作者是《中国青年》的编辑、《轻骑队》第一任主编萧平。萧平是和田家英一起从四川来的，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可惜 1941 年赴前线途中，因同伴枪走火不幸去世）。这是一篇相当厉害的批评稿。当时延安的牛奶极少，除供应高级干部以外，只有幼儿园才见得到。而幼儿园里牛奶数量有限，便只给高级干部的孩子喝。《龙生龙，凤生凤》批评的就是这件事。

"闯了祸"的另一篇稿是《论离婚》。作者是一位少数民族干部，后经几人修改刊出。内容是批评延安某些领导同志在婚姻问题上喜新厌旧换偶频繁。据说从前线回来的某将军看了此文拍着桌子大骂：这些小资产阶级搞什么名堂！

还有一篇较有名的受到批评的批评稿讲的是高岗窑洞的窗户纸。那时延安的窑洞当然没有玻璃，窗户是用纸糊起来的。像高岗等高级干部所住窑洞的窗户纸就比较白而亮，普通干部窑洞的糊窗纸就较黑而粗。作者认为不必在如此细小的生活细节中都体现出等级差别。"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之说绝非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首创，它在《轻骑队》墙报上早已频频受到指责了。

问题还不止这些。李锐发表在《轻骑队》上的文章虽没惹麻烦，可有一件事他却脱不掉干系：

那是《轻骑队》创办一周年的时候，向延安的各个单位和首长们致函，名为"征求意见"，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此举收获的"赞扬"肯定比"意见"多的多，这样可以扩大影响。果然不出所料：赞扬、勉励、支持的回信像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向这些单纯、热情的年青人飞来。已经调到《解放日报》国内部的李锐便让他的"老部下"、已是《轻骑队》第三任主编的童大林就此写一篇稿，登在《解放日报》上。童大林在文章中将回信人的名单一一列出，不知怎么就把总司令朱德和王实味的名字排在了一起。这时已是 1942 年的 4 月，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已被马列研究院批判，并被说成是"托派"，可他还是热情地给他在《野百合花》中百般"袒护"的、和他的观点多有近似的青年们回了信。王实味曾在《野百合花》中写道：

"青年是可贵的，在于他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的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的意见多些，但不见得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中，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的本质，合理地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的'牢骚'便是在昏暗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做镜子照一照自己。"

由此可见，王实味给《轻骑队》回信，实属憎爱分明所难禁。

可他的热心却害苦了李锐和童大林，领导把"排名"事件看成是一个政治错误。说来也是冤枉，因为尽管马列学院里在批王实

味，外面的人却并不知情。乔木责成童大林写了个"检讨"式的声明：此文"系童大林同志发出，未经编委会全体知悉"，并表示："《轻骑队》曾检讨年来工作，认为编辑方针错误，并决定加以改变。"

其实《轻骑队》根本就没有什么编委会。

一个星期天，青年俱乐部里挤满了人，大家从《轻骑队》贴出的海报中得知，他们要作检查。整风运动已经开展了好几个月，"检查"在各单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轻骑队》影响大，所以人们对此表现出更高的关切。

会上，已经调到政治研究室的许立群以《轻骑队》第二任主编的身份，作了长篇检查。乔木让童大林将原文压缩，准备登报。

乔木将检查拿给毛主席过目，主席亲手为这篇检查加了标题：《我们的自我批评》，然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第4版）

主席的态度，使正在拼命追查《轻骑队》政治背景的康生有点泄气。

接下去，中宣部部长凯丰代表上级组织找中央青委的蒋南翔和延安市青联正、副主席章泽、童大林以及李锐、许立群等人作了两次谈话，批评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清谈，在革命如此紧张、困难的时候尽讲些饮食男女。

半个世纪以后，当年的"骑士"仍然健在的都已年逾古稀。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少人觉得，应该给《轻骑队》平反。其实，如果人们了解了这样一个细节，或许会多一层感慨。

据童大林回忆：那是在《轻骑队》停刊一段时间以后，一天傍晚，人们在延河边散步，冯文彬把童大林叫到一边，悄悄告诉他前些日子，主席忽然问，《轻骑队》怎么不出了？冯向主席汇报了《轻骑队》在整风中的情况，主席似乎不大以为然：让他们把屁股转过来就行了嘛！

大概是这种"分寸"较难把握，或是青年们经过整风，已学会了用另一种思想方法来解释现实中的缺点，反正已经停刊而主席还

想再看的《轻骑队》再也没办起来。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当年博古阻止了《轻骑队》的铅印,那些理由至今看来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惜正是这一决定,使《轻骑队》的文稿几乎一篇也没留下来——1946年撤离延安时,那些印给主席看的油印件都烧掉了。而杂文界的老前辈曾彦修至今认为:从延安时期算起,最好的杂文当属《轻骑队》!

整风之初

1942年是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日军把侵华的重点从国民党战场转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也想乘机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从而不顾抗日大局,搞军事摩擦,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并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这些地方的物质生活遇到极大困难。革命队伍中间也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

为了坚持抗日,走出困境,毛泽东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1942年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始整顿《解放日报》,毛泽东认为初期的《解放日报》是一张"不完全的党报",有时不能很好地贯彻党中央的意图,因此解决党报不能闹独立性、不能有自由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是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陆定一传达中央的意见,说报纸要百分之百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意见,不能打折扣。博古在检查时也强调:"一句话也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强调党报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与党完全保持一致,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因为党正处于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是这种"强调"似乎也为日后的"舆论一律"打下了基础。以致党的路线出现错误时,党报的作用总是推波助澜。

应该说,李锐一生中这几年的新闻工作生涯是幸运的,因为在这段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路线一直是引导人民走向胜利

的路线。在这个前提下，新闻工作者的党性、纪律性都为保证这条路线的贯彻实施，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在这个前提下，新闻工作者才不会为遵守这“两性”欠下“食心债”。

这期间，李锐的一篇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解放日报》1943年1月11日)对推动边区的大生产发生过很大影响。

模范农民吴满有，是逃荒到边区来的难民，初到延安，穷得卖过女儿，饿得啃过树皮。分得土地以后，他勤劳发家，丰衣足食，成了劳动致富的典型。记者莫艾写了一系列有关他的报道，李锐的社论就是配合这些报道而写的。

“吴满有起身比谁都早，睡觉比谁都晚，天还没有亮，他就喂牛上山，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比较闲，就勤于捡粪，庄稼出了苗，有的人懒上山，不除草，或者最多锄一次，他却至少锄两次，乃至三次。他这种勤快的精神，已经发生了很大影响。吴满有说：‘全村的人和全乡的人的眼睛，现在都向着我，我们一家人鸡叫起身的习惯，已变作吴村人的习惯了，庄上的二流子已经没有了。’

“吴满有不仅勤快，肯劳动，而且他的庄稼经营得法。熟地深耕，多施肥。他的谷子除草三次，糜子锄两次；大块土疙瘩，都要打得粉碎，毫不马虎。耕地下种都很适时，不早也不晚……他又会经营副业。牛羊养得最好，经常对拦羊娃讲一些畜牧知识。比如羊圈潮湿一块就垫好一块；要让牲口吃饱草，喝饱水；草要扎的短，筛得净，不让有沙土和鸡毛；牲口外放不让在潮湿地躺卧，免得生病。牛羊养得好，积肥就比人家多。除发展畜牧之外，他还广种果树，种柳条编筐子。今年还准备试种一亩棉花……”

这篇社论文风朴实，言之有物，通俗平易，就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也百分之百地能听懂，而且感到亲切。而“报纸要密切联系群众”正是报社开展整风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或许是命运的巧合，当年李锐就非常关注水利建设事业，几次撰写这方面的社论。一次，他从众多报刊中整理出一份“解放区水利建设的资料”，然后配写社论《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

由于这篇社论以及随后他写的《冀鲁豫边区的剿蝗斗争》等文章的影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人民战争"这一节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

写完上述那篇水利的文章，李锐大病一场，高烧不退，住院40天。后来他回忆说："这场病同出狱后过度劳累，生活又遭意外不幸有关。"

李锐因何入狱，又是什么样的"不幸"把他击倒在病床上了呢？

在抢救运动中入狱

1942年整风运动转入对干部的审查。

几年前同王明一起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康生此时不仅是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而且担任了干部审查委员会的主任。这个王明路线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在这场以"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中，不仅没有受到丝毫怀疑，而且竟能爬上领导运动的副手的地位，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据说这是因为他能在王明垮台的过程中迅速转变态度，将王明踩在脚下，从而取得了毛的信任。他除了领导整个运动以外，还具体负责中央机关的整风。在这方面他的头衔是中直机关学委副主任(主任毛泽东)。几万干部的命运就落在了这样一个人手中。当他搬出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清洗的一套做法，一场大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42年11月间，康生曾向党中央报告，称中央社会部破获了一起重要的敌特案件，即"张克勤案件"。张克勤，当时19岁，1937年底在甘肃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后来经过地下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和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西北公学学习。1942年11月，康生在

西北公学搞审干试点，以张父在兰州被敌人逮捕自首，和张对领导提意见偏激等原因，将张看管起来，进行审讯。在严重逼供的情况下，张被迫编了一套假口供，说国民党对我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实行“红旗政策”(即敌人派遣特务、叛徒，打入我党内部，充当内奸，进行破坏活动的政策)，甘肃地下党就是“红旗党”，而且说他本人就是被发展的一个特务。康生获得这份笔供材料后，不问真伪，认为这是审干工作的一大突破，一面抄送中央领导，一面以此为资本，到处宣扬说：“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并进而得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靠不住、必须“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随即又开展大规模的追查。

“审干”开始不久，李锐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之后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特务并诬告李锐是他的“上级”。

1943 年 4 月，李锐被关进延安的监狱——保安处。

7 月，康生在中央大礼堂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他号召：现在是紧急军事动员时期。无论是自觉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被称为“恐怖信号”的报告，把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把整风运动中的“审干”阶段，又叫做“抢救运动”。从城镇到乡村，各个单位，直至监狱大搞“坦白检举”，几个月的时间里，清凉山解放日报社系统 95% 的人都成了“特务”，以至后来再抓出“特务”、斗争“特务”的人也都是“特务”。

无论多么荒唐的检举，都要求被检举者坦白承认，否则就是“拒绝党的挽救”。与李锐同在评论部工作的编辑余宗彦，在给朋友的信中把与他相好的三个女同学戏称为“三角形”。后来因为又加入了一个女同学，他便称为“四边形”。审干中，信不知怎么就落到了保安处手里，于是余宗彦被反复追查：“三角形”是什么组织，

"四边形"又是什么组织？余宗彦当然不承认，最后被送至"劳改队"。而更多的人却在昼夜追逼斗争的高压下，痛哭流涕地承认了自己是"特务"。清凉山那95%的"特务"绝大多数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外面如此，狱中的李锐命运又如何呢？还是让我们看看若干年后，李锐自己写的一份材料吧：

在延安保安处受审情况

(一)由于有人诬告等原因，1943年4月—1944年6月，我被关在延安保安处受审查。可记之事如下：

1.严重的刑讯，搞逼供信。我受的刑罚还是比较轻的：5天5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还要逼着写材料，不断受审。据说有这样一种理论，可能是苏联传来的：如此日夜紧张，可使受审者精神疲劳，终于说出真话。这种残酷的"疲劳战术"，听说有长达15天15夜的，姓名已经忘记了，千真万确。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我手上伤痕，几年才消去，也挨过耳光之类。

听到的有各种各样刑罚：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挨鞭抽(周兴即亲自这样打人)；假枪毙；等等。当时是几个人住一个窑洞，这种情况容易交流。第一次见到林里夫时(东北人，因上海党受破坏，1938年即关入狱中的"老号")，他伸出伤痕累累的双手给我看，说道："这能解决问题吗？"

魏伯跳崖受伤之后，长期带上脚镣，因而双脚残伤。赵一峰长期带脚镣，当时即神经失常；听说现在还不能提往事，一提就神经不正常。

还有饿饭的办法，专设"特字号"，将"顽固分子"集中，每

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2.发动群众搞逼供信假坦白（1943年夏季才开始，这是由当时延安的"坦白运动"发展到监狱来的），开群众大会围斗，也打人；树假坦白标兵，搞乱思想；严重的诱供。结果增加甄别的困难。

3.在狱中见过钱维人（已去世）和蔡子伟。这两人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上早已宣布枪毙了。蒋齐生（原在新华社），只是由于一个同姓名的"特嫌"，而误关了8年。还见到多年关成白毛女的人：满头白发的青年。

4.窑洞卫生条件很差。铺草睡在地下，因而关节炎普遍。

5.我是1944年6月有幸最先出狱的。其他绝大部分人都是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新号"、"老号"一起总共有三四百人，或者还多。

（二）延安的"抢救运动"没有认真作过总结，没有写过一个文件，吸取这次经验教训。七大开会时，毛主席曾为此对受害者赔礼道歉。对这个运动负主要责任的康生，反滑过去了。延安"抢救运动"教训极多：对革命形势估计错误；夸大敌人能量；尤其是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左翼的不信任；导致对整个地下党的否定；逼供信的恶果，多少人自杀、得神经病；等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肃反工作（打击AB团——作者注），使苏区党和红军受到极大损失。延安审干运动开始，毛主席制定了九条方针。但康生领导的保卫部门并没有真正执行。每一个当时被逮捕的所谓"顽固不化"分子，都是经过康生签字的。

（三）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保卫工作特别是延安审干运动，我认为仍有总结的必要。

1950年我在长沙时，公安厅的负责同志曾将唐纵的全部日记（从成立蓝衣社直到离开大陆）给我看了。唐是抗战时期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务工作的组长，后任内政部副部长，去台

湾后仍居高位，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中，是仅次于戴笠的重要人物。日记中的重要东西我曾摘录了一厚本。1942年的日记中，记到延安“抢救运动”情况时，我记得他写了这么一句：“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这就清楚说明，康生当年关押了几百个“特务”（除开从边区边境上越境进入被我逮捕的真特务分子外），将80%以上的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却没有一个真正潜伏在党内的特务。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教训。

李锐在押期间，虽然受到种种折磨，却没有牵连过任何人。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因为在严重的刑讯和诱供下，乱咬别人已普遍到不被当作一回事儿，（二三十年后的另一场“浩劫”中，抓“5·16”分子，也出现过这种局面）不少人不仅承认了自己是“特务”，甚至还在追逼审问中交代了自己的“特务上级”、“特务联络人”、“特务发展对象”等等，结果雪球越滚越大，“特务”越抓越多。

一天，《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碰到李锐的小学同学黄乃。黄乃1938年从日本留学回国来到延安，此时在总政敌工部（对敌工作部）工作，《解放日报》有一个叫做《敌情》的副刊，即由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所编，所以他常到报社。博古知道他们两家是世交，便向黄乃问起李锐的情况。黄乃虽然说不出多少根据，但他坚信，这个自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不会去当“特务”。博古告诉黄乃：“有人咬他。”

相对而言，在“抢救运动”中《解放日报》的几位领导对人的处理还算比较慎重：报社被抓进保安处的人没有一个是他们决定报送，全是康生的社会部下令而抓。对李锐的问题，他们也一直持保留态度。

为了证明李锐的罪不可赦，康生又造谣说李锐的父亲是被红军所杀，李锐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幸亏李六如向保安处来调查的人证明：李锐的父亲1922年在长沙病逝，当时还没有红军！

李锐的亲属中的确有人被红军所杀。那是1931年红军打入

长寿街时，实行“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的过左政策，家里男丁早已外逃，留在家中的祖母、婶婶、堂姐、堂兄嫂和侄儿等被强迫迁往江西，路上两个祖母走不动被推下山崖，其余几人一路病饿从江西讨饭辗转到长沙，先后病死在李锐家中。当时李锐正在上中学，家中一下来了许多人住不下，母亲便让他去父亲朋友家暂住。

对于老家人的死，李锐虽然觉得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参加革命后，每次向组织谈及此事，他总是坚持“这些亲人死于红军的极左政策”这一看法，但并没有在感情上引起太大的震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从小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感情比较疏远；另一方面大革命以来，他在长沙常常听说老家平江红白相杀之事。当时国民党杀害共产党和他们的家属，也是非常残忍的。先入为主的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家教和大革命时期英雄先烈的影响，已在他的思想倾向中起了主导作用。

然而，像李锐这样，家里发生如此残酷的事情仍然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投奔光明、投奔革命、投奔共产党的青年，在“审干”中不但得不到信任、嘉许，他们的家庭反而成了他们被怀疑的根据。“审干”中一种非常流行的逻辑是：这样的人不仇恨革命谁仇恨革命？他们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李锐的大学同班同学汤钦训就被责问：“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到延安来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种极“左”思潮之所以横行一时，除了康生之流别有用心以外，狭隘的农民意识也使一些工农干部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何以会不为自利而仅仅为了信仰，为了真理就能参加革命？

狱中的李锐终于明白“延安色彩”并非“最单纯”，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悠悠日夜旧山窟，恨不心肝挖出瞧。
虽说江河曾遇险，怎知沧海浪涛高。
（《龙胆紫集·延安杂记》）

然而，李锐晚年认为：正是这番坎坷，奠定了他一生反极“左”的基础。

1944年6月，重庆一个中外记者团要来延安访问，其中有一个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是李锐小学的同班同学，周恩来看到李锐反映的这一情况以后，立即吩咐有关部门将李锐提前释放，以便做些统战工作。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主动地对“审干”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这个党校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他又说：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这个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最后，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他把手举在帽沿上向大家敬礼，并诙谐地说：你们如果不谅解，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会场上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他才把手放下来。

祸不单行

李锐总算结束了一年零三个月的狱中生活。谁知祸不单行，迎接他出狱的，却是生活中的又一个重大的不幸！

为了减轻这一不幸造成的打击，李锐一回到报社，就拼命工作，虚弱的身体，过度的劳累，痛苦的心情，使他再也撑不住了。

病床上整日昏昏沉沉的李锐常常被一个梦魇所折磨：

茫茫的海面上，波涛翻滚，烟雨迷漫。突然，他被一阵狂风从一只小船上掀落海中。他向小船拼命呼喊，他在海中苦苦挣扎，正

当他最需要从船中最亲密的伴侣那里获得力量和慰藉的时候，她却在别人的诱惑之下弃船而去，小船倾覆了！而那乘人之危的诱惑者在这场风暴中扮演的却是负有“抢救”之责的角色。

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感情上的打击。后来，他和那伴侣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了同一条小船上，然而这梦魇却一直笼罩了他们几十年！

因为事情发生在整风、审干的过程中，引起了党的特别重视。群众中的反映也十分强烈。中直机关为此专门开了五天大会，谴责这一事件中的损人利己行为。中央机关党委负责人杨尚昆在会议总结中对当事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党为什么要干涉？因为这不是一个私人生活恋爱的问题，一个被党审查而捕走了，一个负责审查他的老婆，自己负责去审查的时候，利用了这个机会进行个人活动。以党的秘密去讨好自己所追求的目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玷污审干，目无组织，破坏纪律，有恃无恐。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明知故犯。肇事者遭到人们的一致谴责，受害者得到广泛而深切的同情。

报社的同志为高烧中的李锐输了血，医院里的医生、护士日夜精心看护，李锐终于又站了起来，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并且迎来了他文字生涯的又一个高潮。

回忆热河办报(节选)

1983、1984 年,承德群众报社报史工作组的同志两次来找我谈解放战争时期热河办报的情况。他们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并作了许多注解,还复印了许多当年的报纸原件给我,使我能够写成这篇文章。

到热河去

1945 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党中央决定派出大批军队和干部,从冀东、冀热辽、山东、苏北和延安,迅速进入东北。延安的干部 9 月中下旬就开始出发。10 月 5 日,我随杨家岭大队出发,11 月中旬到达热河。当时准备主持冀热辽工作的李富春向《解放日报》要办报的人,博古便派了我和范元甄。富春找我去交代了任务:主办《冀热辽日报》。出发之前,我带了一大批延安出版的书籍刊物,以及若干《解放日报》合订本和许多剪报资料,用一匹骡子驮着。过桑干河时这匹骡子掉到水里了,到承德后费了很大劲,一一揭开晾晒。在热河这样的新区办报,这批书报资料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形势的变化,我到热河时,原来准备成立的冀热辽中央局已改为分局。

大队在张家口停留了一段时间,我们到承德时,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第二批人员吴文焘、王揖等同志先我到达,正准备离开承德到东北去。吴文焘走后,我就负责热河报社的工作,大概是 11 月下旬。我军于8月19日进入承德,9月中旬出版隔日四开的《中



1945年10月李富春向《解放日报》要办报的人，博古便派了李锐去，李富春要李锐主办《冀热辽日报》，任报社社长。在李锐的努力下，报纸办得有生有色，最多印数达两万份，少则5000份。承德邻近前线，是战略要地，《冀热辽日报》在指导工作、鼓舞斗志、稳定人心方面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1947年李锐在热河林西乡下调研，左一为《冀热辽日报》总编辑朱九思。

苏新报》，由冀东地区来的林采主持。苏联红军于十月革命节撤走后，即改出《大众报》和《大众日报》。我接手时《大众日报》由热河省委领导。

到报社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报纸的版面和标题很不合规范，还有“协和语”也是个大问题。现在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协和语”了，这是日伪统治时期强力推行的一种非驴非马的“语言”。其中含有大量日本语里的“汉字”；语法结构多为倒装，即动词在宾语之后，模仿日语；此外，还杂有一些同日语汉字接近的古汉语。例如，“笃农植麦谈”（老农谈种麦）、“军人家族慰安”（慰劳

军属)、"各关系长官咸临致辞"(有关领导到会讲话)、"农作物除草着着进行"(夏锄顺利展开)、"放送"(广播)等。"协和语"是一种殖民地产物,我们必须在报面上消灭"协和语",使读者耳目一新:这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报纸。这件事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值班编辑是生手和伪满报纸的留用人员。

我去后不久,林采就到李运昌主持的动员委员会去了,名义上还负责新华分社的工作。鲁森任总编辑,他原是冀鲁豫的县委书记。不久去张家口治病。大概在 1946 年 6 月间,朱九思来了,担任副总编辑,他原是赵尔陆纵队的民运部长,我的大学同学,是纵队变动建制时,我争取来的。从老区来又做过新闻工作的,只有黄钢、华山、廖经天、范元甄这几个人。黄华、沈毓珂等也是从老区来的,可是没有办过报纸。编辑部里留用的人员较多,有两位老编辑,校对全是留用的。老区来的人虽然不多,从编辑到记者还勉强对付。大家都很紧张,很累。我自己的工作,从写文、改文直到标题、版面,都得过问,还要当夜班。开始一个阶段,还必须让大家熟悉我们解放区办报的一套经验。

那时,热河省委的领导同志胡锡奎对报纸抓得比较紧,经常通电话,省委驻地也离报社近。1946 年 1 月改为《冀热辽日报》,由分局直接领导,分局离报社较远,联系不如省委那样密切。

从技术业务上讲,一个困难是电台,一个困难是印刷。电台的工作主要是领导责任心不强,收报质量差,每天都要有一两个编辑把许多精力放在校正电稿的错字和脱漏字上。黄华是北平大学生,从晋察冀来的(现已去世)。我总记得他整天坐在办公室校对这些电稿,一丝不苟,他几乎能记住明码本上的全部常用字。有时我怨他太过分了。经理部和印刷厂,石夫、金刚、吴克贞三位都在延安清凉山印刷厂工作过,都是很有经验的老手。麻烦就在只有一副很旧的老五号铜模,原来四开四版,容纳不了多少字。一台伪满时代从锦州搬来的小转筒机,印刷质量不好。改为《冀热辽日报》后,出对开二版,容量依旧。曾派石夫到北平去买新五号铜模,

多方设法，也没有买到。承德撤退前，请军区派来一位老红军李耀渲任电务科长，他责任心强，又是老电台台长，电台的工作才有好转。

那时的精力，主要对付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报纸内容和编排，一个是处理技术业务上的问题。最大困难就是用电没有保证，电台同总社联络常常中断。承德的发电厂，那时在双头山，煤供应不足时烧过木柴，后来在附近的大庙搞个小煤窑，稍好了些。电厂的厂长是周建南，我没有少找过他，后来做到保证向军区、报社供电。还有一个困难是发行。敌人在平泉，距承德只几十里路，热东地区发行很难，热西稍好一些。虽然每个县都设了派报所办发行，实际上有很多报纸发不出去。东线未撤退时，朝阳、平泉等地报纸成堆，有的县级机关用同一天的报纸裱糊房子。当时最多印数二万，少则五千。在那个小范围内也是尽力而为了。

承德靠近前方，是战略要地，局势动荡。这张报纸的作用还是不可小看的：指导工作、鼓舞斗志、稳定人心，应当说都是起了作用的。

从承德撤到林西

从承德撤退到林西，其间约经过两个月时间（1946 年 8 月下旬到 10 月中旬）。那时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干部还有和平思想。尽管敌人就在面前，知道仗是要打的，但主观上总希望和谈能多拖一下也好，因此许多工作准备不够。最大问题是没有准备好交通工具，直到最后才搞了几辆胶轮大车，自己没有卡车。7 月间开始疏散，分几批撤走。所有的印刷设备，几架对开和四开机、纸板机、铅字、铸字机、铜模等等都搬了，但末了把主要力量放在那个小转筒机上，两三万斤重，耽误了许多事。这是很大的失误，就是搬出承德，也搬不到林西，同时没有电力，搬去了也用不上。报社是不同意搬的，要搬也只能水运冀东。这台笨重的卷筒机搬到围场后，再无力运走，埋到县城一座小学里。据说报社回承德后，找

到时已锈蚀多处，两个大框也已被盗走。后来运到天津又不好修理，如配件大修，其费用等于买一台新的，至今仍在《天津日报》仓库里堆着。这使我想起红军长征离开江西时，坛坛罐罐的故事。当时比较机械地执行了上级的决定。

撤退时，报纸坚持出到国民党军队进承德的前一天。我率领最后坚持出报的二十多人，是 8 月 26 日坐卡车走的，先向北撤退到围场。国民党军队 27 日黄昏进入承德市郊。华山当时是报社的记者，他写的那篇通讯《我们还要回来的》，就是在承德火车站听到枪声时采访的。那篇通讯经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宣告我们报社坚持到了最后一天。

撤退途中，天上有敌机扫射，地上有土匪骚扰，可我们收新华社的新闻没有中断，每天出油印的《每日新闻》。报社与新华分社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一路上新华分社的工作没有停止过，发报不一定每天都发，收报是天天收了，不能不收啊。

承德撤退后，热河省委搬到热西，于是派鲁森去筹办省报，从报社抽去一批干部。后来这个省报没有办成，到林西又汇合在一起了。从围场退到赤峰时，赤峰办有《民声报》，是从锦州撤过来的。《民声报》的社长是冀东的何伟，他到林西后就做地方工作去了。《民声报》有一副不完整的新五号铜模，这真是一件宝贝。从赤峰再向北撤退到林西，两个报社人员就合并到一起了。那是在 1946 年 10 月 10 日前后。开始是出《冀热辽日报》与《民声报》的联合版，后来便统一称为《冀热辽日报》。

敌人占领赤峰后，我军退守乌丹。这年冬天酷寒，敌军向乌丹进攻，机枪冻得拉不开栓而败退。我们局处林西，交通不便，消息来源和报纸发行都相当困难。于是派出两个新华支社，一个到热中，一个到热辽，到敌人眼皮底下去。承德撤退前，黄钢就去了热东支社。这三个支社都带有电台。在承德时，是尽可能派出记者，没有建立支社，没有在各地委办报。这次是形势逼出来的，采取了对于一家报纸来讲是重大的战略性措施——化整为零来办报，把

主要的力量放下去办支社和地区(地委)小报。

三个支社的任务都很重大而工作条件又都相当艰苦,选派的负责干部都是从延安出来的,他们经过整风,而且都是很勤奋的人,写作能力也比较强。热中廖经天、热东黄钢是《解放日报》的编辑、记者;热辽的鲁蛮是鲁艺出来的。随同他们前去的编采和电务人员,也是比较精干的。

三个支社起了很大的作用,都出了油印的报纸,同时收录新华社的电稿出《每日新闻》和内部参考材料,供各级领导干部阅读,成了各个地委的直接的耳目,同时,还向报社和分社发回了大量的稿件。当时各地委的负责人王国权、李望淮、王孝慈、强晓初等,都极其重视报纸和支社的工作,尽量满足物质上的需要。

三个地区战事频繁,经常转移,有的地委在马背上办公,报社也在马背上办报。三个支社都受到当地党委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热中支社的《热中报》办了半年多,在邻近的城市赤峰解放后调了回来。热辽支社的报纸,从油印改为石印,又改为铅印。热东支社在黄钢调回报社担任军事记者后,由高文晋负责,报纸也改为铅印,1948 年 2 月我调离热河后,据说他们在锦州解放后即进入锦州,继续出版《人民报》。

热北地区也派出了记者,并培养蒙古族新闻干部,帮助热北地委筹办报纸。热北地委共派来七个蒙古族同志学习编辑、采访,另有三人学电讯技术。后来他们都成为盟委《农牧报》的业务骨干,并参加《内蒙古日报》(东部版)的工作。

林西的南面是乌丹警备区,派去记者,又通长途电话,新闻来源不成问题。

这样,报社虽然撤到了偏僻的林西,报纸同整个冀热辽地区的联系反而更紧密了,对热辽、热东和辽西地区的报道,反而比在承德时还要好些。

到了林西,报社同分局的联系也更密切了。在承德时分局主要抓军事,到林西以后的分局会议我就经常列席了。

在林西时，由于纸张、印刷等等困难，报纸版面缩小成八开，手摇机器印刷，用手摇马达收发电讯。马达每日一修，电池奇缺。生活很艰苦，一到林西就过冬天，那是个经常刮白毛风(带雪花)的地方，取暖只能节约地烧点干牛粪，墨水瓶老是冻着，连煤油灯都找不到，伙食当然也差，但是大家情绪很好。

派出三个支社，又向热北派出了记者，基本的编采力量放到下面去了，老干部就剩朱九思、鲁荻、谢文清、黄华和我几个人留在家里。承德撤退后，张维冷随报社到林西，他是从国民党区来的。我们几个人还轮流到附近地区采访。这时，培植新生力量的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新的编辑、记者共 15 人，大都是从承德、锦州和赤峰新参加工作的国高(即四年制中学)学生。我们放手让他们挑担子，这些同志进步较快，在林西时就能做通联、编辑工作，多数能写文章，有的还写得很好。

工厂和电台也注意提高技术。那时樊允行、应坚两位同志来了，当经理和厂长。老樊是清凉山印刷厂工会的负责人，他以身作则，同工人打成一片，擅长行政管理。他根据延安的经验，改进印刷厂工作，按工种分工，形成流水作业，工效立即成倍提高，尤其拣字，很快达到延安每小时 1600 字的标准，甚至超过。应坚是清凉山拼版的好手，有带好徒弟的任务。电台有三个日本同事：钉崎卫、竹本达也、秋山盛子。他们技术比我们高，除了请他们带徒弟，还请他们办电务训练班，帮我们培养了一些人。后来他们都回国去了。还有一个日本人学拣字，名叫柳田秀夫，他的妻子柳田敬之原是装订工人。

在林西时，虽然种种条件远不如承德，但是各方面工作却蒸蒸日上。

在土改和战争中

解放战争开始大反攻是在 1947 年 6 月。6 月 6 日我军解放赤峰，报社随即南下到达赤峰。这之前不多天，报名改为《群众日

报》，因为这时分局已经改为冀察热辽分局。

热河北部敖汉旗是鼠疫区。日本在东北设有绝密细菌工厂，专门培养鼠疫等菌苗，投降时将该厂炸毁。敖汉、乌丹、赤峰一带，1947年死于鼠疫者数千人。经过紧急封锁、隔离、治疗，1948年始控制住。

到赤峰没有多久就闹鼠疫，整个城市都在疏散，分局也搬到乡下去了。报社一时搬不走，到乡下去没有电。我们只好在院子周围挖沟，让老鼠不能自由往来，这样似乎心安一点。这样一大批人马集中住在这个危城，是冒了点风险的，不久报社也搬到了赤峰南面的牡牛营子村，离分局的五家子村只几里路。

在牡牛营子那一段，关于土改的报道很集中，数量很多。这对于推动土改运动，当然起了好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一些"左"的东西。譬如宣传"老牛赶山"，给地主分坏田，推广那些"左"的经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经验教训。全国解放以后引以为戒，中央有指示，不再在报上报道土改运动了。

我们的报纸，从承德开始就注重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也是老区报纸的传统。《解放日报》1942年改版时，中央宣传部有过一个"改造党报"的通知，其中就专门谈到报纸要展开正确的自我批评的问题：表扬优点，批评错误，以此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并允许各种不同观点的论争。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或者重要偏差，例如发动群众、土改中的问题、官僚主义问题，都有及时的、比较切实的批评。因此，尽管土改报道中间有教训，但对推动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报纸还是起了好作用的。

1947年秋后，土改运动中发现的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部分干部的立场不坚定，和随之出现的"夹生饭"现象、假农会、假分地、某些新干部包括县级负责干部贪污腐化侵吞土改果实的问题，以及浮夸风等等，报纸都有比较充分的批评报道。土改中的一些问题，最先是从热中发现的。我们派熟悉那里情况的副总编辑廖经天同志去采访，配合工作团的工作，搞了连续报道。我自己也写了

《消灭假农会》的社论和《退还侵占果实》、《学会分配果实》等短论，还写过一篇《谈土改报道》的社论，讲不要浮夸，坚持新闻真实性的道理。

1947年夏初高岗来时，分局组织了几个工作团对热河土改进行复查。高岗对整个冀察热辽的工作，主要是土改工作，指责颇多，认为热河过去对整个工作估价过高。高岗在热河和冀东停留近半年，后来他提出建立新作风的问题，在分局开了一个月的会。分局负责同志欧阳钦、黄火青、赵毅敏(程子华当时在前方)等，还有王孝慈、强晓初、李望淮等热中地委和行署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我也是从头到尾参加了的。我记得高岗当时对中农的政策也有"左"的观点。这个期间，对高岗提出的一些问题，报纸有所反映。我写的《宁城的教训》等，和1948年2月20日发表的反对官僚主义的社论《彻底改变我们的领导作风》，就是分局工作会议总结后写的。

那时报道的中心，除了土改便是战争。打仗、支前、扩军等都下力量报道了，并向部队和前线派出军事记者(带电台)。谢文清就是一直当军事记者，在前线奔波。后来我们派出了前线记者组，黄钢担任组长。我们不只是发战报，而且报道战役的经验教训。1947年辽西白庙子战斗，黄钢写过系列报道；刘雪初大概那时是团政委吧，也写了些文章，我还写了社论《学习白庙子战斗》，探索打胜仗的规律。

全党办报，努力接近实际

把编采的主要力量放到前线，放到改革土地制度的农村，放到各支社，家里只留很少几个人坚持出报。在战争年代，这是很好的实践经验，想必还具有普遍性。1947年反攻回到赤峰时，人都派出去了，甚至版面都拼不出来，有时逼得赶写一些东西。1947年夏天，我自己也下去了，就留朱九思在家。欧阳钦到热东开会，我尾随他去的，有意识地当记者，直接采访报道一些下面的情况。我

同一名记者带着电台，坐上马车出发了。边赶路边采访，途中就写了一些新闻，到了热东地委驻地建昌县，又到一些村子里采访。从7月末到8月末，共计采写了新闻和通讯23篇（不含言论）。那时年纪轻，下笔快，当然文字不免粗糙一些。

编采人员到实际工作中去，是报纸接近实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普遍地发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各地负责同志，给报纸写稿，发展他们做骨干通讯员。他们热情支持报纸，他们的文章明显地提高了报纸的质量，我至今还心存感激之情。

分局、省委和各地委的领导同志程子华、欧阳钦、赵毅敏、李运昌、王国权、李东冶、强晓初、郭敬、杜星垣等，都是报社的撰稿人。给我们写稿最多的要数当年在分局任秘书处长后来又带工作团下乡的马洪，据已搜集到的报纸统计，到1948年初他调离冀察热辽之前，见报的文章有42篇。郭小川调来报社之前，徐懋庸在承德和后来在土改工作团时，都给我们写了很多文章。

从分局到地方党委，对报纸工作是很关心的。报社本身从承德开始，整个工作同党的中心工作也是结合得比较紧密的。两个方面，前方的战争，后方的发动群众、清算、反霸、扩军、生产、支前等等，都是结合得比较紧的。除配合中心工作进行报道外，报社印刷厂和热辽、热东两个地委报社印刷厂（热中无此条件），还经常为党委机关排印文件、票据，排印向蒋管区散发的宣传材料。

报社在装备

经过两年的艰难历程，到牡牛营子时，虽然还是在农村，也没有电，但报社仍进入一个新阶段，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朱九思带领行政干部从哈尔滨买回来六号铜模和一批印刷器材，这是了不起的大事。过去用新五号，一块版装不到一万二千字；改用六号字，一块版能装一万四五千字，版面容量大大增加。但是分局年事较高的同志则有意见了。

印刷厂各个工种的技术力量，经过补充和培养，基本上也配备

齐全了(只缺轮转印刷机和制锌版铜版的设备)。万能铸字机已由哈尔滨买来,只是由于电力和技术,几经努力未能启用,回承德后才用了起来。两辆旧的载重卡车也是从哈尔滨买来的,虽然汽油不足时还得烧木炭,可这在报社却是破天荒,第一次有了汽车,工作方便多了。印刷厂夜间工作也有了汽灯。虽然收发报的马达还是人摇,可电台的问题解决了,在林西基本好转,在赤峰没有发生问题,到牡牛营子就相当程度地正规化了。那时电务科已有七十多人,下设四个电台:一、二台担任发报,三台收总社电讯,四台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向《参考消息》供稿。除此之外,有时也代分局和军区收发电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建设,编辑部没有后顾之忧了,大家可以集中精力办报。记得当时在总社工作的英共党员阿兰·魏宁顿曾到牡牛营子参观过,对我们在这种工作条件下,能坚持每天出大张的报纸,极为惊讶,表示赞赏,后来他还写过报道。

人才在成长

到1948年,令人欣喜的是干部培养出来了,有了一批新的专业新闻干部。锦州、承德、赤峰先后撤出来的新同志,经过了战争和艰苦生活的考验,经过压担子,业务上比较过硬了。到牡牛营子时,都能自己动手编写,包打包唱。支社的同志编写之后,还要自己刻蜡版。老干部当然也提高了一步。沈毓珂是冀鲁豫老区来的,过去没有办过报,在承德是编辑,后来能采能写能编,大批人员南下后,由他来主持省报的工作。他的爱人田绿萍,原来文化程度不高,管资料,后来也能编能写了。

从牡牛营子开始,陆续吸收了几批从蒋管区投身革命的大学生,主要是从平津来的,共约二十人,如陈牧天、柏原、李冰封、方堤(现已去世)、沙星航、朱悦、戈津、戈铭等。这些同志经过放手使用,很快掌握了新闻业务。我1948年2月调离热河后,听说他们都成了编采方面的骨干。

从我本人讲,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以后是在延安度过的,做

宣传工作、新闻工作。在《解放日报》编辑部，开始管蒋管区的报道，后来管解放区的报道，一直搞评论工作，并没有全面主持一个方面工作的经验。到热河以后，整个一个报社的担子压到肩上，从文章版面、印刷、发行，到对内对外，柴米油盐都得过问，特别是干部工作，逐渐将担子挑起来了。我在 1947 年 2 月给总社的信中写到："这一年来碰了不少钉子，吃了一些苦头，才算知道一点当家的困难。过去在延安的生活真是'饭来嘴张'，不知天高地厚。去年 8 月底至 10 月底，撤退五六次，奔波一二千里，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算是一扫而光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作为一个干部，就得给他压担子。一压就压出来了。不让他挑担子，他有才能也发挥不出来，或者才能不够也培养不出来。这是一条革命的根本规律：人才是逼出来的，只要放手给新干部压担子，从各方面关心帮助，自然很快便成材了。

从新闻业务上说，我自己一贯比较注意报纸的评论，从社论到短评，自己是勤于动笔的，这恐怕同年轻时在学校就爱好写作有关。也比较注意文风，力求生动活泼。还注意不搞长篇东西，在承德时就与黄钢一起商量过，我们自己要多写短东西，也动员别人写短文章。

在热河报社的时候，从我起，编辑记者当中没有哪个人原来是学新闻专业的，一个都没有，硬是炼出来了，当年的这些老兵，现在大部分还在从事新闻、出版、宣传和其他方面的文化工作，处在负责岗位上。应该说战争年代的报社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冀热辽地区这张报纸、这个报社也不例外。

当年一起工作的同志，对这几年的回忆无不感觉亲切和温暖，为什么呢？就是这些年中党的路线正确，工作发展很快，上上下下团结合作，亲密无间，心情愉快，没有人整人、互相戒备那些事情，工作进步，个人也进步，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都如此，都受到了锻炼。有什么问题解决得也比较好。三四年艰苦的锻炼，打下这么个好基础，受用一辈子。

在那一段比较好的集体生活里，还应当强调一下领导与同志及同志之间，互相信赖，目标一致，大家积极性高。个人的才能得到发挥，工作进展才比较快。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尤其知识分子更是如此。报社内部在土改运动“三整三查”时，也没有整过人；基本上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完了。可是有一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就是韩志新自杀的事。他是电台工作人员，大概有什么生活问题，土改运动时并没有斗他，电台的一部分青年批评了他，可能言辞激烈些，他顾虑重重想不开了。这次事件之后，便明确宣布不搞疾风暴雨式的“三整三查”。那时干部之间无扯皮之事，大家讲原则，靠正常的民主生活来解决问题，互相之间抵消精力的事根本没有。解放后由于弯弯曲曲的道路走得多了，大家现在一谈起往事，自然很怀念热河那一段生活。

（1986年6月）

痛说“大跃进”



在“大跃进”拉开帷幕之后，有一股排斥知识、破除迷信的发狂热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亩产万斤、几万斤、几十万斤地放卫星，“敢教日月换新天”，浮夸风在神州大地蔓延。图为天津郊区的一块稻田。水稻被人们密植，长得密密实实，一个女孩如同坐沙发似坐在上面，水稻纹丝不动，压也压不倒。

“大跃进”期间三次上书毛泽东

在“大跃进”期间，我作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先后给他写过三封信。三封信都是反映我对“大跃进”的观感的。毛对这些信件都表示过他的看法，有的是在小范围谈话中的即兴评点，有的则是在大庭广众中语惊四座的议论。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印象深刻，感慨无穷。

毛泽东听到我说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

1958年6月上旬，毛找我去谈过一次话，说到当年钢铁要翻一番的打算。6月中旬到7月上旬，我到上海主持华东区电力系统下放会议，接着参加华东区计划会议。这些会议是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紧锣密鼓地部署“大跃进”的重要步骤。在开完会议离开上海的头天晚上(7月7日)，我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工作性质的信。我的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地区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尤着重于发电设备高速增长的困难。我认为在工业全面跃进的形势下，电力供应将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信的末尾指出，“有些事情需要也可以‘霸蛮’(按这是一句湖南土话，即勉强蛮干之意)，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人们还是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召见李锐,认为李锐上书的观点"不甚明朗"。李锐解释道,"大炼钢铁",搞"小土群",几千万人上山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决非长策,钢铁这个东西还是要靠"大洋群",否则不能保证质量,从而会影响到用户。最后李锐还说毛泽东"不到黄河心不死",毛泽东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当时,机关、学校也掀起炼钢热潮,图为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机关干部炼钢。

不大愿意多听困难之言,困难之言有时也使人难以启口,至少先给自己戴顶'中游'帽子,才好开讲。"(此信留有底稿)

这封信发出不久,就是8月北戴河会议的召开。北戴河会议决定为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发动全民炼钢;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号召在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这次会议成为把"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推向最高潮的标志。我的这封信同这种狂热势头太不协调,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当时毛泽东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上,对我的这封信自然不会看重。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没有找我谈过话,之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到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情况起了变化。“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子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第一天讲话时提出要把空气压缩一下。也许是他想起我那封信来了吧，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到他的住处东湖招待所去。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就在附近。1952年我从湖南调北京之前的夏天，我到中南局组织部谈话时，在这招待所里住过几天。这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廊式的平房，就在东湖之滨。见面时毛先提到这封信，说是“观点不甚明朗”。我没多作解释，心想不过是“不中下怀”罢了。谈话不到一个小时，现在记得起来的谈了三件事：一是大炼钢铁，谈到“小土群”，几千万人上山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决非长策，钢铁这个东西还是要靠“大洋群”，否则不能保证质量，从而会影响到用户，首先是机械行业一系列问题。我最后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也笑了起来，这些话听进去了。其次谈到大炼钢铁产生乱砍树木毁林的恶果，当时我就有所接触，联想到水土流失。这个问题未能深谈下去。第三件事是粮食“放卫星”问题，我特意问他，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科学论证，一亩地可以打几万斤粮。钱的文章对毛固然起了作用，当时我心里想，一个自己种过地对农业如此熟悉的人，恐怕主要还在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也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许真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吧。说受钱文影响，是否有点推卸责任呢？何况，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还是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硬有7500亿斤。这个比头年翻一番的产量，他是很满意的。（后经核实，只有4000亿斤。）

我在《龙胆紫集》中，“戊己诗”九首组诗有一首七绝，即记这夜谈话情景：

岂有闲情忆少年，湖边夜召话当前。
黄河不到心难死，特作如斯斗胆言。

这晚谈话使我感到，钢铁也好，粮食也好，毛确实比较清醒了，“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重的话，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虽然粮食产量仍坚持公布 7500 亿斤，他还是号召反对作假，直接批评了当时盛行的浮夸和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这就有利于降温工作的进行。

毛泽东批评我的第二封信只有“骨头”没有“肉”。我再次上书，有些话是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

1959 年初春，“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势头比以前有所减弱，农村开始整顿公社，一些工业指标也有下降。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在整顿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一些此前尚未察觉的政策性问题。工业方面问题更多，已经下降的指标（如钢产量）仍然同可能实现的产量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一些部门和地方为完成 1959 年的指标，还在争材料、争设备、争资金。这时我愈发感到问题很多，矛盾丛生，曾反复考虑 1959 年钢的指标难以完成；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很难办，会影响到全局。一次开会时遇见计委廖季立，他是计委委员兼综合局局长，我们是延安“抢救运动”时一同关在保安处认识的。我直率问他，钢产量 2000 万吨到底能不能完成；他也直率答道，不可能完成。有了这个底，我便于 2 月底或 3 月初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反映问题的信（这封信的底稿至今未能找到）。信里主要讲了 1959 年钢产量指标必须下降，并且落实，这样才能免于影响全局。否则，最大问题是同一机部的矛盾无法解决。一机部的主要产品有赖于钢的数量尤其质量，从而电力也是无法保证的。信的末尾，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宁

肯少些，但要好些。”信写好后遇见周太和（陈云的秘书，延安时老熟人），他将信给陈看了，并跟我说，信中所反映的问题不少牵涉到计委，最好能给富春也看看。于是我将信的抄件送李富春，原件送毛泽东，并说明同时给了富春一份抄件。

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会议刚开始两三天，得到通知，毛泽东要我去谈话。他住在一所很宽敞的花园洋房。进客厅时，胡乔木也在座。刚坐定，他就指着我对乔木说：这个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转入正题谈钢铁指标落实，对计委的工作有很大意见时，我才醒悟到，刚才的话是指我写给他的信为什么要送一份给李富春看，认为我胆子太小了。谈到我的信，毛说，为什么只给他几根骨头吃，不给些肉吃？我这第二封信写得大概很简要（这同武昌谈话说第一封信“观点不明朗”有关），主旨在1959年钢的指标肯定不能完成的理由何在，如不立即落实，后果会如何等。看来，这封信内容被接受了。不然，谈话不会如此风趣。出门时，乔木还跟我谈到，去年赫鲁晓夫来北京，请吃饭时，毛问到：苏联有无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赫答：苏联没有这种经验。对这种问话，乔木当时是不以为然的。

我同毛谈话后，受到一定的鼓舞，决心进一步提些意见，于是立即写了第三封信。这封信的底稿保存下来了。从南宁会议到上海会议这一年三个月时间中，我除了自己的水电业务工作外，有一半时间是泡在各种会议和调整计划指标之中，对这种“纸上谈兵”和“画饼充饥”的生活，体会极深；对中央和地方高层决策程序和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及性格特点等，也略知一二。当时心中最焦虑的问题也即经济工作较有经验的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1959年和“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具体落实。我觉得我可以将这点心情和意见向毛透露了。第三封信全文如下：

想到几点意见（仍只是几根骨头），供您参考：

（一）在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关于1959年计划的安排（也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几次调整），从成都会议到这次上海会议，大体上涨了五六次，下降了两次；如果划一根曲线，则北戴河为最高点，武昌为转折点，上海为落实点。这是一个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发展过程。从做计划来说，回忆一下这一年来的情况，接受一些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这对于安排明年和今后的计划有很大的好处。中外古今没有过这种大跃进的经验，一年来计划安排的上下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一点要引起注意，就是今后做计划，应当避免再这样几上几下、大上大下了。对于全国条条块块成万千做计划工作的人来说，这一年中是极为辛苦的，是颇有苦可诉的。由于计划的上下摆动，长期不定，思想不实，对日常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今年一月的订货迟了，影响到一季度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够好；现在二季度订货还在北京难解难分。

在这一年的计划波动过程中，也有个思想问题，就是对一些问题不敢大胆怀疑，否则会有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的担心。

（二）也许经过今年一年的工作，可能基本估计出钢、铁、煤炭、重型设备、发电设备等几种重要工业产品年度跃进的可能限度，可能摸清工业交通内部几个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三委（指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和各工业交通部应当有专人来研究这种限度和比例，以利明年和长远计划的安排，以免今后不必要的几上几下和大上大下。

（三）同时还应当很好研究苏联、美、英、德、日等国跃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去年一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却带来某些副作用，对苏联的某种“不足为训”是副作用之一。还是要认真研究人家的经验，哪些是必须参考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四）以上这些有了进一步的考虑，对于如何才叫做贯彻了总路线，才可能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例如重工业跃进的限度，主要决定于哪些因素？在哪些部门？这些因素又各占怎样的比重？这些重要因素如：头年已经达到的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设备能力，当年基建可以发挥的能力，两条腿的作用，重大技术革命的措施，鼓足干劲的能动性，等等。

（五）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着重讲过留有余地和事物波浪式前进的问题。这两条去年大家不大多谈了。留有余地和波浪式前进是客观的东西，违反不了的。做计划工作不应当忘记这两条。

（六）三委和各部门现在就应当有人来考虑明年的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我们现在是用尽全部精力和全部当前条件来赶今年的任务，其间譬如在基建方面，就同明年和长远计划有一定的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与安排明年计划有很大关系。尽管还会改多少次，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还是早定出为好。

从当时的气候看，信中所讲的一些意见还是比较尖锐的，讲了"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关系；讲了订计划要避免"几上几下、大上大下"；讲了工业内部的比例，工业跃进的限度；甚至讲了"去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某些副作用"；讲了人民担心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而不敢大胆怀疑。可以说，这些话都是直接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

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胡乔木提醒说，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在上海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达三个来小时的讲话。毛在讲话中回顾"大



1958年中共中央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李锐参会。会议着重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冒进。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着重讲述过要留有余地和事物波浪式前进的问题。李锐在给毛泽东第三次上书里,提到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说的这两条,大家都不大多谈了。李锐认为,留有余地和波浪式前进是客观的东西,违反不了的,做计划工作不应当忘记这两条。事隔35年之后,李锐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在原会场址留影纪念。

跃进"一年多来的历程,提出16个问题,评古论今,说长道短,涉及到许多党内上层之间的历史纠葛;讲得疾言厉色,很有情绪。其中讲到第十四个问题即他要找几位秘书时说:

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名曰秘书,从三委(计、经、建委)二部(冶金、机械)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借此同你们唱对台戏。然后再逐步增加,找几个部的。前面乌龟爬上路,后面乌龟照路爬。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你们反对得了呀?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人算是好人,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李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

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是插野鸡毛的。

讲到这里,毛大声地问:李锐来了吗?我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只好应声站了起来。毛说:你坐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头来嘛!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在讲到第十五个问题即要解放思想时,毛又点我的名说:李锐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种空气很不健康,怕挨整,以为总不知有哪一天要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好嘛,公事公办,怕什么?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戴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藉,老婆离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王熙凤乃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舍不得砍掉头,就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岳飞不是砍了头,比干不是挖了心吗?明朝有廷杖制,顶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几百人、千把人,至于推出午门斩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讲,冒死上谏。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我跟陈伯达讲过,你不尖锐,无非怕丢掉选票。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无非是开除党籍、撤职、记过、老婆离婚,砍头也只有一分钟的痛苦。风波亭的戏还要唱,岳飞砍了头,为什么不好?

接着讲第十六个问题即党内批评时,毛又借海瑞敢于冒死上谏的历史故事作了发挥。毛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在地下,然后又捡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嘉靖皇帝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有一天皇帝死了,班房里的人告诉海瑞,恭喜你了,你要出班房了,要升官了。他听了这话以为是假的,他就拼命吃饭吃肉,准备被杀

头，以为是要杀头了。班房里的人告诉他，不是要杀他，是皇帝死了。他听了以后哇哇大哭，把所有吃的东西统统吐出来。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

周恩来当场回答：看了。

我自己真没有想到会在大会上受到如此奇特的夸奖。“你坐到前头来嘛”，“给我点肉吃嘛”，“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此种声调、语气、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发电问题时受到表扬，“要培养像李锐这样的秀才”，但那毕竟是在小范围讲的。这次是中央全会，坐了满礼堂的人，而且是满篇怨言、气话中冒出来的称赞。于是我又一时成为关注和议论的对象。一些人对“骨头与肉”不知所云，甚至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红得发紫了。”

当天晚上，见到田家英，同我一样，他和胡乔木等人都对毛的有些说法感到突然和费解。家英甚至说，是否头晚安眠药吃多了。这样谈到海瑞，似乎是鼓励人们学海瑞，敢于讲真话，不要今不如昔，连明朝的廷谏之风都赶不上。家英向我谈了乔木的看法：引出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当时我和家英都认为乔木这个看法很深刻，他对毛理解得比较深。（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胡乔木加了一个尾巴。）

我个人再次受到此种夸奖殊荣，自然也感到一种安慰；但心中却又怀着一种惶恐，即今后这个“秘书”怎样当下去？能否再这样“若即若离”下去呢？同家英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还是比较乐观的。

第二天，赵尔陆（机械工业部部长）找我长谈了一次，主要谈他们部同冶金部的关系。机械产品的周期都比较长，其数量、品种和质量三者都同冶金部提供的原材料分不开，彼此依赖，互相制约；一年多来，计划的多次改变，重点任务的变化，突击小高炉，突击轧钢机，造成许多半成品，尤其是铁含硫量高，不能使用，等等。他准

备将面临的问题,向中央作一次全面报告。1958年6月的华东计划会议,我就接触到机械部的问题,部长助理陈易也跟我谈到同冶金部的矛盾。关于大型电机的制造,主机与配套之间的复杂情况,我多少知道一些。赵所谈的问题与困难,我是很同情的。记得后来庐山会议时,赵还带了一些不能使用的生铁样品,准备用物证来说明问题,后来会议形势突变,就没有摆出来了。

当时也还有经济方面的领导同志,找我谈同主席接触的经验,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一点感想这样谈到:还是如实反映情况,不要顾及对方听不听得进去或听后的反应如何,直说比打折扣好。

记得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会上,总理对我写信反映情况,很是赞同。于是我趁机动员他去新安江看看。这是除三门峡外,正在施工的大型水电站,完全靠自力更生,由我们自己设计的(三门峡由苏联设计),72500千瓦一台的发电设备也是国内生产的。4月9日,由我陪同,总理去新安江工地看了半天,留下了这样一句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新安江值得欢呼:施工三年半后的1960年,就开始发电,造价没有超过预算,保证了工程质量,一直安全运行了几十年。水库形成的千岛湖,已成为东南旅游胜地。

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以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面对现实,纠正错误,形成了对"大跃进"运动的节节退却和渐渐降温,这个趋势是好的。谁能料到风云不测,局势突变,庐山会议后期竟然发生那样巨大的反弹,这股纠"左"早潮被更加"左"倾的狂澜完全淹没。我个人"一跌风波二十年"不足挂齿,党和国家遭到的灾难真是太令人痛心了。

“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

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恩格斯进而说：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为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 恩格斯晚年这段经典性论述，可以看作是研究人类的历史创造和解读一切历史事变的钥匙。

“大跃进”也可以称作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自然重大，但思想影响更源远流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同样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也仅仅是作为“单个意志”去参与这种创造。这情形就如戏剧中演员与舞台的关系一样，生动威武的表演，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舞台的大小、深广决定了演出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甚至也影响到戏剧的成功与失败。这个比喻用之于革命很恰当，用之于建设也同样恰当。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477—478 页。

题就出在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

我们的革命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我们的建设也是源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的学说创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欧，正进行残酷剥削、掠夺世界，又周期发生危机之时。他不可能预见到20世纪将要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同我们实践过(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俄国到中国都发生在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比俄国尤甚。这同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立即实行全社会的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直接分配社会劳动，取消商品、货币，全部社会生产直接由中央计划控制、调节的状况和条件相去甚远。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两种趋向：其一，是教条主义地按照经典理论去“复制”社会主义的“原型”；其二，是在现实国情与经典描述明显不符的状态下，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创造。当然，上述两种趋向，很大程度上在人们头脑中是同时并存，兼而有之的；就是说，人们常常既有“复制”、“摹写”的一面，又有“借鉴”、“创造”的一面，并且随时间不同也常侧重不同。大体说，着重“复制”的一面趋于保守，着重“创造”的一面显得富于生气和活力。由于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以及文化性格等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思想趋向往往存在某些差异和多具其特色。前苏联如此，我们中国亦如此。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更突出地表现为后一种趋向。他发动“大跃进”主要是为了有所“创造”，有超越前人的意识，但整个思想状况又是十分复杂的。中外学者著书立说，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和原因作各种分析，我们应当将这个历史性的“创造”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解释得更合理一些。

“大跃进”形成的潜在原因，自然同中国走怎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分不开。工业化萌芽期本身是受到历史的限制和规定的，西方

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大体分四种类型：(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二)较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四)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以美、英、法为代表，继续实行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辅之以海外投资和殖民掠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量积累社会资本和财富。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国内阶级关系也起变化，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美国上升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一定的领先地位。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赶上英法，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各种内外的原因促成。第二种模式则以前苏联为代表，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国际形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30 年代以后，苏联凭借这种经济体制，迅速壮大了经济实力，增长率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提高，并使它在卫国战争中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或靠近第三种模式的，主要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一般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经济羸弱，但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独立后大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和市场为主导。但因其对外依赖严重，以及民族工业薄弱等原因，发展较慢，亦不稳定。第四种模式同第二种模式具有相同性质，一般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所采纳。差别在于刚刚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这些国家，长期的兵燹与社会动乱，使得经济基础极为脆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起步艰难。但正是这一点，又促使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试图以较快速度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主动学习第二种模式，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充分调动全国的人才物力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压缩人民暂时的物质需求，实行高积累。从本质上说，第四种模式采取的是一种加速型发展战略，即一方面客观基础较差，另一方面又强烈要求改变国家面貌，于是尽可能运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进程。所谓“急于求成”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模式发展而来的。

按照中国当年的情况，选择第四种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即应当采取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度，最有可能加快生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苏联的榜样又摆在那里；而且，由于我们长期遭到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胜利提早到来，更增加了我们加快发展的愿望。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一段广为传诵的话，明显表现了这种"跃进"的情绪。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又说："再有五六十年，在钢产量上赶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种责任，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①

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心态是紧密相关的。如同斯大林不可能改变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一样，50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认识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只有学习苏联，走一种历史规定好了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从1953年开始，在苏联的巨大援助下，我们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成绩是十分辉煌的。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已全部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8.40%（世界银行的统计中，这是当时世界最高增长率之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6页。

原定的14.7%的增长速度。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266%;煤产量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了96%;粮食产量达到3900亿斤,比1952年增长了19%。同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比较,这一连串的数字确实是值得自豪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离工业化目标的实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离超过美国的目标则更加遥远。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旧墟清理完了,但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未改变,因为在这片旧墟上还没有建造起共和国强盛的大厦来。所以毛泽东对这一前进步伐仍感到不满足。早在1955年夏季,他违反自己原来的设想,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斥责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于是应该"花几代人的时间"(列宁语)完成的对农民的改造,在不到半年时间即告结束。有关这一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已有定评。在工业方面,由于受到农业合作化"热潮"的影响,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倾向更加强烈起来。1955年12月,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谈话:"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毛泽东当时还设想八大的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见其"加速"愿望在心中占有的位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这同刘少奇上述传达在时间和意向上是互相印证的。也就是说,1955年至1956年之际,毛已在重新考虑"前进道路"问题,原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速度,已不能令他满意,要探索"非常规"的道路与速度;即是说,要采取不同办法,要超过苏联,比苏联走得快些。1956年

2月中旬，毛泽东开始分别听取中央34个部委办的汇报，经过思考、比较和总结，4月作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开篇明义即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结果长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而且对农民剥夺过甚，造成经济失衡。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些缺陷，并试图在中国的实践中加以克服，当然是十分明智的。由于感到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创造不多，仍处处受苏联经验的限制和束缚，回顾革命年代的教训，毛泽东的心情自不平静，强烈希望从中国情况出发，在建设方面也有所创造，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中，他批评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伤害，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正确处理这三方面关系的问题。他还批评过去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搞得太死，从而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他论证了正确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从1955年到1956年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中央会议上，曾提出"又多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随后李富春加了"又省"。这八个字为毛泽东欣赏而接受。

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我们不但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继续维持过高积累，追求以钢为纲的片面发展，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而且"创造"出"大跃进"这种荒唐的"运动"。结果比同期苏联经济的损失要大得多。这又作何解释呢？难道我们所极力肯定的"探索"就这样含糊其词地被事实否定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所谓"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合乎逻辑的说明吗？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1956年4月提出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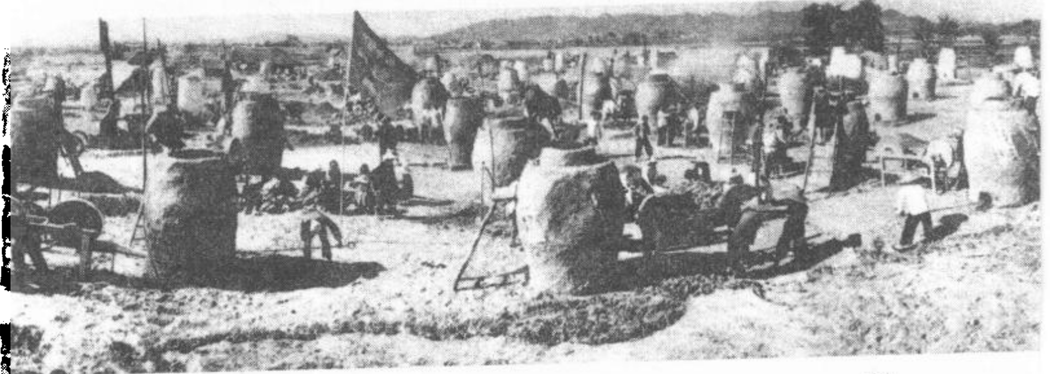
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以为，这段话可以作为解释上述疑问的一条重要线索。

所谓“原则相同”，指的是我们仍然承袭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追求放在经济首位，这是为主的东西。前文已经指出，作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50年代似乎只能选择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同时在理论上，从斯大林起，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理解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部类，即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实行先建设后生活的方针，也就是要高积累，对工业高投入。在中国，则特别要求人们要“勒紧裤带”。早在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就发生过实施“大仁政”还是“小仁政”的争论。道理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太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这些话并非没有道理。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当年国内外形势下，当然首先要加强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建设。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发明新的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在前人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与苏联“原则相同”。在经济结构上，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基础，奠定了突出重工业的建设格局。

因此事实很清楚，1956年前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那后半句话上，即“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论十大关系》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苏联建设中偏轻倚重的偏向，用辩证的观点阐述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对旧的一套观点有所突破。后来八大提出“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意见，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都可以从讨论十大关系前后的思想中找到源流。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尽管阐述的是经济建设中

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兼及政治方面的内容，《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篇经济学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定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而经济运行最需要的就是精确的规定性、比例等量化的东西。因此，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于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被冲掉了。这种现象使人想到“大跃进”中不少貌似“两点论”的东西，比如“工农业并举”、“土洋并举”等等，当时都是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独特性而大加赞誉的，称之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同十大关系类似，这些“并举”更像运动的口号，而不是经济学用语。它们没有准确的经济学定义，因此人们无法掌握“并举”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较关系。只是在感觉上认为提出了“两点”，有了自己经济建设的新方法、新内容，可以傲视前人了。结果，“两条腿走路”和“同时并举”，造成了两条腿一起狂奔，土法、洋法一哄而起，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

“大跃进”鼓吹“两条腿走路”和“土洋并举”，造成了两条腿一起狂奔，土法、洋法一哄而起，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几千万人上山，土高炉遍地“开花”，如回到人类炼铁的上古时代。图为河南信阳市郊五里墩荒丘上密布的土高炉群，这只是全民大炼钢铁的一个缩影。



产秩序(当年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规则)。几千万人上山,土高炉遍地"开花",如回到人类炼铁的上古时代。这就根本不是什么"独创"的问题了,而是虚幻和荒谬,恰恰与经济工作要求的精确与科学背道而驰。在革命年代,靠"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建设时期,却不能靠这两手实现工业化。因此,"大跃进"时期那些所谓"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的东西,表面上似乎是"两点论",实质上不过是在苏联旧体制之上,运用我们自己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已。所谓"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像诗的语言,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非理性思维。结果反而把苏联经济建设中那些弊端扩大化了,造成更大的结构性失衡。以 1958 年为例,全国上马的大中型项目成千上万个,积累率由 1957 年的 24.9%陡然超过 40%,而同期国民收入只增长 22%。这就意味着国家大量挤用消费资金和压低农业投入,来上工业项目,如此何来"兼顾""并举"呢? 因此"大跃进"中这一套自诩的"创造",在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说来,无非是"新瓶"与"旧酒"的关系,"新东西"没有创造出来,"折腾"和"胡闹"倒非苏联所能比拟。这就不是辩证法所能解释的了。因此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苏为鉴",实际借鉴的仅仅是浅层的或操作层次上苏联的缺陷,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又大多"过度"或"无度"。这同苏联模式即其经济政治体制无关,我们仍然在这种模式的旧体制上进行,但在"冒进"上却非苏联所可比拟,他们在几届五年计划中没有出现过我们当年的猛上猛下,没有出现过那种"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出现过饿死人,是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事,同工业发展无关。

为了"创造",搞出一套与苏联不同,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毛泽东曾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乍看起来,这个口号同上面"形象思维"的"两点论"一样,都是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东西。但是"热烈"的气氛、过头、荒谬就接踵而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对教授的态度,他当时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

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由此还称赞了柯庆施敢兼任教授之举。当时听来,颇有新奇之感,把教授或有科学知识的人作为建设的对立面,这于理不通。但当时听者动容,很得启发似的。这些话无形中也成了一种"创造"。如果说毛泽东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早有反感的话,那么在一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他此时此地讲这番话的目的,却是针对着以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为特征的科学知识而言的。因为不打破这种"迷信",那套"豪放"的"创造"就难以为干部和群众接受。毛泽东自己是知识分子,并非不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也提过"向地球开战","开展技术革命","向科学技术进军"之类的口号。但他主观上超乎想像的一面,又时常与实实在在的科学规定相冲突。他在经济建设中的浪漫情绪和超越前人的追求时时让他感到科学知识对驰骋想像的束缚。"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正是以诗言志。政治斗争可以"无法无天",可以厌恶法律的约束,结果不过错划了几十万个右派;经济上也"无法无天",也厌恶规章制度的束缚,那就不止是几十万"右派"挨整,而是亿万黎民百姓遭殃了。28 年的残酷斗争,战胜一切内外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自然养成一种绝对自信的心理;客观上六亿人民齐唱《东方红》的最高音响,是否也使历史伟人对不可违背的客观经济规律和许多基本的科学道理时有违背呢? 不然,"大跃进"时期出现那么多荒谬的事情,一时怎么能信以为真呢? 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这也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排斥知识,破除迷信,在"大跃进"拉开帷幕之后,有一股发狂热而不可收之势,以致在思想上连老祖宗马克思主义也有些看不起了。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是随时代发展的,当然,不能抄书照搬。一般地说,这段话很有道理,教条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害人不浅,曾经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毛泽东感

触最深，为“破除迷信”奋斗不已。这已经有了历史的总结。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也当然不能照搬教条，应该走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这种精神是完全对的。但是，“大跃进”中鼓吹的“不要迷信”，不要“抄书照搬”，则是另外的事情；说明白了，是觉得马克思主义也不在话下了。自己要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范，要搞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破马克思”的问题。他说，自整风以后，我们大多数同志慢慢地不大怕资产阶级教授了。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知识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又说，“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等。这些话，这些感情，应当说都是对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抱有雄才大略的人，应当具有这样的精神气质。问题还在任何人都要受客观规律的约束，不可以超越客观规律胡思乱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何况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人都受三种限制：即时代的局限，自己已有的经验、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否则，还是那句话，伟大与可笑，只差一步。

“敢教日月换新天”，1949 年得到证明，1958 年不能同日而语了。建造“新天”“新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也同三大战役时一样，曾经在全中国铺天盖地奔腾而来。这种主观随意性，远离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原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自己在仅仅三个月之内，也觉得太过分了，不得不连续召开会议“纠乱”。但问题就在仍是坚持高举三面红旗下“纠乱”，作一些量的调整，而

不是作质的变更:放下这三面红旗,回到客观实际中来。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上面和下面某些领导人总是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投其所好,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把马克思主义丢得更远。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开其端,李井泉、谭震林等人紧随其后。可举一个具体例子:1958 年 7 月,在湖北省委机关刊物《七一》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该省主要负责人的开篇之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该文原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由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反对,才改为现在的题名。此文可看做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有关讲话的诠释和发挥。这位负责人是很被毛泽东赞赏的地方领导人。文章一开始就批驳了有些人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理论,而不认毛泽东著作为理论的观点,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现代最重要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做理论,不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看做理论,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提出,在当前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反对厚古薄今的偏向"。接着,作者以讥讽的口吻说:"某些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实际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很低,其中有些人简直是在那里反对马克思。""假若有一个人企图在《共产党宣言》里,或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当中去查找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你能说这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一有所知吗?"文章的用语是犀利的,有点兴讨伐之师的檄文味道,但读来给人印象最深的不过是"不要迷信"几个字,那就是说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要多看毛泽东在当代的"创造",看那些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此必须"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到来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的形势面前,这些话当时真给人们以"激动不已"的力量。

然而人们不能总靠"激动"过日子。几个月的狂热下来,许许

多多的人已有所觉悟:在我们中国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多了还是少了?我们目前所做的,到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中国这块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土地上虚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目空一切,在那里妄自尊大地进行所谓“创造”?《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去做如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据说李达当时闻得书记的这番高论,甚感焦灼,曾据理力争,甚至还当面向毛泽东进言,说已经发高烧了,再热下去不得了。杨献珍其时也有“99%的浪漫主义”之说。可见当年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这篇文章虽说最后不得不换了题名,但点睛之笔尤在“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毛泽东同志也是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后者,一切科学都是发展的。但该文作者的本意却在“超过”,就字义而言(这同后来林彪用的“顶峰”相似),“超过”与“发展”也是两码事。作者当年的意思就在:马克思的东西已经不管用了,毛泽东已经超过了,只要学毛泽东的就行了。其含义同后来林彪的读“老三篇”和手摇小红书,如出一辙。

“大跃进”时期,一切“旧”的思想、理论、规章、制度都可以破除,惟有一件事是迷信的,那就是“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就可以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大跃进”中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前面谈到,这种做法同长期进行革命战争有不解的渊源,同时又是试图打破一切常规的寄托。或者说,也是一种对生产组织、制度的“超越”。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一反冒进就泄了气,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毛泽东为什么要说得这样严重呢?核心在于他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搞一个大突破,超过前人的设想,超过前人的速度。而要实现这个抱负,就必须打破常规,运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搞群



毛泽东对国务院的工作不满，认为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几十个部委，平均使用力量，没有抓住纲。于是提出“以钢为纲”等口号及三个元帅、两个先锋的说法。造成全民办钢，各行各业为钢铁让路的局面。破除条条框框，大搞群众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大批妇女也纷纷响应号召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图中的妇女正翘首期盼钢铁出炉。

众运动的经验，人多力量大，只要焕发出六亿人民的干劲，天下哪有办不成的事情。应该说明的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根本是两回事情。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来源于理论依赖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认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群众运动则是一种激励人们的手段，它具有规模大、力量强、激烈性和无序化等特征，同稳妥、科学、秩序化、条理性等格格不入。在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往往能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或工作目的，如土地改革，参军支前，以至春耕秋收等等，革命形势成熟时，其排山倒海之势，可以迅即打翻旧的统治制度。这是为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但在建设时期，群众运动的上述同优势相对称的缺陷，却会造成灾难。“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是以“革命的冲天干劲”的面貌出现的，针对的正是计划与平衡、规章和制度，以及一切

经济生活必须遵从的程序和秩序，它们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联系。这些“正规化”的东西，应当说从理性到感性，毛泽东都是很不熟悉的，他没有过这方面的直接经验。他早就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因为计划与平衡就来自国务院，毛泽东认为国务院尤其计划工作是搞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束缚了人的手脚，影响群众的热情，即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他多次谈到规章制度问题，认为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要同群众见面，不适用的应当改革。实质上，这同批判反冒进的“保守”、“右倾”是一个意思。《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设新的平衡》说，1956年反冒进，“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简直惶恐得很，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高潮泼了一瓢冷水。”因此社论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篇社论将平衡视作庸俗，等于贬低了生产管理的科学性，于是为一哄而起的乱来开了方便之门，通了畅行之道。毛泽东对国务院工作的不满还在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几十个部委，平均使用力量，没有抓住纲。于是提出“以钢为纲”等口号，三个元帅、两个先锋的说法。造成全民办钢，各行各业为钢铁让路的局面。破除条条框框，大搞群众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1958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曾感慨谈到：“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些话同其后几千万人搞小土炉，所谓群众性大炼钢铁有直接关系。此事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超越”苏联的经验。“大跃进”中批判《马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是否定苏联搞工业的方法。《马钢宪法》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毕竟是苏联组织工业生产几十年摸索出来曾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它在合理地组织生产方面，是经过多年实践的。现代大工业本身，需要严密的规章制度，对各个工艺流程和生

产部门进行监控,以实行优化生产,得到高质量的产品。这已经是不容怀疑的经验和定论。否认《马钢宪法》,认为它限制了人的积极性,还冠以“不准革命”的罪名,实际的着眼点还在于实行工业上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也就附带破除了《马钢宪法》。至于“小土炉”遍地开花等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尤其是大量破坏森林,多年也难以恢复。但当时搞这些乱来的东西,却被说成是“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题”。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迷信群众运动,并不是真正的依靠群众,而是一种“放大”了的主观主义,即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众,借群众运动来达到某种主观愿望,无论从方式还是最终效果来看,都跟群众需要相距甚远。在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还普遍处在较低状态时,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易于耸动起来,形成很大的破坏作用。为了进行科学的有效的生产,人们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及责任制度,这是现代化生产所必然要求的,任何人为的“超越”都将自讨苦吃。“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乱来的做法,为我们民族留下了长久而惨痛的教训。

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高速度绝非坏事,但要看怎样来实行。前文说过,我们所取的建设模式本身即是一种“加速”型模式,极易诱发急于求成,但就“大跃进”发动的过程看,导致急于求成,又有特定的国际因素和主观作用的交互影响。毛泽东很早就对苏联的建设速度表示怀疑,多次讲到我们自己能否快一点的问题,并认为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做到更快一些。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前后,即有这样的想法,但提法上是借鉴苏联经验,少走一些弯路。1957年以后,“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情绪高昂,一再讲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去(按:此处所讲“技术革命”是广义的,指政治以外的经济建设,而不是狭义的技术上的革新和革命,但后者也包括在其中)。而就在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动。两大阵营的对峙,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趋向缓和。50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世界局

势不再像二次大战结束时那样两个阵营间剑拔弩张。1956 年前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方面提出“和平竞赛”的口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认为世界形势正走向缓和。这种形势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应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口号，本身即含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的意味。1957 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提出在今后 15 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这已经有些自不量力了。但毛



1958 年 5 月，毛泽东曾下决心再过一年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到 1962 年，“达到 6000 万吨，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图为上海沪东造船厂的工人举着标语牌庆祝超额完成炼钢任务。实际上，当年全国合格的钢产量只有 800 万吨，仅完成翻一番计划的 3/4。

泽东的气魄更大，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并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年底，刘少奇将这个口号正式公开出来，全国一片欢欣鼓舞。后来，“赶超”时间一再缩短，1958年5月，毛泽东曾决心再过一年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到1962年时，“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在赶超英美的同时，自然也就超过苏联了。很久以来，对苏联憋了一口气。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我们是不是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2000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到1958年，就这样谈到：“我们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也不对外公布。”因此毛泽东要为“发明‘跃进’这伟大口号的人授一个博士头衔”。前文已经提到，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集中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使它在相当长时间内获得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这已经是超高速发展了。沙俄时期，尽管经济落后，但已奠定了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基础。30年代斯大林大力发展工业，使苏联经济迅速强大起来。相形之下，旧中国的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据西方的统计，我国5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苏联1928年时的1/5稍强，工业设备、技术也落后于苏联约三四十年，人口则为苏联四倍左右。（马寅初至1959年仍坚持说：“我们要快，人多就是个大负担。”）这些差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非主观上一蹴而就之事。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赶超”战略，其状况必然是打破平衡，疾进疾退，伤了整个经济的元气。《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平衡思想、辩证关系，时隔两年到1958年已经丢得无影无踪了。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麦克法考尔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感到大惑不解，他判断说：“或许，毛泽东从未完全接受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经济思想，那些思想看上去不像他自己的。”《论十大关系》是他听取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各部委汇报后的产物，其中意见，即使最先是由这些部委负责人提出，但当毛泽东将它吸收到《论十大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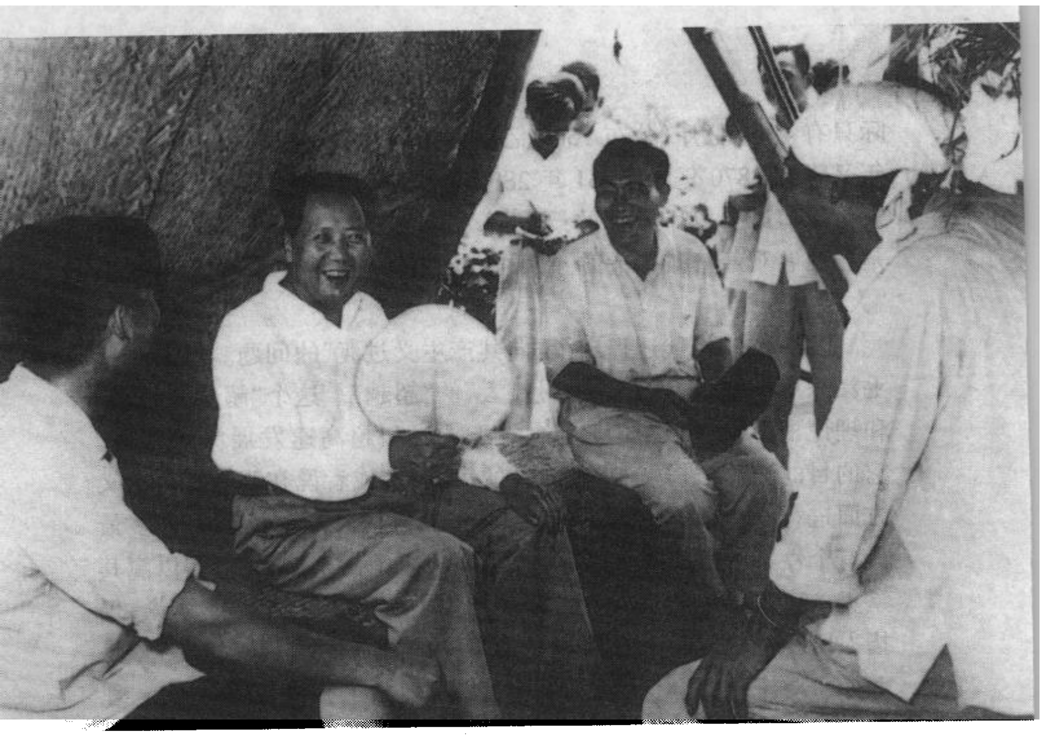
系》中，当然可以认为其中的思想还是源自于毛泽东，是他头脑清醒思考的产物。但随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本人既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所鼓舞，又为求强求快的思想所催促，迷信群众运动等经验，在一系列自制的假象面前，主观主义日益膨胀起来。加之1956年底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对他的影响，我们实际上已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立场上后退，放弃了八大对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批评与警惕，从而助长了党内个人意见至上的传统，随即扩大了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柯庆施、康生等人在中央会议上，正式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是造成"大跃进"局面的催化剂。

回顾起来，当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作战略性转移，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需要特别小心谨慎之时，毛泽东却日渐骄傲、自负起来，他越来越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发展成一人专断的局面。这也同回顾历史正面经验有关，促使他只迷信自己的一套，他将批判"反冒进"同1957年反右派斗争相联系，超过了经济发展方针的分歧；实质上是他个人否定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个人凌驾党之上的严重事件。而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的否定，则基本上改变了当年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状态下，毛泽东个人无论怎样发挥想像，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提到快得不能再快的地步，也不会再受到任何制约了。终于形成上上下下察颜观色的局面。如钢产指标一再加码，粮食产量一升再升。在几年之内，不仅超过英国不算回事，就是超过美国也理所当然。回顾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事情！郑州会议开始提出所有制方面乱来的问题之后，毛泽东仍不愿降低钢的指标。1959年庐山会议一个"反击"，"大跃进"又起高潮。直到1960年9月，局面明显太严重了，才被迫同意调整，而此时国家的经济已沉疴难起了。1960年钢达到1866万吨，1961年猛降到87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实

际只有4000亿斤(公布7500亿斤),1959年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1961年2800亿斤,降到1951年水平。因此发生人口减少以千万计的严重情况。这种猛增猛降、大起大落自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退”。

“大跃进”年代还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当年毛泽东所试图进行的一次“最伟大”的“超越”。这个“超越”在思想和理论根源上,要比经济上的急于求成和超高速发展深远得多。它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社会性的大改造,或者说在改造社会主义方面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许多最具有个性特征的思想和认识,都全面表露了出来,使我们得以窥其堂奥。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超越”性的实践,并不如一般所说,仅指人民公社化运动——那只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已;这个“超越”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摹写或设想,包括了城市、农村、思想、理论、道德、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每一家庭和每一个人自身。因此,它是极其广大和复杂的党国体制和思想体系,是新旧观念交织在一起,又从主观出发而进行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个改造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震动。遗憾的是,当时许多“观潮派”、“算账派”和“攻击者”、“诋毁者”的话,却被历史证明是逆耳忠言,是真知灼见。

我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说过:“‘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不仅离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而且在追求‘大同’方面连康有为的一些认识也未达到,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性是相当轻视的,总希望找到尽早过渡之‘捷径’。历史已经说明,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度中,凭主观想像,任意地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加以根本变动,还名之以‘超越’前人,其后果是何等的灾难性。”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农村，多次谈到小社并大社问题，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毛泽东的这些话一经透露，全国上下一片响应之声，徐水、七里营、范县等率先"急闯"，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甚至消灭家庭都成了一时议题。城市也开始大办公社，家庭妇女和老少幼儿统统组织起来，尝试新的集体生产，集体生活，似乎整个中国一下就到了"大同"之境。图为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视察的情景。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围绕人民公社而构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或称设计的共产主义的远景，主要以旧的思想材料为源泉，例如关于"大公社"的思想，毛泽东的设想大多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而来。1958年二三月间，他在同陈伯达的谈话里，就说过公社政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四月在广州同刘少奇谈公社问题，"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转述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具体构想，即乡村中的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各级学校、

科研机构、各种服务行业、公共食堂，应有尽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仍能看到“新村主义”的明显遗痕。1958年7月，陈伯达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对建立这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即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也没有超出上述旧思想材料。毛泽东的这些想法一经透露，全国上下一片响应之声，徐水、七里营、范县等便率先“急闯”，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甚至消灭家庭都成了一时议题。城市也开始大办公社，家庭妇女和老少幼儿统统组织起来，尝试新的集体生产，集体生活，似乎整个中国社会一下就到了“大同”之境。

现在人们一般都承认，毛泽东上述关于“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空想论”。这种判断当然是对的。但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钟情于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大”（政社合一，乡政合一）和“公”（提高所有制档次，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共负盈亏，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什么他要从旧的思想素材中汲取养料，塑造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面貌呢？直到去世之时，他毫无反悔之意，还惟恐后人否定了他的这些作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基本思想看，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本身可能并非是错误的，如追求人的平等，社会的公正等等。其谬误性在于“空想”是从单纯的想像出发，把社会主义看做是可以不依赖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而发展的社会形态。再深入一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像的公正、平等和对公有制度的追求，正是对贫穷、分散、分化、偏私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空想的美好，正是对社会丑恶的折射。无论西方的空想论者如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还是东方的康有为等等，无不从此出发去阐述自己的理想和设计。对他们说来，公有制度或共有制度是解决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的最佳选择。换而言之，

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把解决生产力问题放在改造社会的首位，而是寄希望于在分配即生产关系方面实现较高的社会公平，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与贫穷的关键。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拉平”主义，即平均主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易于接受公有制度的原因，恐怕亦在于此。科学社会主义要始终同平均主义作斗争的根源，也出于这个原因。

毛泽东在深层意识上，是否受这种产生于落后经济条件下的空想影响，实值得后人研究。早年，由于家庭身世的原因，他对旧中国特别严重的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已有了深刻的感触和一定的思考。1918 年以前，他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寄身于湖南第一师范的五六年中，曾读了大量的经世济民的书籍。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宣扬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 18、19 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乃至托尔斯泰《泛劳动论》和日本的新村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料无疑给他的思想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 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可见旧思想资料中的乌托邦在他心目中引起了很强的共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即投身于长期的革命斗争，激烈的武装斗争，人类历史罕见的艰苦环境，尤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下，长期受压制受委屈的处境，使他经受了极大的锻炼，也积蓄了很高的才智。他终于创造了一整套在落后国家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和经验，这几乎使他享有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武装斗争之父”的声誉。但是，武装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又是一回事。对于建造新的社会，他的思想认识是复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有来源于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方面，最不熟悉、

未彻底接受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第一性"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他希望大力发展生产,希望"向地球开战",甚至是以冒进的形式,牺牲平衡的方式,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经济指标;但那更多的是从"求强"从"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愿望出发。至于如何科学地发展生产力,求得人民的富足,在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基础上再考虑向新的社会阶段过渡,则是非第一位的构想。相反,他甚至顾虑人富了,要变质,"变修",因此要"趁穷过渡",等等。他留恋的、肯定的是战争年代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可以使人精神境界纯洁而高昂,人的精神得到某种升华。

"趁穷过渡",具有典型的"空想"特征,也表现了毛泽东宁愿以一种更高的公有制,而不愿通过发展生产力,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来解决社会差别的意识。显然,在经济条件十分低下的状态中,设计和追求社会组织的"大"和"公",是典型的"空想主义"和乌托邦——因为它们是离开了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的"空中楼阁"。早在合作化初期,毛泽东就主张迈开快步伐,其主要的担忧,就是如搞不及时,会出现两极分化。1953 年关于山西合作化的争论,1955 年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无不反映了他的这种求"公"意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真正提上了日程。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毛泽东当然不是未予理解,但他更有兴趣的,是对社会的改造,是社会关系和所有制的改造,是求得真正的公正、共有和平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所以后来那种钟情于搞"学大寨"运动,可以说,这是他晚年的愿望所在。一当群众中出现生产上的联合愿望,他立即捕捉到这一"深刻"的社会动向,提出了"人民公社"和一整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而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时,人为提高所有制的程度,或人为地拉平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别,以为如此一来,社会的共有和公正就实现了。说到底,这仅仅是一种小农的"共产主义"。

果然，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一切落后的东西都破网而出，最典型的就是破坏性极大又屡禁难止的“共产风”，“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县共社的产，社共队的产，队共农民的产，打的都是“共产主义”的旗号。于是较为富裕的农民杀猪卖牲口，有的生产队干脆组织起来进行“瞒产”，站岗放哨，像战争中对待敌人一样。那些类似“新村”的做法，如生活集体化、公社食堂等等，不久即引起农民的反对，只是在政治压力下强行维持一时而已。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可以说在几个月中就遭到了失败。

1958 年 11 月以后，他开始了解到农村急于过渡，已引起了一片混乱，于是提出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划线的问题，1959 年初，又不得不确立基本队有制（大队）原则，以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对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实践寄予深情和厚望。例如 1958 年 11 月 6 日对《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范县在两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是什么呢？还是那一套所谓“把全县 993 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 25 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的吹牛皮，所谓“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这套小农式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确实始终极感兴趣。1958 年 12 月 7 日、10 日，他又在印发《张鲁传》的批语中写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可见其感情与意识中同中国传统的空想主义有很深的沟通。他希望在中国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而又始终解脱不开经济、文化都处于很低水平的农民空想主义这个情结，当然是无法实现“超越”的。有人说，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点燃了一个幻想，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人民公社化的继续发展），来达到那个“圣境”，结果屡遭挫折。我则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既有十分高远的想像，又

有丰富的历史素养,独独缺少对人类(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了解,其中有为马克思所总结过的,也有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尤其是二次大战后新发展的,他都不熟悉,或者茫无所知;同时又违背革命年代自己的经验,急于求成,不是脚踏中国实际,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终于造成了晚年的悲剧。

当然,仅仅从旧的思想资料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对毛泽东的影响,去分析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这还是很不够的。毛泽东信奉马克思主义,他读过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但有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曾对他的空想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形成了某种"发展"了的状态,今天很多人把这称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误解。在这方面,"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法权"应译"权利")即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58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有如下一段批语:"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这番话表明,毛泽东并非不了解共产主义要有极大增加社会生产力作基础的道理。问题是,他感觉到文章要做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产品上面,即寻找一条具体和"创新"的道路来达到这个目的。而这恰恰是斯大林未能解答的。毛泽东认为,全党大办工农业,几个并举和群众运动,是高速发展生产的最有效办法。而在上层建筑特别是观念形态领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途径。因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有这个思想。

从"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垂暮之年,毛泽东几乎从未放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其执著简直达到了百折不挠的境地。1975 年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可以说把他

的这种观念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毛泽东的这种执著确实值得加以分析。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要划分为两个阶段，具有理论上的科学预见性。但他又提出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段权利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权利问题就被说死了，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段权利已被剥夺，但在交换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权利还存在着，由此造成的事实的不平等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而国家则成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在理论上就成了难翻之案。马克思、列宁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已建成或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国家的党内，并没有引起后来像中国那样高度的理论重视，却在毛泽东的思想里产生巨大的反响，以致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当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这是有深刻思想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空想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生了“共鸣”。

前文说过“空想”的错误性不在于“空想”本身，而在于它脱离了时间和条件，把目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当做一种真实。毛泽东受小农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空想论，刚好可以马克思、列宁的“资产阶级权利论”为“武装”。毛泽东的这种空想，即企求在低物质水平上实现社会平均与公正的特征的思想，终于在这里找到奥援。因此，他试图在现阶段就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例如级别、地位、薪水乃至商品、货币等等，甚至认为这些差别是万恶之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看来，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践，于是提出恢复供给制；通过所谓教育革命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通过干部下放，来缩小城乡差别，等等做法风行于世。似乎这样一认真推行，马上就可以达到理想之境了。毛泽东在倡导破除法权时，又常常带有对以往革命时期经验的依恋，认为“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的工作制，上下一级，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过去实

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 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进城后，后退了”。于是要填补这些“鸿沟”，要超越。这些想法同他脱离实际的空想论，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但这种貌似“超越”的做法和追求，并非使社会有所前进，而是向低经济水平的社会形态靠拢，其平均主义的目标模式，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高速发展生产力、实行商品生产，同今天实践的市场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能再世的话，他们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所呈现的复杂变化，相信也会重新考虑“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至少他们原来估计的资本主义已处于其最后阶段，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和国家，进入一个完全公有制，没有商品，只用“劳动券”的社会构想，已是很不现实的了。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夺得了政权，再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途径，首先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再进一步追求均富；而不是立即消除一切不平等，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穷过渡”的方式，已逐渐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所认同。至于何时才能实现《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描述，那还是极其遥远的事情，甚至应该不做现实的考虑。在这样的意义上，除必须指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固有的空想主义一面外，还应承认他所受到的理论、历史的局限，他毕竟也只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领袖。他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所遭到的失败，应该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

“大跃进”的教训是深刻的，甚至我们子孙后代都应不断从中吸取教训。除需要在加强党内民主、政治民主方面去反思以外，更应研究我们怎样违背了客观规律和为什么会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正如开篇所说，历史为人们提供的活动舞台是有限度的，任何试图跨出这个舞台，作“超越历史”的努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遭败绩。就此而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判断是正确的：“总路线、大跃进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此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遗憾的是，党没有有效地制止毛泽东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行为，以致他将这些东西发展到了极端。“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经由历史来证明是办了蠢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错误的主观意志论和不负责的政治随意性加以彻底清算，那么我们党或者某个人（掌权的人）还会不会再干类似的蠢事，我们这个民族还会不会再次陷入类似的“狂热”（请不要忘记1978年经济上的新冒进）？这个问题似很难作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尤其是因为事实上还有“理论家”或“权威人士”在写洋洋大文，想根本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想根本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他们留恋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也要一分为二，等等。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关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两大错误：“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虽然党已经做了彻底否定的正式《决议》，但是想翻案的确还大有人在。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之加以彻底的清算，经过这样的清算之后，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才能从彻底批判错误中建立起来。

亲历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图为庐山会议会址。

庐山会议始末

关于庐山会议我有一个记录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谈得比较清楚一些。

庐山会议之前

庐山会议前有一系列会议，除郑州会议外，我都参加了。先简要介绍一下几次会议。

南宁会议反反冒进，大家都知道。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这次会前，柯庆施曾在毛面前攻击过陈云。我是为三峡问题去南宁的，会议已近尾声。毛泽东多年来听了林一山的意见，想上三峡（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词）。会上他听说李锐是反对派，于是把我们两个人都找去。我到的时候，大家为我捏把汗。可是，听到我们两人当场的说明，又各写一篇长文之后，便采纳了我的意见。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有理，个别问题他还是听得进意见的。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

接着3月成都会议，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和各省市，都写了如何“大跃进”的报告，通过了30多个决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成都街上有群众锣鼓声……“大跃进”已经开始。会中我去汇报过一次小组会情况（乔木在座）。我进去时，毛指着我说，“这也是一个不知世事的人。”我反映了对柯庆施、陶铸两人的发言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颇不以为然。毛说，“他们是有所指而言的。”我还反映了少奇发言时的感想：“跟主席比，我们差一

大截。”所谓“不知世事”，乔木告诉我，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不满意，说“几十个部，不知都干些什么”（后来提出“以钢为纲”带动全局）。回到北京后，毛找我谈过两次。主要谈粮产如何倍增的问题。有次先同谭震林谈淮北如何水利化，批评了水利部领导。

4月广州会议，各主要工业部参加了，地方同志很少。讨论15年超英国时，第一个汇报的是地质部刘景范，还没听十分钟，毛听不进去，中止了刘的发言。大家颇紧张。

6月间，有天找我到游泳池谈话，讲到钢要翻一番。第二天碰到王鹤寿，告知此事，他很感突然。

6月底，各大区开计划会，定1959年指标。各主要工业部和富春在上海帮助订华东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华东1959年要生产600万吨钢。开会期间，六大区互通电话，指标节节拔高。华东会上考虑的二五钢铁指标上限竟达1亿吨。这时一机与冶金两部矛盾已尖锐暴露。参加会的各部1959年都照600万吨安排，惟独我没有接受电力指标。柯庆施因此对我极为不满，让人带我去参观江南造船厂等三个“跃进厂”。我走时留一封信，仍坚持电力无法满足。7月7日我给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忧心忡忡，反映华东会议高指标情况，以及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从用电“你碰我挤”出发，提出“必须坚决排队，坚决分轻重缓急”。说“这次还碰到好大喜功，而对其目标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却又茫然无知的事例。有些事情需要时也可以‘霸蛮’（湖南土语，难搞而硬搞），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

8月北戴河会议。钢翻一番，决定将当年的钢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只好背水作战，登报。这些情况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没有找我谈话，我知道那封长信毛看不进去。

12月武昌会议，通过会议决议，粮食产量公布7000亿斤。找我谈过一次话，讲到钢铁翻番之不易，问题复杂。会上1959年钢指标降到2000万吨。我斗胆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于是，

毛提到7月那封长信，说我“写得不明朗”（我心中想：你没看进去）。陈云不同意公布7000亿斤，跟乔木说了。王稼祥不同意搞公社决议，同少奇谈了，少奇要他去反映，王不敢。后来少奇反映了，结果毛大为反感。

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我感到形势严峻。陈云在抓配套，抓薄弱环节。交电公司已抢购一空。一季度计划完成很差。从计委廖季立处得悉，钢的计划无法完成，问题极多。新安江缺水泥，我只好带总工去找总理解决。于是又写了封信，反映2000万吨绝不可能完成，应赶快调整，还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意见。这封信交周太和并转陈云看了。周让我将副本寄富春一阅（以免背后放冷箭之嫌）。上海会议之初，毛找我去谈过一次（乔木先在座）。我一进门，他便指着我说：“此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说我给他的信为什么要给富春看。这次谈得很融洽，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乔木谈了陈云不赞成公布粮产等。回来后我又写了一封信，提几点意见（毛说“只是几根骨头”）：1959年计划涨六次、降两次，上下摆动，工作全面被动；人们不敢大胆怀疑，怕被批评“离开总路线”；二五计划盘子要快定；要重视苏联和西方的经验；大家忘记了主席在成都会议讲过的“要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的话。两天后，开中央全会，毛讲了十来个问题。首先鼓励大家学海瑞，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批评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乔木事后说，他这是保护陈，否则陈不能恢复名誉。）还讲了一条“李锐怕鬼”（意指我不该将信寄富春），指着坐在最后排的我，大声说：“我很感谢你呀！为什么只给我几根骨头，不给肉吃？”（这两封信都写得简明，是接受第一封信“不明朗”的教训）此外，还说“我当主帅，你小平当副帅”，大家感觉突然，不解。这次会议小平主持压指标，压到1400万吨。

经过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总之，农业和工

业两方面的"左"倾后果都很严重。农村问题虽已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的情况。广东边境县有到湖南抢粮的。会前,毛视察了两河、两湖四个省。

神仙会阶段

6月30日,彭真召集在北京被通知上山的人,说是开神仙会,讨论13个问题,后来改为18或19个问题。毛泽东6月29日在船上,7月2日在山上,两次讲话所谈问题的简要内容如下(在山上又作了一次传达):

1. 读书。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地委以上干部应读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下卷。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之类。(1957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8月份读一个月。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者;"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者,各省找几个例子;从去年到现在中央的各种指示文件。三本书十万字,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大家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2. 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程度。八大一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对!要坚持。湖南说的巧妙:有伟大成绩,有丰富经验,实际是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最主要是综合平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现在盲目性减少,形势在好转。何时能彻底好转,明年五一。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弄不清,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怪话让人说。

3. 任务。今年钢1300万吨,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每年增加1000亿斤,1964年搞到10000亿斤。钢明后年都只能增加400万吨。确保质量。15年赶英要坚持。去

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指标一年完成。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这几年农业第一,成立农机部。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衣食住用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过得舒服,才有利于建设。两种积极性:盲目和实事求是。

4.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下放,现在要适当收回。强调集权,统一领导。

5.食堂。自愿参加,节余归己。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6.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4800亿斤标准过日子。

7.恢复三定。产、购、销,三年不变。增产征四留六。

8.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9.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包括:农业本身,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10.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11.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不管党,生产队长代替了。

12.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四大指标定高了(指1959年),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

13.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铁的含硫超过标准。出口退化,名誉不好。

14.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问题。许多问题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15.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16.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协作区要搞些调查研究。

17.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000受处分，是个分裂。

18.国际问题。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同蒋介石打了几十年，讲统战时一切忘了。

开会的人都上了山后，7月3日开始，分六个组开座谈会，按照18个问题摆情况，谈意见。白天开会，晚上跳舞。《到韶山》、《登庐山》两诗（寄周小舟与乔木求订正）传开后，大家游山赋诗，很是轻松。我参加中南组。少奇和朱总都参加过这个组，各有一次发言。7月4日会上，王任重作了沉痛检讨：比1954年水灾更困难，500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吴芝圃一边向全国道歉，一边说食堂一个不垮。

7月4日少奇作了下述发言：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凡事不要轻信。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使人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领导看好的多，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好。红旗队低产，白旗队高产。十一二月大吃大喝时，老农已提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大家挨饿，给武汉调粮。去年的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粮食好转才能解决副食。手工业要恢复。工厂财务混乱。纱厂炼钢，用掉流动资金。22万吨铁，至少赔5000万，成本高的要停产。各县盲目办工厂。1958年有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要充分估计；但怕说错误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右倾"也不怕。今年4月份报告，还有点发热，不合实际（指平均亩产450到500斤）；1962年达到450斤，没作结论。赞成恢复四十条。说大话，吃大亏，粮食部不满。脑子发热，很少看到不利；困难时，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也证明确可大跃进，另一面又出这么多乱子，有破坏作用。斯大林似乎说过，平衡要破坏了，才知其重要。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争

取不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错误非犯不可，有好处。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确领导。立三路线，短促突击，损失完了，还不知转弯，要让历史学家总结。当前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认识大大提高一步。半成品还有用。小高炉、小转炉，吸取双轮双铧犁教训。设备达到设计能力要时间，欲速则不达。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难免，不泄为好。不要责备下面，省地县，责任主要由省委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

7 月 6 日中南组会上，朱总的发言：农民还有私有性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很大。食堂在生产上对，消费上吃了大亏。工人还得发工资，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自负盈亏，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否则，干什么？有了钱就吃光。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食堂要吃好，吃饱，有烧的，这样人心才稳定。农民要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是关系五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陈云多年来对粮食抓得多紧。北戴河一时高兴起来，从粮食多了出发。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农轻重安排好。农民立家立业重要。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生产越来越多，要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蛋出口，换回东西。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工业方向要讲。

从北京到浦口的专车上，乔木找我谈过对 1958 年的总看法，认为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他以太阳系运行为例，说行星与太阳之间的关系，轨道运行，都是平衡关系；又说火车、汽车的行驶，也不能离开轨道与公路，否则就会出轨。在火车上，富春主持开了一次工交各部部长的计划会。会上我多嘴，讲了乔木同我的谈话。刚上山的 7 月 3 日夜，乔木又找我谈了一次，陶铸在座(后来富春也来了)。他谈到：共产风是从北戴河刮起来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张春桥参加过郑州会议)，毛转得较快；毛很欣赏徐水群众那种干劲，有废除家庭的思想；他多次提起海瑞，目的却在不要出海瑞。

钢铁翻一番的想法,大概是从粮食问题引起的。成都会议有些人受宠,因此发展了迎合之风(指柯庆施等)。乔木怀疑"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说法,认为许多自然现象都是平衡的(又谈到太阳系),不能套用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因此,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不论如何政治挂帅,必须遵从经济规律,要尊重和懂得前人(包括苏联)的经验。我们也谈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论战争规律的道理,以为佐证。7月6日夜,我又在乔木、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他们四人住在一处)处作过一次长谈。大家又研究了平衡问题。认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规律,因此,常受破坏。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要保持平衡。谈到公社问题之由来,七里坪、碴牙山、徐水成万人去参观,供给制也来源于此。在北戴河提出公社等问题,无人有精神准备。乔木还谈到:报纸一反常规,毛和中央的活动、言论,均要及时报道。(为什么南宁、成都会议都没有报道?)王稼祥应当受表扬。整风、反右,整得人人都不敢讲真话。都感觉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使人很难伺候。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提法,违反按比例规律;元帅是可以下命令,要绝对服从的。富春提"运动中求平衡",也是遁词,办不到的。

这之后的几天,我还去看过周小舟和周惠。他们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三万个小土炉没有点火,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注意到粮食问题等。1958年韶山吃偏饭,也只增产14%。小舟特别谈到他同彭总的交谈(上庐山之前,彭到过湖南),议论了主席。彭说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小舟的话是:二公(刘)不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主席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不愿转弯或回头。我们当时都感觉会议还有压力,缺点、问题还不敢彻底暴露,大家还不能畅所欲言。其间周小舟同乔木也有接触和交谈。

7月11日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即不能

团结。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党内天津局、科长议论，“得不偿失”。上海一党委书记否认“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去年四件事：钢翻番；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公社。缺乏综合平衡，引起各方不满，缺点都承认。有人从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不会错。有这么些中国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连月亮也好。如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被打成右派）就是一个。但他的诗（指黄的一首词《贺新郎》，歌颂百花齐放的）还想读。通过合作化、公社化，农业总增产了，苏联则否。没哪个将军不打败仗，三仗一败二胜，就有威信。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一个、最多三个指头，彭老总说一个多一点（可见此时对彭毫无戒心），成绩还是主要的。公社要整顿。对干部要有分析。北戴河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不公布为好。郑州—武昌—郑州—上海—庐山，这几次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腰杆才硬。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斯大林讲过：客观规律，人们适应时不感觉，破坏时才感觉。去年破坏一部分规律，才有了认识。经验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打仗的经验既从胜仗，也从败仗来；建设亦如此。要接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产。我们要快一点，要找正确道路。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长短腿几十年未解决。我们有两条腿，五个并举。

张奚若说我（指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

北戴河以来的一年，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了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有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训、走过场、签字。

毛泽东找我们两次谈话

7月11日夜，毛找周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谈话。毛说，1958

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哄堂大笑，毛本人也大笑了一阵。）关于钢翻一番，不料王鹤寿当成了法律，登报则是一波和乔木建议。又批评王鹤寿1958年只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忘了，本末倒置。（谈完话之后，我找鹤寿谈了，动员他在小组会作了检查。）关于农业高指标的由来，我问为什么就相信亩产万斤。毛说他受了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学科学"副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影响，钱说太阳能只要多利用一点点，即可亩产万斤或更多。说1958年粮食是否增产了三成，他还怀疑，从而讲了填平补齐的道理：增产、减产与低产一拉平，增产三成很不容易。谈到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小舟于是讲，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毛也听进去了。我们谈到陈云管理经济历来稳重，还是由陈出来主管为好。毛同意让陈当总指挥，说陈有长处，也有短处，重复谈了上海会议时对陈的称赞。由此又谈到曹操打袁绍，失败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又谈起自己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说毛泽覃在江西时，有次他大发脾气（或者是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为此我们又笑了一阵。关于公社问题，毛说："在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我们认为会议还有压力，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揭出来，应当进一步摆开谈。关于讲假话的问题，毛说，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说去年是几件事挤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意指客观规律不易弄清）。我们又说到19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这句话也带点影射味道）；反对"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口号，说这些口号不科学。毛当即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我将当年第九期《宣教动态》送上，请他翻翻。这一期辑录了

一些斯大林的语录：如果社会主义发生经济失调，其危机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等等。

谈完话出来之后，小舟比较得意，将“国乱思良将”这些话传了出去，并说自己这次把话讲完了。这当然引起当时“左派”的议论和谋划对策。我将全部谈话情况同田家英谈了，没同其他人谈。这时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毛的思路还比较偏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我鼓励田将罗世发的材料送上去。田在四川蹲点（田是四川人）刚回来，在下面饿过肚子。过分密植，农民反对，为此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罗的高产都是上面压，虚报的。田领导的工作组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材料。田同我谈的事情很多。说有些问题书记处常让乔木去反映。有次他和谭老板在毛处谈话，毛拍桌而起：“就只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他怕毛再激动下去，就促谭一起离开了。田过去同我讲得多的是关于毛任性。有时一些想法（思路或意见）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别人写检讨。反右之前，为鼓励鸣放，毛当时批发一个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中），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鸣放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即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并非个别。关于废除家庭的想法，这都属于胡思乱想，我们都感到忧虑、不安。这也是朱总在小组会上反复讲要巩固家庭的原因。在庐山时，关于1958年的问题，我同田谈的最多。田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彭总的信是7月14日印发的，上面只批了“传阅”二字。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田的住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这封信，都很感兴趣，因信中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我说，只有彭才有胆量敢写。当时乔木提出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看法，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

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10点，毛泽东又找小舟、周惠、乔木、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他谈得多，也谈得比较融洽，还议论了韶山、庐山那两首诗，留我们吃晚饭，喝茅台。以下是毛谈的要点：

关于总路线，真有70%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大概是谈到1957年反右前情况引起的。周惠说，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好。乔木也是怕乱的，以人长脓疮需要白血球攻为例，说：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则无法治了）。

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信。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宋平、韩哲一），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乱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7月11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八万多人，到吴起镇剩7000，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这还是指1958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

反复讲1300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1959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说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

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

计，比11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5%，一般水平是95%，而我们只能立足于95%。全国年增产30%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

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这是7月17日，彭的信还刚刚传阅。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谈到洛川会议，是让我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他的，也是启发我们不要倒向彭一边。同11日夜间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要找"左派"朋友谈了。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正式找哪些人谈过话。田家英有内线（警卫副官、英文秘书林克、机要秘书等，都同他关系较密切），有什么动静，他会知道。当时都知道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大家都想探问，摸摸风向。我是守口如瓶的，怕惹出麻烦来。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这时找各大区人谈话时，还说要印发《阿Q正传》，让大家受点启发，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

彭总的信和《会议纪要》

在座谈19个问题时，毛即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和我几个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由乔木当组长。各人分写一或两个问题。我负责写"综合平衡"，乔木写总结性的一段。（1988年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查清《纪要》共12个问题，正式名称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我还写了"加强企

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当时还是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纠“左”的文件,谭、曾不是主要起草人。神仙会原来不准备开很长,十天半月结束,通过这个《纪要》,大家下山各奔前程。可是这个《纪要》和彭总的信先后发出之后,形势就逐渐起变化了。《纪要》在各个小组中引起程度不同的非难,非难大都集中在乔木写的总结性那一部分,又特别攻击其中不要忘记苏联经验那一段。我在小组会上(组长是林铁,这已是7月18日以后)就听见有人说,总结1958年经验的说法,看不下去;今天的缺点是否“左”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非难,我们几个起草人都在各自的小组会上为《纪要》辩护。

这个时候,发生周惠闲话事件。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1958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总理为此在7月20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评了周惠。黄克诚在这次会上同谭老板有过争执。黄是7月17日上山的,第二天早晨二周与我三人去看过黄。黄同情我们的观点,说他在书记处会上说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总还算是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讲话了。所谓有压力,在神仙会阶段就存在的。

彭总的信出来后,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许多人都赞成彭总的观点。记得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几乎全部赞成(这在《简报》上都有反映的)。自从参加中央会议以来,由于自己工作人员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过言。关于人民日报1958年浮夸风的报道,吴冷西似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有天我们两人一起散步,他鼓励我发言。我大概是7月21日发的言,指出1959年高指标来自1958年的华东计划会议,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柯庆施(发言刊《简报》)。说彭总的信,精神是好的。7月20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也作了长篇发言,也谈到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在山上,彭同张住得靠近,他们两人有过交谈。从7月3日到10

日彭在西北小组共发过好几次言，当时并未引起很大议论。

围绕彭信和《纪要》，所谓“左”和“右”两方面的意见和分歧，才逐渐明朗。我参加的小组会上，浙江同志说形势很容易好转，如绍兴一抓，鸡和鸡蛋都供过于求。这个发言引起叶季壮极大兴趣，因为当时外贸很困难。

刘澜波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住在一栋楼），但当时所有内情我都没有同他谈。有天他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谈到，毛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一直跟他20年，还是一介书生。使我想起广州会议时，毛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这次会乔木等没有参加）。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说，毛对乔木，是既爱之又恶之。田跟我谈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和李井泉挂帅，他们攻《会议纪要》，攻彭总的信，也攻周惠，这些都是由他们发动的。正在这几天紧张交锋之中，一天吃午饭时，陈正人将彭的信指给我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陈对我说这些，也许是好意，怕我陷得太深。我心中明白，我的发言得罪了柯庆施。这时许多说法都传出来了，说彭的信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路线性质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书记处的人，“左”、“右”一半对一半；等等。彭在西北小组发言，说了“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话；彭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也传出来了。

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外，当时还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怎样在他面前攻击彭总（以及我们这些“右派”），详情不得而知。毛同中央常委同志，这时肯定没有交换过意见。有以下二事为证：

7月20日左右，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问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我的记录本上,7月20日记有少奇提的三个问题:(1)(1958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2)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1300万吨是否右倾?3000万吨是否左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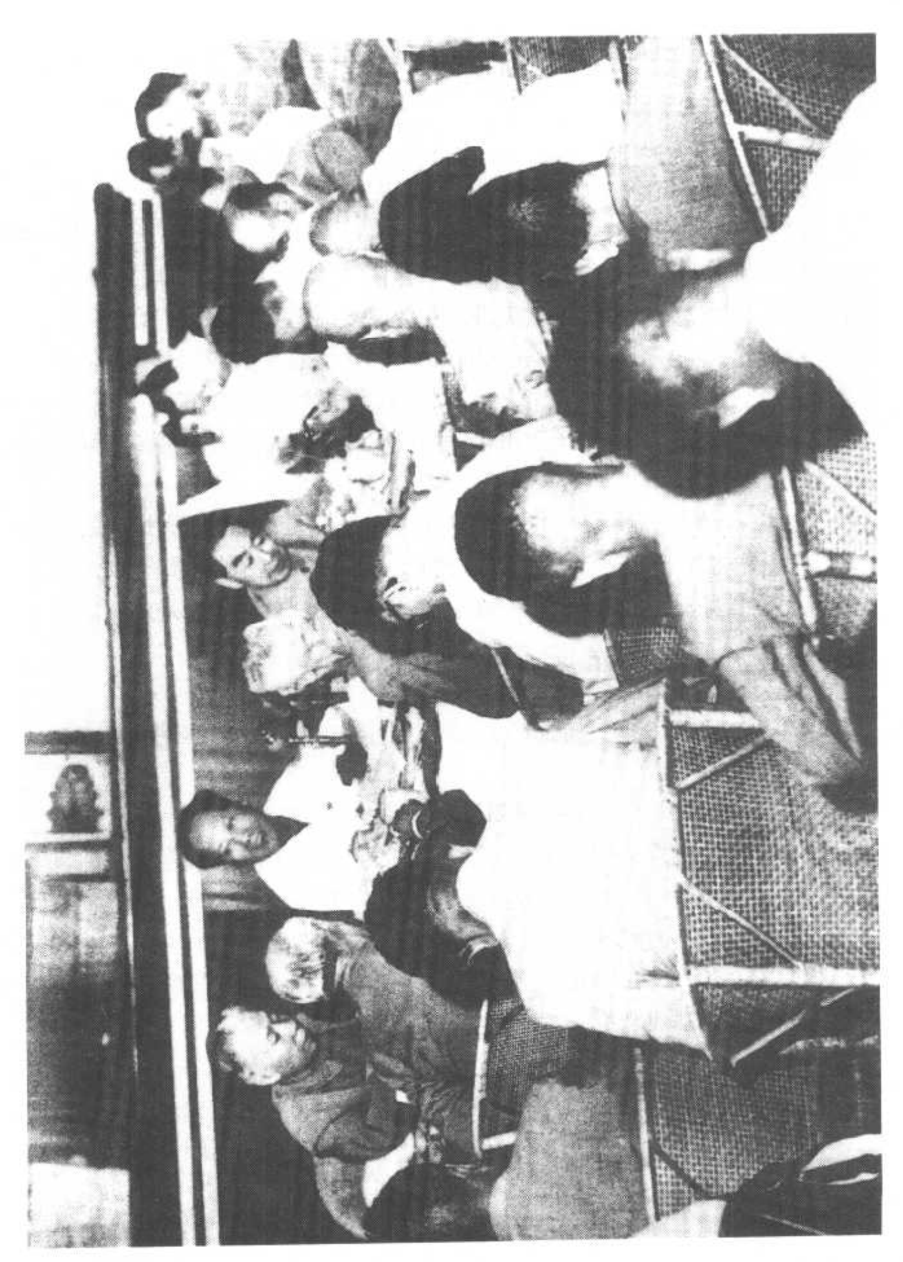
此外,以下情况也是最好的证明:从7月12日到22日,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即补了15亿。总理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冶金部今年24个亿,上半年已经用了19个亿。从而提出问题: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杆上?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由于毛7月23日的讲话,总理主持的会议当然中断了。

去年听黄克诚说,彭本不准备上庐山的,是他催促彭上山的。在湖南视察时,小舟陪着彭总,谈得比较融洽,许多观点不一致,上山之后,小舟动员彭写的信。信中有些材料是贾拓夫提供的。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

下面7月23日毛的讲话,是根据本人当时记录本的详细摘要,内容如下:

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听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劝这些同志听坏话。党内外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修长城倒台;我们修天安门,一塌胡涂。党内有许多动摇分子,看不得完全,有火气。有的人历史有问题,挨过批评(广东军区)。江西党校有集中反映,党内代表也是右派,可以辩论,三四年再转过来。这回会内会外结合,地方太小,不然把右派都请来开会。越讲得一塌胡涂越好,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这一名词。顶一个月,顶三四年,十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原因是做了一些好事,现在腰杆子不真正硬,多数派要硬起来。什么猪肉、头发夹子、肥皂等有所失调,工农商交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



庐山会议召开的本意是反“左”，纠正“大跃进”偏差，会议前期基本是在轻松气氛下进行的，白天开会，晚上跳舞，有“神仙会”之称。自从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之后，形势急转直下，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图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场。

看，没什么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公社运动，碴牙山书记告诉我，七、八、九这三个月，每天3000人参观，徐水、七里营也是这么多人，到那里去取经，其中也有县、社队和省地委干部。大概是出了真理，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不能说全是小资阶级狂热性，是有一些，只想搞多搞快。三个地方三个月90万人朝山进香，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你们心是好的，事实难于办到，要有步骤，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农民一个时期有狂热性。春节前后，两个多月不高兴，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稀饭、蕃薯。因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群众不欢迎。说服这些干部。三四月风即压下去了。现在听说大多数转过来，留恋共产主义的是少数。平调东西要收回，几亿人受到教育，不能你的就是我的。没读政治经济学，不知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公社一级不懂一点不好。不识字，可以给他们讲课。北齐斛律金作《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非斛律金作。）斛律金一字不识，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齐左丞相是斛律光，不是斛律金。）柯老讲15年全民进大学。农民、工人不是也学哲学吗？同他们讲课，比知识分子易懂。

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我们作过多次检讨，他们没有听到。有些问题这次不会解决，有些同志不会放弃观点。要养成习惯，听得进坏话。我少年时代也是一股火气：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还不放弃，硬着头皮顶住，学会这一条。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一些

同志是摇摆的，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历史上四条路线，现在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蒋邦谓我“秧歌王朝”）。这部分同志扭秧歌，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对动摇分子不赞成戴帽子。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则是资产阶级泄气性、悲观性。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就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总理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陈云和小平没有参加庐山会议）。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失有得”，失放在前，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帽子，资产阶级动摇性或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70 万个生产队，70 万条错误，都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完蛋。帝国主义不来，人民要起来革命。专办讲坏话的报纸，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他们不是右派，像中间派，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 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还有 30 公里。现在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有益、有害？有害。

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赞成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保持三分之一即好，1.5 亿人。坚持下来了不起。希望达到一半左右，2.5 亿人。《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不仅节省劳力，还节省物资。有的用上了自来水。建议河南为食堂搞一套机械化，科学院到昌黎县调查，有右派出来说，无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如计委是计划机关，却不会管计划。各个部、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真没有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为自己开脱一下，因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 8 月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对建设根本

外行。没有领导,哪来英明。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当说在我(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堆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柯讲600万吨。我6月讲1070万吨。北戴河发公报,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补贴8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即由此而来。浪费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好铁奋斗。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有话就讲,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触不得;一部分方向危险。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070万吨,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公社决议是我建议写。当时碴牙山如获至宝,记者问我,我说“好”,便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推不掉。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总路线是个虚的,见之于农业、工业。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分担一点。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列宁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列宁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一国可胜利,可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起来后,马克思赞成,估计会失败。但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当然划不来。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1927年失败了?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富春、鹤寿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柯老要搞600万吨,那第一个责任是我。屎都拉出来,人就舒服了。

“不仅对事，也要对人”

毛泽东讲话完了，即散会。彭总在门口挡着毛，说他的信是向主席个人写的，并没有让大家来讨论。

我的心情很沉重，与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四个人走出会场，散步了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都感到沉重之至。走到一个石亭中，田用木炭枝在石柱上写了这首旧联：“四面湖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晚上，我到周小舟、周惠处，大家都不能接受毛的讲话，觉得再无处可诉了，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小舟特别激愤，建议到黄克诚处谈谈。我不赞成，怕有人看见犯嫌疑。小舟坚持去，于是给黄打电话，黄不赞成去，他也不愿来，但拗不过小舟的坚持，只好同意我们三人去。小舟和我都有点火气。小舟谈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意指毛仍偏听偏信。我说，这不是钓鱼吗？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说“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他比较冷静，劝我们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我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谈话之间，彭总走进来了（他住在黄的对面房）。房中无多余椅子，我忙站起让座，心中觉得不大好，示意小舟辞去。我们三人即起身出来，各自归去。但出来后，被人碰见了，随即毛知道了此事。于是 7 月 26 日传令：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大概第三天起，我们在小组中即开始挨批斗。小组会批评我的第一天，习仲勋说我还算是中间偏左的。可是有人受柯庆施的指使，说我在火车上讲 1958 年出了轨。柯之不放过我，原因就在我曾在小组会发言批评了他。康生也不放过我，说我是中央的“间谍”，在延安挨过抢救，住过保安处，因而对党怀恨。还散播谣言，说我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我的父亲死于 1922 年）。别的小组也传出，有“文班子”，也有“武班子”。

7 月 23 日到 29 日之间，田家英还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

他来住处告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还告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后来的"决议"，我被列入"追随者"）。这期间田还告我二事：在毛居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就是纳吉。毛一人在房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对人"之后，批斗升级，小组会上提出"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为了消除毛的疑虑，田转告乔木的主意，让我给主席写一信，以释去23日夜间的疑心。我于是向毛写了一信，说明23日夜间是怎样去黄克诚处的，谈了些有关湖南的情况（那夜也确谈了湖南形势），黄劝我们有问题找主席谈。特别说明彭总进来后，我们立即离去。当然隐瞒了"斯大林晚年"之说这些要害。信晚上送去，第二天（30日）大早，就找我们四人去谈话。毛说，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谈了一军团、三军团的问题。提出（传说彭黄）"父子关系"问题。黄说明在江西被打成AB团时，是彭救了他，因此同彭的感情关系始终很好；但在某些政治、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毛就说：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并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了解彭黄关系）。随后又说，同我们几个人不通心，同小舟尤格格不入。我们反映会议空气太紧张。毛说，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还跟我们谈到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我们提出"湖南集团"的问题，希望能予澄清。毛说，这是一种误会。

谈完出来后，遇见田家英，我将"解疙瘩"之语告他，田说，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

这时，田还告我们几点看法：彭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批斗，太不应当了。慨叹毛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还担心总理也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由于《纪要》同时挨批，他们也有自危之感。

8月1日常委会及最后阶段

8月1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中间没有休息,吃的包子),由毛泽东主持,开中央常委会。参加的有少奇、总理、朱总、林彪、彭真,以及彭总和贺龙。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我四人旁听。彭真让我做记录。(记录本今年找到了,铅笔字迹潦草、模糊,尚无时间整理出来。)

林彪大概是17日以后才上山的,他当然是搬来的主要“救兵”;可能担心军权旁落,已决定让林接管国防部。但在会上并没有同意彭辞职。这个会议是算彭的历史总账。一多半时间由毛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苏联教训,等等。彭在谈到一些历史等方面情节时,有不少对话。总理只问过他与彭总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斯大林送彭出门说过什么话这一件事。少奇也只问过长征时在三军团一件不关紧要的事。彭真解释过延安整风时,平江暴动士兵委员会人员受审查事。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总,内容比较温和,“没有击中要害”。没等朱讲完,毛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总司令红了脸,就停止发言,直到散会,没有再讲一句话。接着就是林彪发言(我的记录本上没有朱总的发言,也没林最初讲的几句话,但我记得极清楚,估计彭真、黄克诚、周惠也可能记得清楚),只简短几句,可说“击中要害”,为整个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前一部分谈井冈山,几次军事情况和几次历史路线斗争。打长沙,打南昌,打吉安、九江,打赣州等等。

彭插话:1934年一二月,我已转了,认为仍由老毛领导好,过去事实可作证明,我同黄克诚谈过。

毛说:李立三多高多大,你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华北局受长

江局领导，听王明的话。高饶事陷得很深。纠“左”比纠右难吗？第二次王明路线，高岗死了，王明至今不认错。纠正铁托容易？整右容易？请包整王明。高饶能改？右倾联系资产阶级，“左”倾联系小资产阶级。路线本身不能改，要让别人来改。几次路线都摇摆，心里恨得要死，由于挨了整。今后也很难说。（彭插话：61 岁了！）

以下又讲了一段“大跃进”的过程。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说主要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只两个亿；搞平均主义，无非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说过食堂留一半、三分之一也好的话（吴芝圃是百分之百），这对右派也给了些影响。到郑州，以为我是不办食堂之人。食堂无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第二天群众自动集合办起来。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公社，总有一天给张楼梯让下来。物质基础，西欧雄厚，波兰、东欧也不错，但办食堂、公社难。我们物质条件就是人，要组织起来。物质条件好，不出政治觉悟。中国东部几亿人，土地少，组织合作化较易。苏联地广人稀，如入无人之境。

北戴河高兴中埋伏了不高兴。比例问题，今天 5 月已解决。原来谈 19 个问题，未提反右倾。北京就有人越落越低、气越泄。彭的信和《会议纪要》，很有功劳。小舟等人主要锋芒对着除自己人以外庐山会议所有的人，要发牢骚，要出气，要讲失调原因，被插了白旗。（小舟插话：并非出气问题。）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随后对彭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达到此程度。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立三路线自己是动摇的。许多历史事件，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然后谈湘鄂赣历史，一、三军团问题。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等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对立三路线并不那样坚决，但也没反对。谈富田事变。张辉瓒搞反革命布告（打倒毛，拥护朱彭黄）。主席过去曾送我两本书：

《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批语还记得，一直带在身边。（这一段话是不同意三七开）接着谈到抗战时期。毛说：打蒋介石十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忽然漂亮了。这是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林彪插话，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说是弼时作的决定。批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彭谈百团大战的过程，怎样逐步扩大；战后才搞武工队，对以后整伪军也有好处。谈到"张飞"的外号是毛取的。说自己对敌斗争是坚决的。马克思主义没学通，但盲从也不行。"我有农民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在北京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少，得不到具体帮助。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上三宝殿。"然后谈到同毛的关系是对半开，毛则坚持三七开。两人相持不下。毛强调，多次重要时期，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责备彭背后议论。"我同常委之间、同别人，从来没讲过你什么。为了使你安心工作，给林彪发转业费。"之后又回过来谈 1958 年，谈到抗美援朝时同朝鲜领导人的关系。最后谈到《内参》不可不看，决不可尽信。《内参》是专搞黑暗的。彭最后表示三条：不反革命，不自杀，可以去作田。

8 月 1 日晚上开大会，总理通知"问题不少"，即右倾机会主义，怀疑、动摇总路线；向党、向中央、向主席进攻，打着所谓无产阶级旗帜，向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这一切有思想根源，有体系，有活动；彭的信起了反面教材作用，等等。

8 月 2 日召开中央全会。毛长篇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八大二次会议定的路线究竟对不对？起初神仙会，并无紧张局势，有些同志要求民主，感到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求点紧张形势，要言论自由，想攻击、破坏总路线，要破坏、批评总路线的自由。重点在去年是否工作基本做坏了？1957 年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看来是这么回事。社会主义之命运由我们掌握，应该团结，现在有分裂倾向。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一看二帮，还是有希望的。无非改或不能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一时跑到那方面，形势有利，经过

说明，可以过来。在延安时，洛甫开始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来，就承认了。这回旧病复发，向楚太子大喊一声，有病要治呀！寄生虫作怪，可潜伏，气候适宜就出来了。上山原来总结三句话；后来就在“问题不少”上发生问题。同在改换题目：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

8月3日起，到会162名中央委员分成三个大组，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周小舟(和张一组)四同志。斗争自然是激烈的，无限上纲上线。一直开到8月10日。我参加彭总这组。康生尤其激昂慷慨。也听到这样的发言：你们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活动。

这个期间毛批发了好几个文件。关于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解散无为县公社食堂的批语：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的投机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叛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漏网残余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要挽救他们，就要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张恺帆就这样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8月10日，我被调到黄克诚组去对证一个问题。结果，7月23日夜二周与我在黄处的谈话，有关斯大林晚年的议论被揭发出来，这就使斗争更火上加油，白热化起来。

8月11日开全体大会，毛长篇讲话，从世界观方法论讲起。说历来犯错误的是唯我主义、极端主义、唯心主义。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总是格格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参加党。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党员称号不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纠“左”比纠右难？历史经验证明：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哪里去了？骂人民公社，是地富反坏骂，兄弟国家怀疑。对“大跃进”，内外怀疑。指标搞高了，只要略有增产，农业有无一成？一成就是跃进。可能三成，还得了。

高饶事件，有的保护过关，实是彭高联盟。庐山两种气候，好得很。另一种是同罗隆基接近，政治上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次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总要吹的，这一切都是好东西，大可教育全党全民。然后又讲哲学，讲必须政治挂帅。“自由、平等、博爱”(这时特别从北京调来当年彭在太行写的文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第一书记挂帅，实在讨厌，我却高兴；你挂帅，不如我挂。只要大家通过，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集体领导要不要？赫鲁晓夫强调的。有无集体领导？有无民主言论自由？这次要求民主，要求集体领导，鼻子不灵，头两周不灵。庐山两个司令部。这次满足同志们要求，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后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都干，天天开，免得老说没有民主，个人独裁。你那个军委会有无民主集中制？现在攻不民主自由，他们要搞政治挂帅，搞小跃进、不跃进。(延安)华北座谈会操 40 天娘，操 20 天不成，这次满足 40 天，加五天，听你操，满足操娘欲望。现在要求民主自由，同章罗联盟一个性质。资产阶级有了民主、自由、博爱，无产阶级就无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你讲我搞阴谋，就大鱼、小鱼、吃人鲨鱼一起钓(23 日夜，我讲过钓鱼问题)。

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听到这里，我倒放心了，知道田家英等不致受牵连。)周惠挨了边，小舟不交心。

我怎么 180 度转变？(这是小舟讲的)我是蝙蝠，开头属俱乐部，7 月 23 日是转变了。臭屁、香屁都放，通通让人讲话。估计有两重性：革命、反动，完全不革命不合乎事实。彭同许多人不合作，不单反对我，七个政治局委员，有几个合得来？十个元帅，九个合不来。大将、上将有几个合作？从不提团结口号。31 年关系，难道庐山就分手？不应当分手。欢迎最近几天同志们进步。

8月13日至15日，开全体大会，彭、黄、张、周作检查，大家批评，当然进一步加码，尤其逼彭承认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要定性质：是魏延、冯玉祥、纳吉、铁托。（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复杂，产生一种很悲观的情绪：这是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敢讲半句公道话。）

8月16日开大会，通过决议，毛泽东再作长篇讲话。开首说，庐山会议解决了大问题，总结经验就要这样总结。19个问题变成第二位了，犯错误同志帮了大忙。之后说彭德怀犯过五次路线错误，依历史顺序又算了总账：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接着谈海瑞问题，说海瑞历来是左派。我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彭黄问题带复杂性、曲折性。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人们不理解，由于不了解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次大会打了防疫针。大家要对他们做工作，要往来，采取热情帮助态度，要开团结大会，要看作是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最后还谈到，估计70%的右派可以争取过来。牛训练三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不如牛乎？刘仁静现在当翻译，要给人出路嘛！立三也改了。（林彪最后插话：这次会，避免了大马鞍形，避免了分裂。）

关于庐山会议，《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文本，则这样定性："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上面就我的记录本，将1959年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特别是将毛的几次讲话、谈话要点录下，以便了解会议和毛在山上思想变化的过程。回头看这段史实，试作如下总结：

1. 上山之初，毛泽东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一下"左"，只认识到是局部问题：农村已调整得差不多（还要保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形势就可以很快好转起来，丝毫没有认输。因此，是

开神仙会，有闲情赋诗，开十来天，讨论好若干问题，通过一个《纪要》。

2．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虽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是多数。不仅彭总、少奇、朱总都发了言，表了态，总理直到7月23日前，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领导开会，算细账，抓调整。问题从何发生的呢？就在从毛主席起，大体还是有这么一部分人（主要是当时挂帅的柯庆施等）并不服输，还是要鼓足干劲，强调气可鼓不可泄（认为落实指标即泄了气）；大体还是这一部分人又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人为财死”。毛当然要靠诸侯，不能靠秀才。

3．彭德怀是刚直的人，讲话直率，“有张飞之粗，无张飞之细”，有些话听者有心（伤了人），又有所谓历史旧账。那些进谗言邀宠之人（其中有阿Q们），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于是毛沉不住气，主观武断为是“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要“搞分裂”，组织“章罗联盟”（这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因素：凡属反对过自己的人，又不转变为百依百顺，一遇到机会，就不惜当场廷杖，乃至“昨日功臣，今朝祸首”。

4．军权不能旁落。机不可失，调林彪上山。林彪看似讲话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张牙舞爪，慷慨陈词，但三言两语，起了定调的作用，有“护驾”之功。

5．当然，在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大斗争中，有一批风派人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因素。

6．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有了一整套“左”倾的东西。“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自我支配下，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自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了。

庐山会议的教训[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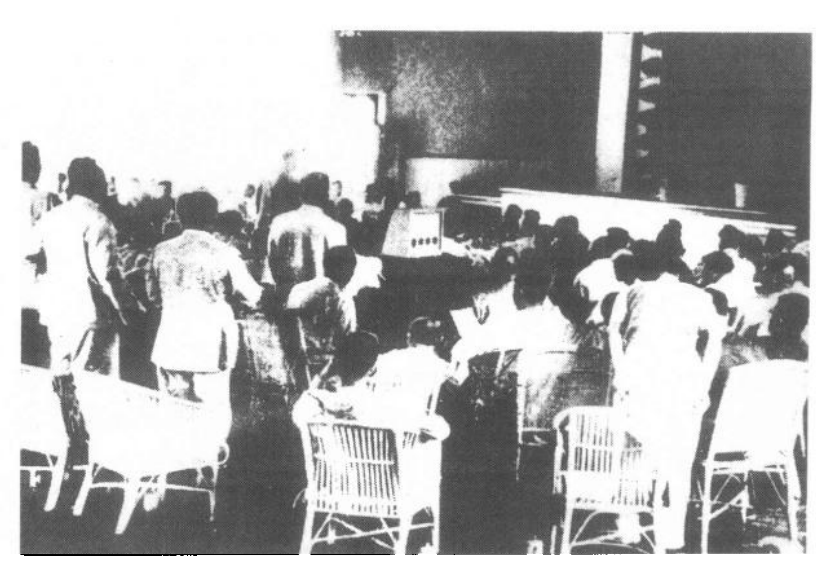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在庐山召开的历时46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之后，于1959年8月17日宣布结束。我的关于会议的回忆也已经结束；下面要说的是我对庐山会议的总的看法。30年之后作的回顾，也许可以说是比较接近"盖棺论定"了吧。

在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党内大斗争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敢于凛然直言的彭德怀、作了深刻剖析的张闻天、提出中肯批评的黄克诚、周小舟，被定性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集团"，随之，全党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并根据庐山会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全国继续实行经济上的持续跃进。庐山会议的结局，不但没有达到纠"左"的预定目的，反而使"左"倾狂热如火上加油，愈益炽烈。庐山会议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后果，从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向党内、向中央领导层发展，终于不可避免地导致10年"文革"灾难的到来。

上面就我的记录本和当年保存下来的有关资料，将庐山会议的实况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叙述。特别是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

---

① 本文系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之"结束语"。



在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党内大斗争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敢于凛然直言的彭德怀，作了深刻剖析的张闻天，提出中肯批评的黄克诚、周小舟，被定性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集团”，随之，全党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并根据庐山会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全国继续实行经济上的持续跃进。图为庐山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

谈话要点，以及两次常委会批彭德怀情况，尽可能如实录下。这样就便于了解会议和毛泽东晚年思想变化的过程。回头看这段史实，似可归纳为这样几点：

第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在运动中，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认为乡社合一，就是将来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公社什么都要管。当时不仅是毛泽东，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大都自豪地描述过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

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总之，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为了实现这样美妙的前景，还在理论上提出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等观点。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是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争年代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大搞“人海战术”，“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而不言经济文化条件太差，起点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难），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们之中蕴藏着一股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然而，这个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庐山会议前的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这半年中的主题就是纠“左”，整顿公社的所有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等，以便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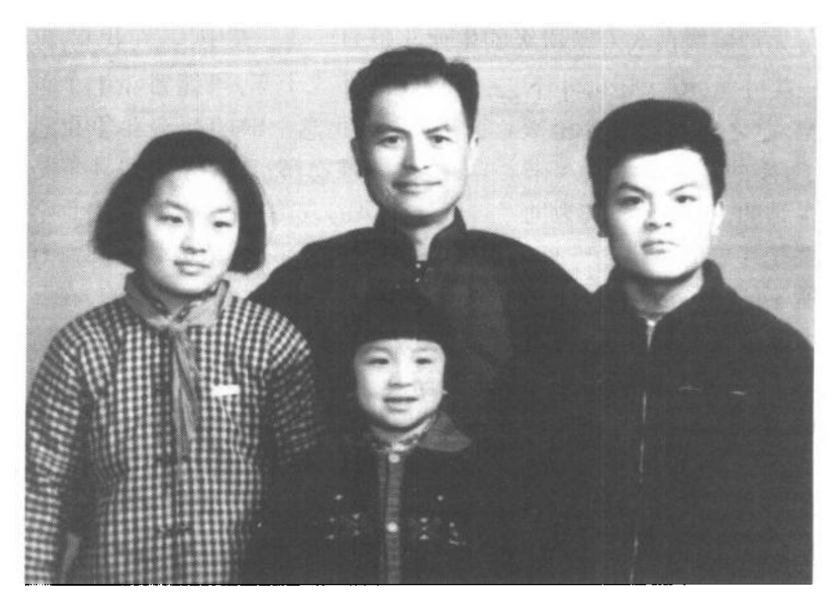
尽管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发展下去，可是这一社会平均、公正和平等的思想，始终是毛泽东所执著追求的。“文革”之初发出的“五七指示”，曾作为“建设新世界的五七道路”：全国都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以此达到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

第二，当时纠“左”，神仙会阶段提出的18个问题，并不意味全党上下已清醒地认识了产生“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并未放弃对理想社会的执著追求，他将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做了惯用的形象比喻：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也是当时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喻）。他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是前进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只须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关紧要的是，劲可鼓而不可泄，“三面红旗”决不允许怀疑，这样，形势就会很快好转起来。毛泽东的认识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深刻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主要是将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第三，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着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和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党内，同他对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判断错误有密切关系。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形势，对我国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本来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报告指出：在我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今后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毛泽东所同意的八大通过的正确路线，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坚持。第二年，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在 195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庐山会议之后，从党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大大超过1957年的“右倾分子”的数量。李锐被当作“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成员，下放安徽磨子坛劳动改造。这是1963年11月23日下放之前，李锐与儿子范苗、长女李南央、幼女范茁的留影。

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重提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更为严重的是，开始将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国内还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然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了清算，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

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十几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一些对运动有疑虑或发表了某种不同意见的讲真话的同志,就被认为是打白旗、促退派、观潮派。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大大超过1957年的"右派分子"的数量。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四,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折点是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账,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本来,党内发生原则意见分歧时,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大家能畅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人

的意见能得到尊重，即对党的最高领导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健全时，是非自容易辨明，错误就可以避免。但经过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时，党内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刘少奇在八大作政治报告，“党的领导”一节，有这样一段关于发扬党的民主生活的话：“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八大隔了 3 年了，这段话人们可能淡忘了；可是 4 月上海会议才过去两个月，关于提倡海瑞精神——敢于犯上直言，关于“有时真理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关于“李锐怕鬼”（实际是赞扬李锐上书，但胆子还不大，要将副本送李富春，内容还写得太简略）的话，都还言犹在耳。然而，朝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无常。戴上一顶“敌对阶级”、“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这些全党刚刚听到的话，就统统不作数了！

第五，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在延安时期，建国前后，毛泽东曾比较注意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盲目迷信权威。1956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曾科学地总结了斯大林在个人崇拜问题上造成的错误，指出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关于反对

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员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历史的不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几十年在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

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当时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确的个人崇拜"，自然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可以说，当时都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荣。7 月 23 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害了毛主席。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 7 月 23 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账，抓调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翦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的主观武断，以为彭德怀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

会。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说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

第六,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的统计,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62%。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重工业继续追求高指标。1959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8%以上。钢产量达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73.4%;生铁达到2191万吨,增长60%。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增加。195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5.2%,提高到43.8%;与此相反,农业的比重由34.3%降到25.1%。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1959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81亿元,增长30%,总投资规模达到350亿元。由于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1958年还低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33.9%,猛增到43.8%,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22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15%,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5元,下降了22%。

1959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入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1960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1840万吨,并提出了8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

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国家计委编制的1960年计划,仍然以“大跃进”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继续进行“反右倾斗争”,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跃进。然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方针,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1960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了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其中粮食减产530亿斤,棉花减少1292万担,油料减产52.7%,生猪头数减少32%。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9.8%,在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25.9%。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都比上年大量增加,其中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比上年增加479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积累率一直维持很高的水平。196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388.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9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3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出现赤字81.8亿元,货币发行过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日益困难。从1960年第二季度开始,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缺布,全国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净增率为-45.7‰;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增率为-3.78‰。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

剧。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败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秦城铁窗八年



1967年1月，李锐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5月被释放，在秦城度过了近8年的铁窗生活。

入此

朔风一夜扫云来，映日高窗半启开。
作伴时时唯语录，担心只怕变痴呆。

(所带衣物唯留《语录》一本。“入此”为狱中看守人员用语。)

封窗

连夜西风空树枝，高窗又到密封时。
夕阳浴鸟明春见，晓日飞霞隔岁期。
世上波澜空自料，胸中肝胆有谁知。
萧然一榻起居上，小孔时窥似挺尸。

(监狱厚木门上端有一四方活动小门，中有一圆形小孔，名监视孔；哨兵每隔一二分钟转动一视，犯人不觉。下端小门送水饭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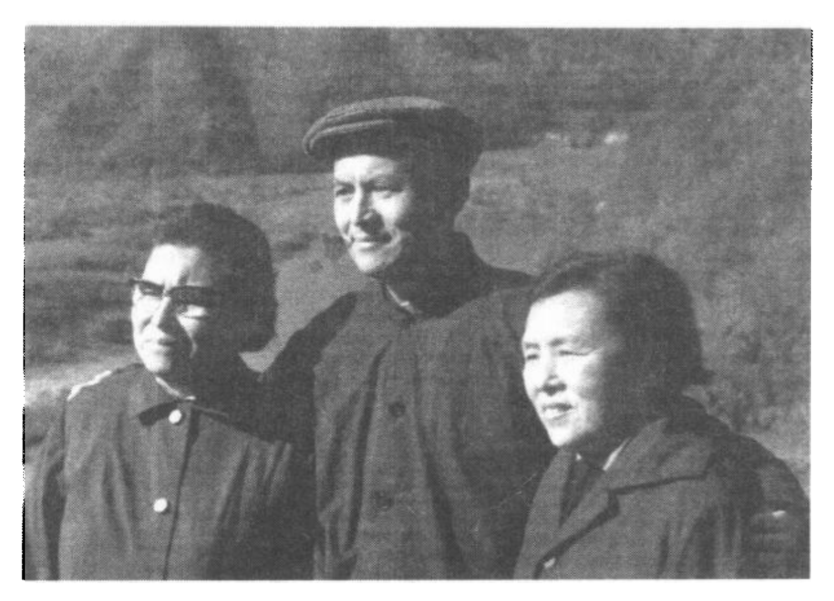
静与闲

也来回首十年间，两字包之静与闲。
问卜前程唯影对，缅怀先烈渐心安。
有书作伴门罗雀，无牍劳形日对山。
窗上晷移知午酉，一张报纸一天看。

安家

朝朝鸟叫仍惊鸟，岁岁花开未见花。
只要有书来作伴，自然无处不安家。

(经过多次请求，1972年底，从六铺炕为我取来存书二十多本，狂喜不已，吟得此绝。)



1967年11月，李锐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5月被释放，被关了整整七年零七个月。在秦城监狱里李锐亲眼目睹许多干部疯了、残了、死了……李锐身处厄境，斗志弥坚，坚持锻炼身体，回顾过去，学吟旧体诗，狱中无笔墨，用药棉签沾着紫药水将苦吟的四百余首诗一首首录在《列宁选集》的空白处，出狱后，这些诗以《龙胆紫集》书名结集出版。

1975年5月李锐从秦城出狱后，仍回安徽磨子坛水电站劳动改造，不久，李锐的大姐、二姐从湖南长沙前来看望他。

苦吟

寄寓秦城不记春，一钱不值是光阴。
古人无病伤春去，我却因闲作苦吟。

1975年5月30日出狱离京

此门走出也无家，一阵春风两眼花。
老汉单身重上路，耕耘三度旧生涯。

我还越活越年轻

1967年11月关入秦城不久，就听到楼下有锤凿墙板的施工声响，随后又从高窗窗外见到高架起重机的长臂，这就更证实了我的猜想：定是“粥少僧多”，现在的大房间隔成两间还不够，还得再盖新牢房。(后来我搬到监楼住过，又回到隔成两间的旧楼直至1975年释放。)有了这种判断，就使我铁下心作长期打算了：必须保持身心健康，因为单监在西方是最重刑罚(读“马恩全集”得知的)，弄不好会得神经病的。于是学做旧诗词，自得其乐；在房中坚持锻炼，天天如此，从不间断。锻炼方法有四：一是冷水擦身；二是做气功；三是慢跑步；四是步行游泳，训练两臂与胸肌。

牢房中只有一张矮板床，别无他物(最后二三年才增加一个床头柜和一只暖水瓶)，倒是便于活动。《龙胆紫集》“榻上吟”长歌中，有四句写这种锻炼生活：

夏来长跑治哮喘，冬仍冷浴免风伤。
斗室恰如面壁处，方丈堪为健体房。

此外，还有三首七绝兼述当时心情：

日赐斜阳一小方，人谁不爱浴阳光。
气功长跑朝朝练，白水蔬餐顿顿香。

少时徒有羡鱼情，白发何妨学后生；
方丈穿梭日十里，我还越活越年轻。

平生酷好浪中泅，曾记童年命几休；
心醉江河湖海里，如今旱鸭仍旱游。

高窗冬天封闭，但站在窗下做三元功（一种缓慢的“闻香蚕吐丝”式倒呼吸），似乎感觉有点凉气。只有放风时，才感到空气多么新鲜。牢房门的上端有个小方门，门正中有个钱眼大小“观察孔”，巡逻哨兵每隔一分钟要窥看一下。擦身，气功，这些活动哨兵不干涉，但一跑步、旱游起来，就会惹起一些哨兵的训斥。由于门是上锁的，他们进不来，我仍我行我素，不予理会，有时也解释两句。有



李锐80年代在重庆，手执象牙红。此花曾入赵朴初亲笔题赠贺《龙胆紫集》出版诗中：“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

一次，一个哨兵打开小方门，命令我过去，待我面对面时，竟吐了我一脸唾沫。这或是“阶级仇恨太深”或是心术不正之类，我只能忍下，不与计较。不过，有此教训，以后就再也不上这种当了。

在秦城八年，我只害过一次肝炎，住过医院，这大概是传染来的。秦城在远郊山下，空气清爽，我的夏喘痼疾，那八年中反很少发作。此种锻炼，得益匪浅。我今年已 76 岁，除开过敏性夏喘外，身体无大毛病，饮食正常，也不大失眠，每天游泳 800 米，最重要的是还能天天伏案，脑力未衰。为了向《羊城晚报》“健与美”专栏交卷，这篇小文，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好了。

1993 年 3 月 9 日

治水情结与
三峡工程大争论



1956年李锐考察新安江水电站坝址时，在坝址处的留影。李锐站立的地方在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被库水淹没，成为东南名胜——千岛湖，透过清澈的湖水已很难寻觅到坝址的原来面貌。

大力发展水电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1]

为什么必须多快发展水电

1957年,我国生产的电力为190亿度,钢为524万吨,煤为1.2亿吨。为了赶上英国的水平,到1972年时,钢要求增至3500至4000万吨,煤增至5亿吨,电增至2000亿度。三者增长的倍数,钢为七至八倍,煤为五倍,电为十倍。电力增长倍数最大,要求的速度最快。这2000亿度电怎样得来呢?

现在的190亿度电中,水电只占48亿度(比重为25%),其他都是用煤生产的火电。现在全国的煤炭是不够的,供求的紧张情况还可能长期存在。1957年全国发电用煤占煤产量7.5%,1972年的发电用煤如以煤产量的10%计算,则可能要5000万吨煤。5000万吨煤约能发电700亿度。如果1972年时发电用煤可能增大比重,火电能比700亿度再增加50%,则达1000亿度。根据现有材料,全国煤藏70%在山西(80%在华北);电力用户却不是如此分布的。煤的远途运输,问题较多。现在全国有多于1/4的火电容量的用煤,是从500公里左右运去的。以5000万吨的煤供全国各地的火电厂用,地区的平衡问题估计仍会有困难。东北的情况正好说明这个问题。东北煤炭产量比较大,过去总觉得利于发

① 这是1958年1月中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时,遵命向毛主席写的一份意见书。



1956年，在水电展览会上，李锐为李富春同志讲解“水电省煤的经济价值”。

展火电。其实东北煤炭蕴藏量并不多，只占全国3.4%。并且，东北煤炭中优质煤较多，不宜作发电之用。东北工业发展快，用煤多，供应是不足的；煤又多集中北部，而南部工业区用煤最多。据估计，1962年南部可能缺煤1100万吨，1967年可能缺1800万吨，除了北部调剂一部分外，还要靠关内其他地区调运。因此，今后在东北再继续大量发展火电是困难的。既然火电的发展有困难，那么，另外1000亿度或1300亿度电，能不能从水电取得呢？根据中国水力资源的丰富与开发条件的优越，这是完全可能的。而关键就在国家应当尽一切努力更多更快发展水电；电力工业的长远方针应该确定为“水主火从”，以水电为主，以火电为辅。只有在下列的情况下，才发展火电：有大量的劣质煤需要利用；用电急迫，水电赶不上；电力系统中需要有一定的火电容量调整配合；以及实在找不到较好的水力资源。

关于需要多发展水电的问题，还有以下两点值得提出：

(1)为了发展耗电量大的工业，如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冶金工业(炼铝、炼铜，电炉炼钢炼铁，以及炼钒、钛等)，特别是原子能工业，都必须有充足的、廉价的电源。这些产品的成本中，电费约占20～50%或高于50%。这一类工业，世界各国大都靠水电来生产。例如加拿大生产世界上1/5的铝(原料全部进口)，而国内只需用产量的1/10，9/10都出口；这就等于输出水电。我国现在氮肥价格比朝鲜进口的还高，就是因为朝鲜的氮肥工业全部用的是水电。

(2)由于我国许多河流洪水灾害严重，水电站的修建可以结合防洪要求。这即是河流综合利用问题。第一个五年中的水电建设都是本此原则进行的，其中以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配合最好。丰满水电站同松花江下游的防洪关系虽然几年来一直存在一些问题，但丰满水库是起了一定的调节洪水和减轻下游水灾的作用的。我国河流水患问题的解决，从长远来看，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有水库调节汛期流量，灌溉的发展最好也要有水库调节流量。毫无疑问，许多水电站的修建是可以同这些任务紧密结合的。

水电能不能赶得上去

水电能不能赶得上去，首先决定于资源条件。我国水力资源之丰富与开发条件的优越，在世界上可说没有一个国家能赶得上。全国水力资源的蕴藏量粗略估算为5.4亿千瓦①，约占全世界的1/7。开发条件的优越主要有三，①除开江苏、安徽、山东等省没有大水力资源外，水力资源丰富的河流相当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区，便于向工业城市和矿区输送电力。②由于许多河流穿行高原、台地、丘陵与盆地、平原之间，坡降很大(容易集中落差)，峡谷众多，可以由较小的工程量得到很大的发电量。例如修建黄河各大

① 根据1980年发表的调查结果，水力资源蕴藏量为6.8亿千瓦。



1956年的水电展览会，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周恩来、李富春亲临会场，薄一波闻讯后也兴致勃勃地前来参观。图为李锐正在为薄一波讲解。

水电站所需的混凝土方数，比世界各国大水电站约少一半。③许多水力资源都具有综合利用的效益，除开发电力之外，还有利于防洪、灌溉和航运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水力资源，很少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

中国水力资源的丰富，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开发条件的优越，却不是容易一下被理解的。过去有三个问题常使人抱怀疑态度：①水电站的造价是不是真正便宜？②水电站能不能很快建设起来满足用户的需要？③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建设大水电站？

现在这三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一批水电站中，已经从正面得到事实的证明。根据新建的四川狮子滩、江西上犹江、广东流溪河、浙江黄坛口四个水电站计算，总容量18万千瓦，总造价2.33亿元，平均每千瓦造价1300元(其中上犹江只有967元)。

同时期新建的包头、郑州、西安、洛阳、青岛五个火电厂，总容量19.8万千瓦，总投资2.4亿元，平均每千瓦造价1210元。上述水电与火电造价之比是1.1∶1。大水电站的造价一般比中型水电站的造价还要低。现在已经开工的容量58万千瓦的新安江水电站，国家批准的造价为4.1亿元，每千瓦造价约为700元。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火电造价，大体只能压低到每千瓦900至800元。世界各国水电造价都比火电造价高得多，如苏联高三至五倍，美国、法国高三倍，日本高二倍。

在建设速度上，这些水电站从正式开工到发电为二年半左右。新安江施工时间预计为四年半。这种期限比火电也只长1/3。

新安江水电站的容量为58万千瓦(比丰满水电站多1万千瓦)，应当说是大水电站。这座水电站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国技术人员自己设计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共修建了20座水电站(其中有12座要到第二个五年才完工)，除开丰满改建和三门峡工程外，所有这些水电站的设计工作都是自己做的。现在正在设计中的大水电站，有云南的以礼河、黄河刘家峡、资水柘溪、岷江紫坪铺、东北桓仁等。它们的容量从30万千瓦到100万千瓦。在国内设计，不仅技术力量迅速成长，也使设计更符合实际情况。

此外还应当指出，水力发电的设备在技术上的要求比火电设备要低，材料在国内也容易解决。第一个五年中除开丰满水电站的设备是从苏联进口的以外，其余全部水电设备是国内制造的。第二个五年可以做到全部自给。现在机械部门正在准备为新安江制造每台7.2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水电设备比火电每千瓦还可节省钢材一半或更多，而且愈是大水电站，钢材愈相对节省。同时，水电所用的绝大部分是普通钢材，而火电需要相当多的优质合金钢。

综上所述，从资源条件，从投资，从速度，从技术能力，从设备制造这五个方面看，我们完全有信心更多更快地发展水电，使水电

更多承担电力赶上英国的任务。

水电如何赶上去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用电的急迫，许多老火电厂便于扩建，新的火电厂也比较易于定案，加上投资的限制等，电力工业的方针是以发展火电为主，水电的投资只占全部电力投资的20%。1957年，全国发电设备440万千瓦中，水电只有102万千瓦，占23%。这102万千瓦水电中，丰满和水丰（中朝各半）占去了77万千瓦。可见第一个五年中，水电主要靠吃老本。因为丰满和水丰两水电站，日本人已基本修好，这几年只是陆续安装机器。在第一个五年中，水电发展上还是有教训的。例如桓仁水电站，日本人在时已经开工一年多，围堰已基本做好，大坝基础已浇出水面，是完全可以早两三年动手的。如今推迟到1958年开工，要到1961年才能发电。

由于第一个五年末期开工的水电站少了，这就影响到第二个五年水电比重的上涨。为了满足用电的需要，第二个五年还不得不继续大量发展火电。预计到1962年时，水电在全部电力中的比重只能升至25%左右。

要改变中国电力工业的局面，就需要水电有一个大的跃进。怎样来实现这个跃进呢？三峡水电站当然是一个最理想的目标。三峡200米高程方案的电站容量约1450万千瓦，年发电量1078亿度。但是由于这个工程过于巨大，不是短期内能修建得起来的，一般估计，包括勘测设计和施工需要15年以上。因此我们还不能依靠三峡的电力赶上英国。

前面谈到，1972年时，电力工业要求于水电的可能是1000亿度到1300亿度这样一个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有几个跃进，而关键在第二个五年。因为第二个五年如果赶不上去，那就正像第一个五年对第二个五年所造成的影响一样，第三个五年仍旧会落后下去。因此，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使得对重要工业发展

起关键作用的一批大水电站，能够在1960、1961、1962这三年中陆续开工。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第三个五年期间，使水电大大跃进一步，开始中国电力工业的一个根本的转变；第四个五年再接再励，力争水火比例关系倒转过来，到1972年的时候，水电的比重能达到或超过火电。

关于15年之内，1000－1300亿度，相应容量2400－3000万千瓦的水电站如何在全国安排，现在根据水力资源、工业部署和火



中国水力资源蕴藏量世界第一，但在50年代水电还不被人们所关注。李锐经过1953、1954两年关于水电建设的调研后，想到苏联参观学习，弄一批规程和资料回来借鉴。1954年12月上旬，组织了一个包括水电、火电的电业访苏团，在苏联共作了三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当时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任团长，李锐任副团长，成员共21人。这是1955年初在苏联参观的照片，左一为李锐，左二为刘澜波。

电的发展等方面情况，姑且作这样一个轮廓的描画（按 2600 万千瓦）。

西北地区：400 万千瓦。主要是开发黄河上的刘家峡、黑山峡、龙羊峡、盐锅峡等。

华北、三门峡地区：300 万千瓦。主要是开发黄河上的三门峡、任家堆、万家寨等，以及永定河、滦河和海河等河流。

东北地区：400 万千瓦。主要是开发鸭绿江干支流的云峰、新义州、桓仁、沙尖子，松花江上的龙王庙（白山），以及黑龙江上的苏霍金、牡丹江等河流（鸭绿江和黑龙江上的水电站同朝鲜、苏联各分一半）。

武汉、华中地区：400 万千瓦。主要开发资水上的柘溪，沅水上的五强溪、鸶鹚滩，汉水上的丹江口，以及澧水，湘水支流耒水、舂陵水，江西的赣江、修水、饶河、信江等河流。

西南地区：500 万千瓦。主要是开发四川的岷江、嘉陵江、金沙江、涪江、安宁河、白龙江，贵州的乌江，云南的以礼河、洗马河、南盘江、黄泥河、西洱河等河流。

两广地区：100 万千瓦。主要是开发东江、北江和西江的干支流。

华东地区：200 万千瓦。主要是开发新安江、富春江、瓯江、闽江、汀江等河流。

以上各地区 2300 万千瓦的水电站中，其容量约有 7 座是 100 万千瓦和 150 万千瓦的，50 万千瓦上下的有 12 座左右，其他是 10－40 万千瓦的。

此外，在全国各地区，1 万至 10 万千瓦的水电站总容量为 300 万千瓦。

在投资方面，这 2600 万千瓦水电站约需 240 亿元。其中在第二个五年只需要 30 亿元左右，其他大量投资将在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支出。

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水电15年轮廓方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投资问题。由于火电建设的时间比水电快，因此在投资见效上水电总是不如火电的。在投资问题上只有打大算盘，从国家全面效益考虑，才能决心对水电先多下点本钱；与火电比较，资金多积压一两年。这个方面苏联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参考。虽然水电的投资比火电贵好几倍，但苏联在战后仍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水电。1946年至1955年十年之间，苏联电力投资中，水电占60%左右，火电只占40%左右；可是，在这十年中间所增加的电力容量，水电只有18%，火电为82%。当然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国水火投资效益上的差别是有限的。

第二个五年中水电所需要的投资并不算大，投资的急剧增长将发生在第三个五年。估计那时国家的财力是能够承担的。

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力量问题。我们说水电建设速度快，是指施工而言。从勘测设计阶段来说，水电需要多花时间，尤其是大工程，勘测设计并不少于施工的时间。因此水电要赶上去，勘测设计工作一定要大大先行，否则是赶不上去的。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系统，包括勘测设计、施工和科学研究，大专程度以上的技术人员只有2000人，第一个五年中，勘测设计与施工之间就总是打架，到处捉襟见肘。这一支力量要担负这2600万千瓦的任务，当然是不能胜任的。根据全国的水利建设以小型为主，分散在各省广大群众中进行，所需高级技术力量不多的情况，我认为水利部的庞大技术力量可以转过来参加水力发电建设的工作，这样，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水利部系统的技术力量比水电系统要多五六倍，水利部在第二个五年中大的工程很少(水电总局有30个以上的大中型水电站工程)，技术力量也需要有用武之地。水利部相当一部分技术力量转过来做水力发电建设的工作，国家还会有一个更重要的收获，就是这样会更便于实现河

流的综合利用，防洪与发电、发电与防洪两者之间可以结合得更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方面所发生过的一些脱节现象就可以避免。

关于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

到1972年时，如果电力有了2000亿度，这就相当于苏联1957年的水平。苏联在1956年开始修建容量为400万千瓦的水电站。预计1972－1977年，我国电力将从2000亿度朝4000亿度前进，每年需要增长电力可能是400亿度左右。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将出现怎样规模的水电站呢？从电力的需要和电力系统的发展来估计，长江三峡水电站就应当成为这样的对象。

因此，在实现上述15年水电方案的同时，我们就需要结合整个长江的规划积极进行三峡的勘测研究和设计的工作，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能及时动工。有关三峡工程的修建问题，是极为复杂的，现在试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虽然三峡对于长江的防洪，特别是对于荆江大堤的保护，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防洪的要求来说，当然三峡愈快修建愈好），可是在经济上真正左右三峡修建的时间的，不是防洪，而是发电；而是1000亿度以上的电力——集中于一个电站的1000亿度以上的电力。这一巨大电力何时投入生产，这是一个关系大半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全面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于一个最大电站可以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苏联现在的经验是：这样的电站投入生产的时候，它的容量可以大到每年所需要增长的容量的1/2至2/3。运用这样的经验，三峡水电站只有到1980年以后才有资格投入生产。当然，生活的发展可能改变这一经验。也有另外一种估计，最大电站的极限可达全国电力的1/5至1/4。根据这样的估计，三峡水电站在第五个五年与第六个五年之间即1976至1980年开始投入生产，还是合理的。三峡这样大



中国电业代表团在苏联专家的陪同下参观了格鲁吉亚(或阿尔明尼亚)的一个水电站，据苏联专家介绍，在兴修水电站之前，列宁同志曾来视察，临走之前用手指着这一片地说："就在这儿修建水电站。"水电站落成之后，在列宁站立处修建了一座巨型铜像以表纪念。铜像雕刻得非常逼真，列宁神采飞扬地指着广袤的土地。

的电站自然同电力系统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电力系统，就是如何最经济合理地利用系统内所有水火电站的能力和特性，以便最可靠地保证它的用户的用电。一般电力系统的组成过程，是由几个孤立电站的互相联结，到一个比较大的区域之内的联结，再进而到几个区域之间的联结，最后发展到全国所有电力系统结成一个统一的大系统（苏联现在只有欧洲部分在形成这种统一）。电力系统这种发展过程，是由经济和技术两方面决定的。三峡水电站出现后，就可能以它为主干，将大半个中国的电力系统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全国统一的电网。

此外，与电力系统有关的，还有工业的合理分布问题，这也就是工业集中与分散得适当的问题。将来三峡电站的用户可能不按常规，而由众多的耗电工业组成。不过，这些用户最好能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将 1450 万千瓦的电力用完，否则就很不经济。

（二）投资问题。关于三峡的投资问题，它本身的投资是次要的，重要的还在它的全部用户的投资。照苏联的经验，一个电站的工业用户的投资，等于这个电站本身投资的五至十倍。那就是说，除三峡工程造价约 100 亿外，还要同时考虑 500 至 1000 亿投资的问题。三峡的施工时间需要 10 年，国家的财力需要应付这种资金的积压，同时有关工业也需要作最好的配合，不要造成两者脱节，或者发了电用户跟不上，或者用户准备好了电跟不上。这种情况苏联现在还发生。

（三）为了实现三峡的巨大效益，105 万人（按 200 米高程计）的迁移问题也许可说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但根据三门峡的经验，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四）关于三峡与国防的关系，毛主席谈话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如果遭受了破坏，那不仅是大半个中国经济影响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下游千万人民生命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考虑，三峡的修建时间同世界形势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任何一个水电站的工程中，开工之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地质查勘问题。三门峡、新安江、刘家峡这三座水电站，1952年就开始做地质勘探工作，做了整整五年，经过苏联几批权威的地质专家反复鉴定，才最后定案。但是1957年定案之后，又来了一位地质构造专家，几乎要做翻案文章。他认为刘家峡的坝址还需要做一些地质工作，才能正式开工。图为1956年中苏专家在黄河查勘刘家峡水电站的坝址。前排左一为刘澜波，中间手指刘家峡坝址的是水利部苏联专家组组长，后排右一为李锐。

（五）三峡水电站的修建，除开需要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成熟以外，还需要技术条件的成熟。三峡水电站所有重大的技术问题，可说无一不超过当前世界的水平很远。当然这一点吓不倒我们。在苏联专家和世界各国经验的帮助下，我们有信心解决三峡的一切技术问题。但问题是需要时间。像三峡这样的工程，所有重大的技术问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如地质）和相对的结论（如40万至60万千瓦一台的机组）之前，是绝对不能动手的。在实际工作中，

有一些技术问题允许冒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有一些技术问题绝不可丝毫冒险。在任何一个水电站的工程中，开工之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地质问题。因为我们的工作是要在峡谷中间斩断一条河流，将顽皮的水驯服下来。而被拦河坝抬高起来了的水，比平时增加了几百、几千倍的压力，它总是不服输，总是尽力地、无孔不入地、日日夜夜地来破坏我们的工程。河流的峡谷在地质上属于最软弱的地带，否则河水就不会从这儿冲出来。因此，凡是修水电站的地方，地质问题总是极其复杂的，总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弄清楚，总是同我们的主观愿望作对。这个问题决不能有任何疏忽，决不能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五年多以来，这是所有从事水电工作的人员感触最深的一个问题。三门峡、新安江、刘家峡这三座水电站，1952 年前后(三门峡更早一些)就开始做地质勘探工作，都做了整整五年，工作量极为浩大。例如钻了几万米的钻眼，新安江和三门峡还在河床底下打了一条平洞。这三座电站都经过苏联几批权威的地质专家反复鉴定，才最后定案。但是刘家峡于去年定案之后，最近来了一位地质构造专家，又几乎要做翻案文章。现在刘家峡的坝址还需要补做一些地质工作，才能正式开工。地质勘探是一种很笨的工作，很难采用快速的办法解决问题。一个水电站坝址的选定，正如许多球队夺取冠军一样，是采取分级淘汰制：由大范围到小范围，由众多坝段到选定一个坝段，最后由一个坝段多数坝址中选定一个坝址，坝址选定之后还得有后备坝址，以防万一。

三峡在长江进入平原之前，形成如此深切的峡谷，就说明地质问题不会是一般地复杂，而是特殊地复杂，何况还存在石灰岩溶洞特别发育的情况。三峡的拦河坝，不是通常的高坝，而是高到 200 米以上的高坝，它的施工围堰也是一座 100 米的高坝。这对地质上的要求，就比通常的高坝更苛刻得多。因此，可以估计，单是最后确定三峡的坝址，五年的时间是不够的。

三峡施工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长江的水(一般洪水为 6 万

秒立米)引走,同时要在施工方便的地方进行最大量的工程(单石方每天以10万立米计)。施工期间还要维持航运。相信这些问题将来会有办法解决的。

(六)关于“围堰发电”问题。林一山同志提出利用三峡施工围堰发电的方案,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三峡施工时间太长,如何在施工过程中争取早一点发出电力,这样就可以使国家少建其他电站,以减少资金的积压。但对这个方案,所有从事水电建设工作的人是不敢赞同的。尽管在技术上可能办到,但围堰是一种临时工程,主体工程完工之后,就要作废的。这个“围堰发电”站的容量达180万千瓦,要花十几亿元,修建时间最少五年,但运转四五年之后,又得拆掉。单从这一点说,国家不需要这样临时性的180万千瓦的电站。有这么多钱,有五年的时间,为什么不可以去修建一座永久的电站呢?这样的水电站在上述水电15年轮廓中,可以找出好几座来。

(七)如何加快三峡修建的速度。关于三峡水电站的施工时间需要十年这一点,现在大家的看法已趋于一致。对三峡工程如何争取时间的问题,我有一个总的意见:即正式开工之前的勘测设计和科学研究工作,一定要舍得花时间,一定要把这该做的工作都做够,不要存有任何后顾之忧。待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一切必须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切困难都预见到了,正式开工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快马加鞭,力争缩短施工的时间。

三峡到底何时能动工?前面谈到,从电力需要上可以估计出一个时间,譬如说,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末期开工。但是从技术准备上,现在确实还没有根据来估计这个时间,也许再过一两年,对这个问题能作进一步的考虑。

为了积极地进行长江规划和三峡水电站的勘测研究工作,我建议中央依照黄河规划委员会(现在松花江、海河也成立了规划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正式成立长江规划委员会,由中央负责同志为首,各有关部门,有关省市派负责人员参加,以加强总的领导。

以上意见特别是关于三峡的意见，片面之处很多。只是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供您参考。

（这个意见当时匆匆写出，手边又没有带有关资料，就在当时看来，许多问题也说得很离谱。为了保存这一段史实，一仍其旧，不作改动。

——1981年5月作者附记。）

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记

1958年1月，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后，毛泽东将这件大事交给周恩来负责：一年抓几次。

回到北京，我忙于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水利部原有一个工程局，于是同水电总局合并为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我也就到部里工作了。这个总局标志着原来两部之间水利同水电的矛盾，现在用同灶做饭这个办法解决了；可是三峡这样的问题，仍难以同床同梦。

2月下旬接到通知，总理要亲自带队到三峡坝区考察，听取中外专家和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队伍是庞大的：有李富春、李先念，水电部李葆华、刘澜波、张含英、钱正英，科学院张劲夫，国家技委刘西尧，交通部、地质部的人，记得北京去的人还有胡耀邦；此外，长办的林一山、李镇南（总工程师）和苏联专家们，四川阎红彦，湖北王任重等；各部门有关工程师和专家很多，有好几十人。2月26日在武汉集合后，晚上坐上一条新造的旅游客轮江峡号，向上游驶去。同我去的有总局两位水电老工程师：一位是陆钦侃，当时正派在长办工作，他曾在美国垦务局参加过萨凡奇的三峡规划；另一位是程学敏，负责水电长远规划。我去南宁开会时，带去的水电远景示意图就是他赶制的。他们两位后来都是政协委员，一直参加三峡论证，没有在最后的论证报告上签字。

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过三峡。在船上大家兴致很高，谈笑风生。1956年2月，我陪苏联水电设计总院总工程师瓦西林可和水工设计院总工程师马洛歇去过三峡，他们是来检查长办苏联专家组的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在讨论三峡问题后，毛泽东把这件大事交给周恩来负责：一年抓几次。2 月 26 日总理亲自带队到三峡坝区考察，听取中外专家和各方面的意见。在武汉集合后坐上一条舒适的旅游客轮江峡号，向上游驶去。陪周恩来考察的有李富春、李先念、刘澜波、胡耀邦和中苏有关专家 90 人。图为周恩来(居中)和中苏专家的合影。居周恩来左一是李富春，左二是李锐。居周恩来右一是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右二为水电总局专家组组长尤林诺夫。

工作的；那次是同林一山和长办苏联专家及一批技术干部一起去的。沿岸重要地段和峡区的情况，尤其坝址等重大技术问题和流域规划问题，谈得很多，看得也比较细。两位专家回到北京后，还向周总理作过汇报。因此，2 月 28 日，当船过荆江大堤和沙市时，周恩来等一行人都上岸去了，我没有去；听说周恩来还问到：怎么不见李锐？很可能以为我对荆江大堤不关心。沙市街道在堤下，长江悬在上面，高出堤后地面十多米，没有习惯的人，遇洪水时这一情景是吓人的。当年水电总局俄文翻译傅玉兰，写过一篇《随周



到达南津关时，大家上岸游了三游洞。到美人沱和三斗坪坝区时，周恩来详细听取了地质人员的汇报，看了钻出的岩芯。这是水电总局苏联专家组组长尤林诺夫拍的一张照片——李锐站在周恩来身后一起凝视地质图，虽经历史的各种风浪仍被有幸地保存下来。

总理踏勘长江三峡记》(刊《旅行家》1958年第5期)。她写到那天下雪，在离郝穴不远处，看了“安澜”铁牛和护堤工程。周总理特向水电总局专家组长尤林诺夫作了介绍，1780年修建的这种护岸导流丁坝，是中国古代水利专家智慧的见证。后来船过秭归时，曾暂停开会，周总理向苏联专家们说，这是中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离骚》等诗篇已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时任苏外交部副部长)译成俄文。到达南津关时，大家上岸游了三游洞。到美人沱和三斗坪坝区时，周恩来详细听取了地质人员的汇报，看了钻出的岩芯。尤林诺夫拍的一张照片——我站在总理身后一起凝视地质图，还有幸保存下来(这张照片曾随傅的文章刊出)。

这样一路下船勘查，上船开会，从2月27日起，3月6日到达

重庆，一直由周恩来主持开会。他边听发言，边作记录。在重庆开总结会，由他作的总结。在船上7天，我同技术干部都住在“统舱”。因白天开会、谈话，又有争论，睡得很不好，那时刚过40岁，还能支持。我手头有一本长办1980年重印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论证会资料》第一集《历次会议文件选编》，其中第一部分《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会议上发言汇编》(1958年3月15日编印)，共辑有21篇发言。第21篇就是周恩来的总结，我的发言是第2篇。不知何故，林一山和李镇南的书面和口头发言没有编印在内；“书面”即《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当时已印发给大家。

这次周恩来率队查勘三峡，是三峡工程以如此规模的第一项论证，也是我最后一次在会议上参加此事的论证。记得大家的发言是比较畅所欲言的，作为历史资料，我愿意将之摘记下来。

最近，在1959年第一期《七一》(湖北当年的理论月刊)上，找到林一山的发言，题为《三峡坝区研究工作的思想指导问题》，内容完全是谈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区的比较选择，他当时极力推荐美人沱坝址。在“具体分析两个坝区的各种复杂条件”，包括地质、地形、施工布置、工程造价等利弊，加以比较之后，林一山说：面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完成三峡的初步设计要点，而初步设计要点的中心问题又是坝区的选定。”因此，“中共长办委员会决定，三峡地质勘探中心应由南津关石灰岩地区转移到三斗坪火成岩地区。”

3月2日开会时，为三峡工作的苏联专家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首先发言。他着重谈了大坝的工程地质情况，从各方面比较了南津关与三斗坪两个坝区的条件。他认为目前做的地质工作还难将两个坝段作综合的优劣比较。然后谈到：“以混凝土折算，三峡工程量比当年最大的已建水电工程，如美国的鲍尔德、大苦力，印度的巴克拉，苏联的古比雪夫、布拉兹克，要大4～9倍。”他着重说道：中国何时需要三峡的电力？以苏联的经验而言，全国发电量的年增长额，应大于这样巨型水电站电量的一倍左右。如年发电

量为100亿度的古比雪夫水电站投入时,全国发电量的年增长额为175亿度(按:1957年全国电力装机容量仅463万千瓦;发电量193亿度,其中水电不到1/4)。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举出这个数字,显然意在说明三峡水电站何年需要投入,很难说清楚,实为遥远之事。他最后指出:长江的重要支流,如岷江、嘉陵江、金沙江、乌江、洞庭湖水系的四条支流、汉江等,在规划要点阶段研究得不够。他指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应当将这些重要支流的规划方案,同三峡方案作一种比较。可是,林一山一直向他宣传,三峡方案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因此他不能不委婉地说了这么几句:"上面所讲的问题研究得不够,只是说明我的意思,不能说是我的建议;也就是说,有可能找到另外一些办法,既能解决防洪,又能满足发电灌溉等要求。"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发言之后,还有三位苏联专家发言,可是他们都对三峡有不同看法,不是促进派,因此,《发言汇编》中就因此没有编入吧。我保存下来的旧档"工作笔记"1958年的一本中,记有他们讲的要点,都是针对《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只强调三峡而谈的。

电力专家组长彼斯夫斯基说: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能的,期限由国家财力而定。输变电线路投资(如60万伏高压),可能接近三峡本身造价。此外,要同时解决用户的布置及其投资,如果三峡本身投资是80亿,那么用户投资是500~600亿。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水电建设得少,就是由于造价高,资金周转不过来。建这样巨大的水电站,对缺少资金的国家不利,不如先建火电。有关三峡的工业布置,这只有国家计委才能胜任,长办不可能单独进行。在三峡建成之前,长江流域需要大量电力,从建水电来说,应当先由支流来解决,它们工期短还有防洪库容。因此应当研究整个流域规划,这是最为迫切的,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尤林诺夫曾担任过苏联电站部水电总局局长。他首先说,林的报告对长江各条支流和上游干流研究得不够。防洪措施是最重要的,但不能等待三峡。他认为像长江这样的大河流,大枢纽工



1958 年 3 月李锐陪周恩来查勘三峡时与苏联水电专家的合影。左一为尤林诺夫，右一为德米特里也夫斯基。

程，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苏联的安卡拉河、伏尔加河花了 30 年。有关的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楚，要深入研究，不要怕花时间如 5 年、10 年。建成三峡总是 20 年以后。因此，在修建三峡之前，需要开发支流。这样，逐渐减少宜昌以下洪水，并减轻长江中下游洪水压力，同时可解决支流本身的防洪问题。支流本身防洪，是三峡无能为力的。规划必须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他希望长江水利委员会尽快研究支流第一期工程的规划，同时仔细研究三峡规划设计。规划与具体设计有别，两者不要混淆。

水利专家组长戈尔涅夫说得更直截了当：从防洪观点看，可用支流水库代替三峡；三峡投资太大；也不能认为三峡能彻底解决长江防洪问题；三峡建成后，都还需要堤防和分洪措施。他还强调，干流、支流所建枢纽工程，都不能解决排涝问题。对排涝最有效的

是广大小型水利工程,能就地拦蓄,可利用群众力量办。

3月3日继续开会。周恩来指定要我先讲。在这个会议上,可说我是相当孤立的。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开始出现潮头;南宁会议有关三峡争论的情况,大家并不清楚(长办和水利部门的人都只知道毛主席指定周总理抓三峡这件大事);"高峡出平湖"的词在继续鼓舞着人们。

1987年1月14日,王任重发表过一篇《随周总理考察三峡日记》(见王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书),文中摘录了当年他写的日记(1958年2月26日至3月6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记下我的发言:"讲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很理想,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反对长江流域规划确定的三峡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

我的发言按《发言汇编》全文抄录如下,以存其真:

从综合效益来讲,三峡是非常理想的,也是很好的。在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应该说是可能的。经济指标特别是单位指标都是很好的。三峡可以解决(按:"解决"二字用得不当,从下文谈防洪即可证实,原件如此,不作更改)长江洪水问题,以及开发长江的水力资源,这都是用不着怀疑的。过去有些问题,曾引起争论,这主要是三峡兴建的时间和坝的高程问题,过去长办曾强调三峡正常高水位235米,这次提出三峡正常高水位200米是比较现实的。过去长办对三峡电能、投资及其他经济方面的问题,研究得不够仔细,现在长办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研究得也比较好,因此这方面的争论也就不存在了。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

从林主任的文字报告中看,对三峡谈得多,对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如何办谈得少。三峡虽好,但它的最大不好是时间长,

需要15～20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决和满足国家建设的近期要求。国家的长远计划，一般需要解决15年以内的问题，今天要赶上英国，三峡是用不上的，现在应该结合三峡统筹安排15～20年以内的工程。

在防洪方面，李镇南同志的分期提高长江防洪标准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是对的。但在发电方面如何逐步满足用电的需要，体现以水电为主的方针？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方面，如何兴建灌溉枢纽，并充分考虑现在的群众性工程？在航运方面如何进行充分考虑？都谈得较少。

林一山同志提出长江流域规划原则是：(1)以三峡为主体进行长江流域规划。(2)正确掌握三峡与干支流开发的相互关系。(3)远景规划与近期规划相结合。这三个原则，实际上就是一切围绕三峡，后两条都是从属的。我认为进行长江流域规划的原则应该是：(1)综合利用。(2)多快好省。(3)远景规划与近期工程相结合。毛主席说："五年看三年，十年看五年。"因此现在的近期工程是关系到国家今后的发展，有必要与远景规划分清楚，在步骤与次序上要分明。当然，远景与近期是有联系的，一般考虑15年以内算近期工程，目前我们不能只搞远景不搞近期。重点与第一期工程，在黄河是一致的。但在长江是不一致的。三峡是重点，但它不能首先开工，因此它不可能是第一期工程，只谈重点不谈第一期工程，不能解决国家的现实问题。

长江是一条大河，应先支流后干流，林虽然谈了支流，但太少，且过分地强调了三峡的作用，贬低了支流的作用，这是片面的。如林报告中第15页提到的沅水，事实上沅水对长江中游的洪水是有一定影响的。长办的苏联专家组长，在1955年初到北京时，曾强调长江支流的作用，特别是强调南岸的支流，即乌江、四水和赣江。乌江和沅水要比汉江水量多一倍。因此，我认为长办对支流研究是不够的。现在我们的工作应

先易后难，长江的枢纽工程也应先小后大，从国家投资看也是如此。因为这样做，可以积累经验，以便今后进行三峡工程。这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谈一谈关于长江的防洪问题。长江的防洪问题，公认是首要的任务，但长江洪水灾害性质与黄河比是不同的。长江洪水量大，而历时较长；黄河是洪水量小，峰峻沙多，历时短而骤。长江洪水两千年间记载发生大小洪水共214次。在明朝堵塞了荆江北岸的九穴十三口，加上人为的围垦，如从1925年至现在，洞庭湖缩小约1000平方公里。这样，在清朝以后，长江洪水才开始有愈益严重的趋势，这是人为的恶化。而黄河洪灾是一种随自然情况发展起来的。长江的最大、最小流量仅相差25倍，而黄河差200多倍。长江洪水经过洞庭湖容蓄后，汉口最大流量为76100秒立米，长江千年一遇最大流量为96000秒立米。假若在汉口通过96000秒立米，相应的洪水位是31.88米，比1954年最高洪水位29.37米高出2米。黄河陕县河床的安全泄洪量只有8000秒立米，而陕县可能发生最大流量为20000秒立米，两者相差悬殊很难解决。在长江增高1米的堤防，就能使汉口增加洪水渲泄能力8000秒立米，这相当三峡的有效库容420亿立米，由是可以说明长江堤防在防洪上的作用。故长江防洪最主要的措施是堤防。长江荆江大堤，是一个好堤，不是一个坏堤。林主任的报告中强调荆江大堤不决口是偶然的，我不同意。应提出确保荆江大堤。实际上荆江大堤是可以确保的。就是三峡做好以后，荆江大堤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汉口的堤防已加高至30.73米。如需解决600～1000亿立米的防洪库容，先做支流，可以减轻三峡负担。若在15年内，水土保持做得好，洪水还会减少，三峡的防洪作用也就可以减轻了。长江1954年的渍灾淹没地区的80%，三峡是不能解决的，这要靠支流。

第四个问题是对今后研究长江的一些意见：

第一，应加强支流的研究工作，如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清江、洞庭湖的四水，汉江和赣江。在这12条支流上，假若在15年内，获得逐步的开发，就可以得到有效库容1000亿立米，发电1200亿度，灌溉4000万亩，航运亦可改善，将来配合三峡运用则更好。三峡单位指标虽好，但支流投资可以分散，周转快，收效快。因此，先作支流是合理的。支流的汉水丹江口，沅水五强溪，嘉陵江、岷江等应先开发，特别是宜昌以上支流，修了水库，对三峡施工也有好处。

第二，不能把三峡概括一切，这里面具有一定的矛盾。在我的印象中，长办对丹江口研究程度没有三峡研究得这样深。而眼前是需要丹江口。远景研究过高，将来变化很多，就会使三峡研究成果等于学校毕业时的论文设计。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林一山偏向于美人沱，如现在马上对美人沱进行初步设计，将来就有可能变成(大学生的)毕业设计。南津关的缺点我们知道是喀斯特问题，而美人沱进一步发现的缺点还不知道，说美人沱的导流施工容易，也是值得怀疑的。现在还没有根据说南津关不如美人沱，而林却强调美人沱好，工作再深入一些，可能就不一定了。现在对三峡兴建，不要强调过快，准备与设计工作，应拉长一个时间。经济方面问题不谈，单从技术准备看，1963年能否开工也是有问题的。若这样还会影响近期工程的进行。因为现在全国都很紧张，特别是地质问题困难，而事实上地质会越做越复杂。经济研究的组成，现在也是有问题的。如照李镇南同志说法，各个部门需要派强有力的骨干驻在武汉。国家计委研究我国15年以后的情况是比较少的，现在可否考虑与计委共同工作，或长办经济工作人员驻京工作。

第三，长江流域规划范围问题。长江虽有超流域的意义，但应约束在一个范围以内。现在无所不包，几乎成为全国的

经济规划。这种全面性是吃力不讨好的。各部门，各省市，能做的工作，长办不应代替，不能单纯以长江地理概念来划分。

第四，关于力量问题，应统一考虑。长办队伍是最强大的，现在拥有技术人员3000人，工程师400～500人。过去日常工作交各省，目前长办主要在搞规划，但其中大部分搞三峡，这是值得讨论的。关于三峡与第一期工程的比重，各占多少，应有一定考虑。

《发言汇编》上接着是钱正英发言。她说下述四个问题，“是长江流域规划中带有纲领性的、关键性的问题。过去长办的工作研究了这些问题，这是对的。这次林一山同志提出的报告也是对的。”这四个问题全文抄录如下：

(1)三峡的地位：因三峡有特殊的地位和开发条件，三峡是流域规划中的关键问题。是规划中的中心枢纽，这应该首先肯定下来。假如长江不进行流域规划要点阶段的工作，那么现在的长江各个支流如何规划，如何对长江进行开发，这些问题都是很困难的，这样就会影响全国整个建设的布局。

(2)干支流关系。长江流域的支流规划，想一下都在今天拿出来那是很复杂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不相信，在汉口能做出太湖流域的规划。因为支流规划工作，多是依靠地方。现在的长江流域规划，就是要提出规划中的主体和各支流规划的工作方向，而这一问题，林一山同志已正确地提了出来。支流在下游控制，在防洪方面才能为干流服务，因此要求在支流的下游修建水库，这样淹没的地方会比三峡淹得更多，且与支流本身利益相矛盾。如支流灌溉，应在上游修建枢纽，这样效益大，但对长江的防洪效益小。因此，不首先肯定三峡，干支流的关系是很难正确肯定的。

(3)对长江各个不同地区，结合长江干支流规划，拟定出各个地区的开发方向。

(4)长江与其他流域的开发关系：虽然向华北引水是远景，但

现在要进行论证是否可能？引水路线如何？这些都会具体地关系到黄河、淮河、海河的治理与开发，这些问题是应当在流域规划中进行的。

钱正英讲的头两个问题，实际是一回事，即三峡同各支流（还有上游干流）的关系。按理应当从河流综合利用原则，即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如何按时间先后、开发难易、技术条件、国家财力等等，做出综合比较，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确定第一期工程。她就是一锤定音：三峡就是好，"不首先肯定三峡，干支流关系是很难正确肯定的。"她说，"在现阶段，现在基本上是一致了，承认了三峡地位，在经济上合理，在技术上可能。""今天李锐同志刚才的批评，仍有些过分的地方：干支流关系，李锐同志提出先支流后干流，我认为干支流应相结合，交叉进行，流域规划要点提出干支流相结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关于防洪问题"，"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过分地夸大，堤防是否能进一步提高水位，各省都认为有困难。""武汉市提高了洪水水位，泛区受不了，三峡未建成以前，有一定程度的确保，超过一定程度则不能确保了，彻底解决长江洪水仍待三峡。"她最后这句话是最关键的。

我没有再在这个会议上发言。不过，其他人的发言，或间接或直接对钱正英的意见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

张劲夫讲的话很短："对于三峡的兴建，赞成积极与慎重。三峡的兴建，希望多吸收些人讨论，经济技术方面，都可以提出问题。如经济方面规模与效用，应进一步研究；如三峡输电的投资不次于三峡工程的投资，这个问题应明确提出来，不应回避。三峡的用电户影响国家的工业布局，估计充分是有好处的。对这些问题应深入研究，这对今后三峡做结论有好处。技术问题，应从可能性中多找几个方案进行比较研究，假若事先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收集很多有效的意见，这也是有好处的。"

刘西尧的发言更短，他说："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我是同意的。""关于在中小型结合问题，光是先小后大，先支流后干流，不见得妥

当。但林一山同志的报告也有片面性。”

交通部办公室主任张文昂的发言，希望如林一山所说，三峡建成后，661公里航道改善，“万吨轮船直达重庆是一个‘地中海’”。但因为重庆以下还有35公里天然航道，希望正常高水位为210米（林一山的报告已从过去的235米降到200米）。他最后说：“对三峡的争论是有好处的，在初期各有各的主张，正由于这样，才使人注意长江流域规划的各方面问题，收集资料，进行研究论证。今后还应当争论，争论还应受到欢迎和鼓励。”

陆钦侃的发言专谈防洪。他几十年一直参与三峡的规划论证，直到最近还向中央上书，说明三峡的防洪作用有限。下面是他的发言全文，是针对《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谈的：

> 长江流域规划，对防洪有片面的看法。如特别强调荆江大堤、汉江遥堤，但对其他地区如洞庭湖860万亩只能确保200万亩；对无为大堤300万亩和赣抚平120万亩，则只提出问题，而无具体措施。1955年作中游平原防排方案，亦未考虑下游。以前淮委考虑安徽多，其他省少；长江流域规划是否亦有类似情况，是否重湖北而忽视其他各省？如江苏省的洪灾一点也没有谈。
>
> 对洪水来源考虑亦有片面。长江中游洪水来源有三，这就是长江干流、洞庭湖水系和汉江。虽然不能否认干流洪水大，占汉口的洪水60～70%，但不能说其他30～40%不应先解决。其中洞庭湖水量要占20～30%，较汉江水量为多。长江洪水因雨量大，但由于气象上原因，各支流发生洪水时间错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洪水才发生遭遇，其中最主要的是洞庭湖水系，四口、四水同时流入洞庭湖最紧张。解决洞庭湖固应做三峡，但建成三峡，为时尚久，因而需要先做支流。在四水中，沅水最大，1931、1954年都与长江干流洪水发生遭遇，1931年沅水尾间受灾120万亩，1954年达340万亩。就是三

峡做了，也不能解决中游各支流尾闾受灾的问题。沅水五强溪除发电120亿度外，还有有效库容220亿立米，相当于洞庭湖有效蓄量，可以减轻洞庭湖负担。林主任很早就提出研究沅水。苏联瓦西林柯等专家认为沅水防洪效益很大，可以初步解决长江洪水问题。五强溪比清江水库大得多，1935年暴雨区在清江，但不等于每年皆如此；清江固可以做，但不及沅水防洪作用大。

长江防洪迫切，不能等待三峡水库的兴建。长江每隔五六年发生一次洪水，在三峡未建成前，还可能出现三四次洪水。1954年以后，长委会作中游防洪排渍方案片面，不考虑下游，且未与各有关省联系，后来行不通，不能实现。以后进行长江流域规划防排方案未继续研究，把重点摆在三峡，以致影响近期工程。

荆江大堤我同意重要，堤质也不好，1954年虽有10万人上堤防汛，但未予以足够重视。堤应进行改善，且较新建为廉，如堤基渗漏可通过灌浆处理。有人认为无法办。请问为什么修建三峡围堰防止渗漏，尚可进行灌浆处理，而荆江大堤为什么就不能照办呢？解决荆江大堤的洪水威胁，不是没有办法的，如扩建二号北闸可以解决百年一遇的洪水；下荆江可用裁弯取直办法扩大泄量，控制四口亦很有利。所以支流水库可在三峡以前兴建，如丹江口、五强溪、亭子口等水库都可进行。三峡水库应长期地、不断地研究。但各支流水库防洪任务多少，并不取决于三峡的正常高水位和三峡的防洪库容。为了解决近期工作，应尽早确定第一批兴建的支流水库。

三峡高程同意200米方案，过去长办强调三峡235米，林一山同志在《中国水利》发表的文章亦是如此。在50年代庐山开会讨论时，大多数亦是主张三峡高程235米，当时我主张低方案，认为三峡高程200米较好，林却说是电力部的意见。现三峡采用正常高水位200米是对的。

长办对支流研究也不够，过去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才对支流指标好、淹没小的水库开始研究。三峡应当研究，但力量上应不影响近期工程的建设。

张含英老前辈当时是水电部副部长，在国民党时代他就主管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他赞成三峡工程应当尽快积极进行。但“重点工程不一定是第一期工程，这应因地制宜决定。三峡无疑是重点，但长江支流都非常大，如丹江口也是世界上的大工程，它已经肯定是第一期工程，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施工。三峡工程应详细研究，但在三峡未做出以前，是不做其他工程，还是有些工程要做？这个问题正是长江干支流的关系与开发先后，显然是大家比较注重的问题。”

发言到此，干支流关系与开发先后，显然是大家比较注意的问题。李葆华发言不长，他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写出的流域规划要点报告，提出了长江的治理方案，选择枢纽，确定三峡重要性；提出干支流的关系，虽不那样的明确，对支流强调不多，但对支流已引起了注意。”“关于三峡两年来有很大争论，争论的结果慢慢地都接近了，过去都有片面的看法，现在都日趋全面了。”（这是两边都打五十大板的办法，作为原水利部的部长，总算是说林一山也有片面性）。“三峡问题，我与澜波等同志交换意见，都愿意做促进派。认为三峡要积极进行研究和准备，20 年建成三峡是太长了，虽然可以提前防洪、发电，但应争取大家都看得见才好。”他当然受到“大跃进”已开始刮风的影响，于是这样提出希望：“即使三峡解决不了赶上英国的问题，将来也可用来赶上美国。”“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跃进中，经费困难不一定很大，近远都要抓，三峡不能看成是很长远的，而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办到的。”

刘澜波的发言很短，先表了个态：“今天我以原电力部及现在水电部两重身份来说，都愿意做一个三峡促进派。”他同意苏联专家组长的估计，“可能是 15～20 年建成。从防洪方面说，越快越

好，从发电说先行一步也好。时间决定于准备工作，及经济的需要与可能。”他说，“电力专家组长的意见，不能说是火电派，他的意见也是综合利用的。”他最后的几句话，似乎是以原电力部的身份为我说的：“过去是有争论的，最大争论还是时间问题，也包括防洪措施与看法等问题。动手应在大技术问题解决之后。我个人过去对长江没有研究，以往的争论，也没有人说是不要进行长江规划。”

地质部工程地质局负责人张更生，详细谈到三峡的工程地质条件和今后勘探工作的意见。他强调了工作中的困难在：“以往由于设计方面不按程序，要求过多过高过急，经常变动，造成返工浪费。如去年要地质队提交技术设计阶段的地质资料（各坝段的剖面图、基坑开挖量、基坑渗透量、边坡开挖量），当时不需要，也是一时做不到的工作。如要求做详细地质工作，又只有不准确的地形图，作出地质图都变了位置，以后还得重测重作。”特别重要的是他还谈到（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三峡已经开始施工，仍要解决好的问题）：“进行区域工程地质调查，对于解决水库内地质构造、浸没、渗漏、边坡塌岸、固体径流（即泥石流）来源，以及库区矿产等项较为重要。否则像官厅一样，由于缺乏水库地质调查工作，现在发生浸没和渗漏问题，再处理又花费不少力量去补救。”

程学敏的发言最短，他是针对《要点报告》三峡 1963 年开工说的：“三峡在各方面差不多都集中了世界水平，也有很多方面超过了世界水平，尤其是施工导流困难仍多，应该正视困难，予以足够估计。在安排工作方面，三峡勘测设计应尽快，但依靠其解决问题，则不能不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考虑（三峡）要迟些，应先作（支流）其他工程。现在还不能肯定三峡于何时开工，可能要第三个五年计划而不一定在 1963 年。”

李善民当时是原电力部武汉水电设计院院长（此院后来搬到长沙，改“武汉”为“中南”），他是南下的老干部，原是湖北襄樊地区的专员，能钻研业务，已相当内行。他首先谈到“三峡过去确有争论，这主要是：(1)在防洪上是一次解决，还是逐步提高？(2)在开

发上先支流还是先干流？(3)在时间上三峡什么时间修完？对丹江口也有争论，即永久性电站或临时电站?”(按当年长办的南水北调规划，是由三峡水库引水经丹江口水库再引水北去，90万千瓦的电站带临时性。现在如果要实现这个规划，三峡水库引水到丹江口已不可能，丹江口本身必须将大坝加高20米，再移民几十万人。)他认为：“实际过程中，支流是会走在前面的。如丹江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应开发。”他从电力需要出发，认为资水的柘溪、沅水的五强溪及四水其他支流，都应先于三峡开发；湖北的清江最好在1962年投入，因电力需要正急。

发言的最后一人是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他首先说：“三峡水库的兴建的确会对国家建设起到难以想像的重大作用。过去是有争论。现在对要不要三峡的看法是一致了，目前大家都一致肯定了三峡水库。兴建三峡水库的准备工作，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了。目前即要进行设计工作，施工时间不是很遥远的，因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开始施工。过去争论是有好处的，今后在以三峡为主体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中，仍然会有争论。在争论出现新的问题，不搞清楚不要作结论。”在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时，他没有发言。这时，他接着说：“林一山同志在工作上是负责的，提出问题是经过论证的，也是有根据的，不是瞎说的。”“有人认为长委会在湖北，因而光替湖北做工作。的确林一山同志对湖北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不是湖北的长委会，事实上湖北省委也未直接要林做什么，林也无片面只管湖北的观点。”关于林一山报告中少谈支流，王任重是这样为他解围的：“因为这次会议就是要谈三峡，其他方面谈多了，重点就不易突出，所以我与他商量，就是要写三峡。因而在报告中长江中下游、干支流关系、中小型工程谈得很少。”王最后谈到，“确保荆江大堤、汉江遥堤，决不是要保护堤后面的耕地，事实上在1954年，这些地区已是都淹了，问题是在于威胁300万人的生命。过去长办曾根据资料进行计算，荆江大堤万一溃口，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亦要淹死10万人，其他不可想像的后

果和事例更多。汉水的遥堤亦是如此。”

王任重在《随周总理考察三峡记》前言中说：“假如不是因为‘大跃进’以及其他因素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我想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按照当时的设想，可能早已在70年代中期建成开始发电，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长江中下游几千万人民也不必再为洪水的威胁而提心吊胆了。”

在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上，中国科学院专家李驾三的回忆：“1952年，水利部苏联专家组长布可夫在审查荆江南岸分洪方案（即现在的分洪区）时，发现荆江两岸地形南高北低，不理解为什么当时要在南岸不在北岸分洪。这样组织上就派我协助他研究荆北分洪问题。”于是，李驾三“就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并提出《荆北分洪方案》，代表布可夫向有关方面做了汇报”。在船上开会的发言中，只有湖北省水利厅办公室主任蒋光耀涉及到这个问题，他反对荆北分洪。他是这样说的：“荆州专署不同意人民大垸挖开及上车弯扒口分洪。”湖北省水利厅厅长陶述曾，是老一代的水利专家，他强调：“单从堤防加高解决洪水，有困难。湖北省的堤表面看来还好，但基础不好，堤的溃口不在堤身，而多因基础下有粉砂层造成管涌下塌。目前改善也很困难，如何改善亦尚无结论。”前述陆钦侃的发言是在陶之后，他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从以上发言看出，关系到三峡工程和水库的要害问题，如泥沙淤积，对重庆安全和四川防洪的影响，投资的估算，包括船闸等技术可能性，艰巨的移民问题，尤其是整个生态环境影响，等等，当年都没有涉及。这次查勘和会议的意义，正如周恩来在重庆作总结时开头的一句话：“这次是开的促进会，以后还要常开。”

当时的形势是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大跃进”的浪潮开始涌起。周恩来是被批评的当事人，已经作过检讨。他虽然不能不当三峡的促进派，但他对这样一项世界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还是采取了极其慎重的实事求是的方针。

他的总结发言基本内容，都充分表现在随后中央成都会议上通过的有关三峡的决议，这是由他主持起草的。在重庆的总结发言中，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峡的指示：如有可能，就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如何积极准备呢？他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召开的。在南宁会议上曾提出兴建三峡的可能性问题，现在就是要听听苏联专家和各部门兴建三峡的意见。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要涉及全江，要谈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必须要联系到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结合，上中下游兼顾，以及水火电的比例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必然涉及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整个工业的布置，和电力网的建设等。"他认为，"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他特别提醒："三峡综合利用，不能孤立地谈，要与干支流，上中下游结合，要分担任务配合进行。""三峡枢纽是问题的主体，但是我们不能集中一点，不及其他，三峡是重点而不是一切，应有主有从，这样才能全面论证问题。"讲话中具体谈到："坝高200米，是否可以肯定下来"；"在不太长时间，15～20年内完成三峡的兴建"。最后以16个大字，来互相勉励，这就是："鼓起干劲，相互促进，乘风破浪，力争上游！"

我的旧诗词集《龙胆紫集》中，有一首写50年代从事水电工作的长诗《六铺炕吟》，关于这次查勘三峡船上开会，有以下几句：

> ……当年大跃进潮头，诸公衮衮峡中游；美人沱觉花岗好，南津关为乳洞愁；评头品足观坝址，阔论高谈坐舸楼……

在船上有人谈到旧中国没有什么水电事业时，周恩来即说，长寿的龙溪河上不是有个下清渊洞水电站吗？有人插嘴：那很小。

他不以为然说：小也是电站呵。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水电处，在贵州、四川等地建了一些小水电站，其中下清渊洞是最大的，后扩建成 3000 千瓦。于是，在到达重庆之前，由于我的动员，3 月 4 日晚，船在长寿县停泊。第二天，大家参观狮子滩水电站。我与总理同坐一车，沿途介绍了龙溪河开发的历史。狮子滩是 1956 年建成的当时四川最大的水电站，装机 4.8 万千瓦，为龙溪河这条长江的小支流梯级开发的龙头，有多级调节水库。周总理一行的突然到来，电厂的工作人员说不出的快慰，大家结队欢迎。重庆市的下放干部等在礼堂门口，总理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还和大家一起照了相。然后从狮子滩下行，沿途看了上清渊洞、回龙寨和下清渊洞三座水电站。这条小支流的水力资源已全部开发，四个梯级共装机 10.45 万千瓦。周恩来在狮子滩参观时，仔细看了厂房、机组、大坝和溢洪道，还进入大坝腹部的廊道，廊道中非常干燥，说明这座堆石坝的设计和施工质量很好，他不断称赞。在纪念册上题词道："龙溪河的开发，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开辟了道路。"李富春和李先念联名题词："为长江综合开发开辟了道路；为四川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我当时很感安慰，这反映河流综合利用思想已深入人心。1952 年我调到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工作时，河流综合利用思想在有关部门（主要是水利部）和高层领导中，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关于三峡和长江流域规划问题，3 月间开的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一个决定。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了决定的起草。记得第四项防洪措施中最后一句话："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是我加的，还记得决定第五项中的七种关系，"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这二句是毛主席加的。可惜的是几十年来，因志在三峡，有关主管部门并未认真按照这个决定的各项规定，尤其第四项规定，全力去办。现将这个决定全文附后：

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1958年3月25日成都会议通过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成都会议大组会议在1958年3月23日讨论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并且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二)为了便于今后有关的工业、农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四川地区的淹没损失,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控制在200米(吴淞基点以上),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190米和195米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

(三)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时期,对美人沱和南津关两个坝址的继续勘测和研究,对一切主要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探讨,都应当采用展开争论、全面论证的方法,以求作出充分可靠的结论;某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必须作试验研究。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重点报告应当于1958年第二季度交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争取在1962年交出。

(四)长江较大洪水一般五年可能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

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五)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七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的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

(六)由于条件的比较成熟，汉水丹江口工程应当争取在1959年作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

洞庭湖水系的规划问题和两湖间的防洪问题，应当于最近期间由王任重同志负责召集有关省份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商议，定出方案。四川和贵州水系的规划，鄱阳湖水系的规划，以及安徽和江苏有关长江的防洪、灌溉等问题，都应当分别由地方负责同志召集各有关方面开会研究，定出方案。

(七)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长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由周恩来同志提出，报告中央通过。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中的设计文件，均应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审查，报告中央批准。

随后，由中国科学院、水电部、一机部和长办联合有关部委和地方科研部门共300多名技术干部参加的三峡第一次科学技术研究会，于6月5日至16日在武汉举行。我当时已无暇顾及此事，只听到参加这个会议的一机部电机方面负责人周建南同我谈起，王任重在会上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三十几个文件和决定，都是促进的，只有三峡这个文件是促退的。后来8月间，在北戴河那样“大跃进”的会议上，讨论三峡问题时，周恩来也只说过，三峡最快可在1962年开工。成都会议共通过了三十几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定和文件。3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所有这些决

定和文件如过眼烟云，早被世人忘却，唯独关于三峡这个决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自然同周恩来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也同南宁会议之后，关于三峡问题的要害所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有所了解分不开。以后，直到周恩来、毛泽东去世之前，不论有关方面怎样催促三峡上马，他们再没有就三峡何时开工有过首肯之辞。至于长江规划委员会，则始终没有成立。

1981 年 11 月

陪周总理视察新安江

1959年4月上旬，中央上海会议开完后，我就动员周总理到新安江去，看看这个正在施工的大水电站。总理的日程安排得很紧，说看过印度施工中的巴克拉水电站，总差不多吧。我极力怂恿，说这个工程完全靠自力更生，是自己设计的，7.25万千瓦一台的机组，也由哈尔滨厂制造。50年代初，水电还是个新事物，上上下下都陌生，河流综合利用方针还有待贯彻，直到一五计划完成时，这个情况还多少存在。1958年初，中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时，我趁机谈了中国水电开发的优越条件，大家同意我提出的“水主火辅”的长远方针（当年这样提法意在引起大家看重水电的开发）。可是，就在上海会议期间，康生突然发言，攻击水电，以四川狮子滩现在发不出多少电为例，说要接受苏联教训，少搞水电。逼得我当场反驳，说明事实真相：狮子滩为长寿县龙溪河梯级的龙头，有多年调节的大水库，只因四川电管局调度不当，去年冬季为火电节煤多发了水电，寅吃卯粮，恰又碰上今春枯水，以至水库水位大降，发不出多少电了。至于苏联水电吃亏，是因为欧洲部分基本是平原河流，伏尔加河长3500多公里，整个落差才200来米。修建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等水电站，都是低水头，工程浩大，造价比火电高好几倍，工期特长，经济上是否合算，国内议论甚多。尽管如此，苏联仍坚持优先开发水电，现在转向开发东部西伯利亚水电，长距离东电西送。中国2/3是山区和高原，河流落差大（长江、黄河都是5000多米落差），上中游多经山地峡谷，工程量小，造价



1959年4月上旬，中央上海会议之后，李锐动员周恩来到新安江，看看这个正在施工的大水电站。李锐告诉总理，这个工程完全靠自力更生，是自己设计的，7.25万千瓦一台的机组，也由哈尔滨制造。图为在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工地，李锐（右）陪同周恩来登上跨江缆索桥视察右岸坝头的工程进度情况。

一般同火电不相上下。同苏联相比，彼之所短，我之所长，快慢省费恰好相反。我这样三言两语，算是驱散了忽然而来的一片乌云。随后为此事向会议写了个文件(1959年第10期《红旗》刊载了我写的关于水火电问题的长文)。当年在对水电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新安江能够在1957年开工，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我认为只要新安江一建成，此关一过，就可以取信于天下：证明中国的水电建设能够做到多快好省，中国的能源政策和经济发展，应当优先开发水电，能一时出现"水主火辅"局面更好。回首当年，为发展水电，我确做到摇旗呐喊，不失时机。总理终于被我说动，到杭州后，即抽出一天去视察新安江工地。

新安江是1957年4月开工的，工程规模同小丰满相似，装机65万千瓦，大于小丰满，当年在世界上也属大工程。由于正逢"大跃进"年代，开工后遇到的困难特别多，如从捷克订购的大型施工机械，被调到天安门的"国庆工程"去了。浇筑大坝用的几台门式起重机，是从小丰满调来的30年代老设备，其安全极令人担心。最大的困难还是水泥，数量尤其质量成问题，被迫使用各种不够标号的水泥。为解决水泥等问题，新安江副总工程师潘圭绥，于1959年3月11日来到北京。此事当时只有"通天"，才能真正落实。14日上午，总理在西花厅听取了我和潘总的汇报，并请建设工程部部长刘秀峰一起参加。(为写这篇回忆文章，《新安江电站志》编委查找到一份《潘总汇报在京一些情况》的会议记录与我。)我们先作自我批评，为节约水泥，砼内有48%的渗合料，这明显影响质量，然后谈到各种低标号的水泥，是自己无法解决的。

总理问我们：300号水泥过去用过没有?

潘总答：过去没有用过；另外在一个坝块上也用了几种水泥。

我接着说：他们掺48%的渗合料，没有经过试验是错误的。总理说：大工程一定要遵守安全系数，实验室的试验要跟大批量生产分开。三种东西是有区别的：一种是礼品，一种是展(览)品，一种是产品。总理还特别强调，新安江是重点，以后供水泥定要保证

质量。

关于今后供应新安江水泥的质量和数量问题，刘秀峰当即向总理作了承诺。水泥问题关系整个工程的进度与质量，在“大跃进”中新安江大坝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同周总理亲自过问分不开；已故的潘总也成为有名的质量铁面监督。问题谈完以后，总理还留我们在家中吃午饭。

4月9日一大早，我陪总理一行从杭州出发去新安江，共两辆华沙牌小车，随行人员只有秘书等三四人（记得有第一次见面的姚溱）。我和总理同乘一车，一路还谈起抗战时期在重庆和延安的旧事。在延安我是被“抢救”过的，由于总理的干预，我只关了14个月就出来恢复工作了。

出发前，我预先通知，只要一两位负责同志陪同，不要惊动大家。一到工地，就登上跨江缆索桥，到右岸坝头看坝体浇筑，各个坝段进度不同。坝上脚手架密密麻麻，工人们正在紧张浇捣，风水电噪声不绝，3吨重的砼吊罐在头顶上来去上下。望着这些老设备，真担心出事故。新安江工程，是主要靠小丰满老工人老设备作主干，按时胜利完成的。那时还不是筑坝高峰，砼浇量每天不过5000方左右。然后到技术革新展览馆，总理看得很细。最后到十几里外的砂石料场，从提砂、筛分到堆料，看全套机械化作业。工地报纸《新安江报》（隔日刊）4月11日头版，刊登“周总理曾来新安江工地”的简要新闻，还刊有照片和题词。副标题说：“对工程建设和职工生活表示殷切关怀”；“全工地职工欢欣鼓舞，决心打一个更大胜仗”。新闻中说：“周总理在百忙中抽身到新安江工地的消息，在全体职工中争相传告。它像一股暖流，注入每个人的心头，激起了更大的干劲。”这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决非泛语浮词。4月25日的报纸，又刊登了视察时的一些细节：在参观展览馆时，周总理指着一台新式电焊机问：普通的电焊机用多少矽钢片？这台不用矽钢片的电焊机比之轻多少？后来看另一件革新的三用工具台，讲解员说，这是土办法做的，样子不好看。总理高兴地说：土办



我国水力资源之丰富与开发条件之优越，在世界上可说没有一个国家能赶得上，全国水力资源的蕴藏量为6.8亿千瓦，约占世界的1/7。较好地利用水力资源的关键在于国家应当重视并尽一切努力更多更快地发展水电。图为1956年在北京展览馆，刘澜波、李锐陪周恩来观看水电展览会上的一个水电站的模型。

法没关系，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当年新安江工地所实行的土洋并举，还是起了大作用的，由于技术监督严格，没出过什么问题。看完展览馆休息时，总理同三个讲解员亲切交谈，问他们家里有多少人，收入多少，工地生活过得怎样？

砂石场是砼的主要原料基地，运输皮带即达5公里长。总理对整个机械化作业很感兴趣，看了采砂船，又看筛分机，知道这些设备都是国产的之后，对随行的摄影记者说：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拍几个镜头。总理视察新安江的照片，大都保存了下来；1979年后，新安江还寄给我好几张跟总理在一起的照片。

在工地见到潘总时，总理马上认了出来：我们不久前见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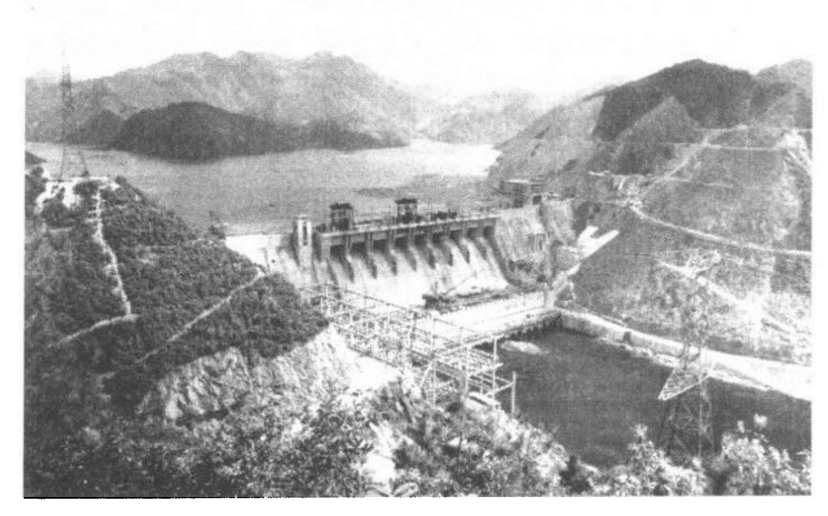
你是潘副总工程师。于是又问起主体工程，还有什么困难，还缺什么，使潘总感动之至。

回到休息的地方，这是开工时就盖好的永久建筑，一栋二层小专家楼。吃过午饭，我将准备好了的笔墨宣纸取来，请总理题词，姚溱在旁也帮了腔。这就是现在刻在新安江厂房的总理苍劲的毛笔字题词：

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周恩来　一九五九．四．九

总理写好题词，就要返回杭州，说在车上可以休息，闭目养神。



新安江没有辜负总理的希望，确实是值得欢呼的：在开工后的第三年，经过三年半时间，大坝开始蓄水，第一台机组发电。在世界同类工程中，这种速度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罕见的。新安江工程是在“大跃进”期间兴修的，但没有受“大跃进”的干扰，至今安全运行。图为新安江水电站主体工程。

新安江没有辜负总理的希望，确实是值得欢呼的：在开工后的第三年，经过三年半时间，大坝开始蓄水，第一台机组发电。在同类工程中，在世界上，这种速度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尤其造价没有超过预算，包括30万人的移民费用，投资同火电相差不多。难怪70年代意大利的大坝专家来新安江参观时，根本不相信三年发电之事，认为这是神话。新安江的建成，完全证明了中国的水电建设可以做到多快好省。新安江工程的质量，没有受“大跃进”的干扰，至今安全运行了32年。它一直是华东电网的主力尤其是调峰的主力电厂；对下游的防洪、灌溉，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离开我所眷恋的水电岗位20年之后，1979年复职后的第二年，1980年5月30日，为参加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的成立大会，我终于又来到新安江，重睹周总理题词，真是风雨沧桑，感慨万千。中国的水电建设事业，在这20年中，遭受了两次严重破坏和折腾：一次是1959年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城门失火，池鱼遭殃”，水电被安上“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的罪名，许多技术干部和领导干部受牵连；再次是“文化大革命”，全国8所水电设计院中，最主要4所骨干院被拆散和下放工地；水科院被砸烂；水电总局被撤销，连资料都烧毁；北京、杭州等4所水电中专学校，连校舍都送了人。1958年开工的刘家峡，拖了十多年才建成。

在这座当年总理休息过的小专家楼中，我同许多水电老同事、老专家学者又会聚一堂，叙别话旧（餐桌上有新安江的大鳜鱼），都感到要重振水电当年雄风。于是，应命写了下面这四句，题为重睹总理题词，感而赋此：

挥毫能不忆欢呼，有幸终来食桂鱼。
难得群贤新聚会，畅谈本世纪宏图。

（1992年9月30日）

访苏杂忆、忆外友

亚洲先进最萦怀，喜见雄狮睡眼开。
知否身边屏息者，迢迢万里北京来。
(谒列宁墓，时斯大林遗体尚并置墓中。)

裸雕男女与儿童，饭店公园满故宫；
人体本来如此美，东方礼教不相容。



1959年11月，李锐率中国水电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会见苏联水电设计总院院长伏兹涅先夫斯基并向水电设计总院赠送资料。

细写皇儿爱窈娘，乌兰一舞使人伤；
八回谢幕犹不已，最是高楼少小狂。
（观乌兰诺娃舞。）

中国有无柑桔尝？高加索遇夜郎狂；
爱翻白眼朝邻右，大小沙文何日亡！
（格鲁吉亚电业局长语，席间对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人之轻视，溢于言表。）



1996 年，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去俄罗斯访问，专程拜访了 80 有余的伏兹涅先夫斯基，伏氏欣然接待，并赠送一张近影给李锐。在照片背面伏氏亲笔题谢道："尊敬的李锐，（此照片）权作对我们在中国长期共同工作（1953－1957）的留念！Н·伏兹涅先夫斯基。"

"又及：照片是在 1995 年 12 月 5 日过 80 岁生日那天拍摄的，在圣彼得堡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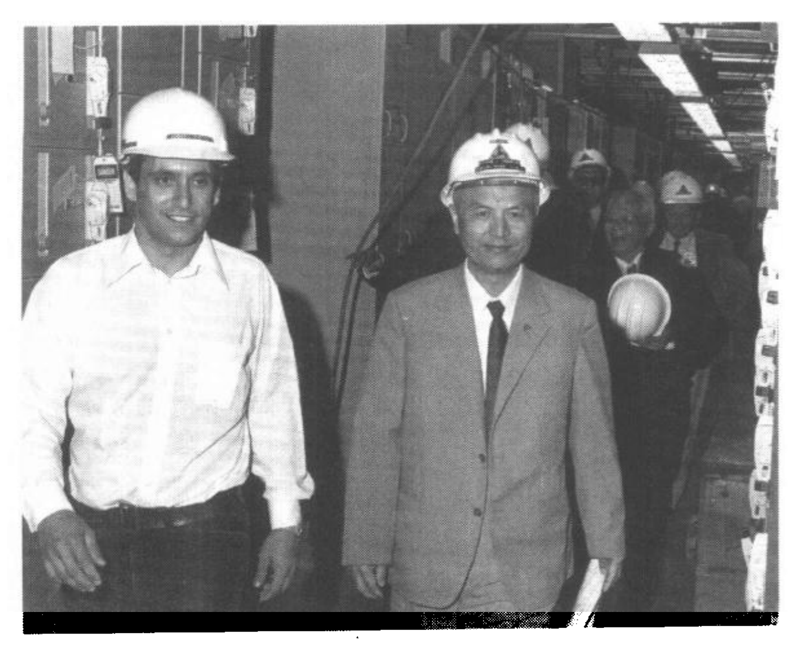
虽然伏氏与李锐近 40 年未见，但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此照是伏氏与夫人的合影。

如何保证优先发展水电

谈到本题之前，先讲几句关于能源和电力的形势。

要实现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众所周知，能源尤其电力是一个重要关键。多年来，能源紧张，电力尤其紧张；能源是短线，电力尤其是短线。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形势短期内难以扭转，甚至将长期存在，特别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华东、东北、京津塘）更将长期存在。因此，如何解决能源短缺是举国上下所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科研、计划部门根据国内外经验，有各种匡算。如能源增长率同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比值（通称能源弹性系数），据我国历年统计，在 1 上下，最近几年小于 1（国外也是这种趋势）。由于采取节约能源、技术改造以及改变产业和产品结构等措施，今后 20 年内，能源弹性系数估计可以减到 0.5—0.6 左右。按此估算，产值翻两番，能源（煤炭、石油）仍需翻一番或略多。可是根据国内外经验，电力却不能套用这一规律，电力弹性系数总是大于1。近二三十年，世界各国一般在1.2以上，西方发达国家都在1.5以上；我国 30 年来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电气化、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电力增长必须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无法背离的规律。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足，致使电力发展缓慢，电力供应长期紧张，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1980 年调整国民经济时，压缩基建投资，对电力工业也“一刀切”，以致近三年的新增装机容



1979 年 1 月 6 日，李锐从流放地安徽大别山中回到北京后，结束了长达 20 年的“赋闲”生活，复职后仍回电力部任副部长，主管水电建设，5 月初参加康世恩副总理率领的能源代表团，到巴西和美国访问。在美国(5 月 29 日)拜会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白宫高级汉学家奥森伯格会见时在座。这是 1979 年参观美国石岛(Rock Island)水电站的情景，李锐身后为水电专家陆钦侃。石岛水电站位于哥伦比亚河中游、华盛顿的歇朗县，是地方兴建的，由私营公司设计施工。

量都比 1979 年减少 1/3 以上，在建规模也随之下降。

现在大家认识到，要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电力至少要保持同步发展：翻两番或接近翻两番。也就是说，到本世纪末，发电量要达到 1.2 万亿度，装机容量达到 2.4 亿千瓦。如果不能同步，即使达到 1 万亿度发电量和 2 亿千瓦装机容量，甚至还少一些，从当前各种因素看，那也将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根据估算，大概3/4要靠火电来解决。可是煤炭与运



李锐认为，在常规能源中，水电的优越性是无可比拟的：水电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再生能源；是毫无污染的干净能源；具有防洪、灌溉、航运、水产等综合效益。因此，100 年来，特别是 3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无不优先发展水电。图为 80 年代龙羊峡大坝在施工中。

输能不能相应保证，问题甚多（如煤炭增长的大部分必须用于火电等），对此应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否则，到时候发电用煤再出现巨大缺口，悔之晚矣！这里我们专来谈如何保证优先发展水电的问题。

在常规能源中，水电的优越性是无可比拟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再生能源；是毫无污染的干净能源；具有防洪、灌溉、航运、水产等综合效益。因此，100 年来，特别是 3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无不优先发展水电。全世界水电平均开发程度已达资源的 20%，其中发达国家平均为 40%，发展中国家为 8%。西方不少国家水力资源已接近开发完毕。能源危机发生后，水电更受重视。

如美国现在又回过头来开发过去认为不经济的小水电。据国外估计,在今后40年内,全世界可开发的水力资源的80%,都将得到开发,届时水电能力可达到18亿千瓦。

我国水能蕴藏量居世界之首。现在的装机容量为2200万千瓦(其中15%为500千瓦以下),仅占可开发资源的5%,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远不如印度。到本世纪末,即使能达到翻两番(按目前做法是不可能的)后的8000万千瓦,也只占可开发资源的1/5左右,发电量仍只能占总电量的1/4左右。

30多年来,水电发展缓慢,原因甚多,根本点即在人们对水电与我国的国情缺乏深刻认识:即没有认识到优先发展水电的必要性,也没有认识到迅速发展的可能性。没有像对待开发石油与煤炭那样,采取有效的、坚决的措施。

在常规能源中,水电究竟占何种地位?过去长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甚至有的统计资料错误地把水力资源按一年计算,因而在整个常规能源中连1%都占不到。按国际通用100年计算(苏联按200年计算,实际上只要地球存在,水力资源永远保持常数),我国水力资源占整个常规能源约1/4到1/3,仅次于煤炭。这是过去认识中未能明确的一点。还有一点不明确的,即水电乃一次能源(水力)开发转换为二次能源(电力)同时完成,相当于火电加上相应的煤炭(石油、核燃料)及有关运输设施等建设。单纯把水电看成是二次能源,自然就不会计算煤炭及石油等一次能源开发与运输的投资,因而产生水电造价比火电昂贵的错觉,尤其从事计划与火电工作的人员更是习惯于此种观点。水电作为一次再生能源,自应同煤炭、石油一样平起平坐。何况水力资源在地表,现在全国已基本查清:可能开发的约3.8亿千瓦,近期具备开发条件的在1亿千瓦以上。这方面是煤炭与石油都难以匹敌的。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煤炭、石油都是珍贵的工业原料,使用太过分了,将来子孙会埋怨前人不为后代着想。而水力不利用,“奔流到海不复回”,就白白浪费了;多利用一分水力,就少用一分煤炭。开发水电

可减轻对煤炭(和运输)的压力,因此,现在对开发水电最为关切的是煤炭部门。去年水电的发电量为744亿度,等于节约了5000多万吨煤炭。

能源与运输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必须及早动手。如果说实现两个倍增还有17年,那么,能源建设如水电,则只有十二三年了。因为1995年以后开工的项目,本世纪末是用不上的。所以关键在"七五"计划,要下大决心改变局面。我们在50年代就提出电力与交通是"先行官",可是30多年的实践仍是"殿后军"。我们应当从战略观点、工业布局(如耗电工业多在东部地区)、综合平衡、投资比例等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能源从开发、运输、加工转换到最后消费,有一整套过程。如煤炭本身投资与运输等项投资(国外称为"煤炭链"),各国具体情况不同,但组成部分大体有一定比例。"煤炭链"中的煤炭投资所占比重约为1/3到1/2。我国山西煤炭与运输投资,两者基本相等。从供电来说,输电高压线路的建设与投资,在我国比煤炭运输有显著的优越性。国家的投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源工业的发展方向。30多年来,在计划安排上没有把开发水电纳入开发一次能源之列,而划在电力投资之中,这是我国水电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由于在计划、财政体制上,电力、煤炭(石油)和铁路的基建投资分归各部,因此,在电力投资有限,供电任务紧迫的情况下,自然首先考虑见效快的火电。多少年的争取,水电投资也只能占到整个电力投资的1/3。因此,只要不改变这种局面,不解决投资问题,不把水电当作一次能源对待,那么,水电的优越性不论如何被人们充分理解,必须优先发展水电不论如何被人们公认,都不免是句空话,最后仍不免走30年来的老路。

国家资金越是不足,越应当讲究重点,不能平均分配。国外有所谓"倾斜政策",即在一定时期,投资有一定的侧重点。美国30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水电;苏联50年代电力投资的2/3用于水电,现在开发东部地区水电,2000公里距离的东电西送。这些都



李锐认为，西方不少国家水力资源已接近开发完毕。能源发生危机后，水电更受重视。如美国现在又回过头来开发过去认为不经济的小水电。图为1980年美国水电代表团访华，中美两国的水电专家在亲切交谈。李锐(右四)负责接待。

值得研究与借鉴。多年来，我国在投资分配上形成的某些框框，如能源投资不超过基建投资的几分之一等，是否能突破呢？按照传统办法，水电投资都列在电力部门，则上述“三分之一”的“紧箍咒”永远也摘不掉。巴西开发水力资源的情况，很值得参考。巴西缺乏煤炭、石油资源，但水力资源丰富。请看以下数字：水电装机1950年150万千瓦，1960年360万千瓦，1970年880万千瓦，1980年飞跃到2800万千瓦，现在全国发电量中水电占91%，估计到1985年，水电装机将达到4200万千瓦，计划到本世纪末达到1.1亿千瓦。巴西水电建设主要靠利用外资和国外技术力量。60年代大起步时，技术方面还远不如我国，现在技术力量已迅速成长。当然，国情不同，利用外资的得失可以研究，不过，这种“倾斜政策”值得借鉴。

不计其他综合效益，仅水电来说，成本低，积累多，经济效益显著。1982年全国发水电744亿度，为国家积累近30亿元，而当年用水电的投资为13亿元。因此，为了解决水电投资问题，出现了所谓“以水电养水电”的设想。但是，就实际而言，为充分保证水电的优先发展，国家还必须在投资分配上实行“倾斜政策”。如果水电投资不能全部从电力部门划出，独立门户，则至少重大项目、骨干工程，特别是有综合效益的重大项目，应当作为专项投资处理。为打开水电建设的新局面，能够达到翻两番或接近翻两番的目标，一批大型水电站(总计约2000万到3000万千瓦)，如处于黄河上游，广西红水河，闽江、汀江，湖南水系，云南水系，长江上、中游等骨干工程，都必须争取在前十年开工，以便后十年陆续投产。如果这一批项目推迟到后十年再开工，势必本世纪内难以见效，翻两番的目标就无从实现。届时仍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使煤炭、运输与

火电之间的紧张局面更为严重。

为了将有限投资用得恰到好处，水力资源必须择优开发。所谓优，即开发条件优越和经济指标好，如地理位置适当，建设周期短，工程总量小，发电量多，单位千瓦造价低，淹没损失少，等等。由于我国地少人多，淹没损失是一个至关重要、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我国已建大、中型水电站中的1000多万千瓦，总计共迁移120万人，淹田150万亩。其中三门峡、丹江口、新安江三座大型水库，各迁移二三十万人，许多遗留问题至今还在处理。水力资源优越的河段多在上游，尤其集中于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今后开发的重点。据统计，拟建的容量同为1000多万千瓦的一批大、中型水电站，虽然移民和淹田可减少到上述数字的1/5，但仍然是一个难题。如湖南的五强溪，原已取得日本优惠贷款，但由于移民数较大，不得不降低坝高，迟迟未能开工。著名的三峡工程，虽有巨大的防洪、发电等效益，但20多年来难以定案，其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便是原高坝方案淹没损失太大。不久前论证的低坝方案，意见比较一致，移民仍将达三四十万人。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很好，大家都愿意把它早日建成，但投资过大，工期又较长，因此有一个同国力相适应的问题，即国家必须有一笔专款，而不致影响其他收效较早、应于近期开工的水电项目的投资，才能决定上马的时间。这就是说，选择最优方案还必须考虑取得经济效益的快慢，即所谓资金的时间价值。

加快发展水电，是打开能源新局面的关键之一，有关问题甚多，如必须做好全面规划，有步骤地择优开发；必须做好项目的前期工作，特别是做好地质工作；尤其必须改进施工管理，千方百计降低造价，缩短工期，等等。根据多年经验，其中的根本条件还是解决投资问题，故作如上建议。从50年代初期开始，我曾长期在水电战线工作，现在虽然“不在其位”，仍愿将自己感到的这个重要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原载1983年第19期《红旗》

三峡工程定案后答记者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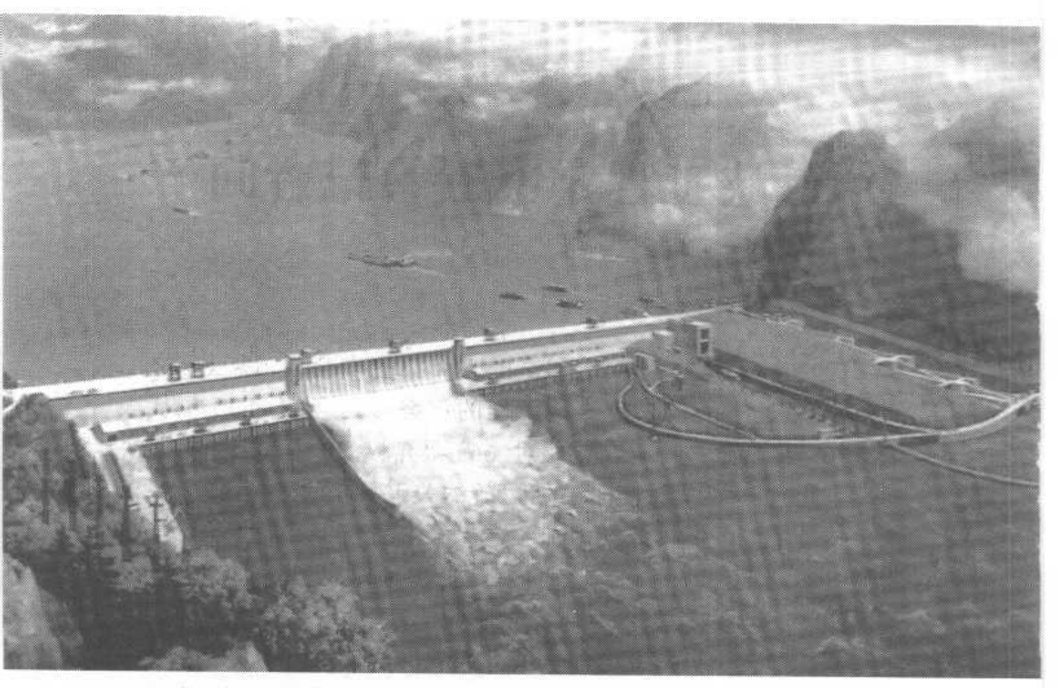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到会的2633位代表中，1767人投赞成票，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位代表未按表决器。至此，被称为“半个世纪的论证”的关于三峡的争论，似乎可以画个句号了。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一争论的人士，对此议论纷纷：为何听不到反对派的声音？《自然辩证法通讯》记者王德禄，为此于同年5月两次来访，我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问：今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作为反对三峡工程仓促上马的代表人物，您对这次表决结果的反应，为国内外所关注，请您谈谈对次表决结果的评论。

答：我对这次表决结果是满意的，表明中央对此事的慎重。

全国人大通过的议案，同意建设三峡工程，建议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这个决定实际上否定了“快上三峡工程”，即今年或明年就动工的意见。至少说明，目前国家财力难以承受这个巨大工程的重负。还应当注意，报告说明中最后这句话：“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足够的重视，谨慎从事，认真对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三峡工程建设更加稳妥可靠。”因此，有关三峡工程种种不同意见，包括从缓（乃至根本反对



长江三峡工程鸟瞰图

建高坝)的意见,都可以提出,还有时间从容讨论。

问:您的回答令我们吃惊,请您解释一下。根据现在的舆论宣传,三峡工程似乎很快就要动工,您却说"快上三峡工程"已被否定。

答:主持三峡论证的原水电部负责人,去年初又走了一次上层路线。他们请两位有影响的老领导,参加十几位专家的"论证会",向中央建议:时机完全成熟,催促三峡今年动工。以此推翻姚依林副总理宣布过的,"三峡五年内不争论,九五计划再定"的决断。后来又借江淮下游洪灾,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三峡上马的宣传运动(或曰宣传攻势)。同时,请不要忘记,1984 年,中央曾通过 150 米方案,两年施工准备,决定 1986 年开工,国务院发了红头文件,要

全国支援。后来因150米高程方案不合理，政协和人大两会反对之声甚大，才又重新论证。现在通过的议案只是列入十年规划，并非立即上马。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否定”。

在人大开会前，所有报刊电台全部舆论工具，如此铺天盖地向社会宣传“三峡工程应即上马”，此种舆论导向，乃多年以来主其事者人为造成。听说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种“一面倒”的宣传方式，也是不满意的。多年以来，反对三峡工程仓促上马的意见，始终不能在报刊充分表达，确令人无限遗憾，也使人感到奇怪：几十年来，三峡工程为什么这样害怕不同意见呢？为什么要造舆论一边倒呢？真理，是决不害怕驳难的。

问：你对投票的结果有什么看法？

答：提交大会的议案和邹家华副总理为此作的报告，都是正面的说明，发给代表看的论证材料，也基本是正面意见，加上会前的舆论导向，表决结果，仍有177票反对，664票弃权，另25人未按表决器，共近总数三分之一。我认为这是人代大会讨论国务院已予批准的重大提案，前所未有的现象；这就说明三峡工程问题太多，人们疑虑、担忧很重；何时开工，必须慎而又慎，有待一切条件成熟。三分之二的代表投赞成票，当然是从信任已批准的提案出发，但也应承认会前“一边倒”的舆论导向也起了作用，人们的习惯还是容易受报纸和电台影响的。

问：看来您对这次决策的程序表示满意。

答：我对表决的结果相当满意，并不意味着对决策的程序表示赞同。我看，像三峡工程这种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在所有要害问题彻底（我说彻底即对要害问题不能冒任何风险）弄清楚并做出可靠结论之前，是不宜做出上马决策的。李先念生前曾说：“一定要保证做到整个建设工程万无一失，……否则一旦出了大事，反利为害，将造成空前的灾难。”这种问题是否应提交人代会通过，许多代表对此提出疑问。四川代表提出：“三峡工程这样一个大问题，是否应采取人民代表按键表决方法？因这会给代表带来压力，

一旦出了问题，实际上就要人代会负责。”[①] 浙江七位代表联名说：“要代表们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对如此复杂、如此重大的工程问题，做出决断，难度很大。科学技术的东西是无法由外行人来表决的，也无法用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其正确与否。有时正确的意见往往是少数人的意见。三峡工程交人大讨论、审议是必要的，但是否交大会表决，建议大会主席团慎重研究。”另一位代表说：“兴建三峡工程一直存在反对意见，对此，议案说明中都没有提及具体情况。三峡工程事关重大，代表们不知情，心里没底，怎么投票表决？”还有一位浙江代表说：“在科学问题上不可简单地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人大审议是必要的，但让人大来通过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合适？今后多大的工程必须由各级人大批准，在立法上要明确。”四川一位代表说：“报告中说三峡工程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我认为还很不够。去年以来，在四川省级机关里未讨论过，连省人大常委会也没人来征求过意见，只在这次开会前才收到一些资料。全国人大视察团去视察时，走的地方不少，日程安排很紧。据反映，有的县汇报时只能讲20分钟，很多意见没有机会发表。在投资和移民上，国家的计算方法与地方的相差很大。真的上马了，缺口谁来补？这项工程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决策前，应允许不同意见发表，不能简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抉择，也不应搞宣传上的一边倒。”还有几位四川代表就表决方法建议：“实行三峡区域的、全国的、重庆市的代表分别投票，少数地区的人应当有适当的否决权。”“议案缓付表决，或进行试验性（分区的）民意测验。”除四川代表外还有天津等地代表建议“不付表决”。其他发言还有对专家论证的怀疑，建议公布论证专家名单。

问：您看过这次人代大会讨论三峡工程的《简报》，能不能谈谈对工程的具体问题，代表们都有些什么看法和意见？

---

① 引语均摘自大会《简报》。

答:我只看了不到20份《简报》,主要是四川代表团的,也有湖北、广东、山东、北京、天津、云南、内蒙古、浙江和台湾等省、区、市的,其中反面的意见居多,正面的意见少。因为正面意见大同小异,比较一般化,这些意见我比较熟悉,就没有找来看。

现在我先介绍湖北一位从事水利工作的代表的意见,这可以作为正面意见的代表:"根据长江洪水的重现规律,发生特大洪水的危险性正在迫近。从去年淮河、太湖发生的水灾中吸取的教训说明,不主动防灾,就要被动救灾;而后者的损失和投入,要比前者大得多! 不建三峡工程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晚建一年就要多冒一年风险,早建一年就早主动一年。"他的意见第二条为"能源紧缺日趋严重";第三条为"川江航运急待改善";第四条为"移民困难与日俱增","晚建一年不仅要增加5.4亿元移民经费(由于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增长),而且增加移民的难度,并影响库区的经济发展。"他认为投资是没有问题的:"从财政上分析,三峡工程静态投资570亿元,只占建设期间国民收入累计值的1.23‰,占国民生产累计值的0.73‰,这两个比值还不到宝钢一期工程建设时投资比值的一半。"

关于"三峡工程可以根本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这个游辞巧饰的说法,几十年来主其事者常含糊笼统地这么宣传,从上到下,大家也都跟着这么说。这次解放军代表团也有代表这么说:"长江历史上多洪灾。本世纪来就发生三次严重洪灾。仅湖北省在1931年和1935年两次洪水就淹地7000万亩,死亡27万人。1954年洪水,死亡3万余人。"这位代表还谈到沿江修堤,每年投入大量劳工和物资。"不修建三峡工程,这种无止境的投入,根本不可能改变。""只有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才是根除长江洪灾的千年大计。"

要知道,三峡工程只能控制川水(长江一半流域面积),根本不能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中下游湘、鄂、赣、皖田亩受淹,多因本地先涝后洪,与川水无关;四川发大水首先四川遭灾,中下游

不一定遭灾。不论有无三峡工程，中下游堤防还是必须加强加固的。这些问题，1958 年中央成都会议关于三峡工程的决定，早已明确指出。这些情况，看来四川代表是最清楚的。他们说："认为修了三峡工程就能解决长江中下游水患的观点是片面的。1981 年四川发生特大洪灾，长江中下游压力并不大。去年中下游发生洪涝灾害，并不是上游涨水。""三峡工程修建后，并不能解决荆江防洪问题。历史上几次大的水患都是中下游自身雨水无法排出造成的。"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究竟如何，还值得研究。他们还这样谈到长江防洪的根本问题："长江防洪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如何治理上游的水土流失……现在治理的成效还不大，对此要进行综合治理。报告中对此没有提出措施。""治标先治本。长江防洪应先治理上游，从上到下着手。"四川和云南的代表，都赞成先在上游的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大渡河、嘉陵江等干支流上，陆续兴建一批大中型水电站，以防洪、拦沙。否则，兴建三峡"有违自然规律，造成泥沙淤积、水位升高，使四川盆地成为泽国。"

关于泥沙淤积问题，不仅四川代表团严重提出，其他代表团如天津、内蒙古等都有代表担忧："泥沙淤积量问题是我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在全国许多水库已经基本淤死。由于库区淤积，流速减缓，淤积上延，会不会危及重庆？""一方面说目前洞庭湖淤积严重；另一方面又说，三峡工程建成后，泥沙淤积没有问题。两者比较，如何解释？"

关于静态投资 570 亿元、移民费用以及国力承受问题，提出疑问也是比较普遍的，认为"国力还不富裕，财力是否允许"？不少代表提到葛洲坝投资，最初预算为 14 亿多，决算为 48 亿。北京一位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说："说明中给的是按水电工程不变价格 1990 年水平的静态投资数字，没有提出 90 年代如开始修建后，动态投资将是多少。现在图表上说投资强度最大的一年是正式开工后的第 11 年，为 54 亿，平均每年投入 25 到 30 亿元。文件中说此平均数只是 1992 年全国基本建设总规模 5700 亿元的 5‰，这样

说不真实。全国基建投资的来源是多方面的，而三峡工程的来源只有政府投资和发行股票(包括借款)两种。政府能用于大型工程建设的投资不过几百亿元，可能会占几分之一，对其他电力建设工程必有不利影响。现在西南几省都在兴建大、中型水电站，以帮助这一地区的经济起步发展。我们决不愿看到如果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其他水电工程都遭停顿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切身体会。1979年我在电力部复职，仍主管水电建设时，每年费尽唇舌争来的有限投资，葛洲坝就占去1/3到1/2。关于移民经费，这是一个很难估算准确的问题，三峡这样骇人听闻的淹没损失(国外水库移民没有超过十万人的)，到底需要花多少钱，我敢说现在算不清楚。因为最大的水库移民，如新安江、三门峡、丹江口，都是30万人左右。新安江移民我最清楚，当年是敲锣打鼓将农民送走的，每人平均几百元，至今还有遗留问题。此事差不多各省都有经验教训可谈。四川代表说："二滩移民，人均3.6万多元，三峡地区富裕一些，却只有1.6万多元，实难有说服力。"二滩水电站装机370万千瓦，是目前全国最大水电站，正在施工。水库人烟稀少，是贫瘠地区，只有2万多人。我始终怀疑，为解决荆江大堤的安危，要由三峡库区一百几十万人、十几个县城、七八百个工厂等淹没的代价来取得，这在经济上、人情上是否合理？这些问题我就不多谈了。

问：听说这次重庆市代表反应强烈，能不能具体谈谈？

答：关于三峡水库对重庆影响的问题，譬如我自己过去主要注意过泥沙淤积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次从代表的发言中，才有更全面了解。四川代表说："重庆是长江上游的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对西南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要求，"大会在三峡工程的决议中写明：因重庆处于三峡工程库尾回水变动区，而存在一些特殊问题，对重庆问题另作专门研究，以保证重庆问题的妥善解决。"特殊情况之一就是，"世界上至今没有一个特大城市位于一座大型水库的边上。""重庆港位于水库回水变动区，三峡工程的建

设对重庆经济发展和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泥沙淤塞、水位上升、污染浓度加重、航运整治、给水排水等等，但究竟影响有多大，范围有多广，以前并未进行过系统的专题研究，国内外又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关于泥沙问题，代表发言有具体说明：当水库175米运行十年后，重庆港的淤积逐年加剧，枯水期将出现碍航；运行到40至80年时，有的码头会淤掉，拦门沙使船舶无法进入嘉陵江。而重庆工业80%分布在两江沿岸，现在各类码头699座，受影响的将达520座。由于洪水位的抬高，许多码头乃至莱园坝火车站，一遇较大洪水，都会受到淹没影响。总之，洪涝灾害将会增加。过去我没有接触过的是环境生态问题。重庆市废水量现为10亿吨，上游废水是20亿吨。水库形成后，“由于两江流速大大降低，水的横向扩散能力减弱，岸边水域污染物浓度升高，水环境容量(纳污能力)减少，据中科院武汉水生所、四川环科所、重庆环科所等单位用二维水质数学模型计算，在排污量不增加的条件下，仅考虑建库前后水力学条件的改变，城区江段排污口下游1000米距岸边10—20米处，预用水控制点的污染浓度升高约34.5—146%；长寿江段污染物浓度升高约117—147%。饮用水质量下降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健康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此外还有给排水系统亦将产生严重影响：“两岸现在取水点170余个，日供水约370万吨，较大的城市污水口2125个，企业自有排污口110余个，高程约在175米以下；水流减缓，加上泥沙淤积，大多数处于被淹堵之中。淹堵时间长了，下水管易发生爆炸。部分自来水厂的深水泵房和净水设施将迁建。”

问：看来三峡工程确实还有不少重大问题要深入研究，彻底查清其利害所在。除开上面谈的外，不知这次会议还有没有其他新的意见？

答：山东代表团有一位代表(侯国本)可能是水利专家或教授，他谈到恢复长江本来功能和三峡水库寿命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根本问题：“长江是一条完整的、系统的、自调的蓄泄功能

完整的河流。它有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巢湖水系、太湖水系及长江干流长达3000公里的河谷蓄量等,总容量为2400亿立方米。这些湖泊水系与长江干流水系互相调节、蓄备、畅泄,发挥着长江完整的调、蓄、泄功能。但是几十年来,长江两岸修建了很多码头、港口,侵占了深水航道,这些码头都应去掉实体建筑物,代以透空建筑物,使整体河流畅通无阻,湖泊应联通起来,相互调蓄;围垦的,必须退田还湖,发挥长江自动调、蓄、泄的作用。同时还要固堤守河,分流泄洪,江湖自调。这样,三峡水库以防洪为主要的目标便是多余的了。'蓄清排浑'(按:这是论证报告解决泥沙的办法)是种想像,不能实现,三峡水库必然是短命的。水沙共运动是伪运动,即水流以高流速强制泥沙运动,一旦流速减少,泥沙自沉降,共运动即消失,所以多泥沙河道必然淤积。长江每年有6.7亿吨泥沙,(防洪)库容200亿立方米,约40至50年必然淤死。在水库内的水是平静的,不可能强制泥沙随水运动。即使水排沙起作用,也只限泄水闸附近。600公里长的三峡水库,淤死是必然的。"他举出三门峡水库原来设计的"蓄清排沙"失败了。水库淤积了,水库末端就会翘尾巴。三峡淤死了,长300公里,就会自万县翘到重庆。因此,水库以上的河道渐成悬河、游荡性河,自然河道要重新调整它的动力要素至少要100至200年(受三门峡水库的影响,渭河河床已经抬高)。水库下游开始是高流速,强制泥沙自河床跳起来随水共运动,一旦流速变了,泥沙沉降,下游河道游荡,无平稳的日子。专家们认为:"蓄清排浑,先受害的是水库,后受害的是河道,遭殃的是子孙后代。三峡工程应慎重对待。"据我所知,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关于泥沙淤积问题,专家中就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设法"蓄清排浑",减轻淤积,寿命很长;一种认为难解决,水库寿命长不了。山东这位专家可能没有被邀请参加论证。总之,泥沙淤积是需要继续进一步论证的。

问:你的文章中谈到黄万里教授,他的看法似乎还不仅是泥沙问题,你能否介绍一下他的具体观点?

答：黄万里教授30年代在四川涪江和岷江作过实地考察，研究过长江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动和河床因之变化的情况。他认为，全部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夹粗沙，是会运移的。对卵石粗沙移动规律，大家都不重视：三峡泥沙专题组论证，“造床卵石移动量为零”；他则“估计卵石年移量不少于一亿公吨”。他说：“所有二级支流出口都产生卵石淤积的急滩，洪水时可被全部冲走，退水时又重新淤积成滩。暴洪下可以观察到全床卵石急速下移。总之，造床卵石是河床演变的主体，其量可观，不可忽视。”因此，他认为“三峡决不可修高坝”。“三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壅水末端将达重庆以上。江流直下到这里时，水深增加，流速减慢，所挟带的沙石将沉落河底。其中细泥可能漂游出坝，细沙(自重庆)向前走远些，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全部卵石则是沉落在粗沙后而，夹杂些底沙在石缝里，这是简单明了不可避免的现象，毋需试验证实。”他也认为“蓄清排浑”不可能实现。这样，汛期将使卵石沉积逐渐向上游漫延，“直到其淤积平衡坡降和天然河道的坡降相交而止”。“河槽淤高了，沿途重新起造床运动，也就是洪水泛滥，淤高两岸平坝。这现象先出现于江津、合川，然后漫延到泸州、遂宁、南充、渠县，影响所及，四川四分之一流域的坝田城市沦为泽国。”他还说，“实际上，水库蓄水后只要来一次十年一遇的洪水，重庆上下就会淤起卵石，群众就会恐慌；不会像今天某些专家报告中的乐观姿态，万年无恙，一字不提卵石淤塞的问题。”黄万里教授最近参加北京市政府会议时，正式提出反对三峡修高坝的提案；他还为此写了篇“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解释”的文章[①]。他的提案标题为《三峡高坝祸国殃民，请决策停修，附文请安排争辩》。他的文章也已寄给了有关部门。我认为，黄教授没有机会参加过去的论证，现在是应当重视他的意见的时候了。他愿意公开争辩，这有什么不好呢？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民主的要害就在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哪怕

① 上面引号中语即摘自此文。

是一个人的意见。这样的沉痛教训,过去难道还少吗?黄教授在“提案”中说:由于不愿意听反对意见而误大事,“回忆以前1957年双百方针刚宣布时,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还曾几十人集会争辩十天。当时反对修建者惟我一人。众皆反对,于是我退而建议保留所有导流底孔洞勿堵住,以便他日排沙,获得全体同意。后来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计划(堵死)。如今每孔底洞以1000万元工费重新打开。今天议论长江三峡高坝,又是惟我一个根本反对修建。”

问:三峡工程论证共组织了412位专家参加,是不是有意回避了持反对意见的人?

答:这个问题应当由主持论证的原水电部负责人来回答。据我所知,这412人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由原水电部领导指定的,即符合他们意图的人。水电系统许多老专家由于持不同意见,就没有被邀请,其中包括50年代参加过长江和三峡规划的专家,如胡慎思、张进谦、安申义、杨渭文、朱藻文、徐洽时、邹恩远、王伊复等。还有水利系统和地质等方面的一些专家、教授,如李驾三、张书农、王宗源、金永堂、朱鹏程、邓明聪等,他们多是公开写过文章或曾向中央上书持有不同意见的。例如金永堂博士为水科院高级工程师,水利专家,发表过一篇《三峡工程不应建也没有必要建》的文章;中科院李驾三老水利专家,曾在50年代向中央建议,在荆江北岸恢复一部分古云梦泽,分洪蓄洪,以减轻荆江大堤所受威胁。其他还有哪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被排除,我不知道。当然,黄万里教授是反对最激烈的一个,他亲自同我谈过,主持论证者的先生是他本家同族,“夫妇俩可以到我家中来看望我,就是从来不让我参加论证。”

问:你前面讲的决策程序有这些问题,对论证程序您怎么看?因为“三峡工程论证”现在被称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范例”;主持论证工作的人尤其着重宣传的是,参与论证的412位专家,以403:9的结果,通过了论证报告。

答：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和多数专业组的负责人，都是原水电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都是极力主张尽快上马的，这是他们主持论证的指导思想，各种不同意见尤其反对方面的意见，不能在论证过程中得到充分反映（自然也不能充分向上反映），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以“民主、科学”作外衣的“自我论证”。我今年元旦的上书中，曾引用了万里同志 1986 年在全国软科学会议上讲的一段话：“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研究部门，当作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比没有论证更坏。”了解了这一背景，你就会明白，论证结果并不能真正反映三峡工程问题的本质和要害。否则，就不会出现我前面谈到的表决结果，近三分之一的人不投赞成票，而且各地代表提出了那么多严重问题。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来解决问题，首先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其次要欢迎反对意见，反对意见越多，这样问题才暴露得越充分，才有利于论证工作的深入，使问题获得正确解决。如果仍由原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来主持论证，或另组能保证全面、客观、充分论证的领导班子，相信情况会好得多。为解决长江的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问题，总应当有几个不同方案来比较论证吧。皇帝选妃，总不能就让一个美女作对象吧，总得有若干个美女让选择吧。现在的论证是“孤证”，只是就三峡大坝的高程，即 150、160、170、175、180 米等等，证来证去而已。造成几十年来三峡“孤证”的原因，根本在有关部门的防洪指导思想（及有关的防洪标准）不对头（总想用水库来装洪水，而不重视其他有效措施），以及急于上马的“左”的思想有关。这些，我过去的上书、文章以及最近的上书讲过多次，这里不再赘言。

问：你还没有谈到 403:9 的这个结果的含义。

答：前面已经谈到参加论证的 2/3 以上专家，是指定的天然赞成者，这个绝对多数是预先保证了的。所谓 403:9 是这么一回事：论证中共有防洪、电力、航运、地质、泥沙、规划、施工、投资、经济等

14个专题组，每组成员分别对本专题的论证结果签字，并非对整个三峡工程方案赞成与否签字(同人代会表决不同)。有的人声明对本专题有保留意见，但也签了字；有的人发言有不同意见，但也签了字；有的人本身是原水电部一个业务方面的负责人，意见很大，也只能签字。这种签字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举一例子：对防洪组的结论，刘善建(国家计委国土局总工程师)签了字，但他写了三条意见，第二条："建议对现状条件下再发生1870年洪水时(按：这是论证的主要根据，要解决这个千年一遇洪水对荆江河段的威胁)，对有无三峡水库的水情、灾情进一步落实，并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对三峡防洪的具体任务作进一步论证。"第三条："建议对上游干支流水库的防洪作用与效果作更全面的分析，争取做到基本可以与三峡水库对比的深度。"这个第三条意见，即是我说的不同比较方案、选妃的问题。

问：您能不能将持反对意见而不签字的九位专家的意见，扼要作点介绍？

答：我简单介绍一下三位专家的意见，不幸的是其中两位已经去世了，即侯学煜和方宗岱。

侯学煜是中科院学部委员，有名的生态权威，他是生态与环境专题组的顾问。对这组的论证报告他没有签字，附有《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影响看法》一文，在1990年7月论证汇报会上，他还有一个发言：《论证三峡工程要考虑的基本观念和一些具体问题》。

他认为淹没区19个县的42万亩土地，都是富饶的平坝地(平坝地只占19县的4%，其他均山地和丘陵)，城镇移到山地陡坡，既缺耕地又难建住房和工厂。624个工厂迁移重建，困难重重，土石方开挖必促进本地区已存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及水土流失的发生。(历史上发生)库两岸滑坡、崩塌共214处(近年新滩滑坡200万立方土石坠人江中，占江面100米宽)。建坝蓄水，因浸泡软化及浮力作用，将使滑坡稳定性减弱，更易引发滑坡崩塌，将威

胁大坝，对航运不利。库区蓄水后，还有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库区历史最大震级达6.5级）；构造条件至今仍在活动，卫星影像上显示清楚。所谓开发性移民，在两岸发展农业和工业，狭窄的库区将产生一系列恶果：工业引起严重污染；农业引起严重水土冲刷（现在两岸植被仅有百分之五），造成越开越穷、越穷越开的恶性循环。两岸高坡因气温关系、土质条件，能否大量种植柑桔，尚难预计。库区四大家鱼（青、草、鲢、鳙）繁殖将受到抑制。侯老还说："三峡是世界著名三大峡谷之一，具有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吸引着世人向往。我曾到过非洲和美国的其他两大峡谷，都不可以与三峡媲美。'平湖'的风景怎能与山峦重叠、险滩急湾、峭壁白浪、山水相映、充满神奇色彩的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宝库相比；三峡地质剖面完整，是地质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如果自然风景和文化古迹被淹没，给我国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将难以估计。"文中还提到涪陵的"石鱼"，乃世界一绝的水下石刻、水文碑林，虽可复制，但却失去了历史水文记录的意义。此外，侯老还谈到以下问题：因上游水土流失泥沙淤积，严重影响水库的寿命问题；抬高河床，影响上游航运，乃至重庆可能成为死港的问题；特别是水库形成后，"把下游的洪水灾害移到上游"。其次，"三峡工程可拦截川江洪水，当然对荆江泛区防洪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荆江洼地的洪涝灾害的防治作用是有限度的。"长江中下游防洪，还得靠堤防和恢复原来的天然蓄洪湖泊等措施。第三，对长江入海河口有影响：河口来沙减少，缺乏造地物质来源，且使径流削弱，必导致径潮顶托，使海水冲刷力增强，沿海沿江建筑都将受威胁；河口淡水来势削弱，必然导致盐水上溯，太湖一带有可能盐碱化；黄浦江污水排泄也可能受影响；此外，崇明岛与南通间长江北支，因受潮汐影响，有发生淤塞危险，等等。侯老的遗言是："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深远的、严重的，但目前研究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得到比较可靠的科学论证。""从生态环境角度看，三峡工程是否要上马，应加以慎重考虑。"

方宗岱为水科院原泥沙所副所长，有名的泥沙专家，是我的老同学，1936年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后，即留校专门研究黄河泥沙。他研究了一辈子河流泥沙问题，过去同我接触多。他参加防洪专题组，对该组的论证报告没有签字，附有一封致领导组长的信，论证汇报会上还有个发言，题为《三峡兴建后重庆最高洪水位将超过202米以上》。他认为我国自古以来，“治水不治沙，终将失败”。从泥沙角度考虑，三峡在规划上的最重要问题，是重庆附近的淤积问题，因它影响重庆洪灾加重，使重庆港区恶化。这同三门峡影响西安属于同类问题。（故周总理提出，必须上确保西安、下确保下游安全。）他从三门峡库尾已经发生过的三种泥沙淤积：溯源淤积.（60年代初期潼关淤高4.5米引起）；偶然性的干扰淤积（60年代，黄河两个连续大沙年，均超过28亿吨，倒灌入渭；70年代北洛河高含沙大洪水将渭河口淤死，后人工挖开）；河道淤积。他认为长江三峡库尾亦将发生这三类淤积，必然性的增沙和偶然性的干扰淤积。他还认为三峡库尾两岸如发生滑坡，会形成“库中坝”而威胁重庆。根据从50年代到80年代多沙年份的资料分析、计算结果，他认定此时重庆最高洪水位为202米以上，将超过1981年最高洪水位9米多；超过历史上最高洪水位5米多。因此，他赞成先在上游干支流建水电站的方案，以代替三峡方案。“三峡库尾问题比三门峡严重，三门峡尚可扩大泄流以减轻其危害性，而三峡则无出路。为免蹈三门峡失策的覆辙，只能在金沙江、嘉陵江修拦沙水库，俟（上游各干支流）水库拦沙和处理泥沙有效时，才考虑上三峡工程。”方宗岱的遗言是：“我们很多人参加过三门峡工程，当时有谁想到库尾出癌症？大家一定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否则无法向历史交待。”

覃修典，老水电专家，现任水科院咨询，没有在电力系统专题组的报告结论上签字。他不同意结论中的第一点，即“从发电效益看，三峡工程应该上，应该早上”。他认为“三峡工程不能与火电比，而应与其他水电替代方案比，这样三峡是不利的。三峡没有上

游工程(水库)调节,三峡本身库容相对很小,调蓄能力很低,高方案的移民、泥沙都难以解决。现在所论证的175米方案,汛期放在145米,水头低,由于泥沙多,汛期要大量弃水冲沙,以便使上下游水沙峰相适应。只有枯水期才有短期的175米高水位,但枯水流量不够,因而保证出力低。这和葛洲坝的情况相似(准径流电站)。这种不稳定电力要大范围长距离输送,质量上是难以保证的。因此,当地要增加大量火电站配合,而不是代替火电站(见华东、华中电网同志的意见)。因此,不宜早上、大上。"

问:这些反对方面意见确实值得决策者重视。看来,这次只将三峡工程列入十年规划,且认为还有重大问题应继续研究,是一种慎重的决策。你从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对此事持不同意见,很愿意听听你都是怎样表达和上书的,尤其80年代的论证过程,一般都不甚了解。

答:我已经谈得很多了。上面谈的这些情况和问题,希望通过你们的媒介,让关心此事的人进一步关心,使得三峡上马的时间,一定要待条件成熟,有关问题彻底查清,有了可靠结论之后,才再作最后决定。我个人仍认为应先开发上游干支流,这样有利于四川防洪与航运,可以早得廉价电力西电东送,也更有利于三峡工程的修建。我个人有关此事的经历,谈不谈都可以。关于1958年初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讨论三峡工程的情况,多年来真相不明,我会写出来,公之于众的,这都属于历史资料了。

问:您一再提出,三峡工程21世纪再说,看来您对改变三峡工程上马的时间颇有信心,为此您将如何努力?

答:我已退居二线,人家又并不看重你的意见,心想何必老为此事所干扰,近日尤疲于应付。不过,此事的确关系国家安危、子孙后代,不少人又常来询问,还接到关于此事的来信来件,使我确又放不下来。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对于自己认定了的道理就要坚持,就要鼓吹,决不改变初衷。正如屈大夫所说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现在我接受你们的来访,又讲了这么

多,目的在努力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决策部门,更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继续弄清楚一些要害问题。

我提出三峡工程到21世纪再定,是寄希望于那时更民主,更开放,更讲科学,国家经济实力更强,对三峡问题会更理性地处理。我再说一次:近期抓紧时间先开发上游干支流,加强上游水土保持工作,既可解决四川的洪灾,又可减轻对荆江大堤的威胁。将来修建三峡工程时,可能不必采取高坝方案,不再担负巨大防洪任务,现在遇到的投资、移民、泥沙和四川防洪四大难题,自然迎刃而解。最后,我希望有关部门端正防洪指导思想,纠正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

在中国水电学会"四大"上的讲话

参加这个隆重的会，见到许多老同事、老朋友，多年不见了，非常高兴。刚才听了汪恕诚、杨析综、马麟三位同志的讲话，他们讲到电力要优先，大力发展水电；四川尤其要优先发展水电，马副省长还从经济上详细分析了水电过去为什么不能优先发展的种种原因。这都使我心情愉快一些。

回首当年，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中央确定了电力工业"水主火辅"的方针。八大二次会议上，刘澜波部长还谈到"二五"计划后，力争水电比重达到50%。可是好景不长，这个方针昙花一现。1959年庐山事件，我个人被称为"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的"三反分子"不要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整个水电也成为"三反分子"，水电发展从此受到严重影响；"文革"期间勘测设计院与中专学校等多被拆散、停办，总局也被取消，水电元气大伤。过去我们常说"水电在夹缝中奋斗（火电易上，水利难配合且乱点鸳鸯）"，这还不是水电不能在中国优先发展的主要原因。80年代初，总书记和总理都言之凿凿，要优先发展水电，但是就是优先不成。其根本问题还在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水电在整个经济尤其在电力中的种种优势，发挥不出来。

1980年能源研究会成立时，我谈到优先发展水电，煤炭部部长首先赞成，因为火电发展对煤炭部的压力太大了。宋泽敏同志长期研究这个问题，这次会议印发的论文中，他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加快水电开发的论证》一文曾寄给我看过。其中引证《世界



中国水电学会“四大”会上，李锐在主席台就座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图为李锐（右）与杨析综同志在交谈。

能源统计年鉴》1984 年资料，当时世界 175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161 个是市场经济，14 个是计划经济。在 161 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水电比重仍在 90%以上的国家有 17 个，曾经达到过 90%的有 15 个，共计 32 个。水电比重仍占 50%的有 50 个，曾经达到过 50%的 62 个，总计 112 个，为 161 个市场经济国家中的 70%。这些国家优先开发水电半个世纪左右，已开发的水力资源都在 40%以上，高者 90%。

煤、油资源丰富并且出口的国家，仍然优先发展水电，如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西德、英国等。我去过澳大利亚，参观过雪山梯级；澳出口煤 1 亿吨，水电比重 59%。哥伦比亚是新开发水电的国家，也出口煤，水电比重 73%。

宋的文章中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水电的利润比火电高”，因为资本家是惟利是图的。“他们是决不会为了防洪、灌溉等社会利益而去开发水电；他们也不可能为了人民健康着想，减轻环



1980年在电力工业部召开的有关水电的一次会议上，刘澜波部长(中)在发言，左为副部长、水电老专家李鹗鼎，右为李锐，时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境污染去开发水电；他们更不可能为子孙后代着想，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先利用可再生资源)而去开发水电；他们只不过是在市场机制的诱导下，不自觉地执行了'合理利用国家资源'这样一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策。"

这段话真说到点子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必须在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上显现出来，才能谈到其他。我国水力资源世界第一，开发条件最是优越。现在开发的还不到10%，真说不过去。蒋介石统治22年，终被我们推翻。我国电力紧张的局面，几十年没有解除，水电开发优先不了，比推翻蒋介石难得多！

大家知道我长期不赞成三峡急于上马，是个顽固分子，因为长江上游投资少、移民少、见效快、优于三峡的大水电站多得很。三峡存在投资过大，移民太多(也太困难)，防洪作用有限，航运是难



80年代初，总书记和总理都言之凿凿，要优先发展水电，但就是优先不成。李锐认为，其根本问题还在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致使水电在整个经济尤其在电力中的种种优势，发挥不出来。图为1980年李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会议，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委，这是李锐第一次身着军装的照片。

关，泥沙问题未解决，还有生态（两岸滑坡）等等问题。三峡与水电开发关系，使我想起白居易《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贵妃死于马嵬坡。前八句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前面四句似可改为：中央看重防洪策，三峡多年上马说，某家有女最坚持，人大投票惊全国。后四句不必动了。三峡开工之后，如我所料（1979年我复职之后，有过葛洲坝的经验），许多亟待开工的水电项目如龙滩等等，只得靠边站了，在建工程也将因投资紧张拖延工期。“回眸一笑百媚生”，我非常担心“媚”字变成“病”字，还担心出现马嵬坡真唱起“长恨歌”来。三峡论证不签字的九位专家之一陆钦侃，最近又两次上书中央，谈三峡的泥沙问题，并未解决，连当事人也说不清楚。这就是“某家女”突然对溪落渡大感兴趣的原因，过去她从来不关心上游金沙江的。

许多好水电项目上不去了，“六宫粉黛无颜色”；作为对联的下联，可以这样相对：“三峡工程有问题”呵！

今年春节学会团聚时，我曾口占一绝，表达对水电多年来未能优先的感叹：

老去无穷遗恨篇，至今水电未优先。
鸣呼大禹今何在，酸雨烟灰满地天。

1995年10月16日

谈 1998 年长江洪水问题

关于今年长江的洪水问题，报刊已发表了一些成灾原因的论述，多指出上游水土严重流失，中游蓄洪湖泊锐减等，乃关键所在；也有专家、院士认为，早修三峡就好了。9 月 4 日的《南方周末》整版刊登记者专访：《陆钦侃眼中的长江防洪》，导读标题为："天灾因素与人祸影响"；"18 年前《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所提出的诸项任务，迄今尚未完成。"陆是水利水电与防洪规划的老专家，40 年代到美国参加过萨凡奇的三峡计划研究，从 50 年代起，一直参加三峡工程的规划论证。我认为陆的这个长篇谈话，真正涉及到长江防洪问题的要害，即水利部门如认真执行了自己的原定计划，今年的水灾并非不可避免。

今年长江洪水形势，上中下游都同 1954 年相似，但洪水总的来量比 1954 年少，宜昌、汉口、大通的最大流量、最高水位和超过警戒水位的天数，都不及 1954 年。有些河段及沙市、监利、城陵矶、九江、湖口等城市的水位，则高于 1954 年。

有史以来，长江是一条具有很好的自调蓄泄功能的河流，洪灾并不很严重。宋以前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泄调蓄洪水，演变到本世纪，仅存南岸四口。国民党统治时期，听任湖泊长期淤积，盲目开垦湖田，湖泊调蓄作用大减，导致水灾严重。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似乎认识到这个教训，但由于实行"蓄洪垦殖"的水利方针以及"以粮为纲"的战略，"要超纲，开湖荒"，导致围湖造田日趋严重。长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1954 年通江湖泊共计 15329 平方公

里，到1980年仅存6605平方公里。如湖北的洪湖、西凉湖、东西湖等通江湖泊的湖口全被堵塞了；洞庭湖、鄱阳湖都新增围垸，减少蓄洪容量近半。长江两岸新建很多码头港口，直至河床乱建、扩大居地，长期不加强控制管理。长江流域上游本是关内森林覆盖最高地区，自"大跃进"大炼钢铁乱砍林木以来，森林植被一直遭受破坏，导致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40～50%，泥沙下泄，河床壅高，湖泊淤积。

1954年洪水之后，为解决长江防洪问题，水利部门一直催促三峡工程上马，认为这是最有效的一劳永逸之法。这时我在电力部主管水电建设，很不同意这种意见，曾展开一场关于三峡的争论。1956年3月我向中央写的有关报告中，这样谈到长江防洪与三峡的关系："防洪本身也必须是综合规划，即干流水库、支流水库、湖泊洼地蓄洪，以及堤防工程，四者不能偏废；应根据条件，见效快慢，逐步提高防洪标准。"

1958年1月，中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曾否决了三峡工程尽快上马的意见。3月间，周总理率领各有关部门领导和大批专家查勘三峡，讨论三峡和长江防洪问题，听取各方意见。随后召开的中央成都会议上，由周总理主持起草，通过了一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我曾列席这次会议并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起草。《意见》第四项是有关长江防洪问题："长江较大洪水一般五年可能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记得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加上去的。成都会议通过的三十几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议和文件，如过眼烟云，早被世人忘却，唯独关于三峡的这个决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以后，60、70年代的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不论水利部门怎样催促三峡上马，直到去世之前，毛主席和周总理从来没有过首肯之辞。

22年之后的1980年，发生过一次洪水。水利部根据国务院要求，召开长江中下游五省一市防洪座谈会，经讨论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报告》中说："从实际出发，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任务是，遇1954年同样严重的洪水，确保重点堤防安全，努力减少淹没损失。"从而定了5项措施："(1)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提高，以扩大洪水泄量。沙市由44.67米提高到45米，湖口由21.68米提高到22.5米，南京定为10.58米，上海定为5.1米。其他堤防，各省自定标准。(2)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要求荆江分洪区、洞庭湖区、洪湖区、武汉附近区、湖口附近区，共分洪500亿立方米。(3)停止围垦湖泊。(4)整治河道，扩大泄洪能力。(5)加强防汛。按照以上措施，在十年内安排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34项，需投资48亿元。"

我是1979年平反复职的，当年就卷入三峡上马的争论。1982年3月，我从电力部退下来时，见到财政部的一个文件，尖锐批评水利部门乱用投资及一个水库工程问题严重等情况。于是我向中央写了一份《对水利工作的意见》万言书。同年7月，国务院召开的水利讨论会上，此件作为会议头号文件印发了。我的意见书中谈到，水利部门的防洪指导思想，多年来存在以下问题：

(1)江河防洪标准要求过高，要在短期内解决力不胜任的防洪任务，而不是根据具体情况作经济比较，逐步提高。另一方面，却因围湖围滩和河道洪障不加控制，以及泥沙淤积等原因，使一些重要河道排洪能力有所下降(如淮河目前已低于1956年)。

(2)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据调查，近年全国水土流失更趋严重，黄河、长江泥沙都在增加。在水土保持工作中，也是重工程措施而轻生态保护。"水土流失关系民族命运"，这恐非危言耸听。

(3)重水库蓄洪，轻湖泊洼地分洪、滞洪。一方面热衷于修防洪水库，不惜淹没损失，劳民伤财；另一方面，原有分滞洪水的湖泊

洼地，长期以来注意不够，措施不落实，洪水来临，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且有的围垦日增，如淮河的城西湖蓄洪区、海河的文安洼、东淀等都已成田，长江中游的湘鄂两省尤其严重（洞庭湖已较解放前缩小 40%）。不适当的依靠水库防洪的思想，以及水库的防洪如何同综合利用更好地结合，仍然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4）重蓄轻排，重水库轻堤防与河道整治。1954、1956、1958、1963、1975、1980、1981 年各年大水，几条大江大河还是主要靠堤防防洪。堤防与分洪，是中外古今行之有效的最主要的防洪办法（至今美国也是这样），相信 21 世纪以后也必将如此。令人担心的是，现有堤防的质量问题还不少，遇到较大洪水要临时抢险；河滩造林和阻水建筑物影响行洪，比较普遍，长期得不到解决。

（5）重防洪，轻除涝。我国水灾最严重的 100 万平方公里平原地区，内涝十分严重，对农业威胁很大。即使提高了防洪标准，堤防未决，仍然会有严重涝灾。1954 年长江洪水，受灾面积中，渍水内涝及先涝后洪约占 80%。1980 年亦与此相似。此种情况，即使建成三峡水库，也是不能解决的。海河、淮河等平原地区，除涝标准都还很低。

我的意见书的末尾，有几点具体建议，如水利工作应回顾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莫护短，这样才能实事求是，走上正道。主要是彻底清理 30 年来“左”的思想，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要切实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对此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扎扎实实抓下去。防洪方针应切实际，着重发挥和加强现有防洪工程和措施的作用，以堤防为主，充分利用原有的蓄洪、分洪、滞洪工程。

80 年代，水利部领导方面最关心之事仍在三峡上马，上述《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所定措施，并未抓紧一一落实。因此，1990 年 7 月，姚依林副总理在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结束时，特别讲到：“长江自 1954 年以来已有 30 多年没有发生全流域的大水。天有不测风云，要居安思危，早筹良策。当前要继续抓紧 1980 年平原防洪方案（指前述《报告》中的部署）的各项工程和

非工程措施的建设。”深为遗憾的是，1980年所提“十年防洪部署”一再拖延，已经18年了，未能落实。以堤防而论，当时安排的荆江大堤、武汉市堤、无为大堤、同马大堤，以及其他堤防的加固加高、护岸培修、洪道整治等工程，至今尚未完成。1995年汛期，长江干堤曾发生险情2562处；1996年汛期，继续暴露堤身未达标及堤质诸多隐患。今年大水，又发生渗漏、管涌、塌坡、涵闸等几千处险情，甚至决口成灾。加强堤防并非大难之事，这只能说，主其事者志不在此。于是洪水来临时，只得动员群众，调遣部队，千万人紧急抢险。这就是七、八两月电视中，天天出现的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场面。我们就事论事（不谈这些场面所包含的种种伟大意义），这种抢险既劳民又伤财，且达不到质量要求，汛后还要返工重修，真是既不合理，又不经济。我国的堤防主要问题是老化失修，应当认真进行加固和必要加高。我们可以修建高达百米的坚固土坝，一二十米高的堤防会有什么困难呢？三峡开工后，每年成百亿投资，前述《十年防洪部署》的48亿元投资，是不是国家拿不出来，还是不去使用呢？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常发生大洪水，干流上没有修一个水库，而是靠堤防作为防洪的根本措施，遇大洪水时，没有听说过要动员多少人上堤抢险之事。

几十年来，水利部门的防洪主导思想是严重脱离实际的，一直重水库，轻堤防；重建设，轻管理；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重大江干流，轻支流小河；重下游轻上游。三峡水库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控制四川来水，减轻荆江大堤所受威胁，对武汉不起什么作用；如1954年型洪水所受淹没损失，只能减轻5%左右。1954年6、7、8三个月上中游来水总量中，宜昌以上来水只占45%。1954年溃口分洪成灾时水量1023亿立方米，中下游原防洪部署加固加高堤防后，其中一半可由河道下泄，另一半还得靠分蓄洪区解决。三峡水库形成后，按175米水位，能控制的洪水量也不过100～200亿立方米（这个数目相当于中下游堤防加高一米后，河道下泄的流量）。何况175米方案遗留问题极多，主要

是泥沙淤积对重庆的影响，因此许多专家建议水位控制在160米。

近年长江中下游水灾频繁。1995年受灾农田6916万亩，受灾人口7489万人，死亡1302人，直接经济损失592亿元。1996年(6、7月份统计)受灾农田7305万亩，受灾人口70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700亿元。这两年洪水都比1954年小，但灾情却比1954年重。今年灾情当然更重。因此，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关于长江的防洪问题，几十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社会名流提过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不赞成水利部门那种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的想法和做法，可惜都未引起重视，连姚依林副总理的话也白说了。经过今年这场大水，水利部门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了，应当改弦易辙、回船转舵了。

1998年9月8日

中央组织部工作剪影



李锐在中组部工作时，认为干部工作中的当务之急，仍然是要尽快起用一代新人，把经过实际锻炼的、政治素质好的中青年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抓紧第三梯队的选拔和培养工作。图为 1983－1984 年期间，中组部领导同志一行十余人到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参观，从左到右依次为郑伯克、白志明、陈野苹、李锐等同志。

请读《胡杨泪》

李荒同志来信

前些日子，收到李荒同志的一封信：

向你推荐一篇报告文学，再提一个小小建议。

《文汇月刊》1984年第四期刊载孟晓云写的《胡杨泪》，如你还未看过，建议抽时间看一遍。从文中可以看出："左"的思想如何埋没和摧残人才，我们现行的人事制度的某些方面又如何压制人才。

建议你设法将《胡杨泪》这篇文章让全党县以上干部，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干部，都认真看看，并仔细想想自己的工作。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人事制度改革，可能还会促进组织工作的新发展。

李荒同志是个有心人，为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他前年就主动退居二线。他同我们许多老同志一样，确实是人退心未退。

《胡杨泪》其人其事

《胡杨泪》写是的中年知识分子钱宗仁20年间的坎坷经历。我读后忍不住索性向《人民日报》推荐。下面且将文章主人公的简历予以摘录。

钱宗仁是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州大队人。全国解放那一年,他只是个五岁的儿童。土地改革中,他家为了一点什么纠纷得罪了农会主席,成分就从贫农变为"佃富农"。从此,钱宗仁就叫做"地富子女",一切好事他都没份,一切灾难他都有份了。

他勤奋好学,1963 年考大学,成绩是全省前十名,就是没有被录取。第二年再考,虽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了,可是公社书记宣布:富农的儿子上大学,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写材料说明"该生政治表现不好",应取消入学资格。学校不愿失去这个高材生,派人去当地调查,原来材料全系凭空编造。这时,这位书记留下如此警句:"要是我们公社一级党的领导机关还搞不过一个地富子女,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就这样,钱宗仁虽然到哈工大念了三个月书,最后仍旧只得回到家乡来。第三年想再考,请求几回,公社没有让报名。

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之下,这个一心想求学上进的青年,只好背井离乡,成了新疆阿克苏县实验林场一名没有户口的工人。辛苦的劳动,微薄的收入,都不能遏止他求知的渴望。星期天,他跑 30 里路到县城阅览室去读书;也学习写作,在《新疆文学》上发表过一些短篇;还能写意境、格律俱佳的诗词。正是他填的一首"江城子"抒发了热爱边疆的感情("扎得根深,此地是家乡。望我成材如树木,宜红柳,宜白杨。"),无意中被专区"四清"工作队的一位同志看见了,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建议他回原籍甄别家庭成分。他筹措不出路费,只好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寄到家乡。这可不得了:为家庭成分翻案! 长丰公社几次发函阿克苏林场,要求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十年动乱中,一系列的罪名,我们的主人公更是遭受批斗、吊打、酷刑、反省、坐牢、进"学习班"……可是,这都无碍于这个人的勤奋好学:坐牢时默诵古文和诗词,推演数学公式;在"学习班"研究语法修辞。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他从土牢中逃跑,在新疆其他地方过流浪生活。在没有条件进行任何研究的时候,他就凭一本字典探索汉字构字的规律,到 1975 年底,终于编成了一种"汉字笔顺号码排

字法",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和有发展前途的。可是这一成果在商务印书馆里积压了两年之后,更先进更适用的汉字编码方法已经出现不只一种了。

终于到1978年,大学和研究生又恢复招考。由于年龄关系,钱宗仁决心自学大学课程,报考研究生。他的命运只能找到什么书就学什么。他在近处找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高等数学》上册,于是就学数学。从1978年到1981年,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他在繁忙劳动和沉重家务的间隙中,自修完毕八门大学课程,以几乎全是满分的成绩取得了新疆广播师范大学的毕业证书。1981年9月,他报考西北大学数学系刘书琴教授的研究生,在26名考生中成绩第一。可是不能录取:大了两岁,这一年他已经37岁了! 74岁高龄的老教授看中了这个考生,可是教师无权录取他的研究生,老教授只好一次、两次地资助钱宗仁旅费上北京,帮助他向有力者奔走呼号,终于也没有结果。然而热心肠的人毕竟很多。在林场的时候,一些青年支持他研究汉字编码;在流浪中,老同学不顾风险介绍他做木工;在苦闷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漆匠跟他谈哲学;为了当上研究生东奔西走时,还有数学家张广厚,报社记者,教育部的接待人员……都希望能给他一些帮助。这里特别应该提到阿克苏地委宣传部长宣惠良,他觉得合理安排钱宗仁的工作,使人尽其才,是自己的责任。可是,一个地委的宣传部长只有那么大的权力,为了把钱宗仁由工人转成干部,为了找一个愿意接受他去教书的学校,为了让林场同意放走他……这位宣传部长几乎花了20个月的时间,才把钱宗仁调到塔里木农垦大学任教,结束了他20年的坎坷生涯。

为什么题名《胡杨泪》呢? 胡杨,在新疆大沙漠的边缘偶尔还可以见到。这树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体内有储存水分的特别本领,要是划破树皮,就会有水分渗出,好似伤心流泪一样。作者这样介绍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握住他那粗糙的手,看到他黝黑多皱的脸,绝不会认为他只有39岁,也绝不会



胡杨，在新疆大沙漠的边缘偶尔还可以见到。此树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体内有储存水分的特别本领，要是划破树皮，就会有水分渗出，好似伤心流泪一样。图为《胡杨泪》的主人公钱宗仁在胡杨树下的照片，看他那粗糙的手，黝黑多皱的脸，绝不会认为他只有 39 岁，也绝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想到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不是同胡杨树有着某种近似之处呢？

读后感想

可以乐观地说，钱宗仁的厄运已经终结了，他今天有可能为祖国和人民施展自己的才华了。但是，还有没有赵宗仁、孙宗仁……？还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厄运没有结束？

那种随意定人“成分”，随意把人列为专政对象，随意剥夺他人公民权利的现象，相信今后可不再出现。但是，要消除埋没人才、摧残人才、压制人才的现象，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全面地、彻底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确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还要走一段相当的路程。

面临城市经济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新的技术革命挑战的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应加上一句“人才就是资源”。人才的开发和充分运用，将决定我们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的速度和程度。小平同志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可惜，这个平凡的真理，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懂得。我们这个国家人才本来就不多，再容不得半点积压和浪费，更不用说压制和摧残了。当今迫切之事，就是上上下下应该切实树立一种观念，培养一种感情，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要惜才，要求才若渴，爱才如命。中华民族从来有这个传统。“萧何月下追韩信”，刘邦逐鹿中原，不能没有韩信这样的帅才，萧何深知此情此理。“刘玄德三顾茅庐”，没有诸葛亮，刘备即不能同吴、魏争雄，鼎足三分。太史公说：“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我国古代就把“野无遗贤”当作治世的一个标志。封建政权，中央六部，以吏部为首呵。

我们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是识才、聚才、生才、用才的部门，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员都应当具有求才若渴、知人善任的品质。我很赞成李荒同志说的，请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一读《胡杨

泪》，加倍珍惜人才；请再普遍检查一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检查一下，你那里有没有《胡杨泪》之类的事，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没有？尤其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种种“左”的遗留问题。

李荒同志的信中还提到“我们现行人事制度的某些方面又如何压制人才”。这是确实存在的。对于那些不合理的、不适应今天经济发展形势的人事制度，必须坚决予以改革。对此，中央作了有关决定，首先是下放管理权限。我们的组织、人事工作必须更好地为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必须更紧密地围绕经济工作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是个大题目，我这里只想提个小意见。领导机关制定各种政策时，是不能完全顾及个性因素和各种特例的，而且常常是规定一些确定的界限，诸如年龄、文化等。但在执行中，就必然要遇到是否允许有一定的弹性的问题。这就是如《胡杨泪》中反映的，指导教师无权录取自己中意的研究生，工人转干部的困难，尤其是调动的艰难，等等，大概都受既有规定的限制，而办不成功。当然，过去与现在，也并非全无弹性，弊病在往往只对有特殊关系者适用，而对如钱宗仁者，则是铁面无情，我们应该颠倒过来：不要再给那些光凭特殊关系者以破格照顾，而对于类似钱宗仁者，却须圆情度理，适当通融。关键就在执行者事事出以公心，还要有满腔热情。这方面，大家应当向阿克苏地委的宣惠良同志学习。

读后感想，只是就李荒同志信中提到的两点说了这么几句，其他应当从《胡杨泪》中得到的教训和启示，是很多很多的，希望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大家来讨论。

1984 年 9 月 4 日

尽快起用一代新人[①]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而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②] 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用人之道，《陈云文选》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书中所收各篇虽然都写于战争和夺取政权时期，但其中许多原则性的意见，对于今天新的历史时期的干部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

为什么说用人之道是非常重要的呢？陈云同志指出：为了保证在工作中"坚持执行党的路线，就必须在组织上保证有最好的干部去领导。"[③] 党的十二大已经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为了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党的组织工作必须特别讲求新时期的用人之道，"组织工作要适合于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④] 现在一场新技术革命正在全世界兴起，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既是一个促进，又是一个挑战。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尤须跟上、赶上世界这一潮流。为此，我们的组织工作就尤须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新的发展。首先是

---

① 原载 1984 年 3 月 23 日《人民日报》，原有副题"读《陈云文选》中有关干部工作论述的体会"。

② 《陈云文选》(1926—1949)第 44 页，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一版。

③ 同上书，第 33 页。

④ 同上书，第 153 页。

我们的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班子，在知识化和专业化两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要求。

《陈云文选》中论述干部工作的文章，大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写的。那时候，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战争，以及围绕这一中心任务的根据地建设（和国民党区的斗争）。干部队伍的主力是土地革命时参加工作的工农干部，加上大批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和各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间革命经历长的一般也只有十年左右。整个队伍年轻奋发，朝气蓬勃。如果说，当年存在“没有大批的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停顿不前”[①] 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的任务和工作比过去不知要艰巨和复杂多少倍，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如果说，当年存在“不敢或不让新的知识分子做更负责的工作，反对知识分子、不放心知识分子”[②] 的问题，那么，今天处于信息社会和知识迅速更新的时代，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和解决它的迫切性就更非当年所可以比拟的了。

近两年来，通过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和放手起用知识分子的工作，已有较大的进展，取得可喜的成果。不过总的来说，领导班子的成员，尤其是一、二把手，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问题还普遍存在。这与我们的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很不相适应的。因此，干部工作中的当务之急，仍然是要尽快起用一代新人，把经过实际锻炼的，政治素质好，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能够开创新局面的中青年干部，及时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同时抓紧第三梯队的选拔和培养工作。如果不坚决经常这样做，领导班子年龄老化和知识贫乏等现象还会继续下去，我们的事业就无法顺利前进，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就不能实现。

这里，我想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尽快起用一代新人，今天主要着眼点应该放在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身上。这有以下两个主要

---

① 见《陈云文选》。

② 同上书，第147页。

理由:第一,从年龄结构来说,他们是全国干部队伍中的主力。全国2000多万干部和1000万不同程度的专业技术干部中,26岁到45岁的都占2/3。其中35岁到45岁(1939至1949年出生)的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约200万人。这200万人中:"老五届"(1966至1970届的大学毕业生)也即所谓"红卫兵大学"近70万人,加上在这个年龄层的自学成才者,估计近100万人;60年代初(六三、六四、六五年三届)的大学毕业生和这个年龄层的自学成才者,以及工农兵大学生中的"老高中"生(六三、六四、六五年考入高中的)也有100万人。这个年龄层的留学生和研究生约1万多人。这200来万人应当是我们所指"一代新人"中的主体。第二,这个主体从政治素质到专业知识都是比较好的,也可以说是德才兼备的。

现在,我着重谈谈第二个理由,分析一下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他们是50年代的红领巾,60年代初期的共青团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兴盛时期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经历过"大跃进"的热潮和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投入过"学雷锋"的运动,也受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影响。总的说来,他们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正是我们党威望最高、社会风气最好、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在各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与我们党、我们国家一起经受了灾难和考验,对"左"的流毒和大打派仗极为厌恶。他们中虽有极少数成了"三种人"或犯了其他严重错误,但也有些人很快觉醒过来、奋发起来;还有些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行为有所怀疑,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而多数人则由盲从而渐趋"逍遥",进而由"逍遥"进入对现状的冷静思考,通过正反两面的经验,更加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同党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近年来的开创新局面,更加使他们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紧密连在一起,政治上逐渐成熟。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经历了如此从正面、反面到新的正面的全部当代历史的辩证教育,应该说,这一代人的基本特点是认真思考、勤于学习和奋发向上的。就文化知识来说,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至少都基本完成了严格、正规的中等教育，大部分人还经过严格的高考上了大学或读完大学，他们接受文化教育的时期也正是建国后教学质量最高的时期。他们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出类拔萃者，许多蒋筑英、罗健夫式的人物涌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由于长达十年的动乱，这些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主动或被动地学习并掌握了社会科学知识，也有相当一些人刻苦地继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现实的逼迫锻炼了他们的自学能力。“文化大革命”给他们造成的不正常的经历，倒使他们具有了较多的求实精神，较少受框框套套的束缚，也得到了一些增强实际本领的机会。“老五届”“四个面向”(基层、厂矿、边疆、农村)的分配，使他们大都来到边远地区的小单位、小厂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他们常常不得不独当一面，亲自解决生产及管理上的繁杂问题，从而脱离了过去一些老知识分子“单纯技术型”的模式，而走上了“管理技术型”的发展道路。精力旺盛，思想开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处在事业上出成绩的年代，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有这样一个统计数字：从 1500 年到 1960 年，这五个世纪内，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 1249 人，共有 1928 项世界性的重大发明，他们取得最高成就时的平均年龄是 37 岁。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取得成果时的年龄，多数也在 40 岁左右。这个年龄确是人的一生中记忆力、理解力、探索力的综合指数最高的阶段。他们一只脚踏进了中年，另一只脚还留在青年，年轻人的锐气和热情没有消失，又略具中年人的审慎和经验。总之，这是我们国家当前承先启后的一代人，是要在中国历史的下一章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代人。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常被人认为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中间也已开始涌现拔尖的人才，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他们一般在政治素质和文化基础方面，需要有一段补课的过程，他们也都在努力这样做。华山抢险的英雄集体，正是这一代人的光辉代表。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现在 40 岁左右的人，就必然要担负承先启后这一特殊的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决地、尽快地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选拔

到各级领导班子中，让他们早挑重担，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以加快我们事业前进的步伐。

值得高兴的是，去年省、地两级机构改革中，新进领导班子的干部，45 岁以下的分别为 1/10 和 1/3(县级领导班子调整后，平均年龄已降到四十二三岁)。他们进入领导班子后，工作是胜任的，选择这一层人到各级各行业领导班子还未引起普遍重视，还没有形成一种风气。例如全国闻名的鞍钢，40 岁以下的大学和中专技术干部就有 1 万多。可是在 280 名厂、处级正职干部中，具有大学文化、年龄在 40 岁至 45 岁的只有 7 人，40 岁以下的只有 4 人。又如首钢，近年的经济效益是第一流的，也很重视选拔使用技术干部，可是在 417 名厂、处级干部中，年龄在 40 岁以下具有大学文化的只有 14 人。

可以预料，要尽快起用现年 40 岁左右的人，必将遇到种种阻力。最常见的一种议论是“太嫩”，资历浅，没有领导经验，压不住台，等等。要回答这种议论，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历史。陈云同志当年要老干部放手提拔新干部、大胆使用青年知识分子时，许多老干部也不过是 30 岁左右，他们的主要经历是十年内战，那时陈云同志本人也只有三十几岁。假如我们承认前面对现年 40 岁左右这一代经历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话，那么，有哪一点理由能说明他们的还太嫩、太年轻呢？领导全党夺取了全国政权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 77 人，当选时的平均年龄不过 43 岁。11 年以后，八届中委当选时 40 岁左右的还占一半以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可证明，40 岁左右的人是可以挑得起重担子的。至于说到资历和经验，他们当然比不上 50 多岁、60 多岁的。可是，问题就在这些同志的年龄大了 10 岁、20 岁。岁月不饶人，他们的精力毕竟不如 40 岁左右的了，他们即将退休或者只能作为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必须是 40 岁左右(和 30 岁左右)的人。试想一下，倘若此刻我们仍囿于论资排辈思想而坐失时机，不抓紧起用以 40 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代新人，随着 50 岁以上

的一代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时将出现怎样的局面呢？

论资排辈的思想，不但完全不适合今天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就是在战争年代也是有害的。陈云同志指出："要了解：德、才、资三个条件，不能专讲资格，需要重视才干。"[①] "有些人说，新干部没有老干部老练，经验不如老干部。很明显，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老干部都是从新干部锻炼出来的。有经验的干部开始也都是没有经验的。新干部经过锻炼，就会从没有经验变成有经验，由不老练变成老练。至于说到资格，那末，资格不老的干部不一定都做不好工作。"[②] 《续资治通鉴》记载了金世宗的一段话："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耄老，此不思之甚也。"可见，古代的有识之士也是不赞成论资排辈的。

前一段机构改革、调整班子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地方要起用某一个中青年干部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不少非难的意见，说这人有这样那样的短处和缺点。对于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须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和认识。陈云同志说："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包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③] "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④] 这里面包含着极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说，任何一个有才干的，特别是能够开创新局面的干部，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不把一个干部放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那么长处无从发挥，短处也无从克服。陈云同志讲干部政策，十分重视"气量大"这一条，今天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

---

① 见《陈云文选》。

② 同上书，第 113 页。

③ 《陈云文选》第 46 页。

④ 同上书，第 148 页。

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①] 三国时的孙权讲过一番很有道理的话：“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②] 唐太宗也说过：“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用人总是求全责备，那是办不成事业的。80年代的革命者，应当比一两千年前的古人更高明才对。

还有一条常见的指摘，就是认为这些中青年干部不那么“听话”，而不听自己的话就是离经叛道。对此，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分析。毫无疑问，年轻同志应该虚心听取老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说：“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而决不可让下级“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服从”[③] “假使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④] 人才只有在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中才能产生和成长，一潭死水，鸦雀无声，必然压抑、窒息人才。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我们还要重复吗？我们年纪大一些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事事都比年轻人高明；千万不要同鲁迅小说《风波》中写的九斤老太一样，一天到晚慨叹“一代不如一代”；不要看年轻人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应该看人家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我们比人家大了几岁，参加革命早了几年，经验当然也是多一些。但我们比他们多的主要是战争和革命的经验，土地改革以及各项政治运动的经验（其中教训也不少），至于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知识和经验，与其说比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更多一些，还不如说更少一些。有位老科学家坦率地承认，由于知识的迅速更新，他对于科学发展的领悟还赶不上自己的学生。

---

① 同上书，第48页。

② 《三国志》卷47。

③ 见《陈云文选》。

④ 同上书，第54页。

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本来是人才成长的规律。可是，有些老同志总摆脱不了老眼光，太喜欢摆老资格，老是以己之长量人之短。陈云同志说：“老干部不应该忌妒新干部的有才有识，也不应该向人家摆架子，而应该向他们学习。”[①]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这么一段话：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千辛万苦，千难万难，我说现在千条万条，支持年轻干部上台是第一条。

当然，今天强调尽快起用40岁左右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决不是不重视或不选拔50多岁的人，也不是轻视老同志的作用。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新干部的成长和提高，除了要靠自身的努力，还离不开老同志的关心、爱护、赞助和支持，没有这一条，能干的领导者是难以出现、难以站住的。现在，老同志多已认识到选拔年轻能干人才的紧迫性，积极选贤荐能，甘作“人梯”。尽快选拔并放手使用一代新人，正是历史赋予老同志的光荣使命，是他们革命一生中最后一个使命。我们应该大力发扬这种精神，使新老干部合作得更紧密，交替得更顺利，以利于一代新人的迅速成长。

《陈云文选》中关于干部工作的论述非常丰富，我们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必须细细研读。这里，我只就一个问题谈了以上一些粗浅的体会，算是一则读书笔记。

① 同上书，第116页。

深入研究一些有关党史的问题[①]

今年3月和4月,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在北京和武汉分两片召开了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业务研讨会。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根据各地相继进入精编阶段的实际情况,让大家再有一次相互交流工作经验的机会,共同研究和解决一些编纂中的业务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增强善始善终完成这项巨大系统工程的信心。

最后我想谈一个这样的问题。几年来,山西共有1000多人参加了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全国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数估计总在2万人左右,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经过几年的紧张工作、学习和锻炼,许多同志掌握了"广征、核准、精编、严审"的一套方法,从收集、辨别、研究资料中,具备了研究历史和党史问题的一定基础。因此,我提出这样一个希望:我们这支队伍中能够有少部分同志,哪怕是1/10也好,今后能够进一步做一些有关研究工作,不仅在组织史范围之内,也可以扩大到党史领域中,深入研究一些问题。临时想到,譬如以下这些问题:

(一)关于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不做组织史资料工作,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不会体会得现在这样深刻。中国近现代史

① 本文为李锐1990年6月7日在山西省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上主要有两大政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国民党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时算起，历史比共产党早十几年。但是，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小团体，其中成员主要是在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目标下团结起来的，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当年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方面，还不远如梁启超和严复的影响大。孙中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没有群众基础，只是一种军事投机；多次失败之后，同盟会内部即呈分裂、涣散状态。由于8000新军参加，武昌起义得以成功。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理论、组织、武装和政权这些革命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同盟会的革命胜利果实，终于落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旧势力手中。孙中山后来孤处广东一隅，还被陈炯明赶走。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使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首先使革命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接受新的革命理论了。可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并不关心五四运动，领导五四运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后来国民党真正能在全国范围内起作用，不仅是由于孙中山执行了新的三大政策，而且还由于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在没有组织的地方新建立了组织。这一切都是靠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才能做到的。这一段历史，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不知道，老同志也不都清楚。过去，我只对南方国民党的情况知道一些，如大革命前两湖地区的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帮助建立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左派为数有限。

这里具体讲一下湖南的情况：1922年8月，中共中央确定国共合作，先以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促进这种改组。1923年中共三大前，湖南由夏曦、刘少奇具体负责国民党的筹建工作，在教育界(学生和教员)和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后来规定党员、团员一律加入国民党。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党中央主持这一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夏曦代表湖南国民党向大会作党务报告。随即在湖南成立了国民党最早的省临时执委



1986年，一批超龄的中央委员退出，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与这些老同志的合影。第三排右七为李锐。

会，负责人九人中，除邱维震、罗宗翰二人为国民党左派外，其他夏曦、何叔衡、李维汉、郭亮、李六如等七人，都是共产党员，这时260多名国民党员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夏曦为主任委员，郭亮负责农工运动，在农民中也发展国民党员，各县的国民党组织无不由共产党员筹建。王凌波、熊瑾玎等都是先加入了国民党后加入共产党的，熊瑾玎一人经手发展了七八十个国民党员。到1925年9月，经过几次群众运动，湖南已有17个县市建立了国民党组织，党员达2750人，并召开过秘密的国民党全省代表大会，选举的执监委员13人中，十人为共产党员，常委三人，夏曦、李维汉和李荣植都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书记长是王凌波（1938年他担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

其实，北方的国民党也都是由共产党帮助建立的。杨小池主编告诉我，据彭真回忆，山西的国民党组织就是共产党帮助建立的。当时共产党有关门主义倾向，500多名国民党党员中，有许多是具备了共产党员条件的，但没有发展他们。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当年孙中山是开明的。他知道要领导中国革命，国民党已经不行了，同意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给国民党注入了一种新的血液。1924年国民党"一大"正式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如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毛泽东、邓颖超都参加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我们党的帮助和参加领导（还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出现大革命高潮，也不可能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这就是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要在国民党中"清党"的道理。

我们党的诞生，有俄国十月革命的帮助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需要。党的"一大"代表中，何叔衡、董必武是晚清的秀才；陈独秀、李大钊等是有名的教授；毛泽东、王烬美、邓恩铭等（以及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赵世炎、恽代英、邓中夏等），是刚离开学校的革命青年领袖，他们对中国国情有深刻认识。因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们很快接受了马列主义理

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人。近代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吞并的危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维新派戊戌变法等都解决不了民族危亡问题,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产生,才真正出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没有真正独立、自由和统一的希望。历史说明,蒋介石国民党曾将中国带到一条绝路;抗日战争胜利后,还决意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继续其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我们不知历史的来龙去脉,不把党的历史和组织发展情况弄清楚,就不会真正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道理,一遇什么气候变化,就会迷惑甚至动摇起来。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党的发展过程,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东欧党,也不同于苏联党,它是自己独立奋斗、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经过无数艰难困苦,在长达28年浴血斗争中,付出了2000万人牺牲的代价,才取得革命胜利的。虽然党曾经犯过几次重大路线错误,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固然有自己的责任,但也同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有关。党经历的最大失败,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次是1934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白区绝大部分被破坏,苏区损失90%,红军被迫长征,作战略转移。斯大林对我们党总是不信任,认为中国党不过在农村打游击,分土地,怎么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呢?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还曾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作战,以夺取全国胜利。大家知道,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农民阶级是具有双重性的阶级,有革命性一面,但基本上是保守的,不是革命的动力。可是,中国这个东方农民大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或变质了,但其规模、影响很大,都很有特色。古田会议的召开,红军避免了走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旧路,从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革命胜利。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又是一个封建文化高度

发达的国家，有着丰富的珍贵的历史遗产，出现过许多杰出的英雄人物。总之，从古代、近代到现代，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产生在这种土壤中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就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一种天不怕、地不怕，一切强大的内外反动派都不在话下的精神。特别应当指出，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党能够克服共产国际、斯大林错误领导带来的困难，反对老子党、儿子党的这种关系，后来还同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作过斗争。这方面的斗争，可以说是最困难的斗争，这也是毛泽东的特殊伟大之处，中国党不同于东欧党之处。

我们做组织史资料工作，对党的组织发展和党的历史应该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自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为什么内乱也好、外患也好，我们党都垮不了？

大家知道，历史上我们党是扎根在群众之中的，是扎根在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党一开始成立，第一代知识分子党员就脱下长衫到工厂、矿山、铁路去，同工人交朋友，发展工人党员，领导工人运动。党在全国执政前，从大革命失败到夺取全国胜利，共有22年主要活动于农村。在武装斗争中，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带领农民翻身求解放。中国农民同党有最密切的血肉联系。党的干部尤其是军队中的干部，主要来自农民和小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这一点。简单说，由于近现代中国的内乱外祸的历史，使得广大知识分子愿意跟共产党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特别是五四运动时，在北京、天津、长沙、武汉、上海、南京、四川等地，都成立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如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天津的觉悟社、武汉的利群书社、长沙的新民学会等，其中的代表人物多是共产党最早的领导骨干。如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首的新民学会，成立于1918年4月，后来发展到74人，其中有31人为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和领导骨干；除有二人后来成为反动分子外，其他都

在教育界服务。如张国基长期在南洋教书，新中国成立后即回国工作；李振翩教授也从美国回来过。事情还不仅止于此，即旧社会中曾经长期思想落后的知识分子，也有转变过来的。如杨度这样的人，清末举人，参加过黄兴领导的革命活动，后来又是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在大革命后，竟成为共产党员，在上海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还有一个比较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就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共产党的关系。如山西的阎锡山，不管此人后来怎样反共，抗战前后，他敢于启用一些共产党员，当时他至少懂得要抗日，要求得自己在山西的生存，他必须利用共产党。这就为党抗战初期在山西开展活动创造了条件。四川刘湘也曾有类似情况。冯玉祥的情况大家都熟悉。张学良今年90岁，西安事变前就同党有联系（不要忘记李大钊等是被张作霖杀害的）。湖南的程潜、陈明仁都曾积极反共，1949年终于起义。张治中曾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对两次国共分裂有自己的看法，向蒋介石进过言，最后出任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团长，结果留在北京，归附于共产党。这类例子很多。

由此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不仅与工人阶级有天然关系，与农民群众血肉相依，同知识分子更有深厚历史渊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许多有代表性的人士，都同党有过久远关系，有的还给党的地下活动以具体帮助，抗战时期的上海，便是如此，至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进步人士和抗战前的七君子，以及广大民主人士和八个民主党派，就更不必说了。如前面谈到的程潜、陈明仁等许多敌对阵营的人士，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也都认识到中国的希望不在蒋介石，而在共产党。我们研究组织史资料，能够发现许多这样的事例。这有助于我们更坚信一点：任何内乱、外祸都不能搞垮我们党。原因之一就在于党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中，甚至连敌对阶级中的人也信服这一条：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领导中国。“文革”十年乱到那种程度，但粉碎“四人帮”后，能够很快拨乱反正，能够从理论到实践，如实总结长达20

年的“左”的错误教训，哪怕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他是党的领袖，新中国的创建人，具有崇高威望。这说明我们党不管犯了多大错误，自己是能够纠正的。这也是党能够取信于民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是可以长篇大论的，我只讲这么几句。

（三）关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问题

前面说到，我们党有一个最好的传统，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建立同群众的血肉关系。山西也存在这种现象，即最近一些年来，在我们党内特别是少数党员干部中间，逐渐滋长了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的坏作风，甚至个别的腐化堕落。这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严重脱离群众。这确是我们党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必须严肃、努力、坚持不懈加以解决。但是也应该看到，大多数党员是扎根在群众中，为群众办好事的。最近，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加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文件，就要求坚持和发扬党的最根本的传统。回顾党的组织史，我们更应深刻体会这个问题。

现在，加强党的建设，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有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干部下基层工作锻炼。这也是党的老传统。在看待干部下基层问题上，有一个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有过一句名言：知识分子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就将一事无成。从革命来说，历史确实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组织发展，武装斗争，直到全国胜利，都是深入工农群众，尤其是同农民打成一片的结果。大革命失败后，如果以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那就只有在城市中搞工人运动，搞城市暴动，而没有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幕戏可唱了。今天新的形势下，提倡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更具有新的内容。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仍然是一个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事情是办不好的；另一方面，情况在起变化，尤其农村中新事物层出不穷，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如何领导脱贫致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等，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社会，在工作中就容易脱离

国情,脱离实际,会出现偏差失误。这两个方面,知识分子干部下基层,即文化、科学下乡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就有崭新的含义。

(四)关于正确判断敌我友的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过去我们党历史上反复多次的一个大教训,就是常发生敌情判断失误。错误的肃反、反右政策,曾使党几次大伤元气。最早是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杀"AB团";然后是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钦差大臣,在各个苏区肃反,杀"社会民主党"、杀"改组派"等等。先杀士兵,然后就杀干部。贺龙说过,湘鄂西苏区红军的领导干部,最后杀得只剩下他和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几个人。最近我看了《四髯合传》,即湖南有名的四位革命同乡(宁乡人)老友: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和王凌波。30年代初,谢觉哉在洪湖苏区,曾被夏曦内定为肃反对象,后因战争中被俘而幸免。到延安后,谢老怀旧诗中有这样一首写到这个问题,他的心情何等沉痛: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本自知。
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我失骄杨君失柳","柳"就是柳直荀烈士,也是在洪湖为夏曦所杀。谢与夏同为新民学会会员,他们三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为湖南党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肃反乱杀,同样是非常严重的。还有陕北的肃反杀了200多名干部,幸亏中央到达,才及时制止。抗战初期,康生照搬苏联做法,在党内大搞所谓肃托,华北各地不知错杀了多少共产党员。后来又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幸亏有毛泽东的九条方针,才没有再开杀戒,但王实味还是被杀掉了。建国后,"镇反"和"三反、五反"中的冤假错案,情犹可说。随后的"潘汉年事件"、"胡风事件",到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遍地敌情,如山冤案,直到国家主席、三军元

帅、第一书记，都难幸免。敌情观念如此登峰造极，除开新的国际环境、内部情况等复杂原因和错误认识外，确有其“左”的历史渊源，是很值得研究的。

分清敌我友，掌握真正的敌情，这仍然是今后的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三资的引入和合作，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经济所有制的存在，国际敌对势力的存在，特别是将来香港、澳门回归，直到台湾的统一，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战争年代，敌我阵线分明的情况下，尚且有时分不清敌我；全国执政后，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敌情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方面今后还会不会发生麻烦，确实令人担心。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很好总结。“富田事变”曾一直被认为是反革命铁案；延安的抢救运动没有认真总结过；康生其人直到死后才能予以清算。这都是历史的教训。

(五)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这里再强调一下。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同哪个国家都有所不同，他们应该同工人、农民一样看待，对他们本不应该有丝毫歧视。党的六大前后，曾一度不恰当地强调领导的工人成分(如向忠发当总书记)，对知识分子开始有所歧视，尤其是张国焘最厉害。党对待知识分子本有过正确的政策，1939 年中央曾通过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但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发生偏差，直到“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搞成“臭老九”。

一般说，中国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由于理性的觉悟。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李六如等老一辈知识分子，多是晚清秀才，他们是从孙中山到马克思的。应该说，对事物的认识，理性比感性更牢靠。从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同工、农参加革命的情况，开始是不同的。从历史考察，对革命队伍本身来说，作为一个阶层，中国知识分子确是值得信赖的，不应该把他们区别于工农，另眼相看。这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敌人的监牢和刑场上，知识分子的坚贞同工农出身的英烈并无区别。许多知

识分子受过多年委屈，平反后对党并无二心。如有名的胡风，不过对延安文艺座谈会有某些不同意见，他有自己熟悉的朋友"小圈子"，但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坐了20多年牢，出来后还是拥护党的。对知识分子在某些思想认识上尤其学术问题上，不能强求一致。人人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应当鼓励大家对事物独立思考。这就是说，在文艺、学术、思想等方面，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内党外都应如此。在这方面不能再搞一言堂，少数人说了算，或以某人说了为准绳、为绝对权威。总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此话说来容易，实现起来真是难而又难呵！

过去有一句口号：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知识分子化。在执行过程中，长期有过偏差，有不如人意的一面。在改革开放环境中，在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大家知道，工人、农民没有相应的文化知识，不掌握一定科学技术，会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的。这方面，知识分子应当尽力帮助他们。同时，我们应当要求知识分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将自己的知识无条件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在思想感情上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同工农交朋友，学习他们的长处，尤其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样，大家共同前进，不分彼此，把国家建设好。总之，我们在研究党的组织发展史时，应该从无数的事实中认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可以信赖的。现在我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大概有四五万人，应当相信，他们中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同国家离心离德的只是极少数。过去许多迫于生计居住在国外的华侨和华裔，他们的心总是向往着祖国的。

（六）关于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问题

干部四化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在中央组织部三年，主要干了这项工作。其实在60年代初，刘少奇就提出干部年轻化问题了。当时中组部抽调了几百名大学毕业的优秀党员到基层锻炼，准备逐步解决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问题。可惜这一措施，刚刚开始，就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干部四化是历史的必然，正像解放前夕，北方老区大批干部随军南下一样，是历史的必然。山西 20 万干部就有 10 万南下，分布在云、贵、川、闽、湘等省。当时，这批南下干部在接管、建党、建政，尤其土地改革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们几十年来为各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南下干部小知识分子居多，年纪也比较大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确实有一个进一步提高和工作适应的问题。这时提出干部四化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四化标准中首先是革命化的问题，这是党的老传统。但对革命化的内容也要有历史的认识。革命化即政治素质问题。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主要是分清敌我，对敌斗争坚决。今天党的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革命化总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没有变化，但内容不同，是以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善于两手抓了。今后，干部四化还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下去。

(七)关于国家形势稳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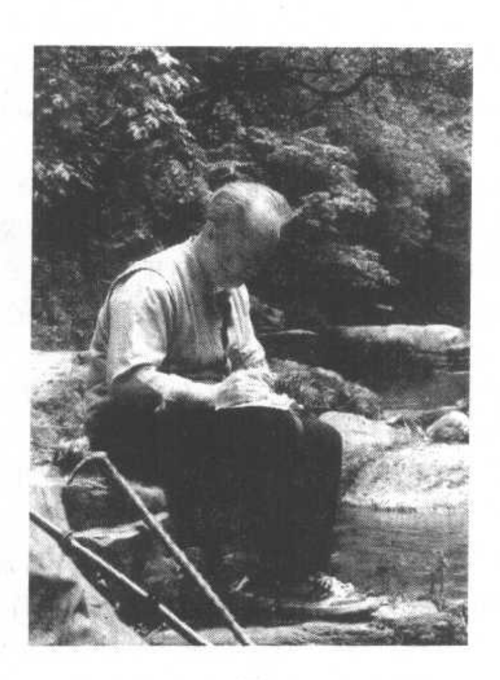
中央领导同志说，稳定最根本关键在于党，要把党建设好。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在新时期，党的总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年来，我们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也有失误和偏差，党的建设有时有所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党员教育抓得不紧和不切实际，还搞形式的一套。

美国布热津斯基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失败》，是在东欧剧变前写的，提出 20 世纪社会主义失败了。其实，就讲东欧形势，尽管发生了逆转，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情况今后究竟长期变化如何，恐怕还很难说死。搞了 40 多年社会主义，一夜之间就能变成资本主义？恐怕不那么容易。相信这些国家中的健康力量、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也不会沉默下去的。西德和东德合并，就会影响欧洲甚至世界格局。如果日本和德国结成技术经济联盟，美国和西欧能不害怕吗？两个超级大国已不能左右世界局面，今后世界局势越来越复杂。只要核大战打不起来，在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中，经

济与技术的竞争自会越来越剧烈。我们不迎头赶上去，同发达国家差距就会更拉大，这是最值得忧虑的问题。今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也决不会停止，将是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因此，在世界日益变化的复杂形势面前，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就要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权真正掌握在能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变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更高要求，要有各种真实的本领，能够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环境。马克思主义也必然要随着新的形势新的实践发展，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旧的观点和结论。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方面，我们这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国策指引下，就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了新的发展。除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外，领导干部还要有文化，有科学知识，有管理能力，有的还要有专业技术知识。而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真正大公无私，以身作则，能够同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打交道，战胜各种邪恶的东西。

总而言之，从党的组织沿革的历史资料中，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一些问题，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使党的组织能够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健全，更加坚强，具备更大的本领。无论什么样的大气候、小气候，都能岿然不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胜利。

研究毛泽东



90年代初，李锐在野外写作。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①]

本书的任务是从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来叙述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时间的跨度是从17岁以前在韶山的岁月开始，直到1923年春前往上海党中央工作为止，也即是30岁以前特别是20岁到30岁这关键的十年时间。因此，这本书也可名为《30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个人在30岁以前可说是青年时期，即从人的整个一生来说，一般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可是青年毛泽东是比较早熟的，这同时代和环境有关，更同他本人的好学储能和刻苦锻炼有关。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是从他不同凡响的青年时期开始的。现在我们就此再作一个简要的回顾：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的伟大成功和晚年错误也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即17岁以前，是在他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农村中度过的。他家祖辈务农，父亲是一个识字不多、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的富农，只希望长子稍识文墨继承家业。因此，毛泽东自幼的身份是小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小学生。作田与读书，他更好读书，前后六年私塾，四书、《左传》等能背诵如流。虽说这些经书枯燥难懂，其实自幼熟读就近似电脑的软件储存，成年后自便于应用；何况经过六年师范，老师指点和自己钻研，对之作了进一步的消化。这些孔夫子的书，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

---

① 此文为《早年毛泽东》一书的"结束语"。



1994年2月23日，李锐与夫人参观毛泽东的故居韶山。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这儿度过的。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少年毛泽东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为。早在50年代，李锐就撰写了国内第一本研究早年毛泽东的专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名震遐迩，之后又撰述《早年毛泽东》《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等多部专著，并多次再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用”(这从五卷《毛选》中可以证实)。经书难懂，他最爱读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英雄。同时《纲鉴易知录》这类简明历史读本，则逐渐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历史嗜好。读书认真，“小长工”的劳动也是认真的，犁、耙、栽、割样样都在行，而且跟人争胜，抢干重活，13岁就在田地里当一个整劳力使唤。这样，自幼养成山区农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就靠双手。母亲的慈祥和乐于助人，更影响儿子同情贫弱，兼爱众生。同农民

的这种天然关系，促使他一生了解农民，尊重农民，不失农民本色。好读书不仅培养了记忆力，也提高了领悟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幼善于思考。养成一种自解疑难的习惯。如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怎么没有农民当主人公呢？纳闷了两年才想通：原来文官武将不必作田，是农民养活了统治他们的统治者。《盛世危言》这本书使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于是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以至30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本书的大要。辛亥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这个事件也使他难于忘怀，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站在受苦受难人民的一边。

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胜利。看来，从劳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生活中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经过亲友的帮助（他们看重这个可造之才），他终于离家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这可说是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个转折：1910年秋，17岁时，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山村，来到当年的一个新式学堂。在这个学堂虽然只读了半年，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由此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尤其喜读《新民丛报》，深受梁《新民说》的影响："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这种必先"变化民质"的思想，同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是一脉相通的。他还师法急切锐利、常带感情的梁氏新文体，写得一手好文章，获得老师"气宇非凡"的赞赏。但这个学堂仍不能满足求知渴望，他急于想到省会长沙这个新天地去。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不满18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同不能忘记广东一样，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方。

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出在广东，林则徐、洪秀全也同广东有关。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和陈天华都出在湖南，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致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学学风，影响至大。湖南还出了个曾国藩，“保卫名教，收拾洪杨”，传教与事功集于一身，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他也师承王船山，并刊刻传播《船山遗书》。不论其人如何满手鲜血，如何“忠诚的虚伪”，列在他名下的“湘学”，标榜“禹墨为本，周孔为用”，“贵诚蔑浮”，崇尚艰辛勤俭，影响也极大。两种政治方向截然相反的“湘学”传统，错综复杂结为一体。当年不仅一般青年学子，即志士仁人也方向不辨、主次不分。从梁启超、杨昌济到陈独秀、毛泽东都佩服过曾国藩。这种历史现象也说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甚为复杂：反面中有正面，正面中有反面；非中有是，是中有非，其主次、轻重就看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对待。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湖南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斗争特别剧烈而复杂的地方。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唐才常自立军失败，时务学堂学生被杀害的达200多人。清末留日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也数湖南人最多。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是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依托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当年被世人称道的“湖南人精神”，有其深远影响。

正是在黄花岗起义时节，毛泽东到了长沙。这个有志于学的乡下青年，立即投入学生的火热斗争之中，在学校发表政见，剪辫明志。武昌起义时，他就马上投笔从戎，正式参军当兵，过了半年军营生活。这件事说明，革命形势到来时，革命与求学两事相较，前者对他是第一位的。他虽然还看不清辛亥革命实际失败了的原因（到办《湘江评论》时就清楚了），却觉得自己在军营中已无事可做，于是转而继续求学。他是一个我行我素不受束缚的人，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这是旧社会头等进身之阶），很被学校当局欣赏，他还是从那呆板的课堂生活中退出来，跑到图书馆狼吞虎咽了半年，

读自己爱读之书。读书是他一生最大嗜好。这时，严复译名著特别是《天演论》，以及其他西方书籍包括世界地图，使他进一步打开了眼界，不仅思考中国的问题，也思考世界的问题。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包括个人；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变计"，"力今以胜古"。他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

1913 年春，已经快 20 岁了，由于经济不能独立，毛泽东只能违背心愿进了供膳宿的湖南第一师范，在这个学校勉强自己读了五年半，于 1918 年毕业。从 1915 到 1918 年，正是世界和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湖南长期成为南北军阀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他利用这个学校，专心于自己喜好的社会科学（不好自然科学），从国学（经典古籍）、诗文、历史、地理到哲学、伦理学，尤好哲学，中外古今或涉猎或专攻或全书抄录。还天天读报（这也是一生习惯），关注时事。总之，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以此为己任，努力将自己塑造好；从学识、思想、能力到身体，力求向上，时有变易；不动笔不看书，每天写日记；生活极有规律，读书问难，锻炼身体，都按计划行事。他的思想随着时代前进，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自己对这段生活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毛泽东幸运的是，在这个并不称心的地方，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和很好的同学。老师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教书育人并重；同学勤学苦练，思想前进，以国家栋梁自许。他们都忧国忧民，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影响最大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国外留学十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批判分析，自成体系，而且以身作则，尽力教导学生立志复兴国家、改造社会，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师生之间互相切磋，有如朋友和家人。还有蔡和森这样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好学深思，交换心得，不分彼此。他还不以周围

几个知交为满足，敢作超凡脱俗、标新立异之举，刊登启事，广结校外同志。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集体互助，努力向上。在毕业之际，他们这一群时代精英，终于结成新民学会这样的进步团体；成立时的 21 人中，除罗章龙外，都是受教于杨昌济的一师学生。

在这个学校，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学识和才具，抱负和胆略。例如，他的异乎导常的写作才能为老师赞赏，同学传诵，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极有思想见地的大块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有效的宣传鼓动；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的自治能力，活跃课外生活；他创办工人夜校，为失学的工人尽心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学生志愿军"巡逻护校，利用溃军不知虚实，竟缴了一支北军的枪械；为了解社会实情，他与好友以游学方式，在暑假中不花一文钱，周游洞庭湖滨五个县；他的"野蛮其体魄"的身体锻炼，冷浴、冬泳、露宿等，多是常人所不敢为。这个为老师看重、同学敬佩的特殊学生，在一次全校学生"人物互选"中，德智体三个方面综合票数最多，为全校第一。这件事最能说明青年毛泽东是一个何等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说，他的社会科学尤其文史知识水平，当年在大学毕业生中也是佼佼者。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过说明学校教育和学生本人的成绩。现在要说明的问题是，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今后的征途同苦难的中国前途，竟如此不可分，结成一体。了解他的学生时代生活之后，使人深深感到，这同他离开校门时两个方面打下的基础有关：一是，他自己的学识才具和思想水平，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身体力行、知行结合的重现实精神，为他今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难复杂的革命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组织成一个战斗的团体，集体行动，共同作战。终于在湖南这个地方（也在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中）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确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幸运。

毛泽东在学校时还没有机会接触唯物主义，只能从古今中外

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同时在《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下，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他的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是同改造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来改造这个旧世界。总之，具有救国救民“舍我其谁”这样一种英雄气概。他这种探究大本大源思想的另一特征，就是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通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而得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认为宇宙间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刘项、汉武匈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在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特点。

“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运动、斗争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①] 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了这所学校，踏上人生的征途，荆天棘地、狂风暴雨在等待着他们。

毕业之后，这一群志同道合的新民学会会员，首先要解决的便

---

① 李泽厚：《青年毛泽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 126 页、128 页。

是去向问题,一致意见是向外发展。必须走出湖南,到通都大邑,出洋留学,自由研究,获得世界知识,以求救国救民之道。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为此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久已向往的北京。克服种种困难,学会会员终于分几批到法国勤工俭学,向海外发展成为事实。毛本人决心留在国内,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更使他眼界大开。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他深深感到,"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地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①]

他带着这些新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回的主观与客观形势,就同八年之前的辛亥革命时大不相同了。毛泽东立即投入并领导了长沙的火热斗争,新民学会会员成为领导的核心,他自己成为学生运动随后成为"驱张运动"的领袖人物。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克服抵抗"的革命活动,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和超凡的思想。这时,《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那些纯粹思辨的东西,冥思苦想的抽象问题,"只有精神生活,而无物质生活"等等,统统不见了,而让位于当前现实的斗争和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主编主撰的《湘江评论》,走出了湖南,尤其气壮山河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获得辉煌的成功,在全国发生了影响。"毛泽东"这个名字开始为世人注意。

---

①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1919年7月21日。

《湘江评论》开始克服唯心主义，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都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那时候的出版物，"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成风，"多半凑热闹而已"；"人入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了"。通观《湘江评论》全部文章，无一不是"研究事实和真理"，"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创刊宣言》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话说得何等明白。作者当然已感觉到，解决物质生活的吃穿住，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吃饭同哲学相比，经济同精神相比，无疑前者是更为重要了。从而对"大本大源"的认识，开始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变化。在长沙响应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精力多用在报刊宣传上，他写的大小文章都是国内外当时最实际的问题。为了一个赵女士在花轿中自杀，一连写了十篇文章。这就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经历：博士论文充满黑格尔唯心主义，毕业时主要想当大学教授，遇上政府反对议会的阻挠后，他转到报刊工作，从而接触到社会实际问题。投入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洪流后，唯心主义就随之克服了。

青年毛泽东参加并领导了群众革命运动之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进程很快。国家处在存亡危急关头，怎样才能挽救？种种社会问题同整个国家关系如何，怎样才能求得根本解决？这时的思路，自然同书斋苦思冥想时根本不同了。在五四运动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学习上海等地的经验，他领导的新民学会和全省学联，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400多个"救国十人团"，在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和欧洲革命形势，也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世界的走向。这都促使他从圣贤创世的历史观中走出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伟大作用："世界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

最强。"贵族、资本家和强权者赖以维持统治的，无非知识、金钱和武力三种手段，他们人数少，人民群众只要提高觉悟，广泛联合起来，这种统治手段也可转为人民所有。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觉醒。这样，圣贤豪杰同"愚人""小人"，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让位于打倒一切强权的"平民主义"了；不是依靠先知先觉的头脑和精神力量，而是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中国社会存在"智愚阶级"、"贫富阶级"、"强弱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产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这些认识已接触到社会上阶级的对立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了。

由于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的本质区别，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幻想"呼声革命"，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湘江评论》上已露出端倪，显示出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色彩缤纷萦绕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他起着"东风压倒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藐视张敬尧的专横残暴，不为几万"北兵"所慑服；他们手无寸铁，敢于"秀才造反"。三个驱张代表团成员秘密离开长沙，北上南下东去，毛为首的学会 20 个左右会员是三个团的骨干力量，他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第二次来到北京。时隔一年多，这次的身份不是"卑微的"图书馆小职员，而是为民请命的湖南 3000 万人民的代表；不仅出入新华门，还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

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湖南败走。他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最重大”的问题。这反映在1921年学会新年会议时提出的三大问题：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达到目的；当前从何着手。1920年初，他同学会会员通信中虽然谈到，“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在《湘江评论》已达到的基础上，实际上他的思想在快速前进中。

驱张运动进行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随后迁到长沙），着手研究驱张之后下一步的行动，提出“湖南自治”的口号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政纲，而重点在“废督”，即如何避免政权继续被军阀控制。毛泽东到上海后，同陈独秀讨论了这个问题，取得相同的看法：当前中国形势，总的解决无望，“不能由总处下手”，但可以“由分处下手”。如湖南、广东这类地方，利用“地方自治”这种口号，脱离北京政府管辖，推行真正的“民治”，可望造成较好的环境。在上海停留时，他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上，[①] 认为这是湖南“废去督军，建设民治”的绝好机会。关于地方自治，当年孙中山、梁启超和不少地方军阀都曾热衷宣传，不过由谁领导，靠谁来办，要达到何种目的，则各持所见。张敬尧败走之后，湖南一时呈现一种新的气象，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为湖南自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利用谭延闿的“顺应民情”，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自治运动”，这是同以上三种“地方自治”绝然不同的新的民主运动。以此为题，他一连发表了十几篇文章，

---

① 两文题名《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前者刊1920年1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前内容提要为“废督的绝好机会”、“湖南人努力”。后者刊1月18日该报，此文又以《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为题刊5月16日出版的《天问》第十六号。

纵论自治运动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并且提出“门罗主义”和“湖南共和国”这样极端的口号,以示脱离北京政府的决心。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一方面显出作者当时存有的某种愿望,推动这种运动,不失为促进“全国总解决”的一种手段,“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另一方面,则从国情出发,认为中国还远不具备俄国“彻底的总革命”的条件。他透彻分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有布尔什维主义,有战败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有列宁百万党员”),十之八九的劳农阶级起而响应。因此,中国要求得“根本解决”,首先要造主义,造党,从而唤起劳农群众。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思想,同头一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对比,可以说起了一种质的变化。当时学会有个别会员对这两个运动不以为然,认为这都是“枝节问题”,有违学会求“根本改造”的目的。毛认为这两个运动同改造中国的根本目的并不矛盾,革命者不能坐等条件,这“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权宜之计,决非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在推动自治运动的同时,毛更重要的工作在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建团、建党作准备。如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去苏俄留学;尤其是创办了文化书社,为湖南的新文化运动补课。在这些公开工作之外,他同陈独秀有直接联系,陈委托他在湖南负责建团和建党的工作。1920 年夏,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了五天会,就关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出现革命和改良两种极端相反的意见。蔡和森为首的多数,赞成走俄国的道路,立即组织共产党,并将情况通告国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毛于 12 月复信,完全赞同蔡的主张。到 11 月,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已达十来人,1921 年近 40 人,是全国团员较多质量较好的省份。新民学会经过三年的发展和实际斗争,1921 年新年大会之后,多数会员赞成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两者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学会 74 个会员中，早期的中共党员共 31 人。

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思想论战，即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驳倒罗素、张东荪等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三次论战，毛泽东都先后经历了。在湖南关系较大的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不把他们争取过来，就难以开展工人运动，因为他们 1920 年就组织了工会，在工人中有较广泛的影响。

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负责人的身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在湖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当时穿长衫的革命者，都是"有身份"的知识界人士，脱下长衫（或穿着长衫）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举的革命行动。工人、农民都是旧社会的下层人，是被"有身份"的上层人看不起的"贱民"。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当时主要还是在社会的上中层人士中进行，还没有同广大工人和农民发生直接关系。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都是在教育界任职的"有身份"的人，现在去同工人交朋友，领导工人罢工，需要克服多么大的社会惰性阻力。在最初人手少时，毛自己担任过八个工会的秘书，几次到安源了解情况，而且常直接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尤其是亲自当工人代表，同赵恒惕政府当面作说理斗争，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胆识。然而他们都一一克服了，做到了，取得震动社会的辉煌胜利。1922—1923 年，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包括全部产业工人，共组织了 20 多个工会，取得了全部罢工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安源大罢工的胜利，成为全国一面胜利旗帜。毛泽东担任了全省工会统一组织的首任领导人。在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工人除为争取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保障工人基本权利进行斗争外，还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工人运动中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党的组织。在 1923 年"二·七"罢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时，只有湖南工运在继续发展，直到迎接北伐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 年 9 月发生军阀派军队镇压安源工人运动的大惨案后，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曾总结了当年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教训：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在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得到改善，“由此我们产生了和平麻痹观念，对可能发生事变，缺乏警惕性”。同时“不懂得在合法条件下所需要的秘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秘密工作的干部应和做公开工作的干部分开，要有一、二线的区别。”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怀抱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追寻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他为此批判地研究了有关实现这个理想的中外各种学说思想，同时尽力在自己的行动中从事各种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在五四运动时期，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他不断克服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将马列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逐渐同实际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近代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实践行动和思想理论两个方面，显出同样的胆略，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1918 年至 1923 年初在湖南的革命活动，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他在这一个时期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现代的革命事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我们党产生的历史，代表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革命方向。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驱逐军阀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也即是从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的。当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工人运动。领导着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给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坚决奋斗，唤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工人运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他首先在湖南地区建立了坚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

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按照他后来规定的公式是：无产

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他一开始革命活动，就认定中国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并且从自己具体的革命实践，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教训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极其明确地认定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虽然当时他还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极其熟悉农民，同农民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在同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深刻认识到彻底摧毁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因此，从1925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了。

由于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善于确切衡量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一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将建立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当时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中，他极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广泛地争取和联合中间阶级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和团的组织，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党、团之一，尤其质量都高，是在长期群众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干部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湖南地区的党组织具有许多优良作风，它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极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注意党的思想建设；党内有民主的生活和纪律的约束；党员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工作能力和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的牺牲精神。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直接熏陶影响下，大多数党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具有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

由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无产阶级的幼小，从全党情况来说，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理论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够，开始那几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有限，因

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比较差。毛泽东在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没有可能接触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资本论》长时期没有翻译过来),他同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甚至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毛泽东高出同辈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还努力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创造性地运用其原理。从现在所能找到的有限的文献中,就足以看到毛泽东曾是如何注意理论宣传的工作。关于世界情况与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关于人民民主运动的方略,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工人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当时他都有不少深刻的独创的见解。自然,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尤其是1919年前的文章,还具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和不正确的思想观点,还远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这正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准备的开始。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功劳,从一开始革命活动就如此辉煌地表现出来的,便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是东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农民国家,近代又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那些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空谈家、书呆子所想的,只要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高度的革命精神与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才能办到,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这不但必须具备对无产阶级事业、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和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尤其需要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对包括官方经典的和民间流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以及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斗争经验。这样,才能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方法，对客观形势作出精确的科学分析，从而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时还必须时刻不脱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创造性的补充和发展，并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环境，从而为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

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出色地开始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他随时随地联系着当前革命的实践，对周围的具体的社会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是用他自己后来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断客观情况和考察、集中革命实践经验，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针。"从他早期革命活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实践家的身份超过理论家的身份；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设想，用革命的实践来证实革命的理论，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从而使两者不断发展，永远前进。他在每个工作阶段中，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岗位上，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丝毫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丝毫没有王明之流的纨绔子弟的习气。因此，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代表。

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工人运动和后来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党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从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在这位非凡的领袖的培养和熏陶下，具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独立的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埋头苦干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这样一批坚强的骨干及其影响下的广大群众积极分子，则大革命失败后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不可能的。正是这批干部和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工人和后来的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成为这支"星星之火"的武装的基础之一。

关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本书所叙述的材料自然还是不很完整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的毛泽东思想，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后，在他的早年——30岁以前就已开始扎扎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它们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东西。

30岁的毛泽东，这个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面前的即将影响并在后来主宰过中国命运的人物，读者已经看到，除开还不是军事家之外，其他特质是很清晰的：首先是一个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个组织家和策略家；此外，还是哲学家（思想家）或哲学嗜好者；一个好教师、好报人（主笔兼编辑兼记者），这两者是他的生平志愿；还是才华横溢的文章家（古文、时文都擅长）和浪漫气质的诗人。他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论，然而读过的马列经典著作还很有限。他博览群书，尤好文史哲，熟悉中国文化典籍和民间小说。他的性格特别倔强，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以斗为乐，决不服输；他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具有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异举。他来自下层，熟悉下层，不是书香子弟，而是农民的儿子，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对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因此，希望读者认识30岁以前的早年毛泽东后，从而学习克服千难万险、走向胜利的中年毛泽东，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56岁，到1957年64岁；更进而探讨逐渐走下坡路的晚年毛泽东，在1976年83岁去世之前，为什么还要说"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他个人来说（当然个人离不开环境，主观与客观是互相影响与制约的），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原因。历史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反映出来的。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鉴戒毛泽东，是当代也是后代中国人的任务。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形成之时，正是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进入空前的新的发展之时；时代也在呼唤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发展，新的实践应该产生新的理论。

5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以计算机、航天技术等为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这场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许多国家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酝酿着经济的起飞。整个旧世界的生产结构和市场服务，逐渐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和社会各阶级的结构也相应在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强大对手的挑战，可是囿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僵化体制的矛盾更为突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乃至发展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尽管在某些领域中，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取得更高的发展速度，但这常常是不顾高昂代价得到的，因而无法稳定持久地保持这种优势，结果是总体差距越来越大。尽管以下这种对比不一定完全合理，仍能借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分量的4.7%，1980年下降为2.5%；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日本的1/4，1985年更下降到1/5；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36800亿美元。这是仅从经济实力来说，还不讲科

学与技术的实力。论后两方面，我们同日本、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越来越大。这是过去20年“左”的思想和实践造成的极其痛心的严重后果。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5000亿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6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4000—5000亿元。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6200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30年全部的基建投资。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说清楚，例如关于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的激增等，即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预言，由于资本主义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因此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基础上，同资本主义相比，必然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使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实践结果，却表明并非完全如此。现实曾迫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改革的道路。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这种改革趋势的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就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固有矛盾。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国内外情况的估量，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并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想超英赶美。1958年1月，他曾经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①]；1963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还提出科学实验是人类三大社会实践活动之一[②]。可是将阶级矛盾、两条道路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和

---

①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

② 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页。

高于一切的任务时，这种重点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确实是历史的不幸，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毛没有能在正确的思想发展轨道上坚持下去。如前所述，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单纯追究个人的责任是不公正的、不科学的。应该看到，任何思想学说的产生，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都烙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穷本探源，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在落后的东方俄国和尤其落后的中国，先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一个客观物质基础即经济与文化先天不足的问题，这恐怕是苏联也是我们党历史上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一个基本的客观原因。穷则思变，越穷就越想快点富强，于是"穷"与"左"结下不解之缘；于是客观上越没有根据的东西，主观上对之反而越坚定不移。以下从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

首先应当谈到国际形势即时代的影响。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1947 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对世界形势曾作过如此乐观的估计："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从这样一个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出发，从而制定国内政策，这也是毛当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外部原因。这个论断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早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即判定人类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重点放在后者。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当然更加夸大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已进一步加深。可是，时代的发展却出现了曲折变化，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并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反而社会主义阵营中在 1948 年就发生了"南斯拉夫问题"。以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最早信号。1956 年 2 月苏共

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各国共产党开始从“斯大林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反思。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迭起，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由改革引起的骚动。30多年之后回头来看，大约人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这就是，当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曾迫切要求突破苏联的控制和干涉，改革从苏联照搬的政治经济体制，克服党和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错误，从而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论后世史家如何评价，实际上，波匈事件是国际共运改革潮流中涌起的第一个巨浪。

虽然对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毛泽东曾给予一定的赞许；但苏联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和波匈事件的发生，终于引起他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忧虑。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伤感地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共产党也批评苏联……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在毛看来，苏联、东欧正在起步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①] 毛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看得很严重，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

---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323页。

会他们就要动摇……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1] 毛发动反右派斗争，也同他对匈牙利事件的思考有关。他在1957年6月8日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2] 从此以后，他错误地把社会上的一切可疑动向，都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党内的一切跟他的意志相违背的分歧，也视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国内阶级斗争视为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于是，形成了用阶级斗争方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基础。到了“文化大革命”，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达到不分青红皂白草木皆兵的程度。由此最后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

中国山多地少，交通阻隔，自古以来为单一的小农经济。群雄争霸，农民起义，实质上都是土地战争；有人有粮就有兵，积粮为称王的基础。历代帝王兴修水利，奖励生育，励行屯田，重农抑商，走以粮为纲的老路。这种经济结构，阻碍分工，抑制交流，更谈不上科技进步。水利工程，常修常毁，毁林开荒，毁草种粮，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土壤不断沙化碱化，几千年来，逃脱不了这种恶性循环。直到近代，社会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育的阶段。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据前述七届二中全会的估计，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乎占整个社会经济的90%；10%的近代工业多属具有浓厚超经济色彩的官僚买办资本。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阶级分化。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

---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4页。

② 同上，第432页。



李锐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与毛泽东个人威信的高涨同时到来，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当成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也难得摆脱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图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博罗县的一家8口人在毛主席巨幅照片下，在最小的孩子指挥下精神抖擞地高唱“语录歌”。

生产者则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他们渴望改变贫穷处境，希望建立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他们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寄托在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身上。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

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反映农民的这种理想的社会思想，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太平天国、康有为和孙中山三次有同有异的理想社会思潮。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中国革命是一场东方独特的、新型的农民革命。但是暴力革命只能带来政权的突变，并不能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突变。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能同时在经济上、文化上也立即翻身。事实说明，我们过去几十年，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后来的公社化)等三大改造，加上国家的财政援助，尽管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有这十多年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国策，才有望于 2000 年时达到小康水平。从经济方面深加追究，也正是由于这种同封建主义结合的小农自然经济，只能产生以家庭和土地为依托、以自给自足为理想的凝固而封闭的经济结构思想；所谓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加以客观上，过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们实行长期封锁，中苏关系的破裂(原来也主要是政府间的简单记账贸易)，使我国经济长期处在高度集中和政府统制的计划经济结构中，"文革"十年更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古今内外的影响，也使得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可能超越这种社会存在。我们不能苛求他的经济思想能同现代国际经济运动、开放发展的格局相协调相一致。1956 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曾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倒是我们现在应当很好继承和发展的。

当然，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长期的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革命意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同农民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党员和干部大都出身于农民，农民固有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观念，在党内不能不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思想土壤。此外，白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以及共产国际和苏共

高度集权的影响，也使得党的民主生活难以健全，而容易形成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几次整风运动，也没能得到解决（在那样一种体制下，也不可能解决）。相反，战争年代必要的一元化领导经验，发展到"书记挂帅"，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大家习惯于以"人治"代"法治"。此外，在我们这个根本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中国革命胜利与毛泽东个人威信的高涨同时到来，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也难得摆脱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最后促成毛泽东可以随意实行个人专断。可以说，这种中国特有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以及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习惯势力（它们容易产生英雄崇拜和个人迷信），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在体制上曾长期存在的问题是过于集权。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习苏联，我们沿袭了战争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照搬了苏联集中计划的产品经济体制，并建立起与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体制、对外关系体制等。按照苏联模式，把国家所有制、指令性计划、统一调拨产品、轻视市场经济等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等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对科技、文艺等领域实行的行政干预和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集中管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内在要求。这些日渐僵化的体制，一方面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以及文化艺术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干扰着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党政各级缺乏制衡与调节的机制，这都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实践发展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形成日益严重的集权体制与个人崇

拜的恶性循环。这里应当着重一谈的是,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原则,必须正确解决领袖同党的关系,这个问题对执政党尤其重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为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领袖同党对立起来的观点(所谓“领袖的党”、“群众的党”),有专门一章论述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文中强调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指明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里讲的是一般政党政治的原理,并没有论及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这方面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列宁着重讲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党和阶级的一致性这一面;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高踞于党与群众之上,尤其是领袖也有可能犯错误,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列宁很注意贯彻民主的集中制(他强调民主前提下的集中制),以避免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他同马克思一样,很厌恶别人对他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他特别重视党政分工,防止党政机关犯官僚主义。可是,斯大林没能继承列宁的民主传统,却把列宁关于垄断权力的一些想法,发展到极端,逐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领袖终身制,高度集权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终于导致一系列严重错误。关于领袖与党的关系,列宁已经有所侧重的不全面的论述和斯大林的集权专断,对我们党都曾长期发生过影响。我们又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皇权高度集中、习惯定于一尊的国家,正如《历史决议》中说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过去在长时期中,我们惯于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只说成是个人的智慧,不讲还有集体的贡献;把一切成就归于个人,不讲党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神化，说成绝对正确，而不讲领袖也是凡人，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到毛泽东晚年时，尤其形成一个坏的习惯：在任何场合，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曾以为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长时期中，我们只注意了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同一切崇洋媚外的思想作斗争，却放弃了同时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种种严酷的封建专制主义现象，自不是偶然的。1980 年 8 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说：“我们进行了 28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方面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①] 文中具体谈到过去在政治、思想和体制等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情况：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②] “权力过分

---

① 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版，第 295 页。

② 同上，第 288—289 页。

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② “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③ “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④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

① 同上，第288—289页。

② 同上，第289页。

③ 同上，第290—291页。

④ 同上，第291页。

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①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②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③

上面摘录这么多邓小平讲的话，是以其权威性来说明我们过去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之深，和肃清其残余影响之难。这个问题同上一节“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是一回事，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中国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残余影响，恐怕得靠几代人的努力。

---

① 同上，第 292 页。

② 同上，第 293 页。

③ 同上，第 294—295 页。

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

在1920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年毛泽东长时间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包括科举时代的必修课四书、五经、纲鉴等，也包括对他更有吸引力的小说、笔记、野史、杂集等。这两个方面都给了他很深的影响，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和内地长沙的毛泽东，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不多，只不过从梁启超、严复、杨昌济的转手中有所涉猎，如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之类。他从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远不如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了。笔者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只能凭借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而以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为多。"大跃进"失败后，他才着意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新中国成立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他对身边人说过，《资治通鉴》读过七遍，这部书是常置案头的。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如在《毛泽东选集》中，除了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有几处摘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之外，几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引文，斯大林的引文稍多一点，而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总不下几百上千条，藉此也可见中国旧籍对他浸润之深。不论是"显形"的官修典籍或"隐形"的民间传说，都是铸造毛泽东一

生主要的思想原料，这话并不过分。我们说，在毛泽东思想中，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往往有时会起消极作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虽然很难直接归咎于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但若仔细探究，也不无渊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

从本性上看，终其一生老而弥坚的“造反”、“斗争”性格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是反传统的，对于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儒学，应当说是没有好感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对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便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认为要在中国进行革命，要打破政治上的强权，也必须打破思想上的强权。《湘江评论》上他的文章中还说过：“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也一再提出反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儒学。每当要打破陈规，破除旧的秩序时，在思想领域内总是把孔学作为靶子的 。固孔学核心是维护既成秩序。汉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曾多次受到他的抨击。他也不止一次在讲话中调侃孔子，甚至把孔子的书同他所蔑视的蒋介石的书相提并论，认为读一些这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从反面教育人们懂得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林批孔”时，他赠诗给郭沫若(批孔批郭)：“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①

---

① 见汪澍白：《艰难的转型》，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8 页。

当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否定孔子，他认为孔夫子的这一笔遗产还是应当继承的。那理由是："剥削阶级当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①] 因此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要清楚地讲明他究竟认为孔孟有哪些"真理"，这是困难的，特别是晚年他已把孔孟当作没落奴隶阶级的代表。毛对孔孟学说，更多地是依据政治上的需要，随时摘取某些语言，古为今用，或赋予新的解释。比如，1939 年 2 月 20 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讲到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时，这样说："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以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1942 年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实际上，毛常常是利用前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极广，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无不在其视野之内；在当代领导人中，罕有其匹。但其基本办法，仍是"六经注我"，即利用或改造前人的思想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作法就其好的一面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但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即在这种利用、类比之中，容易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一起继承了下来。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传统的副作用。

比如，早年读的《礼记·礼运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给他晚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最初的基础，而且给予他以怎么样也摆脱不了的简单粗糙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都是无可置疑的儒家的影响。与此类似，前述他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

---

① 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5 页。

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军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又如，毛不止一次地以刘邦、项羽作对比，批评项羽不能像刘邦那样从谏如流，结果最后垮台，闹到演出“别姬”一幕。就其本意，是教育干部要有民主作风，但今天社会主义需要的是民主政治，远非古代用贤纳谏所能概括。如果领导人仍以为居高临下的“纳谏”便是民主，那么，民主不过是恩赐，不过是点缀，也就始终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决策的程序。毛泽东自己，确实没能摆脱这种“君临”的思想意识，没有在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建设起现代意识的民主生活。

再如，毛晚年多次谈到秦始皇，谈到焚书坑儒。“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角度赞扬秦始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赞扬这位古代暴君的。但是，他又笼统地以此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①] 这就容易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根本区别；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他一生酷好读史，到老不衰。除常看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外，即便是专治史学的专家也未必人人通读过的《二十四史》，也基本读遍了。至于稗官野史，他更是兴趣极浓，熟悉之至。他认为读史可以知兴亡、明事理，“观往者得失之变”。《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从中可以熟悉历史事件，吸取经验教训。看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史实，而不会是“臣光曰”所阐述的儒家政治哲学。他是要从这些史实中考

---

① 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第 28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其中固然有智慧的一面,但也有落后的一面。例如,从《明史》中搬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此作为三线建设对付现代核战争的方针(三线曾耗资一千多亿)。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

毛泽东曾一再自称对佛学有兴趣有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像他真的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的“劫”和道家发展观中的“循环论”。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曾从法家学说中,锻炼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有人可能会认为,毛自己不但承认而且标榜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因此而认为毛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法家。但是,毛之所以主张“无法无天”,甚至事实上做到了“砸烂公检法”,却决不是不要人们遵从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让自己受法的束缚,如他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这样就可以做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这不但不与法家思想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得到了法家思想的精髓。这正是中国法家(“圣人执要”即君主执法)与西方法学(法即君主)的不同之处。仔细地把毛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思想,跟受到毛推崇的“法家”,从秦始皇到韩非、李斯等的言行相比,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晚年思想尤其错误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来。只是,毛的这种思想到底是他早年

读过申韩之书，或渊源于荀子、老子之书而形成的呢？还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印证，而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呢？这就需要深入细致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以为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自汉以后，儒法已很难分家。汉承秦制，虽说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杂霸道王道以用之，乃儒法合流。荀况引法入儒，而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正是荀况的学生。法家为求法治，也必须引儒入法，吸收礼治，以补充法治。儒法合流盖因共同本质为"人治"：儒家提供了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准则，而法家则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策略与方术。"阳儒阴法"，儒法的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理论与行为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策略家，以阶级斗争同蒋介石较量时，有理有利有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儒家的政治艺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治国时，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都是为君主便于驾驭臣下、统治万民而着想的，自可利用改造。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家以法、术、势结合，君主执法行绝对专制统治。对照之下，我们的以人治代法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以及在阶级斗争中设置对立面，引蛇出洞，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不受原则束缚，以实用为依归的策略等等，都不难看出法家的影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家、某派的影响，应当说，它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国内国外现实状况的错误判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

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心理是颇为矛盾复杂的。在全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规定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可见他是有明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的。后来时过境迁，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谈到领导者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有分别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不能全面否定。

在国际共运史上，突出地指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大。这给各国党也给中国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删去了七大党章中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党当时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给毛泽东解除了某种精神束缚，使他的骄傲情绪随之滋长起来。过去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对其人虽然并不佩服(同王明的斗争实质上是同斯大林的斗争)，也只能“腹诽”。现在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从而也提出了重新评价苏联模式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前后，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城乡敲锣打鼓庆祝，全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些内外条件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似乎是世界上唯一最高明、最正确、最有本事的。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在苏共党内的地位，迫切需要中国党特别是毛的个人威望的支持，在短时间里对毛作出了谦恭的姿态，也助长了毛前无古人、横空出世的骄傲心理。在对东欧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趋势抵触日益加深的同时，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率领中国人民一再进行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完成向共产主义

过渡的人类伟业。可是事与愿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而其起点比苏联更低，因此很自然地便跌入了类似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死谷。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不满于1956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业，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于是需要“政治挂帅”，于是需要“大权独揽”，于是需要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了。“大跃进”运动一开始，他就由反对个人崇拜转而主张个人崇拜。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从而将拥护真理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此后，反对个人崇拜一直成为毛十分忌讳的问题。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党就公然指责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毛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和鼓励，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之风。“大跃进”时，柯庆施等人迎合邀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林彪、康生等人更是极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林彪疾呼：“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尤其“文革”十年当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升级。这一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三面红旗”的失败，一系列政策措施越来越不得人心，天下大治甚为渺茫，党内党外对他的信赖越来越少，疑虑却越来越多。为了维持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得不借助于“大树特树”。将必要的权威与个人崇拜混淆起来，这种人为培植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



李锐认为，毛泽东习惯于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政治上迫害干部和群众，经济上劳民伤财，给民族留下累累伤痕。图为在“文革”期间，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仲夷在批斗会上被强制戴上高帽，身心受到强烈摧残的情景。

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从大政方针到日常小事无不遵循“最高指示”，而且“传达不要过夜”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失误和灾难，从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个人崇拜必然助长个人专断。晚年的毛泽东是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他自以为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的模式和途径，因此，不管谁对“三面红旗”提出什么意见，他都予以严厉驳斥；即令同中央集体发生严重分歧，他也固执

己见，认为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或一个人手中。从八届二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对周恩来和陈云的批判；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实为批周），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驾凌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的结果。无情的历史说明，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是：领袖犯了错误，必然导致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再思三思的。

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将战争经验套用于和平建设的论断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不但搞阶级斗争如此，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等等，毛也习惯于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政治上伤害干部和群众，经济上劳民伤财，给民族留下累累伤痕。在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上，毛讲过这样的话：难道搞经济比打仗还难？是的，在22年无比艰难的条件下，革命军队由小到大，小米加步枪，把日本军国主义赶出了中国，最后终于消灭了由美国武装的800万国民党军。这种战绩与经验，可说是史无前例的。难道到了1958年，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把经济速度加快一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可他恰恰忘记了古人之言：“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他也忘记了，他的这些伟大胜利并不仅仅是靠着军事力量取得的，在他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军队只是三大法宝之一。他似乎也忘记了，对于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尤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必然规律，还是很不熟悉的，远没有认识清楚的，还是“不自由的”。这层意思，他在执政前夕发表

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说过，后来却忘记了。可是，“大跃进”时真是太自由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先提出有谐音之趣的口号“以钢为纲”，接着又辅以“以粮为纲”，直到出现许多军事术语及其作法，如“元帅升帐”（钢铁、煤炭、粮食三大元帅）、“两个先行官”（电力和铁道）、“一马当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及“大兵团作战”、“挑灯夜战”之类。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毛对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过的军事共产主义十分留恋。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他多次谈到，我们党是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家长式的），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他曾多次表示，要逐渐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他还企图把各种社会组织都变成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高度集中的准军事组织；认为通过这种组织可以创造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建立人民公社和后来的“五七干校”、“五七农场”、“五七工厂”等等，就是尝试。战争年代被敌人分割封锁，各根据地必须自力更生、各自为政。引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于是不论农村、工厂，一县、一省，都提倡“小而全”、“大而全”，万事不求人。这种封闭式的经济，自然同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毫不相干，背道而驰。

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完成不顾实际情况，不顾条件的变化，到处照搬照用，必然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此路不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带有这种浓厚的狭隘经验主义色彩。

晚年毛泽东对待马恩列斯的理论，常以对他有用与否为取舍的标准，这样就不免误解和误用。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至理名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这是指西欧资本主义

国家而言,而且在书中明确指出,他这里所提出的是带有旧社会痕迹,仍然存在市民阶级权利的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实际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也许把这个过渡阶段看得较短,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提出的过渡时期,理解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曾一时看得过短,一时又看得很长很长,由此在政治上产生一系列“左”的方针与政策;在经济上则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前面已经谈到,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观点,以及列宁提出的小生产自发倾向的论断,也都特别重视,借以为自己新的阶级斗争理论作说明。在表述马克思的观点时,他把“资产阶级权利”从本意的分配领域扩大到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并把抽象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同旧制度下有实际含义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同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由此得出他所需要的结论: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温床。撇开俄国十月革命初期的具体情况,在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补充下,更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毛从实用角度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话,他始终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误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造成令人极其痛心的历史悲剧,曾同“左”的教条主义作过长期坚决斗争取得革命胜利,而受到全党全民爱戴的领袖,晚年也陷入“左”的教条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给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灾难性的后果是违背他的主观愿望的。

从这个历史教训来说,我们后人应当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何等重要的历史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为了对自己实践中的每项措施和对策作出解释,毛泽东使他的晚年错误思想逐步具备了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态。其主要部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概括地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发展到极端,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文化大革命”。下面再简单概述

一下这一发展过程。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的问题后不久，在毛的主持下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文章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一个最大原因。当时的一些论者，包括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把它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其实这并不是斯大林独有的现象，不善于正确运用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人，尤其手中有权的政治家，一般都很难避开权力的腐蚀作用。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必须受到民主和法制的制约，否则，权力能使人冲昏头脑，骄纵放肆，智力衰退。一个西方学者说得好：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不幸的是，这一现象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避免，斯大林的专制行为引起了特殊的震动，毛泽东的晚年也终于出现了类似的悲剧。1959年庐山会议时，受批判的几个人中曾议论过“斯大林晚年”问题，当时只不过是对未来事态的一种隐忧，不幸的是隐忧终于变成了事实。

同权力的腐蚀伴生的是骄傲。在1949年以前漫长的28年中，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尤其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那时毛泽东从不轻敌，何等谦虚谨慎，因而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如在军事上，他从不轻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过于强大，还有斯大林的干预等等这些决不容忽视的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打出了威风，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似乎客观失去任何制约，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尤其党与个人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客观的迷信与主观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确实有了骄傲的本钱，使得毛泽东不再谦虚谨慎了，日渐高傲而随心所欲了。

从历史上考察，前面已经谈到，毛泽东早在战争年代就很注意党的民主生活，形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民主传统。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都宣称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之后，民主生活就不正常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说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尤其在反右运动中，普遍推行了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定阶级成分的方法。从此，阶级不是如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的那样，指的是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可以随掌权者的好恶而改变(这方面也有法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邓小平认为，1957年大体是毛泽东进入其晚年错误思想的界标。1957年起，从理论到实践，毛开始同民主思想告别，同时也为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运动准备好了舞台。这时知识分子不是箝口结舌，便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了。对"大跃进"、"吃饭不要钱"，不是没有人议论，但只能窃窃私议，有些议论的人早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敌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一块新的重要的里程碑，从此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内部。这也就是党内存在"走资派"、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的伏笔。通向"文化大革命"的大门打开了。

任何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总是长处和短处并存的，问题在关键时刻，何者处于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夺取战争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驾驭矛盾，指挥若定，是何等游刃有余；可是领导现代经济活动却相形见绌，这些陌生规律过于复杂，非其所长。如果他有足够的民主作风，党内和国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自己不怕认输，不怕下"罪己诏"，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气慨，应当说，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是不难纠正失误的。不幸的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蚀了他的智慧，谦虚谨慎变为刚愎自

用，不但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反而继续想用老思想老办法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抓政治挂帅，抓阶级斗争，这是他本人也是全党的轻车熟路，大家都在行得很，定个百分比，谁都有辫子可抓，根本不要学习，不要读书，也不要调查，而且“一抓就灵”。直到“文革”时期，关于经济生活，他仍只能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方针，走不出“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制造的迷宫。

马克思说过，历史人物性格的“偶然性”，对历史的发展常起某种作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本文只是简要地探讨了一下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并且侧重在同政治实践有关的思想，而没有涉及他的性格和气质等问题。其实性格与气质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有关系的，有时甚至是大有关系的。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诗词作品足以方驾古人。他喜欢屈原，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可说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和非凡天赋的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些诗句读来真令人神往叹服。应该说，伟大的革命家，不论马克思或者列宁，也都有着浪漫主义的气质。不然怎么能睥睨一世，在旧世界看见了新世界，并且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呢？浪漫主义气质同革命事业可以相容，有时会相得益彰的。一首“北国风光”的《沁园春》，曾经风靡重庆，在大后方多少高人雅士乃至官宦名流中引起震动。可是，在从事经济建设活动中，却容不得多少浪漫主义。“高峡出平湖”是好诗，但当年如果把这诗句当作必须立即贯彻落实的建设计划，事情就麻烦了。

本章开头即提到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这就是说，凡自己认定了的目标，必不畏任何险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的伟大人物必备的品质，毛泽东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但不容拂逆变为一意孤行，那就成大问题了。这种问题自随主人公的地位、权力和作用而造成不同的

后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惊心动魄的事态，饿死了那么多人，大乱到那种程度，几十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死于非命，难道他都无动于衷？这似乎只能从他自己所说的虎气与猴气中找到解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千钧棒之下误伤难免，可是玉宇却混乱不堪了。毛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有这样几句话：“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还有这样一句话：“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这是不是可以作为理解毛泽东晚年悲剧的一把钥匙呢？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心态也是值得研究的。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他喜欢读三赋：《恨赋》、《别赋》和《枯树赋》，从中是否可以讨到一些消息呢？

我们在回顾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时，当然一刻也不应该忘记问题的另一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漫长而艰巨的中国革命，曾经走过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从胜利到失败，又从失败到胜利，即他在延安常讲的，中国革命走了一个“之”字路。他本人身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走了一个“之”字路呢？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及取得胜利之后的最初一些年月中，他是何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很少失误（如有失误很快就能纠正）。可是到了1956年，特别是1957年之后，他一生事业达到辉煌顶峰之时，这个“之”字却逐渐曲折地走向下坡。反右派，“大跃进”，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时进时退终于步步下滑走到了他的终年。到了1975年、1976年，他对某些失误有所察觉，希望有所更张，可是这时已积重难返，形格势禁，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他已经无力走上这个“之”字的末笔，重新走向胜利的一笔。这

个任务就留给他的后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了。《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

从1957年开始，在近20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以他在党内外的崇高威望，逐渐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留下深深的“左”的印记。毛泽东辞世已经16年，可是“左”的影响，并未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到1987年，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①] 这种“左”的习惯势力至今还是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最大障碍。近年有些“理论家”，还经常在报刊上、讲坛上散布这样一些“左”的论点：如改革开放引进来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我们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囿于过去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观点，将实践已经证明了的谬误，还当作真理。因此，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不能不再一次发出“主要是防止‘左’”的警告，要求我们把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提高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难道我们能够再等闲视之，掉以轻心吗？要真正纠“左”的习惯，就有必要认真清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因为“根深蒂固”的根子主要在这里。这样才能端正思想路线，从历史教训中深刻认

---

① 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第27页。

识到，改革开放与拨乱反正的关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得来何等不易，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有了深刻理解，我们才不会重犯“左”的错误，才会对“左”的东西具有辨别力和免疫力。

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①] 历史是最公正的。百年千年后的历史，必然会同我们现在一样，公正地景仰地看待毛泽东，像后人对待古圣先贤一样，从他身上，从他的言行中（不论正确与错误），吸收养料，推动历史前进。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就有助于避免重蹈覆辙，可以使我们党和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前世界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命运正经历着最严重的考验，同时也碰上一个百年难逢的良好机遇。我们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我们应该抓紧时机，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往前发展。毛泽东终其一生，究古今之变，通中外之学，探治乱之源，求大同之境；他曾经唤醒民族，同内外敌人浴血奋斗，终于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使神州大地走上社会主义大道；他的许多思想遗教，他常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将启迪后世；他晚年来源于“左”的教条和主观盲动的错误，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无法为之掩饰，正好引为鉴戒。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版，第 366 页。

韶山谒毛泽东铜像

翻天覆地几沧桑，百岁归来喜气洋。
父老乡亲齐托福，杜鹃花也早芬芳。

（1951年曾随程潜、黄克诚第一次到韶山，这回是第三次，游人如鲫，楼馆林立，山乡已变城市。有关铜像建立前后的民间传说，在北京已有所闻，山上确有早开的杜鹃。）



1994年2月23日，李锐与夫人参观毛泽东的故居韶山，这是李锐第三次游韶山。

中国革命的回顾[①]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经历28年的艰难曲折取得胜利。内外敌人强大，最大的困难在于战胜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主要是王明(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毛泽东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完整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划分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两个历史范畴。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形势，这一切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必须分为两步来完成：

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第二步：条件成熟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现革命转变，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轨道。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谈到党的一般纲领时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为什么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

---

① 1989年1月23日下午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讲稿(提纲)。



1989年1月9日至2月20日，李锐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考尔教授的邀请，在美访问讲学了40天。图为李锐在美国国会大厦前的留影。

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呢？毛泽东回答，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说，“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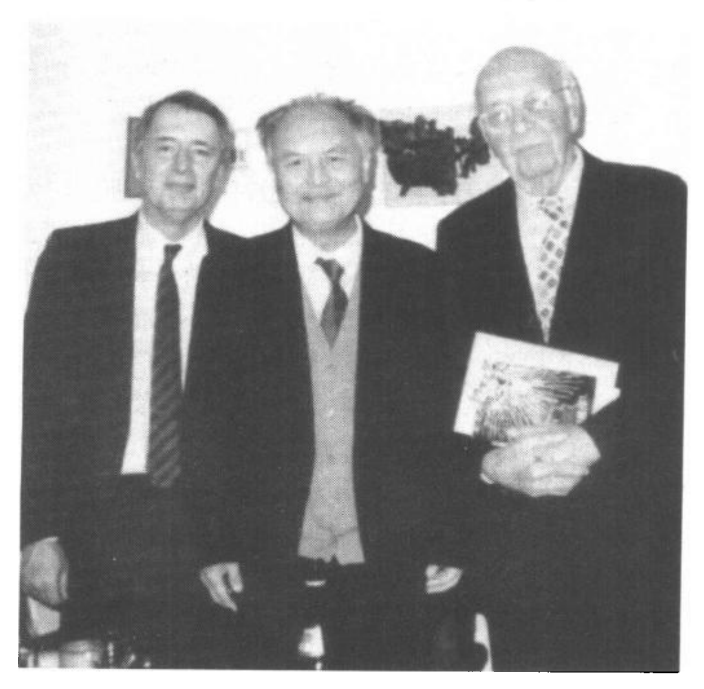
1940年1月，张闻天（那时他还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在延安作的一个报告中说，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对于“民主的”一项还作了如下的解释：“即反封建、反专

制、反独裁、反压迫，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①] 毛泽东没有单独提出"民主的"这一项，只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将"民主的"并入"大众的"之中。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解放战争转入进攻时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49年3月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鼓励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他说："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他说："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

① 《张闻天选集》第252页。



1989年在美访问期间，李锐同费正清老人与所长麦克法考尔合影。费正清，斐声中外的汉学家，曾多次来华访问，主编的多卷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有中译本。

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教授，前英国国会(工党)议员，后定居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教，曾多次来华讲学、访问，为西方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对我国“文化大革命”有专门研究，著用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并参与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

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当时中国全国工业产值占10%左右，农业占90%左右，只有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才能为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物质条件。刘少奇天津讲话，说中国还是资本主义太少，剥



1989年访美期间，李锐在密歇根（密执安）大学讲学，讲学题目是《中国革命的回顾》。演讲结束后同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右），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任时的高级官员、白宫著名汉学家奥森伯格合影。李锐十年前拜会卡特总统时，奥森伯格在座，老友相聚，感慨万千。

削有功。这些都是毛泽东表示同意了的。

1949年政协会上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有人主张在总纲中明确写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周恩来说，十年到二十年之内不急于转变，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之时，才能实现这个转变。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谈到当时16个城市有万家商店歇业的情况，"望国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他说："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改善同他们（指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单一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期。”（《哥达纲领批判》）彻底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单一所有制。（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是适当的）对于目前中国这个东方农民大国，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单一所有制是不恰当的。要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不可逾越。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认识到，经历了20多年痛苦过程。必须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渡时期总路线，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他说：“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他还批评了“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认为“四大自由”（邓子恢，农村工作部：土地经营自由、雇工自由、信贷自由、贸易自由）乃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难矣哉。”（“文革”中林彪批刘少奇天津讲话为修正主义。）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的三条要点：

1.走新民主主义，不是旧资本主义。公私兼顾。社会主义是几十年之后的事。

2.资本主义剥削的进步性。联合资本家发展。必要限制。是朋友不是敌人。剥削有功。工人的痛苦在于无人剥削他们。资本家有本事剥削，于国于民有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有功。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

3.雇工单干应放任自流，都有三匹马一张犁（东北、山西反映：富农发展，互助组解散。老区不革命，影响了毛泽东）。不要过早限制单干。农民喜欢发财。伤害私人资本工业家、个体户积极性，

乃破坏作用。

土改完成后，主要矛盾，并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阻碍了向社会主义转变，首先是：

(1)落后生产力，并非资产阶级私有制。

(2)“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论人民民主专政》)1953年的前3年中，私营工业比重已由63%降到39%。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左右国民经济的发展。

(3)落后国家需要首先发展大工业，一概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三大改造过快过急过粗。原设想十五年才三年即完成了。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理论上的失误(毛泽东修改，中央批准)：

当时颁发的“宣传提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亦改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成为我国唯一经济基础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总路线就是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必须弄清楚。”

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立：

(1)错误地将新民主主义社会同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立起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已认识到当年苏俄的错误)二中全会。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非同步转变，先实行第一个转变。刘少奇的“八大”报告，用毛泽东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我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只承认根据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上的重大变动。

(2)离开国情,急于消灭资本主义与一切私有经济。"八大"宣布大规模阶级斗争结束,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来是对的。可是不久毛泽东即急遽转变,重新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

(3)工作重点转移。反右派斗争以后,中间经过"大跃进"的失败,逐渐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理论上对主要矛盾判断错误,离开国情,越走越远。经济上又急于求成。

(三)

列宁的弯路:余粮收集制。指令性计划生产、分配。新经济政策(小企业、租让制、外资合营、接受外资)。布哈林——初级阶段。只有四年,结束太早。

斯大林模式:

(1)工业化是对的。打下了二次大战胜利的基础。但长期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两种工业化道路。批右倾投降。

(2)农业集体化。快速消灭富农。整村整州,单一模式。大饥荒,饿死800万人;集体劳动,统一分配。

(3)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大规模肃反。肉体消灭党内反对派。思想禁锢,日丹诺夫一套。

(4)急于求成。过高估计发展阶段。1936年宣布已建成社会主义。

《联共党史》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从延安起教育了几代人。

苏联模式对我国的影响,主要在1949年以后。最初注意结合本国情况,农村政策,合作化,粮食增产;和平改造资本主义。

问题在1953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矛盾认识错误。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理论上的失误，斯大林影响。1955年过快实行农业合作化，错误地批“小脚女人”。

1956—1957年。《论十大关系》(1956.4)，曾想克服苏联模式影响，走自己的路。

“八大”文献：“以苏为鉴”。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调整重、轻、农关系。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苏联出兵匈牙利。整风运动急剧转变为反右派斗争。超英赶美，急于求成，“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走上更“左”的道路。

(一)“左”倾理论和“左”的实践恶性循环

政治上，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毛泽东以反右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宣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判断错误导致实践错误，错误的实践又概括出错误的理论，步步升级。

经济上，“大跃进”的错误实践，“主要矛盾”又贯穿其中。庐山会议。“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阶级斗争导入党内。并非不重视生产力，只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等)的反作用。哲学思想。持续“大跃进”，导致三年困难。七千人大会后搞调整。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已怀疑三面红旗的正确性。林彪的说法不同，七千人会上保护毛泽东过关。刘、周、陈、邓都认识到农村所有制改变过快，影响农民积极性。刘支持自由市场。三个商业系统。直到1965年6月，还支持个体经济。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包产到户。责任田 。企业联合。托拉斯。公司集团。(当时毛泽东对这一套极为不满，最初曾隐而不发。)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终于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关于阶级斗争事例,下面有反映)反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下面各级许多人接受。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五反、四清。1964年底毛泽东提出:官僚主义阶级乃斗争对象。1965年1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提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提出了理论根据。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文革"的思想准备。

(二)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恶性循环

权力逐渐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领袖的能力。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改组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书记,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实现了一元化领导。对于取得战争胜利有积极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八大批评了个人崇拜。八大通过的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高度集权制也是国际共运中组织方面一种历史特征(残酷的地下斗争环境,战争环境,在未取得政权以前有其必要性。"一切服从战争")。后遗症:不同程度党决定一切,统管一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以政代企。制度本身的缺陷,取得全国政权后更有所发展,一般一把手较强,资格老,加以中国人几千年封建主义养成的等级观念,定于一尊,习以为常。集权体制同个人"最后决定权"结合,造成了领袖独断专行的条件。领袖个人素质,包括性格这种偶然性。1957年尤其南宁会议之后越来越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凌驾于组织之上,日益骄傲。脱离实

际，脱离群众，主观，专断，日益严重。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

个人崇拜加剧的原因：(1)经济、文化不发达的产物。漫长的封建主义的腐朽遗产。小农经济小生产，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领袖说成是一个人，一切成就归于一个人。(2)广大群众自发的对领袖的热爱(农民需要别人代表)。(3)本人的默许乃至提倡。(如柯庆施以工于个人崇拜而成为政治局委员。1958 年成都会议。1970 年与斯诺的谈话)(4)林彪、四人帮等野心家的推波助澜。康生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是最高最后的标准。林彪的红宝书，谁反毛泽东的路线，"全党共诛之"。"理解与否都要执行"。毛泽东为路线代表人。路线对一切都对，错一切都错。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林怀特教授提出：1943 年即已开始。此说似嫌过早。)

过去维护党的团结与毛泽东的威信(最宝贵的财富)，出自心愿。庐山都作违心检讨。

(三)"文革"与毛泽东晚年政治思考

主观认为是"反修防修"。何谓修正主义，谁也说不清。毛以为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1963 年在国际上反修，发表"九评"，以赫鲁晓夫的改革、与美国和平共处为修正主义。国内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毛泽东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他的对策，开展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干部下放劳动，防修。1965 年 10 月他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怎么办？1966 年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刘、彭不听话)"赫鲁晓夫就睡在身边"。以"左"的观点来看苏联的一些政治经济改革。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全世界 100 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克

思列宁主义。又说，中国反党分子要打倒党和他本人，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在群众运动中培养接班人。纯系主观臆断。

公社——五七指示。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

"文革"夺权问题。炮打司令部，一月风暴。"权力斗争"似乎如此。实际上中国党无一人(林彪也许在外)敢做"彼可取而代之"的梦，决无一人敢违反众意夺毛泽东之权。反问：如果毛泽东真认为大权旁落，他能力排众议(抛开政治局)发动"文革"？("二月逆流")

普林斯顿大学林怀特教授《论文革的社会根源》："文革是权力斗争的产物，也是权力斗争的工具。"(麦克法夸尔也注重毛、刘之争。)西方不深刻了解中国。(为什么至今不放弃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一分为二，功第一位过第二位。)

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彻底改变现状：如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无差别。所有制变了。要"洗刷几百万"，天下大乱到大治。大破大立。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样板第三个里程碑。"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

既有追求新的理想主义，又有重新分配权力、政治斗争的一面。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个班子不满意，要彻底改造这个班子。

既有憎恶、粉碎官僚机器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的一面。既有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反修防修)一面，又有做"君师合一"的导师、领袖的一面。

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混在一起。

(费正清认为：1965年，毛泽东指控其同僚在搞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对党感到失望。求助于军队。借军力。甚至利用《解放军报》做喉舌。江青受林彪委托的座谈会。1965年11月以后，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费认为"文革"有偶然性。)

(苏联马林诺夫斯基，1964年11月7日宴会上，同中国人谈："把毛泽东搞下去"。也有刺激作用。)

关于中国革命的若干看法[①]

一

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而开始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红军得以胜利完成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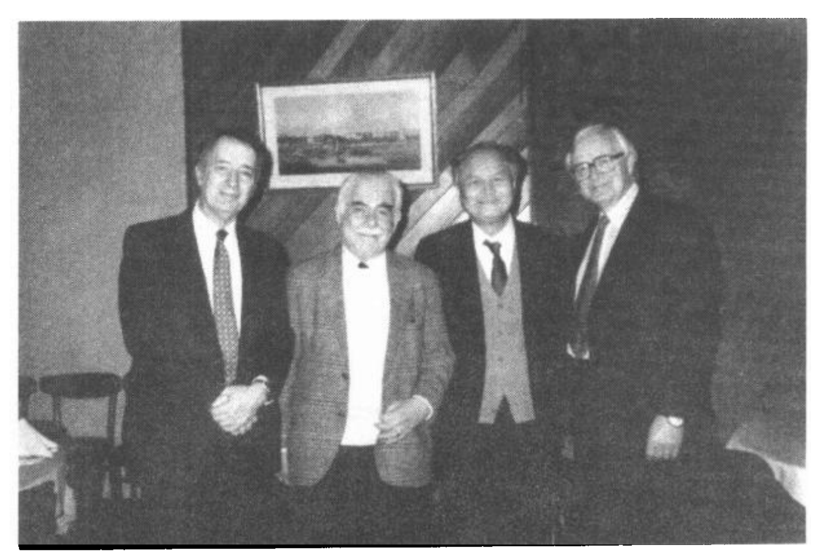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上井冈山以后，克服种种困难，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建立了强大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毛在中央苏区时的弱点，用人唯亲，如用李韶九打AB团；脾气不好，使人疏远（黄克诚谈）。

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和理论。毛泽东在反一二三次“围剿”的胜利中起了决定作用。同各种“左”的错误与“左”倾教条主义（由国际斯大林控制）的斗争极其不易。

王明路线在军事方面的影响（米夫、博古），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损失90%。（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认识，在变化中。）导致长征。长征中的争论。毛泽东争取张闻天、王稼祥，导

---

① 1993年5月31日至6月5日，在美国克罗拉多大学召开一个命题为《1936—1965中国的党与国家的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 State and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1936 - 1965）的国际研讨会。有来自美、法、德、英、荷、俄、澳、日、中国和台湾10个国家和地区的32名汉学家列席会议。与会者都交有论文。这是会议第一天李锐简短讲话的提纲。



1993年，李锐应美国科罗拉多、明尼苏达几所大学邀请去美开会并讲学，在哈佛大学会见麦克法考尔（左一）、施瓦茨、施拉姆（右一）。麦克法考尔、施瓦茨均是费正清的得意门生，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属第二代著名汉学家。施拉姆为第三代著名汉学家，影响较大的著作是《毛泽东传》（已有中译本）。

致遵义会议的成功和长征的胜利结束，到达陕北。

（遵义会议前三人小组领导一切）。

二

陕北苏区的作用和西安事变的影响。

落脚点与出发点。这部分红军得以保存（很危险了）。特殊的地理位置（抗日前线）。延安为中心：革命圣地（全国革命青年来归）。

西安事变（西北军、东北军中长期有党的作用。杨虎城、张学良的爱国、开明＝容共）。两大作用：蒋被迫抗日；红军得以保存发展。



1993年5月，李锐在科罗拉多大学参加《1936－1956年中国的党与国家的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国际研讨会，之后在波士顿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接受美国电视台和BBC电视台的采访。

三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地位完全确立，思想统一，党的一元化领导。

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首先军事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其全国影响。辩证法。哲学思想。

同国民党的斗争。统一战线。有理有利有节。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实践论》、《矛盾论》，也是以总结战争经验为主。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

《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决定中国走什么道路。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二步。

整风运动批判、总结王明路线的错误，提高和团结全党。（抢救运动的错误说明什么？）一般干部受到阶级教育。

党的一元化领导，导致全国解放胜利。毛泽东的个人决定权始于1943年3月的决议。毛泽东与党的无上权威，党政军民不分，一切统一于党领导，战争年代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否则革命无从获得胜利。

四

国民党的崩溃。战争的胜利。

日本投降前后的美蒋关系。苏蒋关系，斯大林的态度。

和平谈判。当时并无全国到手的雄心，只提出争取东北，扩大华北。

美国政策(?)和平溶共，同共斗争——支持蒋。白皮书。

蒋的错误。毛终于“和清一色”（原来是“平和”——打麻将的比喻）。

五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一）马恩列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党领导一切，高于一切。A.列斯对世界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世界革命的方针。（苏联第一。输出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总危机、总崩溃的时代。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等）。以及共产国际“左”的传统、专制传统的影响。（秘密党的条件）。B.几千年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影响，历代“明君圣主”的统治权术和经验，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C.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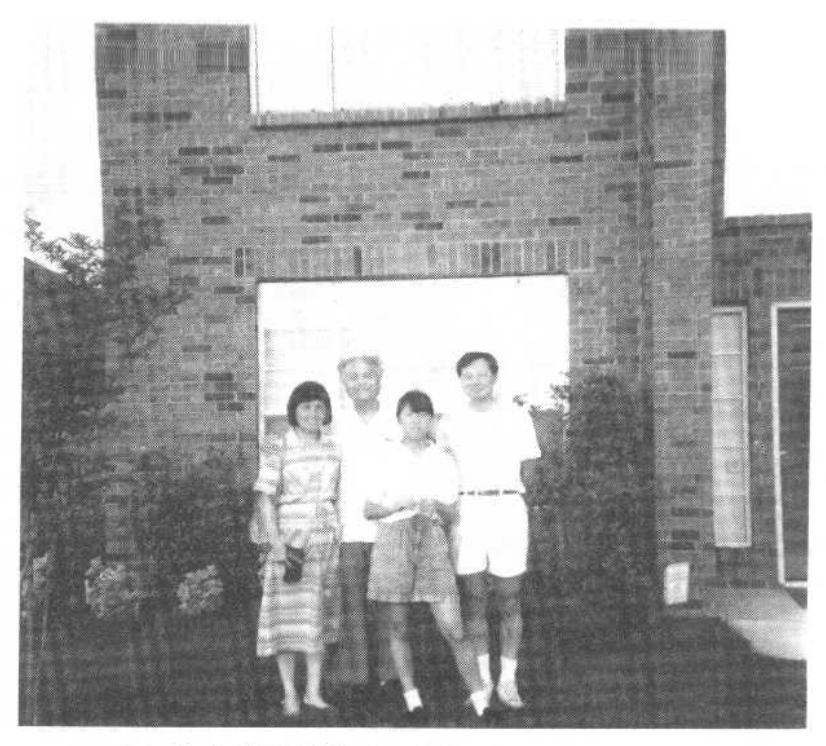


1993年6月19日，李锐在科罗拉多大学《1936－1965年中国的党与国家的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际研讨会上。

经验。主要是战争的经验和发动群众(群众运动)的经验。根据地的一元化领导。延安经验也影响到建国以后的党政不分。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D.中国土壤。封建社会与自然经济。中国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特点，对专制主义的纵容与容忍。

毛泽东在接受马恩列斯的旧教条之外，又补充了自己的新教条：A.消灭一切私有制，所有制关系决定论；B.发展的高速度(三年灾难)；"大跃进"。C.古今中外的空想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临终前说他办了两件大事。

执政党地位，仍强调"一元化"。毛泽东个人的独断专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天下大乱"做到了，"天下大治"则有待后人。



1997 年 5 月，在美国达拉斯女儿家中，祖孙三代，难得一聚。右一为女婿巴悌忠、右二为外孙女巴筱忙。

党内在重大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中央或地方领导人与毛泽东相左时，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权威受到挑战。不论从客观上看或主观上看都是如此。不赞成西方所说的：权力之争。当然，毛泽东担心也不愿意中国出赫鲁晓夫，死后有人做秘密报告。

毛泽东意见常变化，不好侍候。

毛泽东好用极端手段处事治人。不到黄河心不死。像关于原子弹的说法。

向毛反映意见，关于材料准确性问题，提供材料的人关系甚大。

六

林彪的作用。

1958年5月到7月，军委错误地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毛泽东说。苏联经验有好的、不好的、坏的三种，不要因反教条主义而否定一切。

庐山会议后，林彪到一线，主持军委。根据毛泽东"以我为主"方针，林推行了一整套"左"的东西："捷径"与"顶峰论"——只学毛泽东，不必学马列，学毛泽东著作，"一本万利"。"第三个里程碑"。"马克思没有写过什么哲学著作，列宁不过几篇小文章。"导师中毛泽东最伟大。"肚子里可以开飞机"。要服从、崇拜领袖。"要背警句，带着问题学。"背几十句就差不多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学"老三篇"。罗瑞卿、谭政反对。1961年4月30日罗在一个会议上说：带着问题学，那就是找现成答案。这句话不好，要学精神实质。这是庸俗化，简单化。（林首先整罗。）

紧跟。高举。1963年提出21个字方针。

"四个第一"（1960年9月12日）：

人的因素第一（人同武器）。

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同其他关系）。

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同事务性工作）。

活的思想第一（书本与活思想）。

"三八作风"。总强调突出政治、狠抓思想（思想一闪念）。

推动党的"左"倾错误，林彪起了很大作用，尤其在军队，为发动"文革"打好了思想、个人绝对服从的基础。

林彪：正确与不正确的东西，你不攻它，它即攻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即造你的反。

心中的人物



1980年5月，李锐参加刘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感慨良多：毛泽东、刘少奇相互之间，不能说相知不深，可是，当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刘少奇临终遗言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5月14日下午，刘少奇的骨灰从河南郑州由专机接回北京。王光美睹物思人，悲痛欲绝，无肠可断。

《刘少奇百年祭》序

1990年出差河南，曾特去开封看过刘少奇去世时的住处，老伴当时禁不住眼泪盈眶。1994年因事回湖南时，去过宁乡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参观后命留言时，特写下这么四句，从而表达了我的一种感叹：

> 少小离家北取经，沉沉井下掘光明。
> 旧颜已换新颜后，岂料元勋目不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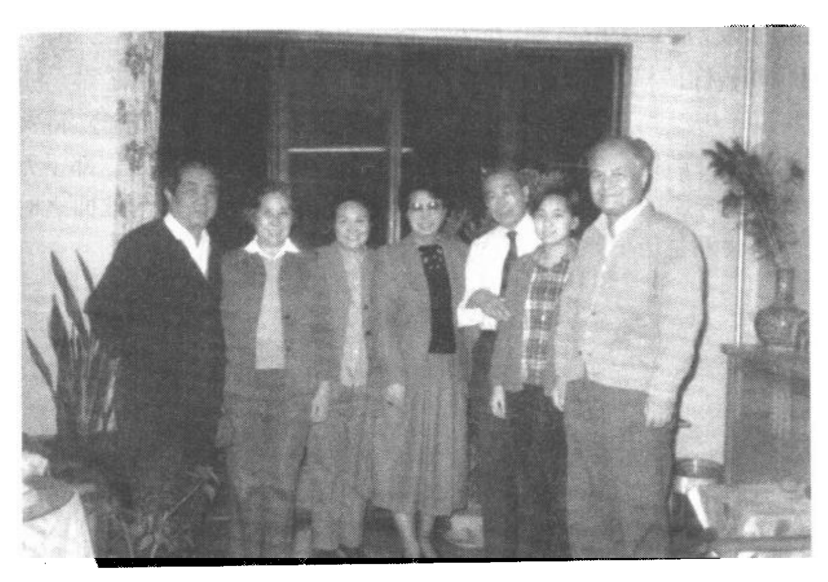
延安时期我在《解放日报》工作，记得1942年开始整风，刊载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长文，是毛泽东写的批示。从此就传开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以及他如何宣传、确定毛泽东思想，并写入党章。1950年我在湖南工作，开始搜集《早年毛泽东》资料，从安源大罢工中知道，毛刘二人结识得多么早。高岗事件后，知悉高为什么要攻击刘的天津讲话等情，自己的心眼比过去更多了一些。1958年1月南宁会议，狠批"反冒进"，这件事同少奇有关系。3月成都会议时，少奇在小组会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跟主席比，差一大截。毛泽东让我汇报开会情况时，我特意将此话传达。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大跃进"的问题暴露得更清楚，毛作了长篇讲话，提倡海瑞精神，颇多激动情绪的话语，突然冒出一句（转身对邓小平说）：我当主帅，你当副帅。大家对此很不理解，田家英告诉我，他们几人（包括胡乔木）估计，是否头晚安眠药吃多了。庐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及连年自然灾害，造成严重的后果，经济大幅度衰退，人民缺乏口粮，很多地方出现人口非自然减少。1961 年年底，刘少奇在广州温泉附近山上的树林里拣毛栗子、橡子和苦桔子，以解食品缺乏之困。

山会议最后一次大会上，刘的总结讲话中大谈个人崇拜的重要。山上下来，我已跌入深渊，但仍关注大势。10 月 1 日见到报纸头版并列两主席大幅照片，心中自然涌出：对少奇这并非好兆头。后来的七千人大会，听说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停办公共食堂、农村责任制等事，也隐约听到些传说。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号当权派”刘少奇，我就毫不奇怪了。

1980 年 2 月，刘少奇的追悼大会我参加了。当时心里想过，毛、刘相互之间，不能说相知不深，可是，当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历史悲剧？“文革”爆发之后，关于自己的命运，少奇本人可能还是预感不足、估计不足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但是，他留下这样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说明，离开这个世



80年代，李锐（右一）在秦川（左一）家与王光美（左二）等人在秦川家聚会。

界时，他有信心：历史会还他一个清白。

元戎罹难，四海同悲。中国自古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历代诗人有着关切国事与轸念民生的传统。所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刘少奇的遭遇自易激起诗人的感叹、哀思、同情与忠愤之气。不管是高居尊位还是远处江湖，都有权诉说，有权评论，有权歌哭。眼看20世纪就要过去了。一百年足以抹去记忆中的许多雪痕泥爪；然而，一百年又特别能唤起人们对无法忘怀的史事与人物的强烈感应，尤其是“十年浩劫”的灾难记忆犹新。1998年为刘少奇百岁诞辰，新世纪的旭日将升。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已让我们懂得怎样去创建新的生活，去搏击新的风雨，去书写新的篇章。刘少奇主席家乡人民正以高昂热情筹备这位伟人的百年大典。以诗歌颂祭英灵不失为一炷纯朴、别致的心香。“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早在1995年，宁乡的诗

人们就发起征诗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反响，三年之中，有6000多件诗稿源源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涌向少奇诞生之地。主其事者历经筛选，辑存500多首(篇)。如同《诗经》、《离骚》，诗文自是用心声铸成的历史，用情感和热血铸成的历史，这是一部千万颗心声吟成的历史，正好证明了少奇在惨遭迫害而悲愤难抑之时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负辱蒙冤，千古奇冤千古泪；
扬芬逝水，一瓢湘水一瓢情。

作为湘人，忝为"诗人"，《刘少奇百年祭》编者让我作篇序言，于是写了上面这样一些话，从而也寄托我对少奇同志的哀思。

学习彭德怀，做真正的人[①]

今年是彭德怀诞辰100周年。3月间，八一电影制片厂、军事科学院军史部送来《彭德怀》六集电视纪录片脚本，让我谈一些有关彭总的感想。最近，湘潭市负责人来，要我为《乌石吟——彭德怀同志百周年诞辰诗联集》作序。这当然都是由于我同1959年庐山一案有关。当年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有"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及其追随者"一语，所谓"追随者"即指李锐。下山之后继续批斗过程中，这个"反党集团"扩大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四个"反党集团"，"追随者"就多得很了：全国反右倾，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达380万！

我们这些"追随者"是幸运的，能够亲历冤假错案的平反，能够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彭德怀却是在囚居中1974年11月29日去世的，临终时他的身心多么惨痛：还戴着"野心家、伪君子、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如磐枷锁；无比的癌痛折磨得他用牙齿将被面撕成一条一条，哀求看守的警卫："你帮我打一枪吧！"

1982年2月，《彭德怀自述》出版时，我写了一篇长文《读〈彭德怀自述〉》(发表在《人民日报》)。文中谈到，在庐山"我也被迫作检讨时，坦然承认说过这样的话：彭总伟大，只有他敢于写这样的信。现在读完《自述》，更清楚了解一些历史关节之后，才使我真

① 此文系李锐为《乌石吟——彭德怀同志百周年诞辰诗联集》一书所作的序。



1945 年 5、6 月七大开会期间，彭德怀作了专题发言，总结了八路军抗战的伟大成绩和几点经验教训，除谈了个人方面的问题外，检讨了“百团大战”的得失。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他（彭德怀）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李锐认为，毛泽东对彭德怀成见之深，14 年后发生庐山之变自非偶然。图为 1950 年彭德怀在朝鲜前线视察阵地。

正知道彭总的伟大在何处。”文中列举了红军初创时的三件大事，以说明彭德怀照顾大局的博大胸怀：第一件是，平江起义后，彭率红五军一部（不足千人）上井岗山与红四军会合，为让疲惫的红四军安全撤走，奉毛泽东命，坚守井岗山，同强三四十倍的敌人艰苦作战。第二件是，坚决反对一、三军团分家（即反对三军团中的地方主义），“拥护朱、毛为旗帜”，从而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三件是，揭露分裂毛、彭关系的伪造信件，“坚决拥护毛政委和总前委的领导”，避免了红军的分裂。庐山会议上，人们指责彭德怀“一贯反毛主席”；毛自己也坚持，他同彭的关系是“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对抗）”。根据《自述》，十年内战时期，彭德怀其实并没有

盲目执行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路线；在抗战初期，也并没有执行王明的右倾路线。可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许多误解始终耿耿于怀，误解之处，彭也从不作解释。有一个典型事例，即林彪信件。长征途中，1935年5月中旬，中央召开会理会议，当时林彪对毛泽东指挥军事不满，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建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写此信，事前彭德怀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林彪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自述》中写道，虽然"当时听了有些难过，但没有申明，而是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庐山会议常委会批判彭德怀时，毛又重提出此事。这时大家都面对面，林彪才申明，他写信彭不知道。我亲历了这个场面。

现在好几种彭德怀的传记出版了，许多老同志、老将军的回忆录中，也有不少谈及彭老总的旧事，因此，彭德怀一生功绩及为人刚直，大家知道得更多、更清楚了。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还涉及到华北座谈会事，彭对这个座谈会是一直有意见的。党的七大召开之前，1945年2、3月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彭德怀受到批判和"围攻"。与会者尤集中火力攻击百团大战，从而清算彭的历史，说他"闹独立性"。百团大战的是非，现在已有了历史公论。关于华北座谈会，主要当事人之一薄一波，在他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一书中，作了公正的回顾。当时批百团大战，薄这样说道："我和杨尚昆、安子文同志都是参加了并且赞成百团大战的，可是在这种气氛下，未能起来据理反驳，内心深感不安和惭愧。""对于华北工作座谈会上错误的批评，彭德怀同志没有做违心的检查。他多次说过：'承认错误不要哗众取宠'，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师哲所写《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讲到毛泽东对彭德怀看

法的一个细节。1945 年 5、6 月七大开会期间，彭德怀作了专题发言，总结了八路军抗战的伟大成绩和几点经验教训，除谈到他个人方面的问题外，检讨了"百团大战"的得失，承担了责任。师哲写道："彭德怀敢于自我批评，不但严于解剖自己，问题谈得很深刻，而且态度谦虚，严肃认真，既无矫揉造作之态，也无哗众取宠之心。一个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正视，勇于揭发，能够实事求是地说出心里话，这是难能可贵的共产主义品格。""当时我也确是第一次听到像他那样的负责干部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所做的那样严格的自我批评。"两天后，毛泽东问师哲对彭德怀讲话的认识和感想，师哲如实表态，没想到，毛不高兴了，这样对师哲说："他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他是心悦诚服的。"毛还补充说："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彭德怀成见之深，14 年后发生庐山之变自非偶然。

师哲同彭德怀接触多了之后，才深深感到："彭总为人耿直，心直口快，坚持真理，一心为革命。他出身贫寒，没有念过多少书，但是才智过人，爱钻研问题，又爱学习，他常讲只要持之以恒，也可水滴石穿。"在转战陕北时，师哲亲眼目睹彭老总同士兵共艰苦，彭有胃病，想为他改善生活，反而碰了大钉子。"司令员生活简朴，旅长、师长们自然也不敢特殊化。彭总吃大灶，和战士们吃的完全一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命令。"

1994 年，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出传记的"续编"——《一个真正的人》，让后人知道我们的"彭大将军"人民共和国元帅的"临终遗言"，这是此书的最后一节。彭德怀去世前两个月，中央军委派来"专案审查人员"征求他的"临终谈话"。"他流着泪，舌头僵硬，讲话已很困难，但他还是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出临终遗言：

"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编者于此附了这样一句话："他对毛主席的感情至死没变，对毛泽东的错误在最后的日子里也几次提出来，并说可以报告毛泽东。"

"周总理，我们相处 30 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

泽东思想策略的。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

“我们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编者说：“他奋斗一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关心人民的幸福和疾苦，二是关心国家的安危。他临终最担心的不是他自己，是国家安全。”

最后，关于自己的“案子”，彭德怀只讲了这样一句话：“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做结论。”

我在《读〈彭德怀自述〉》文中，最后写了这样的话：“这本《自述》应当向每一个青年、每一个共产党员推荐：这是一部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教科书。”

彭德怀的一生，他的功绩、为人、处事，总之，他的伟大精神将永垂史册，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彭德怀的家乡湖南湘潭人民，为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特向全国征求诗词曲联，共收到4000多件，经过编选，《乌石吟》这个集子中共收701首，其中诗321首、词107首、曲5首、联268副。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纪念活在人们心中人物的一种最富于表达感情和心意的办法。怀念彭德怀这位伟大的真正的人，我曾写过四首诗，三首七律（前两首“文革”时囚居秦城时作）、一首七绝（已刊《龙胆紫集》新编）。现抄在下面，以结束这篇序言。

庐山吟（之八）

山雨已来风撼楼，重温旧事溯源流。
轻看游击藐边界，急欲兴师不省州。
延水岸边无舸橹，太行脊山有山头。

春秋三十匆匆过，风雨来时不一舟。

（记常委会毛泽东批彭德怀。）

彭德怀

煤窑子弟爱红军，自许张飞不二心。

亲耳平江空谷足，未谈长岛梦婆春。

百团大战惊倭寇，三载援朝卫国门。

今识庐山真面目，是非功过后人分。

（1958 年 4 月由武昌赴广州开会前夕，彭总知我原籍平江，曾详谈平江起义经过。）

题朱维民油画《自述》
——纪念彭德怀逝世十周年

忍尤攘垢夜沉沉，九死其犹未悔心。

愿剖寸丹喷血泪，唯将坦白示胸襟。

平生事业沙场日，旷代文章泽畔吟。

天地浩然存正气，画图难写世情深。

彭德怀铜像揭幕

岂止沙场百战身，却留委曲受伤心。

一篇自述垂青史，万古雄姿照世人。

（1990 年 10 月 24 日，彭德怀同志铜像在湖南平江揭幕，未能前往，特书此绝，以表敬意。

1998 年 7 月 26 日于怀柔宽沟

帅大姐期颐大庆

十年前元旦的第二天，我去看望帅大姐，才知道1月3日是她的90大寿。这天我作了一首五律写好送去，最后一句是“回首一生雄”，并以此为题写了篇文章，谈到1938年在湖南地下党时就开始结识大姐。从此每届元旦，就会想起大姐来。大姐92岁生日时，应《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一书编辑之约，我又写了篇短文，着重谈大姐一生不随风倒，从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闹宗派起，到延安抢救运动，到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她都敢于顶风，敢讲真话；还写到她虽文化不高，却极其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亲近知识分子。文章以一首五律结尾，其中“平生只为公”一句，即此文的题目。（两篇小文都在《瞭望》发表过。）

进入90年代后，大姐就因病长期住在医院了。每年我总要去看望两三次，她双目已近完全失明，但总听得出我的声音：是李锐来了。前几天，她的秘书陈双璧告诉我，大姐明年100岁，小小的纪念一下，要我再写几句。我的心情自然很不平静。1982年我调到中央组织部后，同大姐的来往才密切起来。想到她的一生奋斗，一生坎坷，特别是两次濒临死亡，能活到100岁，真是人间奇迹。是什么力量，精神的，体质的？能使她达到如此高龄。于是我吟得四句，先用电话告知双璧：

大姐英名天下闻，死生两度炼金身。
百年曲折坎坷路，铁骨冰心传后人。



帅孟奇大姐一生不随风倒，从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闹宗派起，到延安抢救运动，到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她都敢于顶风，敢讲真话，虽文化不高，却极其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亲近知识分子。李锐每年都要去医院看望帅大姐，这是帅大姐百岁大寿时，李锐前去医院祝寿。

死生两度之一：1932年大姐在国民党的刑庭上，受过罕见的酷刑，三次倒灌煤油水，七孔流血，牙齿被打掉，左眼失明，腿骨折断。1935年瓦窑堡开全国党代会时，帅孟奇曾被列入烈士名单。她被判无期徒刑，抗战爆发后才出狱。1938年我见到她时，才42岁，已经显得老态了。50年代，李伯钊为大姐写过一本书《一个女共产党员》，详细写到了大姐在南京监狱中这段经历。这本书发行了几十万册，教育了一代青年。

死生两度之二："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大姐在中组部主管外交外贸干部工作，被康生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罪名，受造反派的批斗折磨，关入监狱7年。这一次右眼被打坏了，加之狱中通

夜不关电灯，眼睛受不了光照，逐渐失明。1967年她已71岁，经过此种摧残之后，患有心脏病，尿中毒，后来全身浮肿。康生为留下“活口”，大姐得以送到医院开刀，九死一生，留下一条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

大姐从来没有跟我谈过她在“文革”时受折磨的情况。1978年她从流放地江西回到北京，住在医院时，妇联的原负责干部去看望她，问起她右眼为何失明时，大姐忍不住谈了原委：“关押起来，白天、晚上进行车轮战，逼我承认‘叛徒’、‘特务’，经常吼叫：‘站起来，低头’。我的右腿在国民党监牢里坐老虎凳折断过，站久了，腿就发抖，倒在地上。他们把我抓起来，强迫我站立，我又倒在地上。就这样，日夜连续批斗50天。有一次审问时，一位专案组的人把《一个女共产党员》一书卷成一个筒，一边批，一边挥动书，打在我的右眼上。她恶狠狠地说：‘看你这本书欺骗了多少革命青年，你还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吗？’后来右眼肿起来了，发了炎，也不给治疗，因此，右眼受了严重创伤，失去了视力，这是我最痛苦的。”她沉默了一会儿，乐观地说：“两次坐牢，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要看到四化的实现，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①

是的，“要看到四化的实现”，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力量，使大姐战胜一切身体的疾病和磨难，活了下来，活到100岁，她的生命的力量还没有终止。大姐并无什么养生之道，一生粗茶淡饭，生活极其俭朴。她节衣缩食，省下的钱捐献给地方的教育事业和援助有困难的人。她常说：“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有的人住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这只会脱离群众，害了子女。”为了反对歪风邪气，端正党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她克服双眼失明的困难，写了许多文章，回忆何宝珍、徐特立、钱瑛、邓中夏、彭湃、陈谭秋等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她还为《中国妇女》写了《学习张志新同志的崇高品德》，对“四人帮”残害张志新，表示极大的义愤，认

---

① 引自《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204－205页。

为这不过表示“四人帮”的虚弱。大姐说：“张志新是捍卫真理的模范，她真正做到了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她坚持真理，从容就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值得每个党员学习。”[1]

帅大姐的终身好友，在莫斯科就同学的刘英大姐说：“我敬她，爱她，从心底里钦佩她！她称得上是党内楷模，女中英豪。”

帅大姐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她的一生，代表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苦难、曲折、光辉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

① 引自前书 20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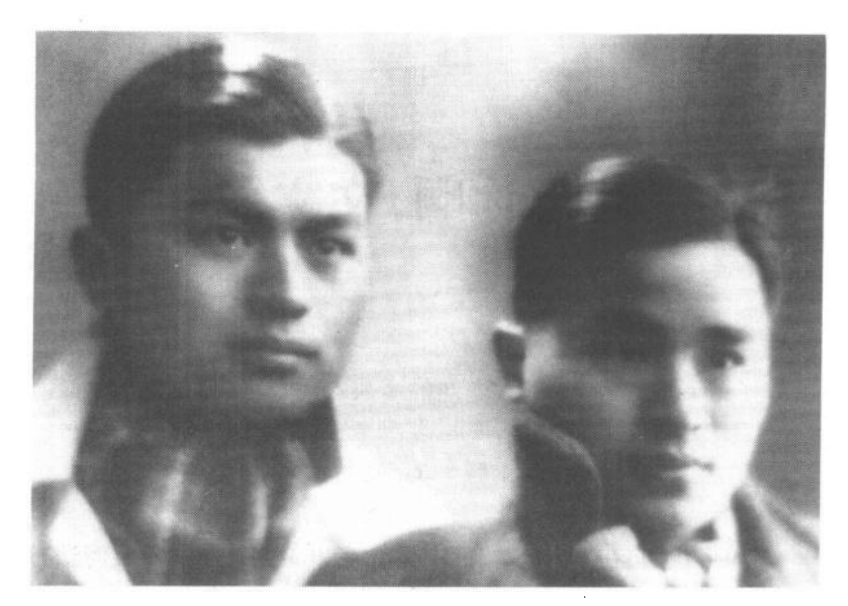
想念你啊，文立徵

寇逼徐州入鲁先，得知消息换人间。
忠魂定不回衡岳，日出当观泰岳巅。
——《龙胆紫集，哭文立徵》

70年代初，在京郊秦城狱中怀念老友立徵时，作了上面这首绝句。我们是平津失陷后一起到济南并留在山东的。1938年3月，我到武汉开会，碰到立徵从鲁北前线辗转回后方找组织关系。于是我介绍他入了党，一起来到徐州；他和同行的十几个青年同志，立刻被苏鲁豫特委派到鲁南开辟工作。我们就此分手，一直不通音讯。1949年南下途中，遇到山东的老同志，才知立徵于1945年初在鲁南游击区牺牲了。

去年1月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立徵的一位表弟不断来信，为的是立徵老家湖南衡山县，由于"找不到入党证明人"，多年来不承认立徵的烈士身份，甚至还有说他是伪军的。表弟寄来一厚本复印的22个人写的证明材料，他们都是立徵的战友和同事，有省军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特级战斗英雄、游击区区长、影片《大浪淘沙》作者，等等。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这位老同学、好朋友文立徵，原来还担任过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的政委。

现在的年青人呵，你可曾知道，你们从电影和小说上认识的那位铁道游击队政委，牺牲时还不过34岁；他家中富有，是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的儿子；他在北平辅仁大学学化学，英文很好，又爱好



文立徵，李锐的中学好友，出身军官家庭，追求进步，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抗战期间是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是电影和小说中的政委李正的原型，因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年仅 34 岁。文在艰苦环境中打了八年游击战，只有短暂的初恋，终身未婚。图为李锐（左）与文立徵在高中时期的合影。

文艺，会吹口琴，还喜欢照相，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期间，他在鲁南艰苦的环境中打了八年游击战；他只有短暂的初恋，没有结婚……

为了敦促我写一篇纪念立徵的文章，他的表弟又寄来珍藏的立徵于 1934、1935 两年写给弟弟的 15 封信，其中有 1935 年 12 月 11 日、18 日两信，详细描述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参加游行示威的悲壮情景。"一二·九"的当夜，立徵就给我写了信，告知游行队伍怎样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水龙、皮带奋战。我收到这封信后，即用报纸抄好，张贴在文学院大门口，燃起了武汉大学同学们的愤怒之火。

在中学时，立徵是一个非常用功、沉默寡言的人；午饭后必临魏碑，当作午休。我们直到高三才成为好朋友。这是由于两人都



这幅字是李锐 1982 年 8 月 16 日为文立徵烈士扫墓前夕应文立徵烈士的表弟陈铁如同志之请而作的。

爱读邹韬奋编的《生活》，都好写白话文，一起办班上的墙报，常常旷课同去看联华公司的进步电影，我们的政治思想倾向完全相同。1934年上大学后，我们每周通信，从不间断；谈论的范围很广，"一二·九"前后，华北形势、国家命运成为主要话题。当年的辅仁是有党组织的，大概由于立徵沉静内向的性格，以及学校生活，没有可能同组织中人接触。1937年5月，我离开学校来到北平接党的关系。6月间，他就正式办了退学手续，跟我住在一起。遗憾的是，当时没来得及介绍他入党；但他从我处看到了许多党的刊物。他也认为自己已像我一样，是一个共产党员了。1937年8月到达济南后，我们就决定不回后方，留在山东打游击，接受组织的安排，进了韩复榘第三路军的抗日军政工作人员训练班。大概从这时起，他的性格和作风，有了某种根本的变化。

从1938年3月后，我和立徵虽然没有再生活、战斗在一起，但这一厚本证明材料告诉我：这个沉默寡言，曾经热心于化学试验的人，由于斗争的需要，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普通一员，成长为一名深受鲁南当地人民爱戴的游击战士和指挥员。鲁南人民义勇总队和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都是1938年春夏间建立的党领导的群众武装。立徵参加这个部队后，就改名文立正。据当时在这个部队任政训处长的朱道南同志说："我只兼名义，实际工作由文立正做。1938年三四月间，我们带义勇队一个大队到台儿庄一带活动，随即回到峄县四区，和国民党几个比较进步的司令共同协议成立了山外抗日联合委员会，办了一个青年训练班，由文立正负责主持。1938年7月，同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特种工作团第五大队的邵剑秋，抗日坚决，政治进步，一再要求立正到该部工作。特委即派立正以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到第五大队，在那里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立正的威信甚高，为所有的干部和士兵所爱戴。"1938年秋，朱道南到国民党第三专署保安第五旅工作，这是一支带土匪成分的队伍，工作很困难。朱道南就向山东分局统战部要求，立徵又被调来当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整顿好了后，1939年

秋，立微又被调回第五大队。朱道南说，“当年冬，邵剑秋部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这可说是文立正同志初期工作的一大成果。”

立微在第五大队和运河支队工作两年多，邵剑秋至今非常怀念他。他写的材料说：第五大队成员都是自愿集合起来抗日的老百姓，只有朴素的民族意识，对抗战的持久性、艰巨性认识不清，更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立微在部队教政治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用油印印成带画的书，极受战士欢迎，终于使这支部队成为有纪律、有觉悟的抗日部队。在运河支队成立前，干部和战士都叫他文老师。这支部队在立微的教育指导下，在军事上也懂得了游击战术，除了一般战斗外，打过好几次比较有名的胜仗。如在津浦路上唐湖车站附近袭击日寇军用火车，在津浦路侧伏击汽车，曹家埠歼灭战，夜袭利口铁矿，奇袭唐湖车站据点，等等。这都同立微的正确指挥有直接关系。在抗战年代里，部队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吃饭、穿衣全靠当地群众。在日寇扫荡、围剿、封锁和日、伪、顽合流向我们进攻的情况下，常常吃不饱、穿不暖。立微爱吃高粱煎饼卷辣椒，常穿一件破棉袍。

1941 年 3 月，立微被鲁南军区派到第三军分区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这个地区即现在的临沂、郯城、邳县、枣庄平原地区，是当年非常艰苦的游击区。1943 年到峄、滕、沛地区检查独立支队工作时，因政治委员牺牲了，即留立微任独立支队政委，并兼任过八个月铁道游击队政委。后来由于小说和电影的关系，铁道游击队真是十分出名了，当年配合铁道游击队工作，在临城六区当区长的范有功，追忆起政委文立微的时候，叙述了当年他在游击队的一些生动场面：为了应付敌人，他穿着褴褛的衣服，戴一顶破毡帽头，穿一双铲鞋(一种很结实的布鞋)。真像小说上写的李正，穿一件破烂棉袍，束一根用布旒子编成的腰带。他个儿矮，袍子太长，就把前大襟翻起，掖在腰带里。破裤子也补满了白、黑、蓝各色补丁。他常带两支短枪，掖在胸前袍子里。战士们在铁路上斗争，

都穿一色服装,很“阔气”,都有手表,好枪。文立徵等领导同志跟随队伍在周围村子里隐蔽指挥。当时护送干部过路,他总亲自参加。记得有一次大清早,见他毡帽上沾有稻草,准是夜里在哪个草堆里“歪块”(随便躺)了半夜。当时生活很苦,几个小枣也算一天口粮。有一天,他拿着一小块果子饼认真地对范有功说:“伙计,咱们今晚有饭了。”他非常爱学习,军装上衣和大襟衣的口袋里,全是自己用布面钉的小记录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铅笔字。他很沉着,遇事总要弄个清楚,不轻易下决断。他非常乐观,对人总是和蔼可亲,从不高声说话。他是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却很活跃,会吹口琴,总随身带着,一边吹,一边还教小孩们跳舞。

1945 年 2 月,立徵到当时的临城县六区(今滕县西岗公社)检查扩军情况,这一带群众都亲热地叫他文科长。这里是游击区,他住在丁家堂村。区武装队的一个副班长是内奸,勾结伪专员大汉奸申宪五的匪军,于 2 月 22 日深夜突然袭击,立徵不幸遇难。滕县以西、微山县以北广大群众,知道文科长在丁家堂牺牲了,称这次事件为“丁家堂惨案”。1945 年和 1948 年,这个内奸和申宪五先后被我军捕获,在当地开了公审大会后枪决。

立徵牺牲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十分悲痛,从当地一个大地主家找来一口柏木棺材,将他的背包、衣物一起入殓,埋葬在丁家堂村;在追悼会上唱了临时编的挽歌。解放以后,西岗公社丁家堂村等地群众每年清明和国庆节,总有几千人到文科长墓前开纪念大会,献上花圈,安上高音喇叭,宣传他的英雄事迹。

相信立徵家乡湖南省衡山县的人民,也一定会以故乡出了这样一个人民的好儿子而引为光荣。忠魂呵,你现在可以回衡岳省亲,看望看望家园了。

1980 年 11 月

怀念田家英

跟家英是在延安时就认识的。延安当年是一个“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的地方；人们相互间很容易熟识，没有什么戒备(整风审干填“小广播”表，那是后来的事情)。1941 后，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文章寄来，必经我手，于是也就成了“文字之交”。延安的生活，值得人们回忆的事情是很多的。如“粗布服”的这个题目，就很值得写一篇文章。那时每年只发一套单衣，衬衣裤是不发的。夏天人们都爱下河洗衣、洗澡或找水深之处游泳。有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见一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

文字之交后来一直保持着。解放初期在湖南工作时，我写过一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的革命与反革命》，家英在《长江日报》上见到，压缩了工人运动等部分，改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推荐给《学习》发表了。原来我还以为是《学习》哪一位编辑多事。1952 年调北京后，我转到工业系统工作。第一次见面时，我把过去搜集到的一大批有关近代、现代史的书籍，全部送给他了，表示从此“洗手”，同文字生涯告别。可是仍然留下一个“麻烦”：离开湖南前夕，我匆匆写了本书，《中国青年》要连载，于是将这个“麻烦”交给了家英，由他全权处理，他的工作岗位也便于处理此事。1956 年此书出版时，对他删改的一些部分，我有不同意见，又恢复了原状，但他并不坚持己见。

由于“隔行隔山”，同在北京，却不易见面。大概是1955年或



李锐与田家英是在延安时认识的，文字之交一直保持着。田家英才华横溢，作毛泽东的秘书多年，主编《毛泽东选集》四卷之注释；为人耿直，敢于直言。"文化大革命"受陈伯达、江青陷害，自杀身亡，以死抗争。图为田家英1959年夏在一艘船上的留影。

1956年，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同另外一位共同熟识的朋友碰到一起了，天南海北，古今上下，乱扯了一阵；意犹未尽，肚子又有一点饿，于是一同到西四牌楼的宵夜摊，吃小菜，喝老酒。家英是四川人，龙门阵摆到深夜两点。70年代初，在京郊那个所谓隔离审查的地方，有一天忽然想这件事，感慨系之，哼了四句：

> 咫尺天涯见面难，只缘都在做京官。
> 百年不遇龙门阵，西四牌楼宵夜摊。

几天之后，犹感伤不已，估计总有一天会再经过西四牌楼的，于是又哼了一首：

何处再寻宵夜摊？四牌楼下景非前。
曾经有句怜遥梦，相对无人哭逝川。

由于一种千载难逢的偶然机会，从1958年1月开始，直到1959年9月，我们得以时常在工作也是开会时见面了。大家知道，这个期间是当代中国发生第一个大折腾的年代。我们比一般同志更直接地生活在历史的漩涡之中。作为个人来说，我大呛了几口水，被淹得半死不活。家英好，得以幸免。这个期间的交往，就不限于摆摆龙门阵，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了。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前些日子，去看家英夫人董边同志，才知道，我们当年交心的内容，有许多家英并没有跟自己的妻子说过。我在工业部门，他则常下农村。在了解情况方面，我们正好互相补充，使头脑比较冷静，有共同语言，能够不留情面地针砭时弊。我们都经过延安的整风学习，有作调查研究的习惯（在延安时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不喜欢说也讨厌听那些空话、大话，很看不惯某些吹牛奉迎的人。我们年纪轻些，在某些人眼中，也许属于"嘴上没毛"之类，但我们保有"赤子之心"。

家英从小失去父母，在哥哥姐姐家中长大，当过中药铺的小学徒，这使他熟悉民间疾苦。他在抗战前，接受成都地下党同志的引导，积极参加救亡活动。1937年到延安。1947年他参加过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深知农村情况。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了，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买

账，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探听气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风，我们非常反感，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果然，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这位“经济学家”赶时髦，抢浪头，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毛主席的严厉的批评指责。摔了这个筋斗，陈伯达痛苦之至，我们毫不同情。

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家英在四川农村蹲点，是穿着“便服”赶到上海的，几乎引起进出住处的不便。那次会议，东道主极尽招待之能事。此时此地，他向我描述了在农村挨饿的情景，以及基层干部如实反映的浮夸。那时他领导的一个工作组正在四川有名的全国劳模罗世发的家乡作调查，罗世发谈了他如何被逼讲假话、虚报产量的情况。6月底，庐山会议之前，许多严重的“左”的错误，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特别是共产风，已经发现，在逐步纠正之中。开会前夕，毛主席提出十九个要讨论的问题，准备纠“左”。会议的初期，是“神仙会”，毛主席找我们少数几个人谈了三次，谈得很融洽，有时满堂欢笑。家英将工作组写的有关罗世发的材料交了上去。我们尽自己所知，作了汇报，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最重要的一条是：应当让陈云同志重新主管财经工作。

在延安时，我们是革命的晚辈，通过整风学习，更加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深刻理解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对毛主席的敬仰、尊重，自信不比许多老同志差。《毛泽东选集》四卷中所反映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我们也不比陈伯达之流了解得差。尤其家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987条注释的主编，更是如此。由于各自有机会接触过主席的一些手迹，以及早年不为人所知的史事。或者直接多年在身边工作，我们对主席的不同凡响、棋高一着，比一般同志可能感触更深一些。可是，我们也确实没有将主席当作一尊神，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人。因而对主席的某些缺点和作法，私下常有些议论。如在“大跃进”时我们就谈过，主席对经济工作不熟悉，缺乏这方面必须具备的知

识，在经济理论方面尤其没有钻研过，因此，处理有关经济的问题，就远不如处理军事、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家英当时有一个集中的想法，即主席应当摆脱日常事务，总结一些重大经验，专心于理论的著作，这样，对后代更有意义。在庐山时，他跟我谈过一副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即指这个意思。他很惋惜主席志不在此。在早就同我谈过，编《毛泽东选集》时，主席常有厌于回顾旧作的情绪，而兴趣全在新的事物。

1959年庐山的大风波，原因复杂，这同当时有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之人，也有关系。7月23日，正式宣布批判彭德怀同志之后，我和家英等四个人，沿山漫步，半天也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阵阵，大家仍无言相对。亭中有一块大石，上刻王阳明一首七绝，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一首对联吧。我拣起地下烧焦的松枝，欲书未能时，家英抢着写了这一首名联：

> 四面江山来眼底
> 万家忧乐到心头

写完了，四个人依旧默默无声，沿着来时的道路，各自归去。

家英当年跟我谈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最后一条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应当说，这是一个党员对党的领袖最高的关怀。在山上开"神仙会"阶段，由于我的不谨慎，将这三条意见同一位有老交情的同志谈了，开大会时被捅了出来。此事当时虽被"掩盖"过去，仍然影响到家英后来的处境，使我长期耿耿于怀。在山上时，我曾有过一种很悲观的情绪，向家英流露过。开完会，回到北京之后，他特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1960年到1961年，我在北大荒劳动。前期在一个村子里，同

老乡三同;后期调到虎林西岗农场场部,场部的生活条件稍好一些,由于身体关系,1961年底调回北京。其后两年,我独自一人在京闲居。两年间,同家英见过三次面,都是电话约到市内某一新华书店碰面,然后带着大口罩,漫步街头,找到有单间的饭馆,继续过去那种长谈。第一次碰面,我才知道在北大荒调到场部,是他和别的几个关心我的同志作的安排。70年代初作的杂诗中,曾记述此事:"打起精神学打场,忽然意外转西岗,长安故旧多关切,不忍其人葬大荒。"这次在饭馆谈了一个下午,谈到北大荒当时少见炊烟的暮色和农民的挨饿景况时,我很动了感情。家英也谈起庐山会议之后他所受的种种冷遇。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国家和人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搞大运动了。分手前,一起哼成了下面这首诗:

闹市遮颜过,胡同尚可行。
人间多雨露,老友系诗情。
冷眼观尘世,丹心向众生。
炎凉何必叹,把酒贱浮名。

1963年12月,我被派到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去当文化教员。离京之前,与家英话别,到后海岸边散步,深夜又到一个小酒店喝酒。当然,谈的主要还是当前大事。他正参加起草农村工作的后十条,说不久后,我会听到传达的。他谈此事,也是让我对形势放心之意。临分手时,走过景山很远了,又讲起吴季子来。对我的遭遇,这夜他特别感慨系之。夜半回到住处时,不能成寐,直到吟得下面一律,才勉强睡去;

客身不意复南迁,随遇而安别亦难。
后海林荫同月步,鼓楼酒座候灯阑。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夜半宫西墙在望,不知相见又何年。

真没料到，这夜竟是我同家英的永诀！“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虽然相约，如有事就直接通信，但接受山上的教训，莫再连累他，一直没有给他写过信，上面这首诗他也不知道。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害致死的情况。21日“中央文革”来人通知，两条罪名：同当时被批斗的办公厅负责同志关系不正常；一贯右倾。撤职交代，搬出中南海，并收走了全部文件。随即又听到办公厅大会上宣布了另一条罪状：篡改毛主席著作。这是指整理有关《海瑞罢官》的谈话时，他不赞成将彭德怀写进去。他这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的陷害。真想不到兢兢业业18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70年代初，住秦城监狱怀念家英时，还作过这样一首七律：

古柳安详围海边，园中深院院中园。
多时不见忽相忆，无事而来乱扯谈。
世界纵横三万里，古今上下五千年。
戏言犹记料身后，又是黄昏絮满天！

家英专搜集清人字，我则兼搜字画；曾戏约后入土者，有继承权。董边同志告诉我，家英的藏书只收回很少一部分，有些难得的字条已散失，我送给他的一幅郑板桥字还幸存。收回的书籍中找到一本有我签名的日本版《东洋读史地图》，就带回留着纪念了。

这篇琐碎的“怀念”该结束了。但是对家英的怀念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1979年12月

怀丁玲

丁玲在我心中一直受到尊敬，是从中学时期开始的。1928 年到 1934 年，我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

大革命时期的长沙是轰轰烈烈的，我正读小学五年级，是班上童子团的小头头。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那时就读过。从此，就爱看左翼小说。大革命失败后，长沙很难买到左翼的书刊了，商务《小说月报》倒是常看到的。记得是 1931 年，在《小说月报》上读到丁玲的《田家冲》，一下就吸引了我。这篇小说是从一个佃户家的幺妹的眼睛，去看一个临时隐蔽在她家的革命者（东家的三小姐）的活动。在当年读过的进步小说中，这篇印象特深，大概也同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老家平江长寿街是老苏区，红白斗争极为尖锐，家乡不时传来这方面的信息。

1931 年我随母亲去过老家一次，到过乡下佃户家，父亲的坟墓在那家附近。因之对丁玲笔下的三小姐，有一种藏之内心的特殊感情，似乎她的血也在我身上流着。当然，这种革命意识是很朦胧的。我投身于革命，是"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但少年时就爱好左翼文艺，无疑是有很大关系。1933 年丁玲被捕之后，《良友》出版的《母亲》、《记丁玲》等，以及记载她的事迹的出版物，我都是怀着关切的心情读过的。

1941 年《解放日报》出刊后不久，我就调到报社。1942 年改版之前，编辑部的分工是一、二、三、四版，一、二版是要闻与国际，三版是国内，四版上半截陕甘宁边区、下半截文艺副刊。我是国内版



毛泽东对丁玲来延安是非常高兴的，并赠送丁玲《临江仙》词，中有“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句。丁玲因孩子生病未能参加毛泽东与江青婚宴，因而结怨江青，对此丁玲感慨甚多。李锐与丁玲 1979 年同住一幢公寓，经常在一起闲谈，图为 1983 年李锐（左二）与丁玲（中）等人在北京家中。

编辑，丁玲是文艺主编。我们同住在一排新打的土窑洞，大家都在几个新砌的烧地炕的大石窑洞中办公，每人一张小白木桌子。我最初值夜班，文艺版不值夜班，但大家天天见面，也有机会闲谈。我同丁玲谈起过读《田家冲》的印象，又都是湖南人，在湖南地下党活动时我去过常德，20 年代她也在岳云读过书。因此，共同的话题甚多。有一天晚上，我到她的窑洞中闲坐，谈得很晚。她详细谈了软禁在南京的情况，逃出来时得到当时在南京教书的方令孺的帮助。这次谈话，是我有意扯到这个题目。

丁玲在延安发表的作品，我都是及时读了的，有的内容很有同感。如《在医院中》这个短篇，写上海一个产科学校的毕业生陆萍，在离延安 40 里地一个刚开办的医院里工作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边区生活的一个侧面。对于要求把革命根据地写成黄金世界的观点来说，这篇小说当然不合胃口；但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不

能不承认小说描写得相当真实，而且是充满着善意的。显然，作者是希望消除某些消极的和不健康的东西，才写这篇作品的。医院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主要的还不是战争环境和物资匮乏造成的，更多的是主观上的因素。小说中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例如，医院的院长是一个“在军队里工作很久，对医务完全是外行”的人。一个什么处长的妻子，只认识几十个字，“对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却可以安排在这里做技术性很强的护士工作。陆萍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革命既然是为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后来，比这篇作品遭到更为严重的一再批判的，是 1942 年的《三八节有感》那篇杂文。在这之前的 1941 年 10 月的文艺副刊上，还有过她的一篇《我们需要杂文》，其中有这样的话：“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接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不是吗，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还有现实的意义。

我到《解放日报》之前，在中央青委工作。当时机关工作不甚紧张，知识分子干部聚在一起，年纪、经历差不太多，都有些少年气盛，曾在机关所在地的大砭沟口，立了一个大木牌，办过当年有名的杂文大墙报——《轻骑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一些认为是落后的或不顺眼的现象。我也是积极分子之一，最初几期写过文章。上述丁玲几篇文章留在记忆中，就是因为当时思想观点有相同之处。当然，整风运动开始之后，我们都检查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激思想”。《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闯了大祸的，是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近年话旧，丁玲还谈起过，发王实味的文章时，她已经离开报社到了“文抗”（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住在乡下。这以后在延安，我们就没有再碰过面。

1948 年初，我从热河调到东北局工作。丁玲前往苏联访问，

经过哈尔滨，我们又见了面。她到我的住处坐了一阵，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经过，原稿曾送予毛主席过目，还把当时东北刚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送了我一本。这本作者签名的初版本，1949年南下到湖南后，就被人借去了。这一别就是整整三十年！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时，康濯同志曾持她的介绍信来找过我。1952年我调到北京，改行到工业部门工作，50年代在北京也没有见过面。1959年以后，我同她有着近似的命运。我们同时在北大荒呆过，同时在秦城呆过，不过彼此都无从知道罢了。

天回地转，到了1979年3月，有一个月时间，我与丁玲同住在医院，于是又能串门闲谈了。刚入医院，我是在脑神经科做检查时，突然遇见她的。白头相对，当然她的头发比我的白得多。令人安慰的是，她精神甚好，谈锋仍健。“屋破又逢连夜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在北大荒吃的苦头，那些皮肉之刑，我还没有经历过，她居然活了过来，真是不易。我觉得这同陈明同志的长期照顾有关。他俩如“涸泽之鲋，相濡以沫”，被隔离时也千方百计通点信息。没有这种精神与感情的支持，在这样漫长的“风雪人间”，古稀高龄恐怕是难以熬过来的。

在医院时，她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关于两个“反党集团”的决定尚未撤消，这是“毛主席批的”)，不免谈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她给我看了《新文学史料》上赵浩生写的一篇访问记，内中还涉及延安文艺界的所谓“宗派纠纷”。她认为这不利于安定团结，现在不应当再这样来回顾过去(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她总结文艺界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在讲话中曾着重提到宗派主义的危害)。出院后，在万寿路招待所，我遇见周扬同志，便谈到丁玲对这篇访问记的意见，建议他去看望她。后来丁玲告诉我，周扬来她家来了，可惜的是事先不知道，她不在家，没能相互畅怀一谈。在医院中以及后来多次闲谈，她跟我详细谈过她在左联时期的情形，包括同冯雪峰的交往，以及为什么文艺界因1936年的争论而形成如此长期的门户之见。谈起这些似乎是无法解开的历史疙瘩，虽然我是局外人，但

我觉得丁玲的态度是诚恳的。她也常谈自己遇事过于天真等等缺点。

1979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搬到同一幢公寓大楼，走几步路，上下电梯，就可到彼此的家。来往的次数是记不清的，闲谈的内容很广泛，总是在晚上，有时谈得很晚，来我家必与陈明一起。有时也相互送些土特产，或是出差带回的，或是别人馈赠的。有一回同海婴来，请海婴为我们拍了好多张照片。他俩同我的老伴也很熟了，我家老阿姨也最关心丁大姐的身体。

有一次谈到1936年到保安时的情况，她说，那时同志间都很亲热，无甚拘束，谈话随便得很。她谈到对边区的观感：像个小朝廷，说林老就是财政大臣。毛主席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过去不知道毛主席赠给她的那首《临江仙》词，这次谈话才知其详，她当时在红军中有个军职。词中说的："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可见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同志对丁玲的到来，是何等高兴；毛主席的欢愉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丁玲不无感慨地说，这首词的手迹是胡风保存下来的。由此谈到过去同胡风并不认识，胡风在重庆办《七月》，才有了交往，她的稿费，胡风设法寄给她在湘西的母亲。

有一次话题从平生得罪的人谈起。她说，这只怨自己马虎大意，"也不会做人"。于是谈到江青结婚请吃饭之事。当时她听说女儿生了病，心里急得很，好不容易借到一匹马，就赶着到安塞保育院去了，而没有去赴宴。其实，脑子多转一下，安塞完全可以晚一天去。这样就可以免去引起的误会：被认为敬谢宴请，是对于婚事的态度。这大概是结怨江青之始。《三八节有感》中写的："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当年就传说是讽刺江青的。关于不会做人之事，谈过不止这一例，她的感慨甚多。

在我同丁玲的接触中，感触最深的是她对党的一往情深。20年代，她曾经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上海大学念过书，同李达、瞿秋

白等有很深的关系，但那时她并没有入党。她入党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 1932 年，是在胡也频牺牲之后不久，就同战场上拿过阵亡同伴手中的枪继续战斗一样，这是怎样的悲壮和勇敢。不论是敌人的幽禁，还是自己同志的委屈（长达 20 多年呵），都没有动摇她对党的信赖与深情。这从她 1979 年回到文坛后写的文章可看出来。1982 年，她访美回来，来过我家两次，谈美国见闻，美的与丑的，赞扬与厌恶。第二次同江丰一起来，谈到美国某些人对她的“失望”。过去有人对她的出国是有戒心的，还设过障碍。这次令人担心的美国之行，她说，也算是不辱使命吧。她还同我谈过，当听到中央领导同志在报告中讲到，右派不能留在党内时，她哭了一上午。下午，见到一位同志，对她说：“今后不能以同志相称，你有什么感想?”这真是向伤口上撒盐。她说，这些创伤多年来埋在心里，很少同人谈过。近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毫无矫揉造作，对党一往情深，这才是丁玲同志一生最基本的方面。

在丁玲的家中，前后看到过几幅她的油画像。最早看到的一幅半身像，背景为北大荒的冬天：千树梨花，神态极其安详。我深知北大荒的冬天，曾为此像写过一首七绝相赠：

北大荒人十二冬，惯于雪夜白毛风。
三千白发何须问，掬出心肝依样红。

这首诗也可作为我上面这段话的补充。

1984 年 8 月 1 日，中央组织部发出了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通知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落实，几次慎重讨论，最后由中央批准。通知高度评价了她为党做的工作，赞扬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是的，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著的爱，即使她有过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党给她彻底恢复名誉，推倒一切强加在她身上的不实之词，她是很感激的。她觉得从此她可以不再受到那些若明若暗的歧视了。那些喊喊喳喳的非议也可望消除。

她同我谈过，有位美籍华人女作家想写她的评传，有人竟认为：作品可以介绍，评价可难写。收到这个通知后，她对陈明说：我可以死而瞑目了。她曾经想给中央写一封感谢信，底稿给我看过，信中充满了激情，表示要在余生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后来也许是认为实际行动比言词更加重要，这封信没有发出。

1984 年 10 月，丁玲八十寿辰时，我书赠了一首七律：

> 多情湘女总多愁，风雨华年苦索求。
> 处子文章惊海内，平生抱负蕴心头。
> 纹身刺面寻常事，雪地冰原孺子牛。
> 笔底波澜随老壮，晚晴无限耀高丘。

这首诗，最初得七、八两句。这也是几年来我们的交谈中，我常常提到的一个题目：希望她在晚年集中余力，多写一些东西，尤其是回忆录。可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她却以一种只有年轻人才有的狂热着手创刊《中国》文学杂志的工作。那时她住在医院里，就整天想这件事找人到病房里商量，邀哪些人来合作，刊物的名称、刊期、篇幅，等等。自己出面写信、拜访，请求有关同志支持。我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决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得了的，她主编《北斗》，那是五年十年前的事情，因此，我对这件事是持观望态度的，认为与其办刊物，还不如利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自己多写作一些。也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只不过几个月的筹备，这个大型刊物就问世了。

1984 年 11 月，她邀请我参加了在新侨饭店举行的《中国》文学杂志创刊招待会，还“强迫”我这个文学界以外的人讲了几句话。我只讲了一个意思，请作家们特别关心经济，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国策，写我们民族第三次腾飞经济生活中的新事物。

据我理解，丁玲最后以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来办《中国》杂志，也是她一贯爱护青年人的最后一次表现吧。1985 年第一期即

创刊号，发表了她自己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记北京市集体企业的先进人物：京海计算机机房装备公司经理王晓晖，这是团中央向她推荐的一个24岁的年轻人（她还介绍这位青年到我家来谈过）。这个刊物重视发表知名或不甚知名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包括一些“有争议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也可说明我的这个理解。就我知道得不多的情况来说，她近年曾帮助过一些青年作家，艺术家，还有一些与文艺无缘的青年人，她给他们看稿，作序，送书，帮助解决工作问题和调动问题，直到予以资助，这些，都是很感动人的。对有些青年作家乃至有了名望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她看到的缺点，也是直言不讳的。她不止一次同我谈过现在某些年轻的作家和刊物编辑之间的不正之风，互相交换发表作品，她说，这种走后门会坑害一代青年。

在作协四次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谈了创作自由问题之后，1985年春，丁玲在西安向记者讲到文艺界的一些敏感问题，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她讲得好，不愧是一位革命的老作家，号召青年作家向她学习。她说，作家要正确理解创作自由，正确理解党的号召同行政干预是不同的。近年新人新作的涌现，说明党对文艺界没有太多的行政干预。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行政干预，确实非摒弃不可。她说，党号召作家走向生活，反映时代，反映群众干四化、搞改革的崇高思想。但作家自己思想不解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作自由。只有真正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真正掌握了时代脉搏、客观世界的本质，既懂政策，又善分析，那才能如鱼得水，无往不胜，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驰聘。她还说，创作一定要百家争鸣。创作要自由，评论也要自由，允许批评和反批评。

今年春节前不久，我老伴去医院看望丁玲后，回来对我说，精神很不好了，自己说懒得动，什么都不想动。2月18日我赶到医院去时，她已住进急救室，人已入昏迷状态。陈明详谈了春节前后病情的变化，她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除夕告诉家人：我将成佛。广播中听到她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南方出差。对于一个年

过80、饱经摧折而又患有多种疾病的人来说，这并不使我感到突然。我同丁玲相识45年，近年又过从甚密，对于她的离去，家中失去这样一位能随便闲谈的长者和朋友我不能不感到深切的悲哀。3月15日，我同我的老伴到八宝山向她告别，看到拥挤着的人群，一个个忧戚的面容，挂满灵堂内外的挽辞，特别是看到北大荒人送的覆盖在遗体上的"丁玲不死"的红幛，心中似乎代死者感到一种宽慰。

一个人的生命，无论怎样长寿，总是有尽的，而一个作家的生命却长存于他的作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丁玲并没有离开人世，她还通过她的作品在今后的时代中发挥作用。说起她的作品，我有一个感觉，如同江河一泻千里，就不免泥沙俱下，而不能像山泉那么纯净。她的创作，常常是充满着昂扬激情，文思泉涌，奔赴毫端，也就不暇字雕句琢了，因此偶有使用感到不够整饬之处。记得1981年我收到她的《生活、创作、时代灵魂》(她近年出版的所有作品包括六卷本《文集》都送我的)，看到一两篇文章中有语法不妥之处，我竟到她家中当面指出过。其实这也不足为病。似乎在一本巴尔扎克的传记上看到过，巴尔扎克也有类似的情况，大概他的法文也有不甚考究之处，可是这决不妨碍巴尔扎克的作品成为文学世界的瑰宝。古诗所谓"天然去雕饰"，鲁迅诗说的"扫除腻粉呈风骨"，大约就是这种境界吧。那种缺乏思想与激情，而徒事雕琢、刻意求工的诗文，是不可能传世的。

丁玲是走进历史里去了。她留下的，不仅有几百万字的著作(有的遗作还待整理出版)，60年的文学活动，还有她的思想演变的道路，从一个旧中国感到彷徨苦闷的知识青年变成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20多年纹身刺面、受尽磨难而不变初衷、痴情如故，这都有典范的意义。我深信必将有更多的人研究她的作品和生平，必将有人为她写出传记的。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我又习惯地来到丁玲的家中，又到了她住的房间，这间工作室兼卧室被陈明收拾得更加整洁，只是增加了一

幅大型照片。丁玲同志，我的尊敬的朋友，你仍然同我们住在这一幢楼，我并没有感觉你已经离我们而去。

1986 年 4 月下旬

黎澍十年祭

日子过得真快，黎澍离开我们十年了，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心中稍感安慰的是，世事变迁仍顺着他生前的愿望在发展。他去世时，我只写了篇短文，记述他书桌上几篇未完文稿的情况。

黎澍是历史学家，更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已有许多学者、专家论述，这些文章的一部分已收入唐振常编的《黎澍之路》一书中。我同黎澍虽是平生至交，但无力论说他的学术成就，现在只将我们半个世纪的交往作些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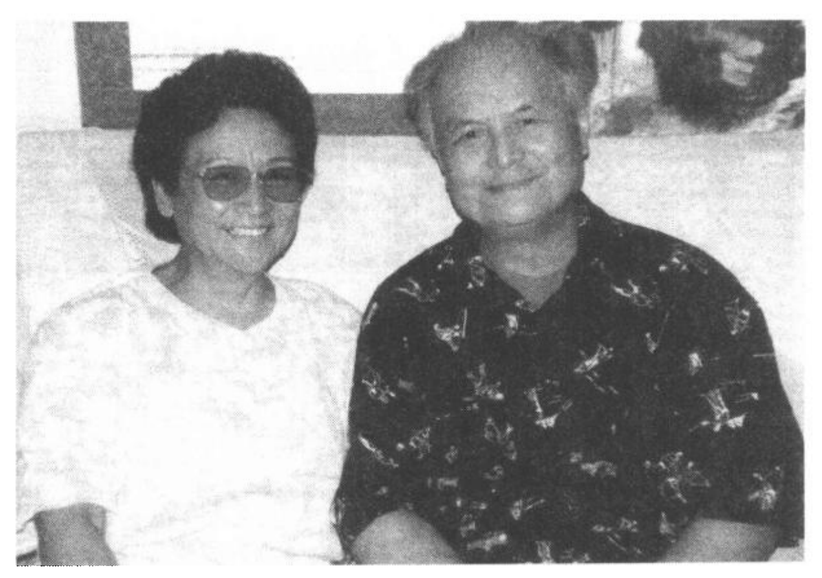
1938年夏，我从徐州突围，辗转敌后经沪港回到武汉，长江局派我到湖南省委工作。黎澍(那时用原名黎树苍)正主持《观察日报》的笔政，任总编辑，我就住在报社编辑部营盘街，每天同桌吃饭。那时我负责省青委的工作，大家各忙各的，他在地上，我在地下。这个报纸是四开版，编得较通俗活泼，有"抗战地理""时事演义""经济讲座""社会服务"等专栏，有"老百姓"副刊；文艺副刊由张天翼等主编。当时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王西彦等文化界名流都在长沙停留过，都为这个报纸写过文章，谭丕模任过省委宣传部长，领导过报社的工作。我在长沙时，也为报纸主编过"青年阵地"周刊，也写过文章。黎写社论最多，常直接批评国民党的限制出版自由不发动群众等，很受读者尤其进步青年的欢迎。长沙大火后，省委迁到邵阳，报社也迁去，曾全文刊载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更公开变成省委的机关报，于是不久以后，报纸就被国民党查封了。黎澍没有随省委到邵阳，由于



黎澍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他离开我们十年了，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此为 1984 年李锐（左）同黎澍在一个摄影展上的留影。

有地方上层关系，他到茶陵另办了《开明日报》，后来迁到衡阳。从此天各一方，整个战争年代我们没有再见过面。

1952 年我调到北京后，我们才又重逢，但更是各忙各的，我在管水电建设，他在中央宣传部，真是隔行隔山。但如古人所云：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由于自己从来好文史，在武汉大学是工学院学生。却读过李剑农的《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李在文法学院教历史），以及左舜生编的那套中国近百年史资料，这时在工作忙碌的空隙，读了黎澍送我的他写的书《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重版改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从而知道他虽然长期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却对近代历史下过大功夫，这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随后知道，吴玉章论辛亥革命的小册子也是他执笔的）。我转业前写的一本书《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3年在《中国青



1979年经人介绍，李锐和张玉珍女士相识结婚，终于过上宁静、平和的家庭生活，正是在这种合谐气氛中，李锐近20年奋力笔耕，《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一批为世人瞩目的专著才付梓面世。对这之前李锐的婚变，黎澍深表理解，认为合情合理，夫妻间思想观点南辕北辙，最为痛苦。李锐与范元甄曾于1939年结婚，1961年离婚，其后又复婚、离婚。范为李锐生下一儿二女。

年》连载前，就在中宣部刚创刊的《党史资料》一、二期全部刊出，而且排在卷首。这个刊物即由黎澍主编。我写这书的来龙去脉他是知道的，排印的原稿曾寄给中宣部。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时做的另一件事，收集《湘江评论》和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集结为《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50本，却挨了胡乔木的批评，命全部上缴中宣部。这个过程他是清楚的。他也知道我挨了批评不服气，因此才发愤写出《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你胡乔木说辑印那些有错误观点的旧作，是“有害无益”；我偏偏要将它写出书来，看看究竟是有害还是有益。我坚决离开湖南省委宣传部（我

是部长)，转业到工业系统，北京中宣部的人并不知情。等我到了北京，中央组织部办好手续，到燃料工业部上班前夕，胡乔木才知道。于是打电话给我，说消息知道太晚，有央求之意，要我到中宣部主管党史工作。我当然婉言谢绝。这件事，黎澍也是知道的，他了解我同乔木相识与在延安的工作关系。

50年代，我们也偶有相聚，当然总是上下古今、海阔天空漫谈，自不免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其中还有个关系人，有时碰到一起，即田家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刚到北京时，住在东城演乐胡同，约田家英来家就是同黎澍一起来的。我将收集的几十本有关近现代的历史书，包括同盟会在日本出版的《民报》全套原本(这是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好友陈长簇送我的，陈是湖南和平解放时的民主人士)，全部送给田家英，表示"洗手不干"的决心：转业水电，不再要笔杆了。记忆中还有两次这样的三人相聚。一次是晚上到中南海黎澍家中，田家英也来了，一起乱扯谈。《龙胆紫集》"怀田家英"六首之一，记下此情此景(当年黎澍是很能喝酒的)：

咫尺天涯见面难，只缘都在做京官；
百年不遇龙门阵，西四牌楼宵夜摊。

(1954年某日，与家英、黎澍聚谈至夜，意犹未尽，又到西四街头小摊喝酒，深夜两点始归。)

另外一次，黎澍大概已到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了，是在万寿路田家英处。我们一起大侃当代"掌故"，谈起"高岗事件"。由于1948年在东北当过高岗八个月的政治秘书，自己对高的为人处事有一定的看法，而主动离开。这种看法只同信得过的黄克诚谈过。高任国家计委主任时，觉得此种安排不当，但不敢向中央反映，只能私下向黄克诚谈及。由此也就议论到党内民主，谈何容易。战争年代黎澍一直在国民党区工作，没有延安或根据地生活的经验，

同这些地方出身的"老干部",常有某种隔膜之感。我们之间却毫无这种隔膜,还是同当年在营盘街一样。这也就是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吧。

1959年庐山事件之后,还能保持一点联系的老朋友,也就只有黎澍和田家英了。记得1961年年尾,从北大荒劳动回到北京后,同黎澍的一次见面是在鼓楼前的马凯饭庄,这时我还住在离此处较近的六铺炕,他特地从沙滩家中到这儿来,请我吃一顿湖南饭菜,他知道我在北大荒是饿苦了的。这天谈得很久,我还谈了一些庐山的细节。从北大荒回京一周后,我就同意到法院申办了离婚手续。我的私生活包括延安旧事,他是很了解的。谈话中这也是一个题目,他认为这合情合理,夫妻间思想观点南辕北辙,最为痛苦。临别时,他还发了这样的感叹:历史上能够传名后世的人物,往往是身陷逆境或犯上受害者,彭德怀一定会永垂史册。这天的相聚和这样的言谈,对我当然是莫大的安慰。当时我独自住在机关的一幢单身宿舍中,目睹人们天天上下班,自己关起门来用一个小电炉做饭吃。

1963年,我又下放到安徽大别山中一个小水电站去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6月3日的《人民日报》就刊有整版批判黎澍的文章。他被指责为"资产阶级霸占史学阵地"的"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文革"前那几年,黎澍认为教条主义剪裁历史事实,使之适应教条,历史的丰富内容不见了,剩下的是说明教条的一些简单的事实,而且往往还是靠不住的。这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以致惊呼出现了史学危机。这是对教条主义历史学的一种抗议。历史界争论的这个核心问题,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理解。黎澍认为,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农民战争,还有民族战争,权力斗争,种姓斗争等等。一概称作阶级斗争,太简单化了。以马恩这句话,将中国古代史理解为农民战争史不对,将中国近代史理解为一部革命史也不对。黎澍批评了《联共党史》的错误观点,即历史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所

创造,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黎澍问道:既然如此,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以前有没有历史呢?在阶级消灭以后有没有历史呢?当年史学界的争论情况,黎澍的角色和所起作用,我全不清楚。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这时遥望北国,真是鱼书欲寄何由达,水恶山穷处处同。

1975年5月,从秦城释放,我仍回到那个水电站过劳改生活。1978年黎澍知道我的下落后,特来信让我写庐山回忆。这时,我已将那本旧书增订完毕。于是将新写的一节——"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寄给他。我是1979年1月6日回到北京复职的,这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这篇长文。从而社会上也就知道李锐其人还活着,且又故态复萌了。回北京之前,他还给我来信,也希望我能到社会科学系统工作。可我还是思恋故土,仍旧回到水电建设岗位。

一别18年之后,萧疏鬓已斑,欢笑情如旧。我们不免又继续"南朝皆旷达,东晋最风流"起来。第一次见面时,他谈到的两件事还记得。第一件是在天安门漫步遇见胡乔木,他指着正在修建的纪念堂说的一句话,使乔木大惊失色。这句话是从历史角度长远的将来说的,我也有同感。乔木是我们共同的熟人,也可说是共同的朋友,都有过老上下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我离开延安后不存在了,他却一直摆脱不了。我们臧否人物的议论,乔木常常在内。第二件也是有关乔木的,李新给我看的回忆文章写到这件事。"四人帮"扫除之后,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一时成为最具战斗性的学术刊物,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他最早写文章批判"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最早提出要写"文革史"。1978年8月15日(大家记得是日本投降这一天),黎澍、李新、廖盖隆等五六个人从乔木家中往中央党校去,黎、李与乔木同乘一车,三人闲谈起来。黎澍很郑重地对乔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在说不通。乔木说:要不断革命嘛。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自己的政权,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呢?李新就笑着说:林彪说过嘛,革革过命的命嘛。

乔木过了一阵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考虑。以后他就写文章,大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发明权就据为己有了。黎澍同我说过,乔木常爱批评他标新立异,其实这乃乔木自己的专有权,别人不能抢先也。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作的报告,夏衍同黎澍说:如果这个报告让乔木去作,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1980年10月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我们有过接触和议论。黎澍的一个真知灼见一直记得,即认为历史的认识从来不是一次完成的(对真理的认识也是如此),因此希望这场讨论不要拖得太久,应及早结束,形成决议,以后就好办事了。他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四年,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最初两年,感到极左已成惯性,个人迷信似乎少不得,要改变那套专制制度很难。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一系列的思想斗争,感到发展还是快的。但是种种阻力还是不小。他相信通过这个决议后,会使阻力减小。他谈到苏联的党史就写过几次。《联共(布)党史》是斯大林时编的,我们曾将它当作百科全书;斯大林死后,重新编写《苏共党史》;赫鲁晓夫倒台后,勃列日涅夫时期又重新编写;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又要重新编。为什么老要重新编写呢? 因为都有它的片面性,每一次写党史都只是现在领导的合理性,换一个人就不一样了。因此,历史要站得住,必须讲的是真正的事实,写出来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推翻不了的。跟着现实政治的风向团团转,那就不可能写出一部大家都承认的可信的历史。

我的《庐山会议实录》初稿是1987年夏季写出的,先送他看过。他常谈到,过去写的历史著作中,主要是存在片面性,不够客观。就他自己说,多年来讲抗日战争史,只讲我们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不讲国民党抗战。现在开始纠正这种片面性,也讲台儿庄等战役了,这样就全面些了。他说过去还有一个片面性,是为了鼓吹革命、鼓动大家起来革命而产生的,我们的历史只讲革命。有一个口号相当普遍,“为革命研究历史”,听起来似无可厚

非，实际上有片面性。“为革命研究历史”，那就是以革命为目的了。其实，革命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是要改革社会制度，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我们过去写的历史主要问题在于只讲革命。1949 年革命胜利后，依然讲要革命，甚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在历史上找不到根据，得不到说明。我们过去有许多革命的观念，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为革命而产生的，不免带有片面性。当然，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或者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也有其历史限制，不能一概照搬。

我们议论过“兴无灭资”的口号，因为 80 年代中还有主管宣传的人坚持这个口号。黎澍以为这是一个彻底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提这个口号的人连《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读过，很可能还是从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脱胎而来。《宣言》说：“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何况在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后世的发展自不可能都能预料到，如 20 世纪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抗中，各自发生的变化，社会主义大弯路，资本主义大发展。然而“兴无灭资”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相干呢？

我们也议论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社会赖以进步的历史产物，是专制与独裁的对立物，西方经过几百年斗争，依靠民主、自由和科学，才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黎澍说：自由是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首要条件。而且“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党对学术

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展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当然，自由不能没有范围。约翰·穆勒《论自由》一书，最初介绍到中国来，严复曾把它译为《群己权界论》。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各种自由权利，不得侵犯。但是法律规定自由有范围，例如不能妨碍他人身体自由，不得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不得违反政府法令，等等，都是把自由限制在一定范围以内。有了这些规定，自然就不必怀疑自由是专属资产阶级的特权了，社会主义离开了自由和民主，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只能名之曰封建社会主义。

大家知道，1983 年发生过一次"短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黎澍在头一年已经离休。运动开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离休干部讨论、表态。会上一些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黎澍，所指责的竟是如此可笑，说他提出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污染"，是"放毒"。这些人完全忘记了 1980 年邓小平长篇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的，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还是一个严重的任务。对此，黎澍据理反驳，还说，我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史、当代史，我污染谁了？他对我说，这哪里是什么"精神污染"，而是污染精神；攻击他的人是一些瞎子、疯子，只知道无限上纲，罗织罪名，跟着"左王"转。他还告诉我，石西民去安庆回来说过，陈独秀的墓不像样子，应当修一修，陈毕竟是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人。会上也有人批评石为叛徒树碑立传，这也是"精神污染"。对此种荒唐可笑，他真是既生气又悲哀。关于所谓"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他作过这样一种极为理性的分析：污染是与进步相伴而来，每一进步都必定带来某种污染。开个工厂，生产各种产品，必定同时出废气、废水、废料，污染环境。精神产品也一样。阳春白雪来于下里巴人，精华出于糟粕；没有下里巴人何来阳春白雪？没有糟粕何来精华？而且即便是糟粕也未便轻弃，它可以肥田，种出粮食蔬菜，还可喂猪喂鱼。肉食精华也，然而出于糟粕。治理污染是必要的，清

除或反对则是不合理的。何况什么是阳春白雪，什么是下里巴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都还没有分得清楚呢。

这次会后不久，本来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又生了气，黎澍终于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我和老伴多次去看望，还告诉卫生部原领导中的老熟人，多多关心他的病情。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后，胡耀邦本来计划随即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干什么)。胡乔木立即向华国锋告状，因而夭折。其实乔木本也是"凡是派"，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初，他也并不赞成的，尤其老喜欢空谈共产主义理想。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作了充分表演，其实质就在反对改革开放，要走老路，又不好明讲。同这种意识形态相伴随的用人之道，就是要排除他认为有"自由化"思想的人，"标新立异"的人，或者同他有过个人恩怨的人；就是要保留并重用凡是派和唯唯喏喏的"左"爷们，这些人中不少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都有大小辫子抓在他们手中，因而服服帖帖唯命是从。他们一挨批评或碰了钉子，就善于装扮受了欺负，向靠山哭哭啼啼，泣诉委屈。

1984年黎澍搬到木樨地24号楼后，我们成为邻居。过去是"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现在是上下楼走几步就碰头的真正邻居了。于是我们的来往就极其频繁了。只要都在北京，一个月总要见面四五次，有时一个礼拜来往两三次。内容主要是交谈有关毛泽东和过去的问题；种种历史教训；对当前形势看法和互相关心的问题，如"左王"、"左爷"们的动态；有时是高朋满座，如告别辞《我们的悼念》中署名12人中，碰头最多的是秦川、于光远、李普、朱正、王若水等；此外还共同参加有关文史等方面的社会活动；各人写了文章，不论长短，常相互征求意见；友人来多了，也举行家宴，有一次廖沫沙夫妇请于刚、黎澍、李普和我四对湖南夫妇，到三家村酒店相聚；偶而也一同去看望朋友。到他去世为止，成为邻居的这四五年中，我们之间三日不见面，也要电话一相亲的。除上面写到的以外，就记忆所及，继续录下这些属于"思想的闪光"的言谈。

——黎澍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割据为王”到独立自主。二是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包括群众路线。三是统一战线，又团结又斗争。四是实事求是，中国古已有之。五是不断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挨整受罪过，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我们常谈到农民战争，黎说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导致“皇权”的集中，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中外历史概莫能外。

——关于暴力革命问题，黎认为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亦如此，他送过我一本库西宁夫人著的《斯大林前后》，真是可怕的绝灭人性的专政。恩格斯晚年对暴力与和平过渡已有新的说法。

——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我们常交谈的。黎有几个原则的说法：1、古代与近代社会发展不同，要予分开。2、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并非绝对对立，有互相依存即统一性一面。经常性的生产，是阶级利益一致的结果，如果罢工形成对抗，就不能生产。工人中的阶级斗争和对抗意识的存在是常态还是非常态？革命有来潮和退潮、高潮和低潮，阶级斗争和对抗也一样。经常保持斗争状态和革命状态是可能的吗？“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使我们吃了多少苦头。3、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因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合理的，也违背了马克思的理论。尤其阶级专政导致一党专政。党高踞于国家之上，又导致权力与腐败结合。我们多年以来解决不了执政党如何执政的问题，解决不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问题。这种专政是“左”的土壤。4、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并非你死我活。5、所谓不断一分为二的理论，乃自我毁灭的理论。有一次谈到内部矛盾是你死我活，敌我矛盾倒可以妥协。内部矛盾联系越多越深，总是由内部向敌我转化；而敌我矛盾又向内部转化。毛泽东的随意性：辩证法变成形而上学，一分为二，永无止境；唯物论变成唯心论，使用干部也要讲成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否句句是真理呢？有的话本来就不是真理。有的话从前是真理，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已经不能算是真理了。“生产在阶级对抗基础上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状态，以后情况的变化越来越显著，历史已经表明生产只能是在阶级利益一致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长期处于革命斗争中。斗争中产生的著作不能不带有论战性。论战性著作必然以攻击敌人，辩护自己为任务，因此不能避免片面性，有时还不能避免感情用事。认识的局限性，任何人都容易犯的。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也有空想，有唯心主义成分。马克思主义形成的50年中，唯物史观与经济学说，《资本论》与三大手稿是顶点，完整的框架，手稿中提出“科技是生产力”。后期马克思尤其恩格斯，都有反思与修正。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举世公认，不可动摇。

——列宁本来就有“左”的东西，《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曾寄与马赫，马赫复了十万字的长信，列宁也有复信，其中即反映了列宁的“左”。原档已经找到，在翻译中(《毛选》中“左”的东西也不少)。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进行了实践，有变化与转折，从新经济政策到逝世前，又有所变化(对斯大林有反感)，布哈林后期思想更民主开放些，斯大林却发展了列宁的错误战时共产主义，成为一个专制独裁者。列宁将第二国际的政党看成敌人，可是欧洲(称号不一)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工人阶级的事情，反而促动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将瑞典同苏联对比一下，仔细研究，可以发人深省。

——说“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了”，这是文学语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商品经济，仍脱离不了市场规律，这是马恩列斯毛都没有料到过的。马克思也没有料到过高科技的神速发展会左右经济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会如此漫长，以至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后，20世纪快完了，还难以预见何年何月能够实现。

——马克思讲的“自由人联合体”，无非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其自由、权力、利益所得。能否真正做

到任何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以此评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各自情况如何?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非常需要认真据实总结,搞理论的人责无旁贷,这方面当然不应有任何禁区。一般而言,各级领导干部对实践负责;但搞理论的人应当对理论负责。回顾我们过去几十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教训太多,理论搞错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千万不能忘记人民公社化这种教训。不论是苏联、东欧和我们,对于过去的实践一定要加以理论总结,以免今后再犯错误,至少要做到少犯错误,切忌犯全局性错误。关于写书,黎说,科学家(有科学头脑的人)才能写书,政客不能写书。

我们的共识:人类社会发展前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可能互相渗透,最后走到一种新的社会。与此有关的议论很多。如社会主义国家喜欢讲排场,搞浮夸,办虚事,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比较实事求是。美国人对我们将他们总统办公的地方(White House),译为"白宫",很有意见,明明是"白屋"嘛。黎澍说,老是害怕和斥责"全盘西化"(胡适当年也并非我们批判的那样),其实质是责备现代化。不要传统行得通吗?不要害怕东方文化传统失掉。日本彻底西化过,什么都学西方,仍旧保留了和服、茶道,还有武士道精神。对孔子评价现在有一派复古,新儒学潮流,孔子后裔全入政协。

我们的教训在搞过全盘苏化。革命最早学苏联。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出现过"左"的面孔,致力于组织工人罢工,认为这是党的天职,最基本的要求,而不认为从策略上考虑,应当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共同敌人封建主义的联盟。相反,我们到处发动工人罢工,直到发动手工业者,反对中国资本、民族资本。大革命失败后,"左"的一套搞全盘苏化。建立的共和国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在地叫"苏区",军队叫"红军"。王明出的一本小册子叫《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不是化成俄国共产党吗?

在文化学术界,黎澍熟识的人比我多得多。他邀我一起去看

望过两位名家。我同夏衍没有过交往。黎澍同夏是老朋友，在国民党区尤其在香港一起呆过，相知很深。1986年1月28日上午，黎同我到夏的家中，长谈了两个小时。主题是两位"左王"的统治。记得涉及这样一件具体事。乔木在书记处会议上正式谈过，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三个头头是周扬、夏衍和巴金。乔木最近因《上海文学》的一篇小说，让书记处的负责人看，批示顺着乔木的意思，查一查作者是否三种人。乔木还来找过夏衍，要批判一位女作家和一位山西的农民青年作家。夏说，他们还年青，一批就完蛋了。夏也说乔是两面人，骨头软，尤其表现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

我也不认识钱钟书。黎澍同钱先生和夫人杨绛相交很深，相互敬重。他的《再思集》书名就是钱题签的。1987年5月25日下午，黎澍与我一同到钱家，谈到六点。我们谈得兴高采烈时，杨绛忍不住也过来参加了。记得从胡适谈起。1948年他们在上海见到胡适。胡早年的书信全部保存在合众图书馆，内有毛泽东当年(当是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写给胡的信，说旁听了胡的讲课，很是佩服，想拜见聆教。署名为"你的学生"。钱先生说，胡适听图书馆的人说，这些信件在日本统治时都毁掉了，很是惋惜。钱觉得此信于胡是有用处的。胡适回到台湾后，胡的秘书胡颂平是朱家骅派去监督胡的，为胡的学问与为人所感动，因而写了回忆胡的书。说唐德刚是一个落拓不羁的人，同胡接触很深，才写出胡的传记来，此书影响很大。钱也称赞胡适的为人，说鲁迅那样批胡骂胡，且很挖苦，但鲁迅生前，胡适从来没有讲过鲁迅半个不字。那天谈话，尽是臧否人物。谈到某学者吹捧江青"百鸟朝凤"的故事，说得很是风趣。又谈乔木对他们夫妇的照顾，建议杨绛写《围城》与钱的文章。钱说，他同乔本是"来而不往也"，每年乔木要来他家，他们都没有回访过。由此我们谈到聂绀弩的诗集出版时，乔木毛遂自荐写序言，聂却认为，这是为了打扮自己也。我特别问钱先生，为什么记忆力如此好。钱说，三十多岁前，记忆力确实极好，可说过目不忘。在牛津学习时，爱读侦探小说。一次期考，要认清古代

手写英文，连题目也未看清，即通篇查答，结果不及格，以致补考。受此刺激后，影响了记忆力。临走时，我送钱先生两本我的小书，《龙胆紫集》与《窑洞杂述》，《杂述》中有一篇文章《国立师范学院的教育和学生》，即《围城》中教书的学校。1939年在湖南工作时，我去过这个学校（在湖南兰田）。钱回赠我《谈艺录》。后来看过我的《庐山会议实录》后，钱先生很热情地给我写过一封信，对此书很是称赞。

黎澍比我大五岁。大革命时他就参加过共青团，援助过被捕的党员老师。1987年4月他75岁时，我曾书写了一首七律相赠，其中颈联为"一卷文章惊海内，三番思考问先贤"。诗后有如下很长的一段注解，说明我是怎样看待这位相交半个世纪的老友的：

> 黎澍在他的《再思集》序言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编入本书的各篇反映了我个人思想上的这个变化故谓之'再思'云。"他还说道："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究其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党、国家和自己二十多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后，所采取的对历史与现实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是党性立场的科学态度。黎澍是严肃的也是勇敢的学者，我的小诗稍稍表达了我对这位老友的敬重，我衷心祝愿他长寿。《再思集》最后一篇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命题，提出空前的质疑；无论从古代到现代，从历史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他都认为这两个命题不恰当，很难说得通，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篇

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赞成的与部分赞成的、怀疑的与反对的都有。目前这场论战尚未结束，报刊时有新的论文发表。古人诗云："梅花香自苦寒来。"（诗的七、八句为："笔头犀利因忠谔，梅老花香自苦寒"。）既然我们走过二十来年曲折的道路，既然我们的职责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就应理所当然地克服一切僵化的思想，凭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南针，勇敢地开拓自己的道路。

同一个月我满70岁，黎澍也送了我一首五律，他说尚未最后定稿。（"波浪阔"一稿为"风浪恶"；"愈老愈英雄"一稿为"奋发更为雄"。）他善旧诗词，但不常作。1995年徐滨夫人清理旧档，发现他书写的这首五律条幅，特送与我。

浊世佳公子，于今七十翁。
曾经波浪阔，不怕火炉红。
诗赋龙胆紫，文章太史公。
所望加餐饭，愈老愈英雄。

"我衷心地祝愿他长寿"，写这句话时，决没有想到，我们之间的相聚只有一年多的时光了。十三大报告起草之初，书记处负责人还找到黎澍、于光远我们十来人，一起参加过讨论。黎还专门找我谈过党性、阶级性与科学性、民主性之不可分，是统一的，只有真正的科学性才能导致党性、阶级性的统一。可是坚持科学性与坚持真理的人，在"左王"的眼中，却变为异端分子；他们还是搞老一套的"阶级分析"，从而发现"斗争对象"，于是号召"划清界线"。这时他的《历史创造者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又得罪了不少人，这以后直到他去世前的1988年11月，我们的来往还一直频繁，同朋友们的相聚漫谈也多。我们还一起研究过要写出一本《中国的左倾幼稚病》的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中国

和世界的发展问题。

1988年6月,王元化从上海来,我们还一起谈过五四和新儒学复古的问题。大概是从李泽厚的"五四断裂"问题谈起。黎说:五四有三股潮流:1915年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包括文学革命;反巴黎和约的爱国救亡运动;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共产党。他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神话已经破灭,马克思、列宁也不要再尊之为神。列宁批马赫,自己并不懂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错误,哪里来的什么哲学两条路线斗争。马克思从黑格尔等唯心主义接受了许多新东西,并未讲过两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搞起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发展。我们现在还是老一套的唯马首是瞻。

11月20日,广东番禺梅山糖厂主人在仿膳宴请,我们和于光远、胡绩伟、朱厚泽等一起参加了,黎澍毫无病态。

11月29日,黎澍伏案起身倒地,后脑震破大出血住协和医院后,即诊断全身动脉已硬化。12月4日入急救室。我与老伴去探望时,带氧气罩,呼吸已困难,双目紧闭,手脑不断颤动。我轻轻抚摸他的头部和手臂,没有反应,老伴贴近耳朵讲话也没有反应。我同值班医生谈,这是中国第一流历史学家,请全力抢救;我还同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通电话,告知黎的病情。医院决定要切开喉管。5日,徐滨告知,心律已衰竭,在作最后抢救。一同议定几件后事:出文集,《新观察》出专刊,老朋友们出纪念文集。徐滨说,他生前谈到不入八宝山,那些人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那些人,还是上万国公墓。我让家人将书桌上一大摊书稿拍照,准备写《最后一天的书案》,说明历史学家是战死在岗位上的。晚上接戈杨电话,泣不成声,说光远电话告她,黎澍已去世。我即将危险病情告知,并商定纪念办法。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李学昆、徐宗勉来,谈黎澍生平及后事,他们都是黎的助手,相互间感情很深。徐被打成右派时,黎澍很不同意,多年来同情他保护他。黎澍自己因此挨整,作十次检讨通不过,终于调离中央宣传部,并下放。老"左"们



1988年12月9日，黎澍因病去世。应黎澍夫人之托，李锐用一丈多长白布作横幅，持黎澍遗体告别灵堂，代撰书一联：再思三思，时有文章惊海内；言传身教，长留风范示儿孙。12月16日，李锐向黎澍遗体告别，并向家属深切慰问。

总说黎澍偏激，老受排挤。我对他俩说，黎澍不仅是历史学家，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谈到他的长期受压，不能尽展其才，我的声音也咽噎了。12月9日黎澍大女儿来告知：下午2点25分，爸爸与世长辞了，这也正是52年前他在北平街头游行示威之时。她们一家让我审定生平稿与新闻稿。晚上12点，我写好《最后一天的书案——哭黎澍》文，第二天寄《人民日报》与《新观察》(后者发表时没有删节)。12月10日，社科院来4人，取走黎澍生平稿，并拟定火葬前告别名单。12月11日上午，我与于光远、胡绩伟一起到徐滨处，谈学术纪念会可以从缓一些，光远谈中宣部旧事，称赞黎澍为人的正直与勤奋，思想的不同凡响。

12月5日，应徐滨夫人嘱，用一丈多长白布作横幅，持黎澍遗

体告别灵堂，我代撰书一联（徐滨泣献）：

再思三思，时有文章惊海内；
言传身教，长留风范示儿孙。

12月16日，向黎澍遗体告别，去的仍在百人以上，许多人禁不住流泪。告别后，我因事离开，老伴同王若水夫妇等和黎的家人一起，送到火葬场。

一别十年的树苍兄，上面写了这么多旧事旧话，是用来表示我对你的怀念，说明我没有忘记你的言谈，你的思想和观点，这些不仅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也会永远留在你的朋友们心中。我们依然是同心相应的，我们依然同你一样勤奋地思索着，工作着。我没有忘记你的希望：愈老愈英雄——奋发更为雄！

1998年7月7日定稿

项南，真不忍言别呵！

真是晴天霹雳，本月 11 日中午，在电话中得知，项南于昨晚去世。原来当天上午他还去医院检查，下午福州来人谈话，五点到王府饭店会见华侨朋友，共进晚餐，八点又到中国大饭店会见另一华侨朋友，谈到十点，感觉不适，向监护他的夫人要药，站起来，水杯还没接到，猝然坐下，便同这个无限眷恋着的世界告别了！

12 日家中已设有灵堂，虽不忍目睹汪大姐的痛苦，我与老伴还是赶去吊唁。花圈满屋，已堆放到楼道，多是福建同乡送的。列席十五大时，项南曾同我谈到他的病情，隐形心脏病必须做手术，但国内高龄患者(他已 77 岁)很少做过；恰好遇到新加坡一位华裔专家，世界有名，检查后，邀请他去，手术有百分之百把握。汪大姐痛苦地诉说：经费自理的出国报告，两个月没批复。去年四月发作时，曾住院半年多(我到医院去看望过)，后又二次住院。医生警告：要少劳累，这种病二次发作就危险，可是老项从不休息，总是强撑着，尤怕怠慢海外朋友。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地方队伍中，项南是有名的先锋人物。他 1980 年底调到福建，排除重重阻力，首先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他经常下乡，为此作了许多报告，以解放干部的思想。同时落实华侨政策，为胡文虎等平反，在海外影响很大。福建资源较少，八山一水一分田，因此历史上去海外打工的多。而海域面积则大于陆地。他高瞻远瞩，大念“山海经”：发展林、渔、牧、纺织等业和外贸出口，资源贫乏“以智取胜”，尊重知识和人才，狠抓教育。



项南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后因故离职。十五大召开时，原中顾委委员为列席代表，会上项南郑重建议："共产党员要光明磊落，不要背着大家写一些同党的路线唱反调而又不敢具名的文章……以'革命'的极左面目，放肆地反对改革开放。"1997年1月11日项南因病去世。图为十五大期间李锐同项南（左）、孙大光（中）在交谈。

1984年邓小平视察厦门时，他建议特区扩大到全岛（从2.5到13平方公里），认为改革开放决不能收而是要放，得到邓的赞同。他的一篇刊《人民日报》"窗口论"的文章，谈国门打开，带进苍蝇，用装好纱窗的办法，新鲜空气仍自由进出，有全国影响。1984年，福建55家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会议上，因政企不分，婆婆太多，有一封"松绑放权"的呼吁书。项南全力支持。我在北京就听到一种"项南搞什么松绑"的非议。他还跟我谈过，为青年跳迪斯科舞，同胡乔木发生过一场争论，写过几封信。当时有记者采访过他，他认为这不是什么黄色的东西，起源于非洲，传入美洲，改造为现在流行形式，不同于交际舞，而是两人分开对跳，运动量大，也如东北二人传，是健康的东西。80年代的政治风波中，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

常不免于非议甚至不幸。一个值得讨论的“晋江假药案”，使全省包括海外爱戴的领导人，离开了他不愿离开的家乡。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历史的不幸。

我是80年代初认识项南的，可说一见如故，大小敏感问题，观点相同。他回到北京后，除开会外，我们还常有见面的机会。他不认识陆定一，我同他一起到医院去，同这位思想非常解放的前辈长谈，老人那天谈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我们都觉得思想是很超前的。1989年政治风波时，他到我家中，焦虑万分，于是我同他到医院去见他不认识的萧克老将军，从萧老处受到教益，也得到安慰。他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因此退下来后，由于交结了许多爱国华侨，他用很大精力主办了全国扶贫基金会，以引来国外援助资金，办法是要扶贫到户。他的这一活动，我不知其详，却听说于去年被动脱离了这一倾注晚年心力的事业。有心脏病的人最需要保持平静的心情，尤其高龄患者容易出事。呜呼，胡耀邦难免！项南又难免！耀邦同我谈过，他生平没有主动参加过整人的运动。延安抢救运动时他是清醒的。可是1959年在团中央时，项南难免“右倾”之灾，他很是遗憾，铭刻心中。

十五大期间，列席的原中顾委委员都住在皇城宾馆。十天之内，我们朝夕相见，邻桌就餐，长谈短论，相互关心，还在那个豪华大门厅边的小客座，一起拍过照。我们过去从未在一起拍过照，难道真有什么冥冥神意，让我和几位挚友留下唯一“最后的合影”。开会前，我写了一个长篇书面发言，带到会上了。会议期间，项南也给了我一份他的《列席第四小组会上的发言提纲》，共有十条言简意赅的意见和建议。例如第二条：“我党全部历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历史，但也犯过极其严重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为害最烈的是‘左’，而不是右。我国知识分子，极大多数是好的，都有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们党应当为他们营造一种宽松、宽容、宽厚的氛围。给提不同意见的人，随便冠以右倾、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其后果，是永远落后，葬送现代化。”又如第三条说：

“共产党员要光明磊落，有不同意见，可以说，可以写，也可以保留，但不能搞小圈子，背着大家写一些同党的路线唱反调而又不敢具名的文章。……以‘革命’的极左面目，放肆地反对改革开放。”第四条说：“新闻媒体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在宣传鼓舞我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敢于揭露我们消极不健康的现象，是一个政党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多么中肯啊！这是我们尊敬的朋友项南留在这个多灾多难而又充满希望的世界的最后声音，也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啊！

1997年11月16日

活在人心便永生
——悼念耀邦



1982年李锐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同胡耀邦开始直接往来。胡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多年来，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使李锐有如此感觉的，除黄克诚外，胡耀邦是第二人。1989年4月5日李锐在胡耀邦家长谈，这是胡去世前两人的最后一张合影，弥足珍贵。

序《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八年多了。古今中外，大凡对历史进步作过卓越贡献的人，总是为后人永远思念的。胡耀邦自不例外。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当代历史要揭开新的一页，仍有两大难题待解决，即“两个凡是”和如山冤案。不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路线，不解放成千万被定为“反革命”、“反党分子”的新老干部，自不可能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两大难题都牵涉到毛泽东，都同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实践密切相关。解决这两大难题，需要何等的胆识，何等的魄力与毅力。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曾经将中国革命从错误路线和濒于失败中挽救过来的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全民更是唱了十年《大海航行靠舵手》。因此，要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左”的路线，是一场旋乾转坤的搏战，是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众所周知，为这场搏战、这场革命打先锋的是胡耀邦。当时，他先后在宣传和组织领导岗位上，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办好了这两件大事。

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抵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曾拒不交出中央一、二、三专案办的档案材料。这是一种何等困难何等严峻的局面。耀邦勇敢地另起炉灶，对大小案件，由中央组织部单独进行调查，一一落实，取得成功。他常不分昼夜，亲自接见上访人员，干部不分高低，一视同仁。这是一场

硬仗，不打好这一仗，不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不解放从中央到地方各条战线的干部，请问十年“文革”造成的“崩溃边沿”的局势。如何扭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长文章，如何开篇？

这样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创举。我们党“左”的“肃反政策”，由来已久。从江西时期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等，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一直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开国之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直到“文革”十年，到处“敌人”，遍地冤狱。回顾这一页漫长的惨苦历史，令人痛心无已。“文革”十年，制造冤假错案登峰造极之后，才痛定思痛绝路逢生，我们党终于大彻大悟，不再搞运动、大规模整人了，不再重蹈覆辙了；从此才出现人心舒畅、人才辈出的新气象。

关于胡耀邦这一打先锋的历史功勋，有切身体会的老记者戴煌，将之写成一本三十多万言的书《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他经过多年采访和积累材料，细心缕析，使这部书内容翔实，生动感人。书中各章节已陆续在几十家报刊发表，赢得广大读者的赞许，现在集结出版，这确实是为当代中国历史做了一件大好事。

1997年5月16日

同耀邦的诗交

1982年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同耀邦同志开始直接往来。十二大前，我们都在玉泉山住了几个月，有过单独谈话，主要是工作性质，感到他很是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多年来，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使我有如此感觉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

1987年的早春，人们的心情非常不平静。年初我特送他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并在扉页题句："是非公道在人心"（这是我赠诗的末句，前三句为："文章翻案岂常情，左右逢源不二门。黑白纹枰输后手"）希望他藉此移情养性。这年4月，我年届古稀，写了四首"自寿诗"，邀请几位友好家宴时，大家一起吟哦。第四首正道出此种心情：

三月春风犹带寒，小楼今日故人欢。
书生议论曾何补，世事沧桑佐乱弹。
士气峥嵘焉可侮，民心向背最相关。
文章不怕违时尚，结习难除况退闲。

历史如此残酷，到了80年代，我们的国家仍然摆脱不了灾难岁月。1989年的春天，诗中颈联不幸言中。

耀邦突然去世那天晚上，我匆匆写了篇悼文[1]，其中主要谈近

[1] 发表于《新观察》1989年第8期。

两三年中，他同我有诗的交往。1987 年夏秋间，我曾先后将我的《论三峡工程》[1] 和旧诗词《龙胆紫集》送与他。关于三峡之事，他对我有过微词，不同意在报上发表此书的序言。两本书他都通读了。一次在人大会堂散会时碰见，他特意告我，三峡的书他仔细看了。

耀邦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且博览群书的人。他只读过一年初中，14 岁便参加了革命。他的丰富学识，完全是长期自学和独立思考积累起来的。1987 年后，他翻阅了自己十年中的全部文章和讲话等，还通读了马列全集和《资治通鉴》，并对旧诗发生了浓厚兴趣。几年接触中，我深感他的学识才华，来自勤奋、广交、乐群与深思。1988 年 1 月 14 日，我应邀到他家，从下午两点多谈到晚上八点多。他说，从《龙胆紫集》才较全面了解到我这个人。集中收录的三百多首诗词，是“文革”时在秦城监狱八年中吟得的，内容两个方面：讴歌革命，回忆平生。关于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坐过牢，只有一首七绝涉及，想必他知其详。到中组部之前，我同耀邦并不熟识，但 1978 年我还在安徽流放时，得以先进医院治病，1979 年 1 月回京复职，都是经过他亲自处理的。

1988 年 9 月间，他让人送来三首诗，要我修改。一首七律《再登泰山》，另两首五言古风《赠李锐》、《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三首诗我都作了些有关格律和文字的修改。关于律诗的平仄、对仗、粘接等格律规矩写了点说明。并送他十来本旧诗词，其中有王力的《诗词格律》。随后一次谈话，他感慨地说道：“几乎不敢再作旧诗了。”现将他赠我的两首诗录下，左边是原稿，右边是改稿：

[1] 1985 年 8 出版。

赠李锐同志

延水创伤甚，	延水山洪猛，
庐山复蒙羞。	庐山云雾愁。
犟劲终不悔，	强项悲日月，
雕虫度春秋。	铁栅度春秋。
狂歌妖雾扫，	长歌驱毒氛，
拨乱竞同俦。	低唱觅同俦。
胸中浪潮涌，	潮浪胸中涌，
笔下蛟龙游。	蛟龙笔下游。
调反三峡坝，	调翻三峡案，
言诤九派流。	言重百家流。
潇湘一冷月，	云破潇湘月，
青光耀斗牛。	青光耀斗牛。

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

妾本禹王女，	妾本巫山女，
含怨侍楚王。	含怨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	泪滴三春雨，
愁比江水长。	愁染六月霜。
愁应随波去，	泪愁应随东逝水，
泪须飘远洋。	乘风直下太平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	乞君莫作断流计，
流断永使妾哀伤。	天地灵药八千方。
	石壁立，平湖望，
	流断永使妾哀伤。

这两首诗，不知作者最后怎样定稿的。对照看起来，我的修改其实是多余的。第一首我强改为五言排律，除首两句外，都不如原





1986年，李锐到山东半岛尖端的成山头，相传秦皇、汉武几次来此。胡耀邦同年亦来此，题词“心潮澎湃”，“天尽头”，可说是诗情满怀，字亦豪放。1994年夏，李锐与老伴重游此地，重睹耀邦所题写石碑，不禁感慨万千。

作。“雕虫”自比“铁栅”贴切，点明《龙胆紫集》的由来。第二首作者借巫山神女之口，一气呵成，修改的反添了个要查出典的啰唆句。（巫山据传为天地放灵药之处，有灵药八橱。）大家知道，作旧诗需要一些旧学基础，这方面耀邦虽非行家，但从这两首诗来看，从意境、物象、情源到遣词、用韵，确是古风，读起来琅琅上口。有些老同志也喜欢作旧诗，但语多概念，缺乏诗意，不合格律倒是次要的，被人称为“老干部体”。我国的旧诗词源于民歌，《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当时能弹唱的歌曲，即“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隋唐以后，诗渐与乐曲分开。“诗言志”，但主要是“动于情”，没有需要喷发的感情，哪里来的诗歌呢。古今中外，一律如此。刘勰：“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白居



1989年4月6日下午，记者给胡耀邦拍照，举机时，记者说：请笑一笑。胡答道："我怎么笑得起来！"瞬间，记者按下快门，不料这张相片成为胡耀邦的绝照。此照经胡耀邦家属认可，作为遗像陈列在灵堂上，这是建国以来，国家领导人追悼大会上第一次用彩色照片作为遗像。胡耀邦离开我们已八年有余。古今中外，大凡对历史进步作过卓越贡献的人，总是为后人永远思念。胡耀邦自不例外。

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实，声义。"林语堂："诗歌，那不过是渲染着感情的真理。"聂绀弩："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派："诗乃泄情的管道。"别林斯基："感情是诗情天性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

耀邦是一个富于感情的真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失天

真的人，他胸无城府，总是以善心待人。1986年，我到过山东半岛尖端的成山头，相传秦皇、汉武几次来游。耀邦1984年到此，题词："心潮澎湃"，"天尽头"，刻有石碑。可说诗情满怀，字亦豪放。1994年夏，中共组织史资料领导小组在荣城开会，我重游此地，见新建列队秦俑，秦始皇塑像等，重睹耀邦所题写石碑，不禁感慨系之，吟得一绝：

澎湃心潮天尽头，重来秦俑气赳赳。
八年修史事将毕，鉴往方无后顾忧。

粉碎"四人帮"之后，耀邦逐渐主政十年，拨乱反正最先做的两件大事，便是从意识形态批判"两个凡是"，从干部人事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这需要何等气魄，何等胆识。他当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不先办好这两件事，也不可能开辟改革开放的道路。回顾我们国家，我们党七十多年走过的道路，能够从"红小鬼"的队伍中，锻炼出来一个胡耀邦，这应当说，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安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安慰。

上述胡耀邦去世当夜我写的悼文中，写他于1988年到湖南、广西休息，到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济济于道，争相握手，要求留影；到南宁后，他只好足不出户了。因此文末有这样四句悼诗：

天下奇冤已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此诗第二句的含意，就不是这篇小文所能述及的了。

1995年11月2日

四面江山来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1996年5月16日李锐夫妇同邵燕祥夫妇、朱正（左一）游黄山等名山胜境。前面半蹲者为邵燕祥。朱正为著名作家，著有《1957年夏：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黄山小集

5月中旬，应《警探》社长尹曙生邀请，同邵燕祥夫妇、朱正游黄山等名山胜境，余年届八十，与老伴爬山越岭，精神舒畅，兴致淋漓，小有吟哦，以谢主人，并抒感怀。

两度南迁磨子坛，从无妄想上黄山。
重来老客客惊老，久做闲人人不闲。
难得平生偿夙愿，多蒙盛意证前缘。
卅年旧梦层云上，独坐专机向日边。

——1959年庐山事变后，经北大荒劳动，1963年底下放安徽磨子坛水电站当文化教员。1967年11月1日乘专机飞京，关入秦城8年。1975年6月再返磨子坛劳动。1979年1月6日始回京复职。

五台山咏怀(四首)

岂可无诗上五台，平生夙愿古稀来。
此间佛住尘难到，也学弥陀洒落怀。

老夫犹有少年情，无奈形如拄杖僧。
举步脚跟须立稳，登高心境更舒平。



1990年6月13－14日，李锐与夫人游五台山时的留影。

五台一上忆当年，三晋地区烽火天。
尚有袈裟争贡献，禅林也喜伴硝烟。

打罢蘑菇过五台，雪中一宿别如来。
留言莫怪挥戈急，决战时机已挂怀。

1990年6月13日、14日，游五台山佛光寺、显通寺、塔院寺、南山寺等，到达菩萨顶时，须登一百零八个台阶，住持法师说，象征一百零八种烦恼，登上台顶则可消灾免难。到南山寺会晤住持慈音法师，法师17岁时曾参加边区游击队。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4月12日由繁峙县伯强镇踏雪登上五台山，住塔院寺一宿。同住持谈到当时战争形势，救民于水火正是佛祖慈悲为怀之理。正殿有横额“毛主席路居旧址”，各室均有说明。别五台山时，书楹联一幅：“万木森然，群山拥立，五台最具英雄气；禅林排叠，千佛慈悲，百姓唯求安乐身。”



1987年李锐夫妇游张家界。



1987年李锐在张家界为人作字。中为柏原，原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雨中登黄狮寨

也想凌云上顶巅，别看已过古稀年。
登山从未居人后，言事敢为天下先。
小雨侵苔防滑跌，冷风打面自悠然。
奇观一览危岩立，如醉如痴不欲还。

云　岗

有幸登临发已霜，青春立愿仰云岗。
龙门大足叹观止，塞北砂岩易创伤。
政教人神齐一统，儒家释道共联邦。
中华文化堪称绝，我辈如何更要强。

[云岗石窟地处塞北，又是砂岩(龙门、大足皆石灰岩)，风化特甚，尚有山水渗浸威胁，如何保护，是一大难题。]



1990 年 6 月，李锐夫妇游览山西大同云岗石窟。

“左”祸
——无尽的忧与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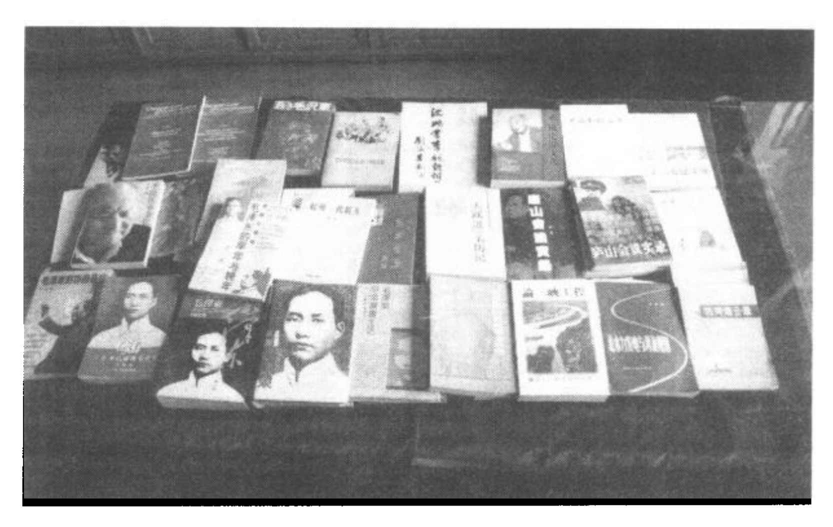


重读《不要害怕反对意见》

回顾过去一些“左”的方针的提出，若从认识方面去找原因，总是源于主观性和片面性。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的最好办法，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多听各种不同的意见，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都听，特别是要听反对的意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到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1956年上半年，各地经济建设工作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中央及时发现，敲起了警钟。当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撰写的。社论发表以后，各地着重纠正了“左”的冒进，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也在上半年，34个经济主管部门，分别向中央负责同志详细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和问题，毛主席集中了中央和各部门集体的智慧，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开始提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对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原则、比例关系、管理体制等，作了精辟的论述。下半年，围绕中央提出的探索新道路的题目，各个部门又都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些探索的成果，集中地反映在“八大”制定的方针、路线上。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日益被削弱以至于被破坏，上上下下搞一言堂，听不得反对意见了。

讨论问题时，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听反对的意见。1956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不要害怕反对意见》，是为贯彻“八



李锐著述甚丰，有关毛泽东的研究书籍影响深广，且被译为多种外文出版。图为李锐的部分著作。

大"精神而写的。其中的一些话，我们今天重温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 对于我们许多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负责人来说，重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重视自己认为是不正确的反对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在讨论问题制定决议过程中，常常不是有意识地组织启发各种不同意见展开充分的讨论，不是有意识地使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有充分的申述自己主张的机会，而常常是用领导者的意见去轻易否定反对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甚至用粗暴的态度去压制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志。
>
> 有些领导人员所以不重视反对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体会到这样做的好处，他们还认为

这样做会有很多害处。他们忘记了，没有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就不可能有什么集体领导。

聪明的领导者，应该像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允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

事实确是如此：对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关系重大的问题，不论是一个政策、一条法令、一项工程，一定要允许讨论，让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展开争论，让正确的去说服错误的，让不全面的得到补充修正。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工作才能顺利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带头恢复党内外的正常民主生活，这是形势越来越好的根本原因之一。但这个问题现在是否上上下下都解决好了呢？恐怕还很难说。在当前各项改革工作中，大大小小的事，难免出现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可是，由于提出了反对意见或者讲错了话（有时并非错话而只是不合时宜甚或误解），就受到指责乃至打击之事，也并未绝迹。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话不说更不写，仍旧成为一种处世哲学。所以，为了建立正常的民主生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即便是真正的错话、错误的观点，也需要采取“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失败为成功之母，错误为正确之伴。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如果没有“言者无罪”这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

1985 年 4 月

封建遗毒和“左”的顽症[①]

大家公认，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精神。当年陈独秀“敬告青年”有六点：“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70年过去了，历史变化很大。但是，他所讲的六点精神并没有过时，回顾历史，五四精神在我们整个民族中的影响究竟如何？在共产党中的影响又如何？很值得我们沉思。

五四运动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来，很快转化为救亡的革命斗争，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由于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克服千难万险，才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取得革命的胜利。但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又这样不科学、不民主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原因之一是，封建主义一直纠缠着我们，终于导致“文革”十年复辟了封建专制主义。反封建主义仍然是我们没有完成的一个历史任务。比如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等等封建东西，难道绝迹了吗？官倒、官本位、权大于法，也并非资本主义现象。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首先就特在封建主义的传统。西方国家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才发展了资本主义。没有民主与科学，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同样，没有民主与科学，社会主义也建

① 本文是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刊1989年4月22日该报。

立不起来。在中国,封建主义就是打不倒,封建主义的种种表现形式,并没有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相反,封建惯性根深蒂固。1949年以后,我们总是讲要防止资本主义,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不少人仍然认为最危险的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有人一听民主和自由,就神经紧张起来。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我们却连人性、人格、人权乃至人道主义也感到厌恶。《邓小平文选》中关于反封建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讲了许多,道理不能说都不懂,问题就在做,在如何贯彻。

此外,还有几十年来"左"的教条的束缚,有洋的,也有土的。"左"的顽症同封建主义一样,没有解决。如在经济上,从"大跃进"起,一贯急于求成,总在"扭秧歌"。大起大落与不讲经济实效,两大顽症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说到底,也还是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是分不开的;大小决策不实行民主化、科学化,就必定出现或大或小的错误。总之,只有依靠民主与科学,领导才能有真正的权威,工作才会有真正的效率,国家与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安定团结。否则,必定事与愿违,南辕北辙。

当然,民主、科学同法治也是分不开的。我们现在还是习惯人治,不习惯法治,领导人还是喜欢个人说了算;人们还是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直至执法犯法。我看,在我们这个几千年封建传统和小农经济的国家,把民主、科学与法治当作吃饭一样,为生活之必需,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恐怕要几代人不懈努力才能做到。因此,民主、科学、法治,我们应当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根深蒂固的还是“左”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众所周知，必须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也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个中心不放。这是我们在几十年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取得的认识，理应十分珍惜，毫不动摇。可是近年来的事实证明，贯彻执行这条路线的阻力还很不小。例如，有些人总想将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或者只是将发展生产力这一个中心挂在口头上、文字上，实质上仍变方设法以政治挂帅或阶级斗争为中心。有些“理论家”讲话，发文章，拐弯抹角地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认为生产力标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等等。他们对特区、开放区，对三资企业，对股份制、证券交易等，统统看不顺眼，甚至将它们同过去的殖民地挂起钩来。总之，把现实看得漆黑一团，说什么“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新的剥削阶级正在形成”。有的“理论家”勇敢地把矛头指向改革开放，说是要承认并限制改革开放的消极作用。现在中国大地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中出现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该通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进行自我调节。而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却是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跟改革开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可是就有“理论家”杜撰出一个“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的概念，以便为自己诋毁改革开放制造口实，用所谓“反对和平演变”的口号来达到反对改革开放的目的。他们深

藏祸心地说："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理论家"甚至露骨地说："文化大革命抓走资派还是有必要的，只是不该往下层抓。"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当年"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说的是谁，也就明白"理论家"的本意是什么了。

如果不澄清大小"理论家"们制造的混乱，改革开放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今年1月邓小平南巡中，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谈到有些"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还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些话确实是击中要害。

其实这是小平同志多次阐述过的思想。总结1957年以来的历史教训，他说："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58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

"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这些话都是1987年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五年，他不得不再说一次"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足见这个问题还远未解决，足见这习惯势力之根深蒂固。

"左"的东西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大的势力？应当承认，首先这同我们党员的理论水平不高有关。我们党建立不久，即投入紧张的革命斗争之中，打了20多年仗，理论准备不足。执政之后，又

忙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繁重的经济建设，没有注意系统地提高党员和干部的理论水平。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都分不清楚，长时期唯上之命是从。于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例如，“左”倾错误的一项主要内容，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的，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其理论表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指导理论来检查，这正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从而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错误理解了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于是导致了“左”的深重灾难。为了吓唬土包子，愚弄工农群众，甚至连似是而非的“理论”也可以不要，而把事情加以极端的简化：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往往被说成右倾保守；凭主观意志，冒险盲动，则被认为革命，好像越“左”越革命。经过 20 多年事实的教训，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灾难，更加使人深思这些根本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大大提高了大家的认识水平和辨别能力。大小“左”的理论家们，虽然还在不断设置障碍，努力表现自己，但市场毕竟缩小了。这就是进步，就是希望所在。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革命急性病，则是容易造成“左”的错误的社会根源；党及其领袖的崇高威信，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容易接受“左”的“革命行动”。

对于“左”的错误所造成的灾难，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著作中，也有不少批判“左”的论述。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五年，遵义会议后纠正了过来。20 年“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了。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些人一定不肯接受历史的教训，硬要把“左”的理论“左”的路线当作不忍释手的宝贝呢？这里有一个比较隐蔽比较深层次的原因。今天，一个人考虑问题，如果真正以党的事业，

以国家的前途，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是不难看清“左”的危害而决心改正“左”的错误的。如果仍然只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和利害得失来考虑，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也就是历史上的惯性力量仍在起作用，即“左”倾主观上是要革命的，动机是好的，犯的错误也不过是方法问题，一般不会受到严厉的责备，决无任何危险可言；而被视为右倾性质的“错误”，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立场问题，照例要受很重的处分。所以就有“右倾危险，‘左’倾保险”，“‘左’比右好”，这样的传统观念总在起作用。一个以个人得失为出发点的人，当然会宁“左”勿右了。几十年来因为被认为是右（实际是正确）而得祸，因为“左”（实际是错误）而得利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无处不在。不幸的是，这一历史现象，现在仍然是一个罩在人们头上的阴影。“右”的平反了，仍被冷落，尚有余悸，要“夹住尾巴”；“左”得可怕过，仍昂道阔步，照旧升官，一遇机会便又兴风作浪。人们上下左右，都可以看到这样两种命运和两种趋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对被认为右倾的干部，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吗？而在执行正确路线的时候，对于犯“左”的错误的干部，却不为已甚，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那些搞“左”的一套的人，在一段时间里也许不甚顺心，可是个人利益并无所损，因此，卷土重来累见不鲜。而一些挺身而出，敢于向“左”倾错误作斗争的人，往往得不到保护，常常横祸飞来，不免落得中明枪暗箭而落马的命运。严酷的斗争事实暗示人们：“左”为安身立命之处，最有利可图，而且风险最小，这当然是有巨大吸引力的。这一历史现象今天并没有在社会舞台上消失。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在分析“左”的根源时，不能不得到这样最确切的例证。当“左”的“理论家”侃侃而谈大发宏论的时候，人们不免猜测：他这时是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地位和权势乃至野心打算呢？这是有事实为证的，我们只要揭开这些大大小小的“理论家”的老底一看，就明白了。原来他们这些人，有的是响当

当的造反派，有的是整党中未被处理的“三种人”，有的是“文革”中各种写作班子的骨干，有的是积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能手，有的是“凡是”派，有的是一贯“左”得可怕有前科的“老左”……其中有的人甚至居心叵测希望学生再闹事才好。就是这样一些人，组成了“左”的从理论到行动的队伍。莫非在他们看来，现在又到了他们卷土重来再显身手的时候了么？同志们，请不要忘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曾这样提醒过大家：“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

错了。这些“理论家”对当前形势的估计错了。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历史必然，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逆转。谁想来阻挡，只会变成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敏感”一点的“理论家”已经感觉到了他的事情有点不妙。君不见，在表明其一意孤行的决心时，发出“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这种类似豪言壮语的呼号，其实不过是日暮途穷的哀鸣。“只剩下一个人”去奋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这种“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深信自己事业的必胜前途，也永远能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难道会越来越脱离群众，最后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么？同志们，“理论家”的这种哀号，正好表明他不过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而已，一个“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而已，他对自己从事的活动其实并无信心，他的心其实虚得很。

在当前世界格局剧变之际，坚持防“左”更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那些反共势力就希望我们出乱子。过去的教训，如以“左”来

对付乱子，就必然惹出许多麻烦乃至恶果，如导致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那样，就可能出现物资匮乏、民怨沸腾的局面，在一些国家中出现过的事态，就有可能也在我国出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千万不能再做亲痛仇快的事情。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改革开放事业，如长江大河，汹涌澎湃，奔腾向前。任何“左”的和右的干扰都阻挡不住。

1992年12月

想起《旧事新谈》风波

1985年4月间，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同志两次来到我家，要为我辟个专栏，写一系列防“左”反“左”的文章；说可以仿照陆定一口述的办法（1984年11月到1985年1月，以〈茗边老话〉栏，发表10篇有关改革开放的短文），由他们笔录成文。我说，怎么敢同前辈攀附，还是我自己动笔写。经过商定，共拟定了30个题目，准备每周发两篇，也登在头版，专栏名称定为“旧事新谈”。

由于4月下旬要出差，于是发了一个狠，一连写了8篇，交给报社，这样可应付4个礼拜了。其他题目，回来后再从从容容写。这8篇题为：“不要盲目追求高速度”，“谈浮夸风”，“再谈浮夸风”，“慎提口号”，“再谈慎提口号”，“允许讨论”，“重读《不要害怕反对意见》”，“要习惯听反面意见”。还在上海出差途中，我就注意到5月7、8、9日三天的光明日报头版，一连发表了前三篇文章后，就戛然而止，不见下文了。回到北京，光明日报的同志就来家，向我深表歉意，并告原委，随后还给我寄来有关事情经过的原件和好几封读者来信。

原来，5月12日，一位从来威风凛凛的老将军，拄着拐杖，来到中南海，没有见到要见的人，由秘书接待，秘书随后向首长送上谈话记录。老将军“拿出光明日报5月7、8、9日载的三篇文章，指给我看，并很生气地说：‘看了这三篇文章，我火气很大！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把现在比作大跃进时期。’‘现在有的地方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把生产停下来，这样做不好。我准备给总理写个报告。’”并

嘱咐："你把我的话报告耀邦同志、启立同志，你就说我火气很大。"总书记和总理对此"火气"的批示，报社的同志也给我了。我这个"早岁曾知世事艰"的人，深深知道，这种"火气"而且"很大"，是惹不起的。

新华通讯社编的内部《新闻业务》1985 年 5 月 25 日增刊 15 期，刊登了一条"不要把目前的超高速比作大跃进"的报导。总书记指出："各地在经济工作中不要攀比速度的问题，中央已经向全党打了招呼，并且已经引起了全党的重视。有的报纸为什么还要接二连三地上纲议论？把某些地方不适当地追求速度，同大跃进攀比，显然不恰当。中央各报再不要登这类议论了。"总理表示同意总书记的意见："不要把目前的超高速度，比作五八年的大跃进，也不要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评论。但须注意，目前各地攀比速度的问题远未解决，认识也很不一致。纠正这种倾向，不能踩急刹车，要逐步使之降速，但必须继续采取措施和统一思想，否则对我经济的健康发展必将引起不良后果。亦请各新闻单位注意此点。"

就在 5 月 13 日下午，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就将光明日报总编找去，通知中央意见，"这三篇文章把现在同大跃进类比，不好。以后的文章停发。"5 月 17 日，首都新闻单位的吹风会上，明确传达了上面总书记和总理的意见。

5 月 18 日，报社约我搞这个专栏的同志，又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再致歉意。信中说："对此事，我认为这三篇文章并无将现在与大跃进类比的意思，只是旧事重提，要人们注意和警惕。这也是一般读者的看法。就我听到的周围同志的反映，认为这三篇文章不错，也收到两三封读者来信，也是反映文章好的。我们报社的缺点是发得急了一点，我原想隔几天发一篇，但总编在发了第一篇文章后，听到了好的反映，就催着发，说要有点声势，连拦也拦不住。结果给您帮了倒忙。此事'始作俑者'为我，给您惹来麻烦，实在很对不起您。"

报社一共给我转来四封读者来信。安徽安庆市委讲师团程多

伟的信，信前有个标题："请老同志多写些这样的文章"。信中说："沉痛的教训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因为它们都随时有重犯的可能。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当前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如果将它束之高阁，那么，三十多年来付出的巨额学费不就太冤枉了吗?"南京的沈存步信中说："过去的浮夸风与今天的浮夸风现象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浮夸风气是害党、害民、害自己的。报刊编辑同志理应站在反对浮夸的前列，为实事求是风气之先行。每写一篇文章，每公布一个数字，每宣扬一件事物，都要切忌浮夸。"有两封信是直接请报社转给我的。天津的贾林说："你两篇谈浮夸风短文，好似两把利剑，入木三分，对于历经艰险过来的人，读后痛定思痛，追悔莫及。只盼今后我们党再不重复这些错误。我党历史上这类错误犯过多次，为什么不能彻底纠正呢? 我觉得党内缺乏真正的民主，吃亏就吃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大家习以为常了。"信中还谈到，有些领导干部忙于事务，有的专看风向，有的喜欢互相攀比，年青干部又无切肤之痛感受。"你的话，真是语重心长，良药苦口，衷心希望你今后勇敢地直书，以有利于党、国的事业。"

5 月 14 日的《报刊文摘》(上海《解放日报》出版)头版头条，转载了 5 月 8 日《谈浮夸风》，标题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副题为："李锐认为忆忆大跃进刮浮夸风的苦很有好处"。

由此可见，不论广大读者或报业同人，对于我那三篇文章的内容和立意，都是清清楚楚的，不过是"旧事新谈"，要大家不要忘记过去痛苦的教训，不要再犯过去那样性质的错误，并没有将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比作 1958 年的"大跃进"。1985 年第一季度，经济上确实出现了过热和过高速度的情况，总理的批示说得很清楚："目前各地攀比速度的问题远未解决，认识也很不一致。"

这种"麻烦"，于我实无所谓，我这个洞庭湖的麻雀，是见过风浪的。由于三峡问题，"话不投机"，这位老将军对我有成见也是早有所闻的。(6 年之后的 1991 年，为三峡之事，还骂过我是"反动

分子”呢。)光明日报上不再发表的其他五篇小文,后来也在别的报刊上发表了。可惜的是,30个反“左”、防“左”的题目,没能一气写完,至今想来,仍是憾事。不然完全可以编出一本防“左”、反“左”杂文集的。

1994年4月

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顾准文集》是王元化同志送我的。这之前我不知道顾准其人其事其文。他大我两岁，我们是同一代人。但九·一八事变时，我在长沙刚上高中，他在上海已经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我们都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投身革命的。面对日本侵略，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就要引起思考，就要追求新的东西。那时新的东西，就是苏联，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虽然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性格不同，兴趣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同，但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受难使人思考　思考使人受难

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出现，当然有特殊的主客观条件。革命胜利了，作为革命者的顾准，却要受革命的苦难。从“三反”，到“反右”，到“文革”，大的磨难他就经历了三次，并且戴了两次右派帽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吧。这种受难，这种异化，全国成百万成千万的人经历过。可是他们，也包括顾准在内，恐怕谁也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又是马克思说的：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于是，许多受难者成了思考者。可是，就知识分子来说，在受难后的思考，一般不过是“反省”自己的“错误”，乃至有“原罪感”，想不通也得想通。而顾准的思考却是大异其趣，他始终在思考一系列最根本的问题。对于人们习惯地不思索就接受了的一些成说，对于一些几乎被看作无需加以证明的公理式的成说，他都重新

思考，提出质疑、补充、限制和修正。

1959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顾准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我正独处秦城囚室，八年中的最后两三年，也让读《资本论》、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书了。我也对一些问题，例如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是非得失，一些人物的功罪，反反复复地思考；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哥达纲领批判》等，发生一些怀疑，也有心得。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这自然同他系统地研究过经济学有关，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经济和价值论等，像他思考得这么深、这么透的人，当年大概是极少的。80年代，孙冶方是我的对门邻居，我们很谈得来，他50年代即倡导尊重价值规律，是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才知道，这方面他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比他更厉害。单说这一点，顾准这样的人就太难得了。顾准晚年的思考，不局限于经济，而是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等广泛的领域，着眼于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他一直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怎么办"，"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为何命运多舛"，等等根本问题，苦苦思索，寻求答案。所以他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而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不只是对自己负责的人，而是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负责的思想家。人们呵，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多么可贵！

元化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不止同一般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大大超前；同善于思考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不久前，我见到一位曾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老同志，他也极口称赞顾准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顾准读的书很多。他不仅读经济学方面的书，还读中外历史、政治、哲学和自然科学，他的英语很好，有不少译著。他着意研究西方文明起源的希腊历史，《顾准文集》中第一部分即十几万字的《希腊城邦制度》。他研究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研究老子、孔子和韩非。他的知识很广，很全面，这是他成为了不起的思想家的重

要条件之一。

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他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的勇气。他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马、恩、列、斯、毛都不盲从。他从现实、从历史、从前人已经达到的思想出发,对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都放胆重新思考。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他身处"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环境之中,写出这些心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是一种布鲁诺甘赴火刑的崇高精神。

对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20世纪人。20世纪发生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经历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道路快走完了,在这样的时候,应当对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顾准是最早开始这种反思的。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二次世界大战,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从孔夫子到毛泽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他都作了深入的反思。他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亲身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他的理论修养加上他的理论勇气,使他的反思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深度,这都反映在《顾准文集》尤其是其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著作中。他的工作,应当由活着的人继续下去。如我们应当弄清中国本世纪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开国以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前苏联与东欧的变化是怎么回事。

本世纪人类最大的变化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也有空想。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容纳的产物。而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都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西方。从列宁到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设想的并不一样。可以说,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俄国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又都有不少误解

和曲解。迷信精神变物质、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苏联失败了,斯大林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列宁所痛斥和批判的第二国际,在北欧、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倒是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影响到北美,使资本主义并没有到“垂死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尤其科学技术的作用,还在发展还在进步中。马克思设想的缩小三大差别,首先体现在这些国家,顾准对这些情况和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阐述。人类所有好的东西都应当继承,错的东西也不应回避。马克思哪些是对的,哪些是空想的,行不通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对了哪些,搞错了哪些;到底是什么问题,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不弄清楚还会犯错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包括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自由。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自由是人的本质;“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人将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真正主人。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还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战争问题、发展问题、贫富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矛盾的问题,此外还有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是又乐观又不乐观。但有一点看得很清楚:人类社会在前进,资本主义也还在前进。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前进。当然,在这个社会经济结构转轨的过程中,不会没有艰险,没有痛苦,没有失误。只要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对策,修正错误,坚持正确,相信这些都是终归可以克服和消除的。可是有人(冒充权威的人)看到这些情况,一不去分析产生的原因,又提不出克服的办法,却要危言耸听,说什么已经影响到我国国家的安全呵,说什么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呵,从而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可是,这些“理论家”能够开口唱的,仍只能是老调重弹,仍只能叫叫“向左转”,“向后转”。我们已经付出过那么巨大的代价,回到过去的老路决非出路,这难道还需要论证吗?再说,谁有此“回天之力”呢?



《顾准文集》是王元化送给李锐的，王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李锐认为顾准思考深、广，在某种意义上是先知先觉。许多受难者成为思考者，顾准是最典型的范例。图为 1994 年 11 月 26 日，李锐(右二)在杭州参加东西方比较研究会，同王元化(左二)、汤一介(右三)等人的合影。王元化为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现在，对于打击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并且已经看见了成效。而在文化出版领域里，却未见同步开展“打假”活动。一些假冒伪劣的所谓“理论家”，还备受保护，颇为风光。宣扬假冒伪劣“理论”，以对抗现行开放改革方针的书刊，仍照出不误。

不久前，看到亚太经合组织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摘要(见 1995 年 12 月 30 日、31 日《参考消息》)。报告回顾了世界经济 200 年的历史，指出 1820 年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排在印度、法国之前，更在美国、普鲁士之前。后来是落到后面去了。报告分析了各种类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分析了中国落后的原因，我以为很能启发我们的思考。很需要有顾准式的思想家来思考。这份研究报告预言，中国在今后十年中可能重新发展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力量。这也正同顾准所作的一个预言是吻合的,他在辞世前一年,在个人丧失一切、困顿至极的情况下,乐观地预言:只要我们"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①]这些话是1973年6月11日说的。由此可见,顾准不但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家。

敢于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 又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③] 我们民族可以自豪的是,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作理论思维的,有顾准这样的思想家。他从研究希腊文明入手,对东西方文明,科学与民主,直到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都作了历史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英国发生的原因,看出了马克思受到的历史局限,对马克思所下的一些定义和设想提出了质疑。当然,他更关心的是他的祖国。顾准说:"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毛泽东在1949年前,都说过这样的话。)顾准提出,"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不论从民主与科学,他都反对权威主义。他谈到民主集中制的利弊,"如果说,科学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碍的话,那是人文科学和哲学,因为这个领域,正是权威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但是,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

---

① 《顾准文集》第3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7页。

③ 同上,第465页。

已。""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顾准指的科学精神包括五个方面:

"(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同科学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①]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呵!

顾准写的许多东西都没有保存下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他与弟弟的通信,没有想到要出版。现在,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领域里的实践,有些方面也许顾准还不曾想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否定市场经济、否定商品交换和没有货币的,但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不能逾越。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已经超过了马克思,这很了不起。但政治上只搞了点行政改革。在民主化进程方面,离顾准的思考还差得很远。腐败同权力并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今天出现王宝森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有一些地方,大大小小的"王宝森"不少。有些乡村干部对农民竟有生杀予夺之权,使人触目惊心。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的讲话中,针对历年有关的积弊,提出了一系列以

① 《顾准文集》,第344页~345页。

贯彻民主为基础的改革措施，可惜多年来未能一一落实。只要能真正全部落实这个讲话的措施，如权力导致腐败这类问题，相信必能逐渐得到解决，我们的政治、社会环境，必将出现一番新气象。

《顾准文集》能够出版，是历史的安慰。这样一本书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要改革，要发展，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不行的。顾准的思考，只会启发我们的智慧，只会有益于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益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他是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也是真正爱国的。但他被迫害到家破人亡的程度，这种悲剧自不应再重演。我们一定要造成这样一种环境，使顾准式的思考者不再遭受迫害，使顾准精神能够得到传播和发扬光大。孔繁森了不起，应该提倡学习；顾准更不了起，他是当代思想史上的先驱，更应该提倡学习。

学习顾准，我想，首先，要学习他对自己、对历史、对中国和人类前途负责的精神。理论思维，不应该是一种远离现实的抽象概念。顾准在他读《资本论·原始积累章》和《共产党宣言》的笔记中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①]他是这样赞许马克思，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其次，要敢于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顾准就是这样做的。每一个有出息的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这样做，而不能躺在无论何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现成的教义上。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这样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最近读到一位我尊敬的理论家的长篇论文，他根据本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变局和当前的现实，来回顾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一系列原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对之作了新的理解和批判，并澄清了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和曲解，论证深刻，有说服力，读后觉得深受启发。希望我们的理论界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出现更多的顾准。

---

① 《顾准文集》，第 311 页

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

——列席十五大的书面发言

近来从报上看到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报道及有关文章，似涉及了防“左”的问题。这确实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的一个大难题，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否则今后还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

离职十多年来，主管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从一大到十三大）的编纂工作（省地县三级已出版，中央卷近期也将面世）；同时，自己也写了一些50年代的经历和有关研究毛泽东的书。因此，回顾历史，感想颇多。古人说得好：“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恩格斯也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中顾委撤销后，很少讲话的场合。趁这次列席十五大的机会，本着知无不言之旨（却难言尽），就回顾历史谈一点感想和意见。我今年已满80岁，来日无多，以后这样的机会恐也难得了。

（一）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

王明的“左”倾路线，从1931年开始，经过遵义会议，到1941年延安整风，整整10年，才做了全面总结；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认识，取得革命胜利。但一些根据地的“肃托事件”，1942年审干抢救运动，解放战争期间的土改，仍出现过严重的“左”。

建国头七年，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等方面，成绩很大，但也有改造过快等“左”的东西。1957年至1978年20

年来,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走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但直到现在,“左”的阴魂从未散去。有鉴于此,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特别讲了“左”是根深蒂固的问题。可以说,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狠抓一个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和理论,近20年来,与之相对的种种“左”的干扰始终没有停止过。

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江西时期从“富田事变”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我接触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个地区共杀了4.5万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五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的。

延安抢救行动,康生执行,说“特务如毛”。幸有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才没有再开杀戒,但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可是《唐纵日记》1942年8月23日写到: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唐纵是戴笠的二把手,当年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1950年在长沙时,我翻过全部日记原件。(《日记》现已出版)

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1/10的知识分子,内多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四清”运动,认为有多数基层组织不在我们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1978年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是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左”王、“左”爷们时有表演。如借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整得周扬抑郁而死;后来还演化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搞了28天,才被制止。



1997年9月，李锐作为原中顾委委员列席十五大时，同任仲夷（左一）、于光远在交谈。

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上述历史情况？首先是理论与认识问题。

革命时期，“左”的教条主义盛行，同共产国际、斯大林有关，对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认识上有偏差，包括肃反政策也受苏共影响。七大前总结历史教训的第一个《决议》，讨论时虽然平反了一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但是从“富田事变”开始的“肃反”运动，并没有做全面彻底的总结。审干抢救运动，也没有认真总结教训。康生这个“肃反大师”一直身居高位，“文革”期间同“四人帮”结合，在党内党外，从上到下，全国各地，制造了千千万万冤假错案。

建国初期，土改完成，认为封建主义已经解决。开始建设，争取苏联援助，沿用苏联模式。《论十大关系》想摆脱苏联某些影响，走自己的道路，但总的方向仍是列宁那里来的：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时刻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认为今后的斗争对象与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且又急于求成，反右结合反“反冒进”，搞“一大二公”，平均主义，从合作化到公社

化，三年“大跃进”，超英赶美，一度幻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几千万人。仍然不接受教训，转而从经济运动完全转向政治运动。认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为整个过渡时期，一直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终于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清除“身边的赫鲁晓夫”，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乱”。

回顾1945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将中国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真是不胜感慨。

上述情况同当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关系。争相输出革命，两大阵营对抗竞赛，东风压倒西风，资本主义已到垂死阶段，帝国主义日落西山。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盖子的后果，导致我们长期的反修防修，同国内“左”的路线紧密结合。

总之，如小平同志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尽管近20多年来，我们从实践中解决了一个中心，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经济多元化，发展三资企业等等，同过去路线相比，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步履蹒跚，迟迟未能突破，导致几次失业高峰。这方面从实践到理论都有待新的发展——前无古人的发展，必须突破马恩列斯毛不适于当今世界实际的违时或失效的论述。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当年毛泽东的气概：不要怕马克思，我们做的已超过了马克思。

（二）发生以上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长期“左”的错误，其根本原因何在？

前面已经提到，首先是理论和认识问题。说得简单一点，两个时期都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长期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框框。马恩的学说产生于19世纪的西欧，他们根据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得出来的结论，怎么可能适用于100多年后的东方与全世界呢？马克思自己

就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提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发展的，是不能停滞的（真理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有同有异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要怪列宁、斯大林，只能怪自己。何况我们并没有遵从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可是十年“文革”我们全部颠倒了。

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理想提出来的。西方早期社会主义者囿于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只能从道德上抨击初期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无法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物质基础。马恩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社会公正的价值观，根据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与社会两极分化，看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力量所在，从而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一切私有制”。他们对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公有制，不可能作具体设想。列宁急于消灭私有制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碰了钉子后，改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是长期的过程。斯大林没有继承列宁的路线，反而批判布哈林，从理论到实践，认为只有采取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完全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几次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可是历史证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还在经济的失败（现在还有40%的国有制），民心不满首先在于商品的匮乏。国有制经济并非社会主义的特色，西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都有各种教训。

我们经过长期的痛苦的弯路，终于认识清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总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把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规定为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追求社会公正），近20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

继续发展。

过去我们讲惯"兴无灭资",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只能永远斗下去,只能是"你死我活"。近20年的对外开放,来往交流,终于提出"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相信马克思活着也会这样说的)。因为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制度的崩溃,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诞生,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全球市场的统一,冷战的结束,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资本与市场,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蓝领"缩小,"白领"扩大)。总之,生产力在变化,生产关系也在变化,更不要说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在走向健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并没有固定下来,还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更是如此。他们两者之间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否可以找到某种共性与交叉之处呢?(西方有一种"趋同论",我们理论界有人批判过。)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包括股份制)发展,就包含有社会主义因素。暴力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马恩也说过)。我们从来反对"改良主义",而能够逐渐改良,用和平的手段发展、变化,究竟有什么不好呢?苏联"和平演变"了,究竟是他自己之过,还是人家"演变"的呢?应该弄个清楚。立场只应当一个:走共同富裕道路,手段各自为之。

除开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外,根本原因还有一个体制问题,即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做得很好,这就同民主化的问题有关。

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儒家命根三纲六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盛行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

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党政不分顺理成章。

但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的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因为敌人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有文化的人，于是阶级斗争更转入思想意识领域。毛泽东毫不讳言：“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不过坑了四五百个儒生，我们打了几十万。一个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天然职责的共产党，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极其重要的讲话。讲话着重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

害。”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向下级交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摘引这么多《讲话》的原文，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经过 17 年之后，《讲话》中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很不受重视，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很好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迟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2 个问题中有 4 个问题同上述《讲话》是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

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工作中，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要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迫切现实性的问题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这些《生活准则》写得多么好。可是18年来，这些《准则》实行得如何？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多年来，似乎很少听到人们谈论这个《准则》了。

正确路线的制定与执行，党及其领导威信的建立，国家各方面事业的正常发展，除开要解决民主化的问题外，还必须解决科学化、知识化和法制化的问题，这四化也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党几十年来，领导革命与建设尤其后者，这四化的建设与贯彻，一直在曲折中前进；历史教训我们，没有这四化的保证，我们的事业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三)应当开始总结这20年来(1978～1998年)的经验教训。

我们要在本世纪前彻底弄清楚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世界整

体发展的趋势。总结最主要的成功经验，更要记住最关键的错误教训，避免再走弯路，21 世纪走上康庄大道。应当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当然，什么时候办这件大事，要由时机成熟而定。但这件事是非办不可的。要允许个人思考，也要让学术机构研究；是自发进行，还是组织领导？是内部“动态参考”，还是允许报刊讨论？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研究历史，不能设禁区。前两个《历史决议》当年都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尤其第二个《历史决议》，全国 4000 人参加讨论，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去掉一切个人恩怨，以党和国家的前途为重，指导思想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相信这件事终能办好。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 20 年能这样走过来吗？何况这 20 年中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

粗粗想了一下，有些问题不能回避讨论：

——是否存在、为什么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这 20 年“左”的表现，今后如何防“左”？如果说这 20 年有右，“右”又在何处？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是否即引进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或存在严重复辟的危险？在我们社会主义政权领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其发展同西方是否会有同有异？革命时期就有“红色”资本家帮我们的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家、企业家是否会多少带些“红色”？

——国有企业与公有企业的区别或关系，如何以公有企业为主？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异何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具体定性，主要是政治、经济和理论三个方面，以及同历史上人家（苏东）与自己（1978 年前）及马恩列理论的同异何在？初级阶段将经历多长时间？几代人，几十年，一百年？还是更长的或说不清楚？

——邓小平南巡前后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四)中国今后的危险是什么?

为保证党今后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使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更加顺利发展,考虑我们有哪些存在和潜在的危险,这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粗粗想来,是否有这样几个问题?

1. 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是否在各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存在?家长制、搞特权、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等等,情况如何? 最近看到一份《1996 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报告》,一共 26 起,多逼得农民服毒身亡,也有爆炸死人,也有打死人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县、乡干部共 135 人。其中山东 10 件,湖南 6 件。

2. 人们都议论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失去民心,情况究竟如何,怎样界定? 过去骂蒋介石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毛主席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恐怕从来是实情。记得反右前,毛主席说过,要鼓励民主党派同我们唱对台戏。随后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当时可能真是这个念头。无奈波匈事件,"右派鸣放",整个历史就走入弯道了。我们党如何进一步健全民主和法制? 除了任期制、选举制、民主生活制度,还应有什么制度? 自己是难以很好地监督自己的。中纪委(监察部)如何加强权力,发挥作用? 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管什么? 如何能保证党不犯错误? 过去我们是吃尽这方面苦头的。党是受人控制的,人又是必然受到三种限制的(恩格斯说三条:历史时代、知识经验、思维能力。还应当加一条:个人品德。)

3. 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左右社会力量的阶级的出现? 如何防止这个阶级对社会生活发生严重的副作用,国家如何从政策等方面加以控制。公私各种经济成分如何服从"三个有利于",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如何相得益彰?

4. 国外威胁问题。对国际形势及世界走向的看法。"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是一种怎样的理解与认识,如何对付。苏联的外部教训何在? 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苏联的崩溃起了哪些作用? 这方面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搞过“反对和平演变”，应当怎样认识和估计这一举措。

5. 香港与台湾问题。要充分认识香港尤其在经济上的国际地位。争取香港民心也真正回归。目前香港总产值约占全国的1/5；人均已超过英国；向内地的投资占全国外来投资的60%。如何发挥香港的正面作用？大陆、港、台经济能否做到“一体化”？如何分化台独，争到民心。解决台湾问题关键何在？台湾对我们的危险何在？

6. 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已占全国土地的1/3。导致洪水灾害的原因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哪些蠢事，哪些坏事？有关系统应该总结治水的经验教训。三峡工程木将成舟，我只建议，要接受三门峡教训，要准备后事，即水库形成后，将出现哪些严重问题，怎样防范？

7. 教育乃立国之本。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又素质不高，社会无序（犯法人多）。人口太多如何消化，已经出现过三次失业高峰。普及义务教育，如何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世界今后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的竞争，也即是人才的竞争。关于提高素质的教育，人的素质靠什么保证？我想起《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还使我想起鲁迅说的一段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1997年9月8日于北京医院

列席十五大有感

回首沧桑一百年，山穷水复路盘旋。
根深蒂固须防“左”，独断专行应靠边。
松绑思维齐活跃，开窗空气便新鲜。
共同富裕旗高举，求是精神永向前。

刊《中华诗词》1997年第5期

八十行吟气浩然



饱经沧桑的李锐，与家人团聚一起，尽享天伦之乐。

自寿诗

五十自寿

依然一个旧魂灵，风雨虽曾几度经。
延水洪波千壑动，庐山飞瀑九天惊。
偏怜白面书生气，也觉朱门烙印黥。
五十知非犹未晚，骨头如故作铜声。

六十自寿

风云变幻着鞭先，回首沧桑六十年。
东抹西涂饶少壮，南奔北走斩河川。
生涯岂料逢虚席，逆境常因好妄言。
四害一除天下治，余生可望不吟闲。



1998 年 3 月,李锐与夫人张玉珍在海南三亚与海龟嬉戏。

1998年3月11日，李锐参观潮州韩文公祠，遇到前上海市委书记、市长、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汪亲切交谈。





80年代初，李锐与夫人张玉珍在家中阳台上观赏昙花。



李锐与夫人张玉珍在书房近影。

七十自寿

三月春风犹带寒，小楼今日故人欢。
书生议论曾何补，世事沧桑佐乱谈。
士气峥嵘焉可侮，民心向背最相关。
可怜日夜萦回处，但望神州快着鞭。

八十自寿(六首)

精神独立自由难，八十行吟气浩然。
曾探骊珠沦厄运，仍骑虎背进诤言。
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
欲唤人间归正道，学操董笔度余年。

八旬何必言虚度，廿载却曾哀废荒。
胸有黎元行坦坦，心无杂念志堂堂。
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仍忧乌托邦。
待听山林鸣众鸟，好风吹送百花香。

人生大困唯饥饿，终岁曾经拒死亡。
牢狱单囚虽痛苦，心官久炼愈聪强。
敢夸后辈忘机乐，且具专长却老方。
鉴往知来无所溺，六根未净少年郎。

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
一床独坐翻书缓，四季闲居畏日长。
笔底风波今未免，平生意气老犹昂。
是非毋待百年决，十亿神州奔小康。

不发牢骚不自怜，楚狂本色总依然。
难充工具难驯服，却近人情却达观。
长觉此身仍属我，厌随流俗只当官。
韶华幸喜没空老，放胆高歌世变迁。

耄矣无穷遗恨篇，至今水电未优先。
曾抒壮志好多省，总扭秧歌老大难。
“乱点鸳鸯”情理悖，苦挣夹缝路途艰。
呜乎大禹嗟何在，酸雨烟灰满地天。

（水电建设为此生最长工作岗位，前后共11年。“乱点鸳鸯”指上葛洲坝、三峡。夹缝指水利与火电之间。）

——1997年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作者=李锐著
页数=455
SS号=10157764
出版日期=